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JOURNAL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社会科学版)

1987年创刊(双月刊)

主 编 杨 威
编辑部主任

责任编辑 李 莉 晏 洁
袁 宇 冯 华
王 蕾 郑静波

执行编辑 王 蕾

特约编辑 谢松波

英文编译 方志彪

封面设计 徐龙翔

排版制作 陈 芬

【特稿】

001 当代青年日常生活的价值意蕴、现实特性及其启示

/冯刚,王桂娟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010 拜物教现象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实挑战
及其有效治理 /林贤明,周宇昕

018 论习近平文艺观的人民性意蕴及其实践进路 /李辉艳,蒯正明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教育部高校学报名栏建设首批入选栏目)】

茅盾研究

026 主持人语 /李跃力

027 爱情幻灭抑或革命幻灭

——茅盾《幻灭》中爱欲问题的文学思想史意义辨析 /杨晓河

035 从“革命文学”论争看《子夜》中的革命叙事

——兼谈吴老太爷的“革命” /刘世浩

鲁迅研究

043 从“怪诞”到“童趣”

——论丰子恺漫画对鲁迅小说的叙事改编 /丰杰

052 《野草》与散文诗的文体边界问题 /妥东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061 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特征、动因、挑战及优化策略

/李宝贵,韩金洋

2025年第1期
第38卷(总223期)
2025年2月15日出版

073 老挝万象中文教育的现状、特点与思考 /杨绪明

085 从流量到知识:泰国网红中文教师教学研究

/何洪霞,廖媛,[泰]Karun Chutharat

【经济学研究】

095 广东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区域比较视角 /李迎旭

105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技术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高楷博,田中景

113 东北地区人口流失对经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牟晓伟,范子怡,全鑫

【海南历史文化研究】

121 文明以止,天人相酬

——兼说紫贝古邑与新传 /周泉根

130 海南中元赈济运行机制与地方社会互动

——以海口白马梁公信仰为例 /李双,褚春霖

封二 特稿专家冯刚简介

封三 编辑部启事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4-5310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6-1076/C

出版日期:每逢双月15日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南路99号

邮政编码:571158

电话:(0898)65883414

网络地址:<https://hlsy.cbpt.cnki.net>



微信公众号

JOURNAL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No.1, 2025 General No.223

CONTENTS

- The Value Connotations, Real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s of Contemporary Youths' Daily Life
..... FENG Gang, WANG Gui-juan (1)
- The Realistic Challenge of Fetishism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Its Effective Governance..... LIN Xian-ming, ZHOU Yu-xin (10)
- On the People-Oriented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Xi Jinping's View on Literature and Art
..... LI Hui-yan, KUAI Zheng-ming (18)
-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iterary Thought History of Love Desires in Mao Dun's *Disillusionment*
..... YANG Xiao-he (27)
- On the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in *Midni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troversy over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Senior Mr. Wu's "Revolution" LIU Shi-hao (35)
- On the Narrative Adaptation of Lu Xun's Novels in Feng Zikai's Cartoons FENG Jie (43)
- The Stylistic Boundary between *The Wild Grass* and Prose Poetry TUO Dong (52)
- The Characteristics, Motivations, Challenge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Integrating Chinese Language into the Cambodian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LI Bao-gui, HAN Jin-yang (61)
- The Status Quo, Characteristics and Reflection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Vientiane, Laos
..... YANG Xu-ming (73)
- From Data Flow to Knowledge: On the Teaching of Influential Internet Chinese Teachers in Thailand
..... HE Hong-xia, LIAO Yuan, Chutharat Karun (85)
- A Study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Population-Space in Guangdong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omparison LI Ying-xu (95)
- On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Population Aging on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GAO Kai-bo, TIAN Zhong-jing (105)
- On the Impac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opulation Loss on Economy in Northeast China
..... MU Xiao-wei, FAN Zi-yi, TONG Xin (113)
- The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A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the Name Changes of the Ancient County of Zibei and Its New Biography
..... ZHOU Quan-gen (121)
-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Hainan Zhongyuan Relief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Local Society
——A Case Study of the Belief of Divine General Liang Teng in Haikou LI Shuang, CHU Chun-lin (130)



当代青年日常生活的价值意蕴、现实特性及其启示

冯刚¹, 王桂娟²

(1. 北京科技大学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院, 北京 100083;

2. 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 日常生活作为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领域, 是每个社会成员都无法摆脱且需要切身投入其中体验的领域, 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当前,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正在不断向前推进, 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科学技术的变革使人们的生活世界呈现出全新景观。与其他代际人群相比, 当代青年的日常生活呈现出明显的代际特征。在消费上, 他们更加理性和审慎; 在社交上, 他们注重寻求有边界感的社交关系; 在休闲上, 他们越来越重视体验的质量和内心感受等。日常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当代青年的重要窗口。通过对“理所当然”与“不证自明”的日常生活展开研究, 发现青年的“常”与“变”, 关注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存在, 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青年日常生活当下社会的意义, 并探寻意义构筑的可能性。

关键词: 当代青年; 日常生活; 价值意蕴; 现实特性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310(2025)01-0001-09

人类作为生命体的存在, 其生存需要属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作为人类生存实践的基础性层次, 日常生活构成了人类一切生存活动的根本基础与前提条件。当今社会, 日常生活发生了诸多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对青年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日常行为模式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当代青年日常生活的内涵十分丰富。通过对青年日常生活的价值意蕴、现实形态和特征表现的总体性解析, 考察处于现实生活中的青年群体, 审视日常生活中的体验和突出现象, 发现当代青年日常生活的新特征, 尝试理解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和目标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对于了解青年人的生活态度、社会关系、价值旨趣、性情爱好、审美情趣、文化品位, 探寻促进当代青年日常生活发展的途径和方式,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回归日常生活世界是现代哲学的重要转向之一。20世纪, 许多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从不同的视角将目光投至日常生活世界, 提出了关于日常生活的构想和批判理论。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Edmund Husserl)提出“生活世界”这一概念, 他将“生活世界”描述为一个“可直观东西的领域”“原初自明性的领域”, 即无前提性的、前科学的、奠基性的世界。“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其对生活的意义”^[1], 胡

基金项目: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党的青年工作研究”(SCJJ24ZD08)

收稿日期: 2024-12-23

作者简介: 冯刚(1968—), 男, 四川乐至人, 管理学博士, 北京科技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院院长,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党建、思想政治教育、大学文化建设和高等教育研究; 王桂娟(1998—), 女, 湖南郴州人,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塞尔提出“生活世界”的目的是为回应当时欧洲科学危机,试图通过返回生活世界来找回科学的意义基础,以此解决科学、文化和人性危机。存在主义创始人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也对生活世界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所理解的生活世界主要由人的存在以及人对于存在的体验构成。因此,海德格尔将人的存在称之为“此在”,通过对人的在世,尤其是通过对人的日常共在的剖析,揭示了现代日常共在的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的深刻而全面的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国哲学家亨利·列菲伏尔(Henri Lefebvre)将“日常生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呈现在人们面前。他把哲学的关注点从劳动异化转向微观的日常生活异化,将批判对象从劳动生产转向日常生活,明确提出日常生活批判这一主题,并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异化现象及其潜在的解放可能性。他将日常生活置于整体的社会里,思考日常生活的概念,“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交汇的地方,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在那里衔接起来,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的共同基础。”^{[2]90}“日常生活包括三个元素,三个方面(工作、家庭和‘私人’生活、闲暇活动)。”^{[2]28}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阿格妮斯·赫勒(Agnes Heller)在《日常生活》一书中,揭示了当代世界日常生活的结构,她认为日常生活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并且是个体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重要领域,将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3]。总而言之,由于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和异质性,任何概括都不可能穷尽日常生活的所有侧面和细节。结合不同思想家赋予日常生活的不同概括,日常生活是客观的、现实的生活领域,是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领域,是自发的、自在的领域,具有重复性、直接性等特征。从分类学的角度来看,日常生活的类型主要包括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日常闲暇活动、日常工作活动,以及日常思维活动等。

近年来,“CityWalk”“Gap day”“公园20分钟效应”“青年养老院”“数字游牧民族”“搭子社交”“反向消费”“夜校”“剧本杀”“电子榨菜”“寺庙热”“精致露营”等时代特征鲜明的青年群体生活样态相互交织。当代青年日常生活中的新趋势和新现象非常丰富,涵盖了消费方式、社会交往、闲暇活动等多个方面。与其他代际人群相比,当代青年在物质丰裕、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中成长,他们既享受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丰硕物质成果,又经历了我国经济发展增速放缓所带来的变化。同时,他们所具有的国际视野使其在观念上更具独立、自由、平等的个性化特征。因此,当代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有着鲜明的青年情结和特色。

日常生活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的特殊生命活动。然而,一定程度上,日常生活却为人熟视无睹,即使它正在发生变化。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言,熟知的东西并不就是真知,“哲学的任务在于将人们假定为熟知的东西加以真正认识”^[4]。作为人所熟悉却也因此最为人所忽略的社会存在,日常生活是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领域,是每个人无时不以某种方式从事的活动。人们却很少去追问究竟什么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本质、特征或意义是什么。因此,我们仍然有必要将目光投向于人的日常生活,并对它进行如黑格尔所说的“真正认识”。通过对青年日常生活的价值意蕴、现实形态和特征表现的总体性解析,考察处于现实生活中的青年群体,重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体验和突出现象,发现当代青年日常生活的新特征,尝试理解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和目标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对于了解青年人的生活态度、社会关系、价值旨趣、性情爱好、审美情趣、文化品位,探寻促进当代青年日常生活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二、青年日常生活的价值意蕴

“不离日用行常内,直到先天未画前”,是王阳明在《别诸生》一诗中的诗句,蕴含了深刻的哲理。王阳明认为所谓“良知”,不是抽象的观念存在,而是即刻当下的现实,它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人们的一举一动,饥食渴饮,无不有良知的存在。在日常生活中,青年获得满足其生存所需的基本条件,逐步形成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自我意识,发展自己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从而建构起他们所特有的生活世界。

(一)生存根基:日常生活是青年生存的基础和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5]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就日常生活展开研究,但是他们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所进行的社会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以及社会革命的最终归宿,都指向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他们认为,人们能够生活,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人类作为生命体的存在,其生存需要属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作为人类生存实践的基础性层次,日常生活构成了人类一切生存活动的根本基础与前提条件。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存所需的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还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起点与归宿。

日常生活是青年生存的基础和前提。对于青年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主要是以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为内容所进行的日常消费活动,以血缘、业缘、趣缘等方面的多种关系为对象所进行的日常交往活动,以网络、游戏、艺术、文化活动等为载体所进行的日常闲暇活动,以学业或职业为主要内容所进行的日常工作活动。这些活动相互关联,共同构成青年日常生活的基本样态。其中,在日常消费活动中,获得满足自身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这是其生存得以维系的前提;在日常交往活动中,获得满足个体社会本质性需要,促进人的本质的发展;在日常闲暇活动中,获得休息时间,促进精神成长;在日常工作活动中,通过发挥才能与潜力,促进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总之,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青年才能维系自身的生存和再生产。

(二)人格塑造:青年在日常生活的建构中塑造自己

生活哲学认为,人是自己生活构建的结果。人和自己的生活是同一的,人怎样建构自己的生活,也就成为怎样的人。“日复一日,人眼学会了如何看,人耳学会了怎样听,人体学会了如何保持节奏。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注意到,感觉、观念、生活方式和愉悦都是在日常生活里确定下来的”^{[6]274},人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是相互规定的。

青年在日常生活的建构中塑造自己。“青年作为人是一种三重存在,既是自然的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还是精神的存在。”^[7]青年的属性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讲,青年发展既包括人作为生命有机体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提高等自然属性的发展;也包括社会能力的提升、社会活动的拓展、社交范围的扩大等社会属性的发展;还包括自我意识的完善、思想道德的提高、审美情趣的提升等精神属性的发展。日常生活“不仅包括吃喝住穿等满足人的最基本日常生存需要的日常活动,而且包括以常识、风俗、习惯等体现的日常观念活动和日常行为活动”^{[8]16}。作为真正的“属人的”生活,青年的发展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得以确认并实现的。其中,自然属性在现实生活中得以满足,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则在日常生活中生成和发展。

任何个体的发展都离不开日常生活。在现实中,青年个体学习语言、知识和技能,形成人的认知、情感和思维等,都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只有在日常生活的动态建构中,青年才能通过不断的实践与互动,逐步形成自我认知、价值观念与社会角色,完成其社会化的进程,并在此过程中生成独特的人格特质。因此,日常生活不仅是青年人格塑造的场域,更是其人格得以展现与演化的舞台。

(三)参照中心:日常生活是理解青年的一把精确的尺子

列斐伏尔提到,“如果我们真的打算认识和判断这些模模糊糊的形象,我们必须从日常生活开始,日常生活是一把精确的尺子和一个参照中心。”^{[6]275}通过观察青年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为青年精准把脉,深入理解其生活态度和方式,总结其发展特点,进而更好地引导和支持他们日常生活的完善。

日常生活是理解青年的一把精确的尺子。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具有意义与关联性结构的文化世界,人们的消费、交往、闲暇和工作等活动都在此进行并投射出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青年的日常生活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精神世界。比如,青年的消费选择揭示了其生活理念,社会交往透露出他们的情感需求,休闲方式展现出他们的审美情趣,工作则体现了他们对未来的期许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理解并进入了青年的日常生活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其精神状况、思想需求、价值取向等。

缺乏对青年日常生活的了解,就不可能真正知道青年的需要是什么。因此,要理解当代青年,日常

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通过从日常生活的视角观察青年,研究并总结青年发展的规律和特点,这样的陈述不是泛泛之谈,而是有了鲜活的经验基础。也就是说,脱离青年的日常生活去研究青年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扎根青年的日常生活,并加以分析研究,我们才能及时把握青年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与特点,甚至洞察到更广泛的社会趋势和历史文化变迁。

(四)意义寓所:日常生活是为青年提供生命意义的寓所

“人是寻求意义的存在,人无法忍受无意义的生活。人的存在是创造意义的生活活动,人的世界是有意义的生活世界。”^[9]青年个体的生活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其生命需求,更重要的是发现生命的意义、实现生命的意义。

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本身可以成为一种艺术形式。“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活,日常生活,应该成为一种艺术作品,一种能让他自己快乐起来的艺术作品。”^{[2]184}日常生活不是日常琐事的集合,而是通过意义的建构,能够成为具有一定的宽度和高度的经验世界。在这一过程中,日常生活的主体和意义是相互建构的。“日常生活主体作为日常生活的参与者,在推动日常生活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8]25}日常生活中的主体被抛入日常生活之中,但他们并不是被动的,他们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能够积极地塑造和改变自己的生活,在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和参与体验中建构自身的意义世界。

日常生活是为青年提供生命意义的寓所。日常生活是一个意义世界,它为青年提供了一个以自我对象的实践活动和生命活动的“实在”,即日常生活是青年个体进行自我实现和生命活动的重要场所。在这个“实在”中,青年可以通过学习、工作、社交、休闲等活动,来探索自我、发展个性、建立人际关系,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为自己的生命确立一种具有意义的价值向度。

三、当代青年日常生活的现实特性

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受到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其中,社会政策、经济条件、文化规范等因素不仅塑造着个人的生活经历,也影响着不同代际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青年作为人的生命中的一个阶段,人群中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日常生活具有不同于其他年龄段人群的特征。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正在不断向前推进,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科学技术的变革使人们的生活世界呈现出全新景观。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对日常生活的范围、形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当代青年的日常生活各个具体领域具有明显的代际特征。

(一)反向消费:日常消费的理性化转向

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之中,日常生活资料的获取与消费是最为基础的层面,因为它直接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为人类的生产与再生产提供了前提和动力。其他日常活动,都要在人的吃喝住穿等生活资料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能进行。

近年来,消费主义渗透到青年的日常生活中,以至于形成了青年“炫耀式消费”“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娱乐化消费”等非理性消费观的刻板印象。虽然部分青年的非理性消费是一种事实,但人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放在一起认识,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随着社会发展和当前主流价值观倡导“节俭养德”,相当一部分青年逐渐把自己的消费观念置于反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进行反思与重塑,他们的消费活动呈现出以“反向消费”为主要特征的理性化趋势。所谓“反向消费”,是指消费者在购买行为中由传统消费主义向理性消费模式的转变。作为当代消费文化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势,“反向消费”体现了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在消费观念和行为上的重大转变,反映了青年的生存理性。2024年6月,新京报贝壳财经发起《2024年轻人消费趋势调查》,来自全国各省份1016位35岁以下受访者参与。调查结果显示,41.04%受访年轻人在购物时,经常有比价行为。年轻消费者变得更加审慎精明,注重商品的性价比和实际价值^[10]。

消费行为本身不仅仅是对商品的购买和使用,更是一种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消费者能够通过消费活动表达个性,表达对外部世界的见解。总体来看,青年群体的日常消费正在走向理性,他

们注重“货比三家”,在“悦己”的条件下寻求“质价比”,通过情绪消费实现自我疗愈,享受循环经济带来的乐趣等。这是市场经济的时代选择,是对消费主义的反思,也是勤俭节约传统的理性回归等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异化一直都在剥夺一切生活”^[3]²³⁰。当前,消费异化仍影响一部分青年,仍需注意消费主义形式的变化,警惕资本塑造的消费景观。

(二)轻量化社交:交往活动中弱联系加强

日常交往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体现了日常生活领域中的主体间关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人们的生活世界是一个人际关系的领域,是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世界。现实的青年个体作为社会存在物,在日常交往中常常按照自己的目的、意志、情感等个性特征选择交往对象,产生一定的亲疏远近的社会关系。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人们的日常交往活动已经被数字化全面包围。互联网和媒介的变革,深刻改变了社会交往的时空结构,培养了人们新的交往惯习,促进了现代社会关系的发展。在此背景下,青年拥有了更多的社交机会,他们的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交往的内容也更加丰富,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人间强联系与弱联系的建构也变得更为复杂。当代青年在日常交往活动中拥有自己特有的存在方式和运动形态,他们倾向于构建趣味相投且有清晰边界感的社交关系,偏好开放且务实的轻量化社交方式。比如,“搭子社交”作为轻量化社交的一种表现形式,展现了青年群体在社交方式上的新趋势和偏好,反映了他们对精准陪伴和个性化社交的追求。作为一种弱联系的体现,“搭子社交”成为流行于当代青年群体的新型社交模式,指向青年在社交过程中的一种独特的生存状态。

“人的社会关系总和的本质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充分彰显,日常生活正是人的活动的重要方面。”^[12]当前,受社会结构变化、技术发展和文化趋势的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成为一个与异质性的陌生人不断聚集、交往的动态过程。轻量化社交形式灵活多变,契合当代青年社交的多方面需求。但是,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这种社交方式也可能带来诸如人际关系浅层化、碎片化、缺乏深度情感支持、社交焦虑等问题。“单一的‘轻社交’弱联系是不平衡不健康的社交行为,久而久之会造成社交疏离、亲缘淡化、‘社交卡顿’等不良影响,不利于人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13]因此,我们应当关注在高度流动性和数字化的社会,青年交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引导青年重拾“附近”,关注现实的具体的,在生活中建立更深层次、更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三)具身体验:日常闲暇的主动式倾向

从哲学的视角看,闲暇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即闲暇是生活世界的重要构成部分,贯穿在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中。闲暇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片段或活动,而且是人类存在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影响着个人的精神世界和自我实现,还与人的本质特质密切相关。

积极心理学奠基人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将人类的休闲方式分为两种:主动式休闲和被动式休闲。^[14]所谓主动式休闲,是指那些需要专注投入、动脑思考方能享受乐趣的活动,如阅读、运动和冥想等,这类活动通常能够带来心流体验,让人全神贯注、沉浸其中,从而带来积极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力量。相比之下,被动式休闲则是单方面接收外界信息刺激以获取愉悦,如刷手机、看电视、玩游戏等,这类活动虽轻松不费力,却易使人感到疲惫、空虚,甚至诱发焦虑、烦躁。“当休闲活动是娱乐和消遣时,休闲活动包含了它们自己的异化。”^[6]⁴¹⁴当下,泛娱乐主义、数字化进入青年的日常闲暇中,极大冲击了青年群体的闲暇生态,他们的闲暇时间被大量娱乐内容所占据。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发生。2024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发起的2023—2024年度《中国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揭示了中国青年群体休闲活动的新动向。调查结果表明,18—35岁的年轻人虽然仍是手机娱乐的主力军,但占比与往年相比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的休闲形式,如“公园20分钟效应”“CityWalk”“夜校”等,逐渐成为青年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掌控感、重申自我价值、抵抗异化趋势的方式。这说明,当代青年正从狭隘的被动式的休闲活动中走出来,开启回归身体在场的具身体验,而不是耽于享受虚拟

世界所投喂的“精神鸦片”。

《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近 11 亿人(10.996 7 亿人)。其中,青年是最主要、最敏锐、最前沿的网络用户。显然,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已经深度媒介化。互联网成为青年生活的重要方式、休闲娱乐的重要空间和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尽管以数字设备和网络平台进行的“赛博闲暇”,如在线游戏、手机娱乐、流媒体内容消费等在青年群体中仍占据主要地位。但他们已经不断地意识到线下空间和实体体验的重要性,逐步从被动式的休闲活动中走出来,以身体为锚地,寻求更具主动性和参与感的休闲方式。

(四)意义贫困:工作生活中矛盾性交织

作为日常生活的结构性活动,工作是日常生活的有机部分,它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职业几乎完全确定了日常生活”“从根本上讲,‘工作之外’的态度和行为模式或多或少直接来源于工作本身”^{[6]295}。工作不仅为人们提供了经济支持,还塑造了个体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并且影响着个体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

从人的生命历程来看,青年阶段是生命历程中的特殊阶段,是人生重要的转折期。当代青年在工作中有上进心是主流现象,尤其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感召下,他们将个人的梦想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对自我未来发展有着强烈期许。客观上看,当代青年的成长过程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步,但在他们刚刚步入或者即将步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恰逢我国社会各个领域转型升级加速的关键时期,在特有的人口结构和竞争激烈的人才环境下,青年面临的工作、学习、生活的压力大而现实。“多重结构性的力量促使青年无法停下来,但个人对结果的走向又缺乏把控力”^[15]。这些结构性困境使他们在追求个人意义和价值的过程中感到困惑和无力,在日常工作中表现为处于“追梦人”的奋斗叙事与“打工人”的自嘲心理的矛盾关系的颠簸状态之中。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城市新穷人’,他们不是‘经济穷人’,而是‘意义贫困’。”^[16]社会学家项飙认为“城市新穷人”的穷,不是“经济贫困”,而是“意义贫困”,即现代社会的高强度工作模式和工具理性导致人们在工作中感到被工具化,无法从工作中看到直接的意义,从而产生意义贫困。韩炳哲认为,现代社会已经发展成为功绩社会,在功绩社会中,“这里没有作为剥削者的他者,而是自我心甘情愿地压榨自身,基于一种完善自我的信念。”^[17]为使功绩达到最大化,个体自己鞭策自己,成为一台效能机器。功绩社会下的自我内卷、功利最大化把人物化成手段和工具,被动地被工具理性所控制。在提升逻辑和进步强制的裹挟下,作为功绩主体,青年在学业和工作上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就像始终匀速运转的摩天轮、在滚轮中不停奔跑的小仓鼠。青年对工作意义有很强的诉求,却在追求工作意义和价值时感到困惑和失落,这是当代青年工作生活状态的典型特征。虽然今天的年轻人常用“工具人”“打工人”“悬浮人”“生命力萎缩”等表达自己对工作生活的体感,但越来越多的青年正在不断探寻保存生命力的方式,以积极的态度寻求生活与工作的平衡点。如“Gap day”“夜校”等成为短暂逃离工作的一种叙事,其背后隐喻的是青年反抗异化的心态。

四、当代青年日常生活发展的启示

日常生活不仅是青年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更是其成长与自我实现的重要场域。通过对当代青年日常生活的深入观察、研究与分析,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构建有意义的日常生活展开思考。

(一)批判与建设:强化价值引领

从整体上来看,当代青年对国家发展充满希望,对个人生活充满信心。与此同时,当前青年的日常生活也呈现一些异化特质,比如“消费异化”“人际异化”“休闲异化”“工作异化”等,对此需要引起重视。青年日常生活的异化特质不仅对他们构建美好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阻力,而且这些带有异化特质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也有悖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今天的中国青年是一个多元、异质的群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呈现的面向极为复杂,从消费习惯到社交模式,从工作态度到休闲方式,都呈现了复杂性和多样化的特点。如何得出青年日常生活的全貌和走向,辨识哪些是偶然、哪些是必然;哪些是主流、哪些是非主流,需要辩证看待青年日常生活的转向,充分发挥批判与建设相统一的价值引领功能。一方面,要对当代青年的日常生活加强分析研判。把握当下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的整体特质,重视青年在日常生活中的发展权益和多元需求,真诚回应青年的焦点诉求,并积极扬弃日常生活中的异质性内容,在尊重差异中包容多样,在增进共识中扩大认同。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主流价值观对青年日常生活的正向引导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源于日常生活,又高于日常生活,它是对日常生活应然性价值图景的建构。然而,处于实然性的日常生活状态的青年,应然性的价值图景与他们的日常生活还存在较大反差,这往往造成了青年在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困惑,甚至可能导致一部分青年思想震荡。因此,要不断推进主流价值观的生活化、青年化、日常化,实现价值与现实、价值与青年、价值与日常的融通,有效增强青年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从而提升主流价值观的感召力。

(二)协同与共促:优化总体建设

“青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党和国家的事业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展。”^[18]青年时期处于人生的起步阶段,存在很多相对弱势的方面。因此,青年的发展,仅仅依靠他们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得到党委、政府、团组织的支持,学校、家庭和社会等来自各方面的帮助。因此,要正视青年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处境,以青年的发展为目标,以青年的真实需求为导向,优化总体建设。

首先,发挥好党委和政府的引领作用。党委和政府要从战略高度出发,制定和完善青年发展的政策与规划,将青年的发展纳入社会发展的整体布局。充分考量和尊重青年群体在日常消费、交往、休闲、学习与工作等各方面活动的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将其作为青年工作开展的依据,研究解决青年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推动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为青年群体提供更加丰富的教育、文化、就业、权益保障等,确保青年优先发展。其次,发挥好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群团组织是国家发展、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优化总体性建设还要发挥好群团组织的积极作用。群团组织应结合青年的实际特点,提升对青年的服务能力。共青团要认真履行引领凝聚青年、组织动员青年、联系服务青年的职责,努力成为党联系青年最为牢固的桥梁和纽带。其他群团组织也应心系青年,协同配合。例如,工会、妇联等应重点关注解决青年在毕业求职、创新创业、社会融入、婚恋交友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和发展需求,并加强对青年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引领。最后,发挥好学校育人主阵地作用。一直以来,我国学校育人普遍注重专业知识教育,存在与日常生活相疏离、与生活世界意义相忘却的问题。学校育人必须与时俱进,生活教育的空缺可以转化为学校育人的新契机,通过系统性、专业性的课程设置,将当代青年在日常生活方面的诸多问题呈现出来,加强对青年日常生活微观层面的教育。比如,2024年南京传媒学院开设“大学生生活指南”公共课,该课程聚焦学生日常生活需求的“最大公约数”,涵盖商品选择与消费权益、个人财务管理、职场入门、社交技能与人际关系、住宿与日常生活等内容,旨在帮助大学生掌握必要的生活技能和社会常识,对于成长中的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显然,当代青年日常生活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必然不断出现,将日常生活教育纳入学生素质教育基础体系中,有效加强对青年日常生活微观层面的教育,延展育人链条是学校教育需要回应的时代课题。总之,党委、政府、青年群团组织、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面都要共同努力,协同施策,以实际行动为青年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不断满足青年对于新的生活内容、美的生活体验以及好的生活方式的需求,使青年成长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

(三)自觉与超越:构筑意义向度

日常生活的主体自降生始就被抛于日常生活之中,主体生存于既定的日常生活环境和条件之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完全被动的存在。日常生活作为主体的实践领域,主体的认知和行为也会反过

来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日常生活是主体主动变革和创造的对象。

日常生活中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构筑着“意义向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从建构主义观点来看,意义不是某种自在之物,日常生活本身与意义向度是无法自行联结的。只有作为主体的人,衡量、审视当下的生活,寻求生活的意义,进而指引未来的生活,才能构筑起日常生活的意义向度。青年个体作为自己日常生活的主体,他们用什么向度衡量和审视当下的生活,将会影响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未来的生活。正因如此,确立并构筑当代青年日常生活的意义向度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青年主体要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与反思,自为自觉推动日常生活的变革。正如列斐伏尔所告诫的,“不只是作家,我们时代的人以他自己的方式,自发地批判他的日常生活。这种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12]^[27]。其中,批判不仅仅是对于当下生活有所否定,更蕴含着对未来生活的某种肯定意义。当前,日常生活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庸常性和消极因素。青年更要自觉对日常生活进行审思,将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反身性方式进行生活方式的选择和规划。另一方面,青年主体要对自我存在意义加以认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人的行动是复数性的,“复数性是人类行动的条件,是因为我们所有人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即没有人和曾经活过、正活着或将要活的其他任何人相同”^[19]。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生活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不同形态,复数性意味着人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每一个青年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青年要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地寻找自我主体性,充分地理解自己、理解他人、理解社会。在主体性的塑造中,确定自己的人生角色和任务,进而确立自己的存在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认识意义是创造意义的前提,而对意义的判定是历史的、具体的,讨论意义不能源自单一的主观判定,也不能无视客观视角的外在标准。

参考文献:

- [1] 胡塞尔.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 王炳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5.
- [2] 亨利·列斐伏尔. 日常生活批判:第1卷[M]. 叶齐茂,倪晓晖,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3] 阿格妮丝·赫勒. 日常生活[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3.
- [4]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 贺麟,王太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305.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8.
- [6] 亨利·列斐伏尔. 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M]. 叶齐茂,倪晓晖,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7] 张良驯. 青年发展导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81.
- [8] 鲁芳. 日常生活的变革与伦理构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 [9] 孙正聿. 哲学修养十五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77.
- [10] 2024中国青年消费趋势报告[EB/OL]. (2024-07-08)[2024-10-2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4016702447514774&wfr=spider&for=pc>.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 [12] 冯刚. 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01):15-19.
- [13] 项久雨. 青年社交行为的困局与破局——基于Z世代“现象级”社交模式分析[J]. 人民论坛,2024(08):43-47.
- [14]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 发现心流 日常生活中的最优体验[M]. 陈秀娟,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02.
- [15] 邢婷婷. “45°青年”:张力之下的青年境遇及其社会心态[J]. 探索与争鸣,2023(02):32-44.
- [16] 项飙专访:城市新穷人不是经济穷人,是意义贫困[EB/OL]. (2021-02-03)[2024-10-24].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0659368125342278&wfr=spider&for=pc>.
- [17] 韩炳哲. 倦怠社会[M]. 王一力,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95.
- [18]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7(12):6-20.
- [19] 汉娜·阿伦特. 人的境况[M]. 王寅丽,译. 第2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2.

(责任编辑:杨威 谢松波)

The Value Connotations, Real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s of Contemporary Youths' Daily Life

FENG Gang¹, WANG Gui-juan²

(1. *Institut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Hunan,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Daily life, as a field of individual survival and reproduction, is an area that every member of society cannot get rid of and needs to immerse themselves in and experience, which has multiple values. At present, the process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constantly advancing, with changes in the production mode, social syste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enting a brandnew landscape in people's life world. Compared with other intergenerational groups, the daily life of contemporary youths demonstrates obvious intergen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consumption, they are more rational and cautious; while in social interactions, they focus on seek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with a sense of boundaries; and in leisure modes, they increasingly value the quality of experience and inner feelings. In short, daily life provides us with an important window to understand contemporary youths. The "constant state" and "changes" of youths can be discovered by studying their "natural" and "self-evident" daily life; while due attention to their true existence in daily life can help to re-examine and reflect on the meaning of youths' daily life in the current society, as well as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ontemporary youths; daily life; value connotations; realistic characteristics



拜物教现象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实挑战及其有效治理

林贤明,周宇昕

(福建农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摘要:马克思主义把文明看作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成果的集合,强调文明社会要同时实现高水平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繁荣。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辅相成、互促互进、协调发展,对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深远意义。新时代,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同时,也有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拜物教现象给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现实挑战。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强化价值引领;加强文化建设,传承中华文明以应对拜物教现象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实挑战。

关键词: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4;D61;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25)01-0010-08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这一命题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更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中国式现代化囊括了物质富足与精神充盈的双重维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互促互进、协调发展,对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深远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拜物教现象必然存在。在拜物教的影响下,社会出现拜金主义盛行、价值观错位、社会发展动力不足、社会心态浮躁等一系列症状。人的思想精神如何在“物”的辅助下保持自身独立性,打破各种拜物教现象的牢笼,破解拜物教现象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实挑战,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一、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也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把文明看作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成果的集合,强调文明社会要同时实现高水平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繁荣。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看,科学社会主义旨在利用并超越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体系,构建一个持续、公平地满足全社会成员基本及更高层次物质与精神生活需求的社会。作为社会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1]物质富足与精神充盈是中国式现代化区

基金项目: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资助项目“新时代坚持和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问题研究”(2021QNYC 063)

收稿日期:2024-11-04

作者简介:林贤明(1983—),女,福建安溪人,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中国化时代化研究;周宇昕(2000—),女,福建南平人,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着眼于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2]⁵⁷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繁荣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 and 实践土壤,精神文明则为物质文明的稳定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精神支撑。

(一)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

物质基础的动态演进推动了精神生活变化发展。依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变革,进而要求上层建筑做出相应的调整和优化。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力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强调物质生产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并预言了生产力高度发达条件下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状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3]⁵²⁷这强调社会生产对社会进步与人类解放的重要意义。

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看,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精神作为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受物质条件的制约。物质匮乏则可能导致社会失序及道德下滑,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⁵³⁸。列宁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⁵⁸因此,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升物质条件和物质水平,才能充实精神世界,提升精神生活的质量。当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个体会更重视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升华。在物质富足的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的体力和智力也得到了更充分和更自由的发展,其用于自由支配的时间也随之增加;自由时间越多,个人的发展就越充分,个人就越能为社会生产力作贡献,从而促进自由时间的进一步创造和发展”^[5],人的精神层面的追求才得以充分展开。当然,也要辩证地看待物质富足,现代社会中人们要警惕过度追求物质财富而忽视了精神层面发展的情况。过度追求物质富足,可能会陷入物欲横流的追逐,导致个人的虚无感和心灵的空虚感,甚至迷失自我。因此,要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努力创造内容类型齐全、数量规模充足、质量层次优良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着力构建完整的物质文明体系和精神文明体系,从而夯实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内容基础”^[6],以推进整体的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二)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尽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可能领先或落后于社会存在的发展。充分发挥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积极作用,为物质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其一,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价值引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但同时提出,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具有巨大能动作用,精神生产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7]。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同时,它们又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可以为物质生产提供价值引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的逐利性有可能导致道德滑坡和社会风气恶化。此时,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指引。其二,精神文明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供思想保障。高度成熟的精神文明作为社会实践中主体活动的产物,是与物质基础相契合的观念、道德、价值理念及知识结构。马克思强调:“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¹¹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锐意进取的责任担当等都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减少社会矛盾,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氛围。在实践中将这些积极正向的理念转化为物质力量,为物质文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三,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人才不仅是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引领者,而且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者。通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各个领域人才的科学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修养,能够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推进文化繁荣,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不可替代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者本质上构成了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在特定历史阶段,其协调发展呈现相对性特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建设初期,虽物质条件艰苦,但却有异常坚定的理想信念。在此历程中孕育的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铸就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但精神文明的发展不绝对受制于物质基础,物质富足并不代表精神充盈,物质的充裕并不一定会带动精神文明的繁荣。实践表明,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并重,否则“即使物质文明建设搞上去了,而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很坏,道德沦丧,国家也不能长治久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受到挫折”^[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现代化发展的整体考量中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从而既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又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中国共产党统筹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伟大实践,已经成为人类现代化历史上独具特色的篇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二、拜物教现象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实挑战

“拜物教”一词源于宗教,指把某种物当作神灵来敬畏和顶礼膜拜。马克思借用“拜物教”一词,把人们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物”的迷恋和顶礼膜拜,称之为拜物教,以此来揭示隐藏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秘密,警醒人们要克服狂热崇拜商品、货币、资本的歪曲观念。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批判理论指出,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使得劳动产品成为私人劳动的产物,需要通过交换来实现其社会价值。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存在,必然会产生商品拜物教现象。此外,各经济主体对物质利益的狂热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对物的依赖和崇拜,进一步加剧了拜物教现象的滋长。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拜物教现象给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现实挑战。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拜物教现象

拜物教现象根植于特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之中,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后所达到的一个阶段,它仍然属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范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拜物教现象。当代拜物教现象从商品拜物教发展演变为名牌拜物教、金钱拜物教、互联网流量拜物教、市场拜物教等多种新形态。

名牌拜物教实质上是一种符号崇拜,反映了对身份和地位的崇拜。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能力的增长,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名牌商品及其背后的文化符号意义,消费行为也逐渐向名牌导向转变。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金钱与名牌商品之间的交易关系所掩盖,从而催生了名牌拜物教现象。名牌商品被赋予符号价值,成为彰显消费者身份和地位的标志。消费本应该是直接与物相联系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然而,随着商品符号化的加剧,传统的物质消费转变为符号消费,即消费者更加关注商品所承载的符号意义,而非其实际使用价值。符号逐渐渗透并嵌入社会结构之中,潜移默化人们的认知模式,导致个体的主体性受到符号逻辑的支配,内心的情感需求亦被符号化,丧失主体性的人格,最终导致人的异化,变成符号的附庸。

金钱拜物教表现为人们对金钱的极端崇拜,将金钱视为评价一切的标准,把金钱视为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追逐金钱成了人生的终极追求。对金钱本质的误解和歪曲是金钱拜物教产生的内在根源。人本应该自由真实地活着,却因为逐利甘愿成为金钱的傀儡,丧失了人的主体性,异化为与其本质相悖的存在,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实现。恩格斯曾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形象地揭露拜金主义者的鲜明特征,“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不知道有别的痛苦”^{[3]476}。金钱拜物教者被物质利益所遮蔽,过度追求物质财富而忽视了自身的精神层面需

求,导致精神追求逐渐被边缘化。一旦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它不仅会导致人们在评估事物时出现偏狭与功利化的倾向,还会促使人际交往趋向功利主义。此外,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占据主导地位会侵蚀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影响公众对于社会公正的认知,淡化公正、诚信等核心价值观。

互联网流量拜物教是拜金主义在互联网时代产生的一种拜物教现象,表现为对金钱和流量的非理性崇拜。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广泛普及,流量已成为衡量网络影响力、创造商业价值的关键指标。在自媒体盛行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吸引大众注意力并获得更大流量,众多内容创造者倾向于生产迎合流行话题的内容,内容同质化问题日益严重,创新性和多样性缺失,无法给人们提供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部分商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商业回报,采用诸如刷单或雇佣水军等手段来制造流量的虚假繁荣。同时,流量明星则是互联网流量拜物教的另一显著表现。“饭圈”文化在资本的驱动下,过度强调流量的重要性,诱导年轻群体盲目崇拜流量明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负面现象,包括网络暴力与非理性消费等。流量经济在缺乏有效监管情况下暴露出泛娱乐化等诸多问题。

市场拜物教是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超越了其实际需求,由此形成了一种近乎崇拜的态度对待市场及其产品。这种现象带来的危害不仅体现在个人层面上对商品和服务的过度崇拜和消费,也反映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企业在市场拜物教的驱使下,以盈利为唯一目标,不顾一切地追求资本增殖与利润最大化,甚至进行恶性竞争,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甚至导致社会道德水平下降。市场拜物教者追求资本在流通领域发生增殖,却忽视了创造财富的源泉从来都是生产环节及实体部门。例如,近几年虚拟经济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然而虚拟经济的加速扩张并未有效地转化为实体产业的繁荣,相反,它在某些情况下还压缩了实体企业的生存空间。如果放任虚拟经济无节制地扩张,则有可能引发资产泡沫,危及经济发展的根基。同时,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有效工具,被认为能够通过价格信号自主调节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等经济活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实践证明市场自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一些关系社会民生的重要领域,如医疗、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往往无法兼顾公平和效率。特别是在忽视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活生生的事实证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如果不加以合理规划和管控,会出现耕地减少、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导致人与自然的冲突尖锐化。

(二)拜物教现象的社会危害

当前拜物教现象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社会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危害。

其一,拜物教现象导致社会关系异化。拜物教现象导致社会关系被物化,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被简化为利益交换。个体在竭力追求物质财富的累积时,往往不自觉地忽视了自身精神层面的需求与满足,进而导致人际关系趋向功利化。个人的主体性与情感需求被逐渐边缘化,人的本质属性与存在价值遭受异化。更进一步,过度消费与攀比心理的蔓延不仅不能提升个人的幸福感,反而成为其幸福感下降的原因。拜物教现象加剧了社会关系的物化趋势,导致了现代社会中个体在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失衡状态。例如,符号拜物教者崇拜特定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未能认清其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在消费领域,商家利用广告和营销策略塑造特定的商品形象,使消费者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而非其实用价值,从而模糊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场域,资本逻辑将劳动关系形式化为简单的雇佣合同关系,掩盖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其二,拜物教现象加剧社会阶层固化。资本逻辑驱动下的内卷化现象已渗透至社会各个领域。职场竞争日益激烈,员工加班加点常态化,个体在重复无意义劳动中被异化。这种内卷化损害了个人的身心健康,异化了社会关系。资本的逐利性质使优质资源向少数群体集中,而大多数人群则面临资源匮乏的问题。在教育、医疗、住房及就业等多个关键领域出现了资源分配不均衡现象,贫富差距加剧,社会阶层结构固化。优质医疗服务集中在大城市和高端医疗机构,偏远地区和低收入群体难以企及。在经济上,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在政治上,资本与权力的结合使得政治决策更倾向于保护资本而非公众的利益。普通人因资源和机会有限,难以突破现有的社会层级,导致社会流动性降低,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健康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限制了社会整体的活力与进步。

其三,拜物教现象侵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拜物教观念的驱使下,人们盲目追求物质满足,而忽视了精神世界的滋养与升华。在追求资本增殖与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企业往往忽视市场规则与伦理道德,进行恶性竞争,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虚拟经济的无节制扩张更加剧了资产泡沫的风险,威胁着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与安全性。这种经济秩序的混乱与市场失范,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阻碍了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金钱成为衡量个人价值与成就的唯一标尺,文明、和谐、公正、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遭到淡化,社会基本道德准则遭受侵蚀。这种价值观的扭曲,会瓦解社会共识,削弱团结奋斗的精神根基,威胁社会和谐稳定。

其四,拜物教现象制约社会长远发展。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天平上,受拜物教观念的影响,前者往往被过度倾斜,导致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福利事业被边缘化,使得有限的社会资源更多地流向少数富裕群体,损害整体社会福利。对物质财富的无节制追求往往伴随着资源的过度消耗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如碳排放的过度增加、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等,制约了社会可持续发展和长远发展。

(三)拜物教现象的原因分析

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资本论》中详细地阐述了拜物教批判理论。他指出,商品、货币和资本在特定的商品经济形态运行中,有了种种假象的表现,而使其蒙上神秘的面纱,产生了神秘性质,称之为“拜物教现象”。马克思的“拜物”指的是特定社会发展阶段,商品交换过程中导致人与物关系的错位和错误认知,人们无法抵挡和自我祛魅,进而陷入对“物”的神秘魔力的狂热追崇,进入一种异化状态。

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一旦成为商品,便会在其属性中增添一层“魔力”或神秘性。以杯子和手机为例,在它们作为劳动产品直接服务于人类需求时,其价值直观且明确。然而,当这些物品进入市场并进行交换时,如十个杯子换一部手机,这种交换形式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杯子的实际价值仅仅是手机价值的一部分,从而影响人们对自身需求的认知。在非商品化的状态中,杯子的用途完全取决于使用者的实际需求,体现出一种直接的人与物之间的互动。但是,当杯子转变为商品后,它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其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上。这时,杯子的意义和价值被商品系统中的价值形式所主导,商品的形式开始支配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使用者对于杯子的需求程度不再单纯依赖于其实用性,而是受其在市场交换中的定位所影响。这样,劳动产品一旦成为商品,就具有了某种神秘性质,“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9]。

拜物教现象是私有制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尤为凸显。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且难以直接观察,而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相对简单且直观,人们往往更容易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10]。也就是说,拜物教现象因商品经济中“交换”的基本要求,以“歪曲”的形式表现自身,使其不由自主地带上“拜物教性质”,同时人们常受制于“拜物教性质”带来的虚幻诱惑,难以自拔,深陷“拜物教”泥沼之中。马克思清醒地看到拜物教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是商品、货币、资本操作控制人的异化现象。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遵循自身逻辑运作,超越了资本家的主观控制。“资本”虽然是人造的,然而到了一定程度,“资本”夺取了主导权反过来操纵了资本家的行为,控制了社会,束缚了人的发展,让人深陷其中、为之狂热而忘记了美好生活的真实意义。

三、打破拜物教现象的牢笼、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

拜物教现象对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如果放松警惕,处理不慎,就有可能造成局部地区的外部冲突和整个社会的波动。因此,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强化价值引领;加强文化建设,传承中华文明以应对拜物教现象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实挑战。

(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我们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作

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回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闯过各种险滩、踏过各种困境。“正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初心使命、哲学智慧、政治格局、治理能力以及强大的自身建设力,才得以缔造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和特色标识。”^[11]

一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12]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存在许多风险挑战,各类矛盾相互交织、相互激荡,国际局势瞬息万变,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破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拜物教现象的现实要求和根本保障。要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忧患意识,时刻警惕各种拜物教现象的消极影响,不逃避、不退缩,不断增强抵制物欲迷惑的本领,有力应对、处置、化解各种矛盾和潜在的风险挑战。

二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打通阻碍发展的现实堵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化基本经济制度与分配机制,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要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新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让新型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转化”^[13],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逐渐消解拜物教现象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也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尽量减少、缩小拜物教的消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14]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15],遏制因资本无序扩张导致的拜物教现象的蔓延和渗透,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此外,要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将资本关进法律的笼子里。

(二)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强化价值引领

只有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强化价值引领,补足人们精神上的“钙”,才能驱散拜物教的迷雾。在拜物教的迷雾下,人们过度追求物质享受,而忽视了精神追求,将物质的享受视为个人成功的标志,在极端的物质追求中迷失了自我,最终导致精神空虚、焦虑和迷茫。因此,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端正价值导向,加强价值引领,树立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构筑思想屏障,克服异化现象,为实现物的全面丰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提供最持久、最深层的内驱力。

一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人们之所以会陷入拜物教的泥沼中无法自拔,是因为人们对拜物教现象的认知不足,无法抵挡并揭开名牌、金钱、流量、市场等的神秘“面纱”,进而陷入疯狂追崇的状态。祛魅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人们要加强理论学习,用理论武装头脑,汲取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批判理论中的思想力量,提升以理论为武器破除拜物教神秘性的能力,增强对社会关系的清晰认知,强化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意识,回归人的主体性思考。

二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能有效规范社会行为,抵御和消除各类拜物教现象对理想信念的侵蚀。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融入法治建设、社会发展与日常生活,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提升人民的政治敏锐度和文化判断力。特别要关注青少年群体的教育,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规范机制,持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努力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发挥榜样与楷模的示范引领作用,开展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强化人民的道德观念和法律意识,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三要以人为本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强人民对建设美好生活的信心,以此打开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空间。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通过改进和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动态调整和补充公共服务,推动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公共服务向弱势群体倾斜,弥补起点不公平和机会不公平,破除社会阶级固化造成的发展藩篱,在平衡发展中改善民生。

(三)加强文化建设,传承中华文明

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才能正确认识拜物教现象的本质,从思想上彻底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在表现形式上展现出的物的外观,实现人的思想解放和全面发展。

一要传承中华文明,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2]32}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守正创新,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起来,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把握历史主动,向人民群众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在关系到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的问题上正本清源”^[16],以“两个结合”拓展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空间广域,不断增强文化自信。

二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多种社会思潮大量涌入,文化领域涌现出多种社会思潮、理论纷争和思想冲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17]党和国家要系统推进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立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工作机制,善用互联网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开展网络斗争、加强网络管理、弘扬网上主旋律,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加强对宣传舆论、文艺创作和传播的价值引导,用独到的思想方法、润物无声的艺术熏陶启迪人的心灵,传递向善向上的价值观,“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18]。

三要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我国目前在精神文化领域仍存在精神文化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不完善、已有精神文化产品无法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等问题。要全面挖掘中华5000多年文明宝库,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形成优质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推动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满足人们多元文化消费需要。要改进文艺创作制度机制,完善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确保文艺作品能反映时代文化高度,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并巩固共同的思想基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审美观念、文艺产品的传播方式及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19]因此,必须主动抵御文艺创作中存在的抽象人性论、隐性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侵蚀,“把牢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积极优化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20],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深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时,改进文艺评价激励机制,强化美育工作,建立健全人才选拔培养体系,使文艺成果能够广泛惠及人民,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2-23.
-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列宁全集:第2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5] 王思远.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视域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共同富裕的实现[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4(05):45-50.
- [6] 战绍磊. 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J]. 学习与探索, 2024(11):9-17.
- [7] 刘睿. 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逻辑前提、现实关切和实践旨归[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02):71-82.
- [8] 江泽民.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77.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89.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925.
- [11] 田旭明. 党的领导何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07):52-62+138.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61.
- [13] 孙绍勇. 马克思生产力思想及其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启示[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4(05):75-83.
-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2:211-212.
- [1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N]. 人民日报, 2022-05-01(01).
- [16] 权瑞华, 张培富.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指导文化创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路径[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05):46-53.
- [17]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149.
- [18]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17.
- [19]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19.
- [20] 陶虎. 坚持“两个结合”,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4(05):15-17.

(责任编辑:王蕾)

The Realistic Challenge of Fetishism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Its Effective Governance

LIN Xian-ming, ZHOU Yu-xin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0, China)

Abstract: Marxism regards civilization as a collection of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spiritual production achievements, and emphasizes that a civilized society should simultaneously achieve the double prosperity of high-level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one in which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re coordinated, for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mplement and promote each other, and develop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which is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solid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and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ized country. In the new era, 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that have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but meanwhile, there are also a series of long-accumulated and newly emerging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urgently addressed. Among them, fetishism has brought a series of severe realistic challenges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herefore, efforts must be made to uphold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to strengthen education in ideals and beliefs as well as value guidance, to enhanc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inherit Chinese civilization so as to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realistic challenges of fetishism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Marx's criticism of of fetishism; material civilizatio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论习近平文艺观的人民性意蕴 及其实践进路

李辉艳, 蒯正明

(海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 习近平文艺观有着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 不仅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 还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文艺批评理念, 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文艺理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论述内涵丰富, 涵盖艺术的本质、灵魂、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以及艺术发展的根本保证等方面。习近平文艺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发展了艺术的评判标准, 彰显了人民的主体性地位。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需要做到: 一是深化文艺体制机制改革, 确保文艺创作更加服务人民; 二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以保障人民共享发展; 三是推动优秀文艺走出去,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 习近平; 文艺观; 人民性; 社会主义文艺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310(2025)01-0018-08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文艺观, 为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提供了“指南针”“定盘星”“风向标”。“求木之长者, 必固其根本; 欲流之远者, 必浚其泉源。”^[1]就像树木需要稳固的根系来支撑其生长一样, 我们的文艺创作也需要不断地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灵感和力量, 去芜存菁、推陈出新。人民性是习近平文艺观的核心底色和根本立场, 深入挖掘其人民性意蕴, 对理解和彰显其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至关重要。

一、习近平文艺观人民性的思想理论基础

习近平文艺观的人民性有着深厚的思想理论支撑, 不仅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 而且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文艺批评理念, 还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艺理论思想, 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 为中国新时代文艺批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和丰富的思想资源。

第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述为习近平文艺观的人民性意蕴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这在文艺领域体现为文艺创作源自人民。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指出: “精神的太阳, 无论照耀着多少个体, 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 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 就是官方的色彩!”^[2]马克思批判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 指出其束缚思想自由, 忽视社会多样性, 压制民众声音, 阻碍社会矛盾解决。他强调自由环境对精神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 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 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专题式教学研究”(22VSZ076)

收稿日期: 2024-11-15

作者简介: 李辉艳(1979—), 女, 河南周口人,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蒯正明(1977—), 男, 安徽肥东人,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研究。

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3]这段话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包括文艺在内的意识形态形式)之间的变革关系,以及文艺作为意识形态形式所具有的能动性。如马克思指出一些英国作家所描述的社会现实“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4]。这句话肯定了文艺作品在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社会矛盾方面的深刻洞察力和独特价值。恩格斯指出:“倍克歌颂胆怯的小市民的鄙俗风气……然而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5]²²³⁻²²⁴恩格斯批评德国诗人倍克的诗歌将“穷人”和“小人物”描绘得卑微虔诚,缺乏革命斗争性,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应深入挖掘社会问题,真实展现人民的斗争和革命精神。列宁提出文学的“党性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强调了文艺的阶级性,但并未系统提出文艺的党性原则。这些区别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列宁指出:“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6]列宁揭示了写作事业的阶级属性、与无产阶级事业的关系以及党性原则在写作事业中的重要性,为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早在1905年,列宁就指出我们的文艺“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7]。列宁明确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宗旨与责任担当,为无产阶级文艺发展指明方向。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文艺批评理念为习近平文艺观的人民性意蕴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首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早在商周之际就有“敬德保民”的民本主义观念。经过演化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儒家和道家为主要代表的两种民本思想体系。儒家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8],体现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道家强调“无为而治”,认为政府应该顺应自然、尊重民意,让人民自由发展。杜甫于乱世书写:“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9]表明创作当以人民生活、情感为源。这种思想在文艺创作中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即文艺作品要反映人民的生活、情感和需求,体现人民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其次,注重文艺作品的社会教化功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艺批评理念,如“文以载道”“诗言志”等,强调文艺作品的社会教化作用。文艺功能服务人民成长。传统文艺多有启迪教化之功,如《三字经》《弟子规》助力民众修身养性,注重文艺作品在塑造社会风气、引导人民思想、传承优秀文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最后,强调真情流露与艺术性并重。如《论语》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0]⁸，“思无邪”强调真情流露、毫不作假,启示文学创作要贴近人民的真实生活。“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0]¹⁶²“兴观群怨”则涵盖了激发情志、观察社会、结交关系、怨刺问题等多方面,启示文艺批评要注重人民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白居易的诗风追求通俗易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1]等诗作在民间广为流传,因为他注重作品能否被广大民众理解与接受,其诗歌创作理念体现出文艺作品需接受人民大众的检验。古代文艺作品注重艺术性和审美价值,追求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这种统一既体现了对人民审美需求的尊重,也体现了对文艺作品高品质的追求。

第三,中国共产党人的文艺理论探索为习近平文艺观的人民性意蕴开辟了深远的理论空间。首先,早期共产党人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孕育了萌芽。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其文艺思想体现于《文学革命论》。他力主彻底变革社会文化,摒弃旧文学形式,倡导文学应具独立自主,抒情写实且有益大众,将文学革新作为改造社会与启蒙思想之利器,推广白话文以传播新思想,冲击封建观念。李大钊乃马克思主义中国先驱,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彰显理论自觉,倡导经济组织与人类精神同步改造。《什么是新文学》提倡新文学需社会写实、以博爱为本并融合多重要素,受启蒙与传统伦理影响,认定十月革命为庶民胜利,主张新文艺服务劳工阶级尤其是农民,推广通俗文学以普及知识。瞿秋白提倡唯物辩证法为无产阶级创作法,实践侧重现实主义,强调文学的党性、阶级性与政治性,批判浅薄浪漫主义,这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和革命任务紧密相连。他提出了“为工农服务”的文艺方向,积极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以马克思主义理解本土文艺问题,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发展,贡献卓著。综上所述,三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艺思想各具特色,陈独秀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启

蒙作用,李大钊注重文学的平民化和意识形态功能,而瞿秋白则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方向,并初步奠定了人民性、实践性和社会性的理论品格。其次,毛泽东文艺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成型与升华。毛泽东借《新民主主义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本土化发展。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定位革命阶段、剖析文化特点、推崇鲁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无产阶级文艺方向,指出文艺要服务于工人、农民、兵士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12],强调革命文艺服务大众、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也指导了革命文艺蓬勃发展。最后,党在不同时期的文艺指导思想一脉相承并不断发展。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将文艺服务对象扩展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3]。江泽民要求文艺工作者在人民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创造,胡锦涛则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些思想为习近平文艺观的人民性意蕴提供了坚实基础,持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迈向新高度。

二、习近平文艺观人民性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涵盖了艺术的本质、灵魂、创新、组织四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一理念强调了艺术的人民性、时代性和创新性,为新时代文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

神推动力。

第一,“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14]³¹⁴。首先,文艺创作源于人民。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灵感和素材都来源于人民的生活和实践。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人民的生活实践是文艺创作的灵感和素材的宝库,文艺工作者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15]¹⁵其次,文艺作品为了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15]¹⁸,从文艺作品的角度来看,文艺作品的价值“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4]³¹⁴。这些作品应该能够反映人民的心声,传递正能量,引领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15]¹⁴所谓“天职”,即无须动员和劝说,内化为自身主动追求的天然本性和职业本分。“天职”一词凸显了为人民服务不仅是职业要求,更是道德责任和使命担当,体现了文艺工作者对职业的崇高认识和责任感。最后,文艺事业属于人民。从文艺事业的角度来看,人民是文艺事业的根基和动力,文艺事业的发展需要依靠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同时也需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文艺工作者需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只有这样,才能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文艺本质是人民的文艺,这一观点为新时代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

第二,“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艺术的灵魂”^[15]²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15]²³首先,聚焦中国梦的时代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16]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文艺创作的鲜明主题。要深入开展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活动,生动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景,既绘就国家民族的宏伟蓝图,又勾勒百姓生活的细腻笔触,借助鲜活的艺术呈现与讲述,彰显中国梦的多元色彩与深刻意蕴,汇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其次,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17]⁸,需要以其为文艺创作的导向,达成全面且深入的贯穿与融入。凭借引人入胜的故事、灵动鲜活的语言以及立体丰满的形象,将核心价值观巧妙地呈现在文艺作品里,于潜移默化中润泽人们的心灵,使大众在文化的浸染中领会并接纳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把握艺术个性和社会道德的关系”^[17]¹⁹。运用各种形式艺术展现党史国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传承优良革命传统,引导人们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最后,高奏

爱国主义的嘹亮主音,彰显时代风采。“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18]爱国主义是中国精神中最为基础且核心的要义,也是文艺创作的永恒追求。要坚持唯物史观,尊重和颂扬为中华民族做出历史贡献的英雄,组织支持爱国主义题材文艺创作,热情颂扬民族豪杰,抒发爱国情感,传扬团结协作精神,提升身为中国人的自豪与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19]正确反映中华民族及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各类历史,生动展现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的心路历程,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第三,“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¹¹。首先,激活传统文化基因。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15]²⁶,激活传统文化基因。如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相结合,彰显民本思想的当代价值,创造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文化新形态。其次,赋予时代内涵。结合新时代实践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正确取舍,“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20]¹¹,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如将“和为贵”思想与现代社会和谐发展理念相结合、“自强不息”精神与当代奋斗精神相呼应,使其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走进群众生活。最后,创新表达形式与传播方式。“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15]¹¹创新表达形式,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及多样艺术形式,如利用AI、VR等新技术打造智慧博物馆,以小说、电影、游戏等形式对文化资源二次创作,并通过主流媒体传播,让传统文化更生动有趣、贴合大众需求,打造新场景,以人民需求为导向,设立展示区,加强教育普及,培养后备力量,同时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紧密联系,如融入传统元素的文化旅游等,使其更好地走进寻常百姓家。譬如,《流浪地球》,其“电影的构思、讲述手法和拍摄技术等借鉴了好莱坞等西方经验,但又没有照搬照抄,而是消化吸收再创新。它胜就胜在,将中国的“道”与西方的“术”有机融合。中国文化、中国视角和中国价值观赋予了《流浪地球》不同于好莱坞大片的精神和灵魂”^[21]。

第四,“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15]²⁷。首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核心理念,为人民创作是文艺的核心使命。基于这一共同点,党与文艺便有了共同的根本立足点。坚守这一根本立足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以妥善处理,进而能够正确理解党性与人民性、政治立场与创作自由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意味着在党的领导下,文艺创作能够更好地反映人民的心声,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其次,我们党历来重视文艺工作,始终把文化视为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因此,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必然需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通过制定和实施文艺政策,引导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力量。最后,党的领导还体现在为文艺创作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上。各级党委与政府部门需强化宏观指引与统筹协调,全方位动员各方力量积极参与文艺工作。一方面,要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与完善,深化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以此推动并保障文艺的繁荣发展,为文艺创作筑牢法治根基。另一方面,需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独特优势,紧跟传播规律,促进优秀作品通过多元渠道、多平台及终端广泛传播与展示,让正能量引领网络文艺发展。

三、习近平文艺观人民性的理论贡献

习近平文艺观关于人民性意蕴的重要论述体现了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是对新时期文艺发展存在问题的针对性回应和纲领性规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以新的理论视野开创了新的理论境界,为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和理论意蕴,对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文艺观具有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第一,凸显了个体性“人民”的概念,深化了对“人民”内涵的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

扎”^{[15]17},体现了对“人民”概念认知和理解的历史性进步和丰富性深化。首先,强调人民的具体性,关注个体情感与价值。将“人民”从抽象的集合概念细化到具体的个体,使文艺创作能够关注到每个人的独特性和多样性,避免将人民概念化、脸谱化。“人民”不再是脱离具体、远离泥土的抽象概念和抽象符号,而是无限接近现实的具体、鲜活的个体,在集体性底色的基础上凸显了个体性价值。要求文艺创作关注个体的情感、价值和诉求,书写具体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等内心世界,展现每个人在时代背景下的不同经历和命运,让文艺作品更具感染力和深度,从而更好地反映人民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其次,尊重个体的主体地位,以个体展现时代精神。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让普通个体成为作品的主角,充分展现其在社会发展、历史进步中的作用和贡献,使人民真正成为文艺创作的核心,突出个体在时代中的参与感和创造性,肯定每个人的历史主体价值。以个体展现时代精神,倡导以小切口折射大时代,通过描写小人物的故事来诠释大主题、展现大变化,让个体的命运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从个体的视角展现时代的风貌和精神,使时代精神在具体人物身上得到生动体现,让文艺作品更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凸显个体性“人民”概念是新时代文艺书写“具体的人”的内在要求,是关注、肯定、尊重个体价值的外在表现,是对文艺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坚持人民至上执政理念的深度统一。

第二,发展了文艺批评的标准,深化了对文艺评价人民性标准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15]30}批评标准,明确将“人民的”标准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美学和历史的”^{[15]257}标准并列起来,以文艺批评的“人民的”标准牢固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和评论导向,为新时代文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首先,明确了人民评价是文艺评判的最高标准。好的艺术作品应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14]320},使评价标准更加科学合理、评价主体更加多元化,更加有利于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22]322},这是习近平文艺观人民性在文艺批评层面的具体体现,也是习近平文艺观最核心的价值观,突出强调了“人民”在文艺中的中心地位。其次,有力回应和引导规范了当前文艺批评诸多乱象。受互联网技术、新媒体和市场化等因素影响,有的文艺批评忽视作品质量,一心向资本献媚,“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15]29},有的抛却专业性和学理性,以情绪化的“道德批判”代替冷静的学术分析;还有的泯灭民族特色,不惜自我矮化主动迎合西方审美趣味,“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15]29},其根本原因就是批评标准中“人民”的失声与失位。突出文艺批评的“人民”标准,促使文艺批评落脚于提高人民的审美品位与审美水平,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在当代语境下的创新性发展。“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15]29}新时代文艺批评应发挥时代之镜、社会之药的功能,推动文艺健康发展,促进精品力作产生,提升作品价值,以实现擢升审美、悦情悦民、德润于民。

第三,彰显了主体性“人民”的地位,擘画了文化自信的文艺路径。文艺是渗透力和感染力极强的世界语言,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沟通交流的最好途径。人民性蕴含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气韵、道德范式和价值追求,表现于中国人民艰苦创业的顽强意志、拼搏为公的深厚情怀和开放博大的人类意识,蕴藏于独具民族特色的审美旨趣、饱满丰盈的心灵魂魄,这就是优秀文艺最本质的内核和最深沉的底色,也是筑牢民族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首先,具备世界眼光与人类情怀。“中国人民历来具有深厚的天下情怀,当代中国文艺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22]325}“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22]325}当代中国文艺创作者应着眼全球,创作展现中国审美、传播中国价值、反映人类共同追求的优秀作品,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艺追求。其次,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挖掘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全球激荡的时代背景下,文艺工作者“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将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22]324},“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15]26},创作出独具民族特色审美旨趣、精神特质、灵魂标记和价值追求的优秀文艺作品,为世界人民提供中国特色的审美滋养,为整个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让世界各国人民切身体味中华文化的巨大魅力,在世界文

化“大合唱”中弹奏出中华民族最强音。最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文艺工作者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创造性和影响力持有充分自信,不断增强深刻理解和理性认知,赋予其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并以优秀的艺术实践开掘和呈现中华文化的美学内涵,融合传统文化、现代思维与当代传播要素,“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23],游戏《黑神话:悟空》即是探索成功的例证。

四、习近平文艺观人民性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文艺观人民性的实践路径在文艺领域主要表现为深化文艺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及推动优秀文艺走出去这三个方面,旨在确保文艺创作更加贴近人民、满足人民需求,并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第一,深化文艺体制机制改革,确保文艺创作更加服务于人民。首先,在激励机制方面,建立以人民满意度为重要衡量标准的文艺评价体系。除了专业评审,还要增加群众评审团,让普通民众参与到文艺作品评优过程中,激励创作者生产人民喜爱的作品。例如,对于电视剧奖项的评选,可通过线上投票、线下观众代表座谈会等多种方式收集大众意见。政府的文艺创作资金、补贴等优先给予那些深入生活、反映人民题材的作品。比如对一些以乡村振兴、普通人奋斗故事为主题的文艺创作项目,在资金上予以重点扶持。其次,在人才培养机制方面,要完善以基层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在艺术院校的课程设置中,安排学生深入基层体验生活的环节。如学表演的学生到工厂、农村进行为期数月的实践,与工人、农民共同生活,了解他们的情感与故事,为日后塑造真实的人民形象打基础。在师徒传承引导方面,要鼓励老一辈艺术家在收徒授艺时,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比如老作家在指导年轻作者时,要求他们创作前先去采访各行各业的群众,积累素材。再次,在创作引导机制方面,要强化选题规划引导机制。文化管理部门定期发布贴近人民生活的创作主题指南。比如,在社区文化建设主题下,引导创作者围绕社区里的邻里关系、志愿服务等内容进行创作。文艺机构利用大数据分析大众的文艺喜好和社会热点。例如通过分析阅读平台的数据,了解老百姓对不同题材小说的偏好,反馈给作者,使他们的创作更符合人民的兴趣。最后,在传播推广机制方面,合理分配平台资源,强化基层推广。主流媒体平台、文艺传播平台在版面、时段安排上,优先展示反映人民生活的文艺作品。如电视台在黄金时段安排播放讲述老百姓故事的电视剧。加强基层文化场所建设,将优秀的、贴近人民的文艺作品输送到社区文化中心、乡村文化站等,让文艺作品更方便地走近人民。综上所述,通过改革文艺体制机制,为文艺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为了增强文艺工作的治理效能,应当激发文艺发展的活力,保证文艺创作更加紧密地联系群众、体现人民心声。

第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首先,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这包括持续投入资金,建设和升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确保这些设施能够覆盖城乡,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高农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在城乡均衡发展。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破公共文化服务的时空局限,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现代科技与公共文化服务深度融合。可以建设智慧图书馆、智慧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平台,开发云展览、云阅读、云视听等线上文化服务模式,让人民群众随时随地都能享受到丰富的文化资源。其次,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加强公共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要根据人民群众的需求,提供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可以通过实施“订单式”“菜单式”“预约式”服务,精准对接群众需求,解决公共文化服务“有没有”和“好不好”的问题。同时,应激励并指引社会组织、企业及个人投身到公共文化服务之中,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要培养和引进一批懂文化、爱文化、会管理的公共文化服务人才,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同时,要加强对基层文化工作者的培训和支持,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最后,强化公共文化服务的评估和监督。要建立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定期对公共文化设施的运行情况、服

务效果进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整改。同时,要加强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监督,确保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效益。综上所述,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要从设施建设、服务供给、数字化建设、人才队伍建设以及评估和监督等多个方面入手,以保障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

第三,推动优秀文艺走出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首先,立足于中华文化的根基,推进文艺人才强国战略。挖掘并呈现中华文明的精神象征与文化精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文化资源的守护与运用,促进文化创新与进步。借助国际文化交流展、世界文化节此类活动,以艺术为载体履行对外交流责任,助力世界更完整地认知中国。推动构建鼓励艺术家开展对外交流的政策体系,设立助力高影响力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专项基金,帮扶有发展潜力的艺术家打造优质作品,推动此类扶持体系稳定运行、长效发展。同时,加强美术教育体系建设,培育更多热爱美术、有才华的艺术家。其次,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对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与文化核心予以提炼展示,构建起与我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话语权,此乃势在必行之举。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构建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通过电影、电视、音乐、网络等传播媒介,扩大中国文化产品的输出,让世界更多地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最后,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和创新,加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需着力推进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速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以及文化消费模式的兴起与发展。通过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提升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品牌。加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主要表现在积极运用现代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推动文化产品的创新和发展,提升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综上所述,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优秀的文化产品和精神食粮。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习近平文艺观以其深刻的人民性,为新时代文艺发展奠定了价值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习近平文艺观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人民至上理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飞跃。发展新时代文艺事业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文艺观为指引,弘扬人民性,将其融入文艺工作,向广大人民敞开文学艺术的怀抱,肩负起新文化使命,书写民族新史诗,铸就文艺与文化的新辉煌。

参考文献:

- [1] 刘昉,等撰.旧唐书·魏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2551.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1.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686.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6] 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3.
- [7]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6.
- [8] 孟子[M].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289.
- [9] 杜甫.杜诗详注[M].仇兆鳌,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832.
- [10] 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1] 沙灵娜,译诗.唐诗三百首全译[M].何年,注释.陈敬容,校订.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272.
- [12]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5-856.
- [13] 张江明.邓小平理论与现代化建设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72.
-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5]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40.
- [17]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28.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23.
- [20]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21] 李玲. 用世界语言讲中国之道[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03-01(01).
- [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23]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8.

(责任编辑:王 蕾)

On the People-Oriented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Xi Jinping's View on Literature and Art

LI Hui-yan, KUAI Zheng-ming

(School of Marxism,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s view on literature and art has a profound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it not only inherits the classical Marxist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but also draws from the people-oriented ideas and literary criticism concepts i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eoretical idea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discourses on literature and art embrace rich connotations, covering the essence and soul of literature and art, the issue of how to achiev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and art, etc. Xi Jinping's views on literature and art have enriched the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developed the criteria for literary evaluation, and highlighted the subject status of the people. To develop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new era, efforts must be made firstly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literature and art to ensure that literary and art creation better serves the people; secondly to improve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to ensure the sharing of development by the people; and thirdly to promote outstanding literature and art to go global and enhance the soft power of na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Xi Jinping; views on literature and art; the people-orientatedness;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



主持人语

李跃力

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是,近年来茅盾研究正在持续升温,甚或渐成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投身茅盾研究领域,产出了一批批重磅成果,使茅盾研究的气象为之一新。与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潮流中的茅盾研究相比,当下的研究无疑摆脱了文学-政治对立的二元框架,呈现出更为复杂丰富的面向。就茅盾研究而言,学界的共识正在形成,即对于茅盾这样的文学大师,他的独特性不是在拒斥政治,而恰恰是在全身心地拥抱政治。因此,简单地用一种抽象的个性化观念或者“纯文学”的价值理念去衡量茅盾及其文学,当然是不恰当的,也不是历史主义的。茅盾研究的魅力在于,其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样本,以及一个作家与政治深度纠缠的样本。观察茅盾的视角不应该基于文学与政治的对立,反而应基于文学与政治的互动与融合。但这互动与融合绝非抽象的,而是具体而微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展开的。这样,“历史化”观念影响下的茅盾研究一方面呈现出鲜明的文献意识,即借助原始文献的梳理将问题置于历史现场中来审视;另一方面则是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角度重新进入茅盾的文学世界,对其创作做新的诠释。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研究范式称为“再政治化”,以区别于此前那种简单的“政治化”。

本专栏刊发的两篇论文,可以视作“再政治化”方法的具体实践,均在文本阐释的层面展开,对茅盾的经典文本《子夜》《幻灭》进行了新的诠释。杨晓河的《爱情幻灭抑或革命幻灭——〈幻灭〉中爱欲问题的文学思想史意义辨析》同样有明晰的问题意识,即《幻灭》中的“爱情”的本质是什么?茅盾如何处理它和革命的关系?与此前研究不同的是,杨文经由文本绵密细致且富有理论性的分析指出,在《幻灭》中,茅盾呈现出的是革命与爱欲的共生关系而非对立关系,他写出了爱情的幻灭,却并没有写出对革命本身的幻灭,小说也“因此是一个爱情从此让位于心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性的故事”。刘世浩的《从“革命文学”论争看〈子夜〉中的革命叙事——兼谈吴老太爷的“革命”》一文,重新审视“革命文学”论争与茅盾创作《子夜》的关系,即“革命文学”论争对茅盾所产生的影响如何落实在《子夜》之中。以往我们对此一问题的认识较为粗疏空泛,毕竟“革命文学”论争数年之后,茅盾才创作了《子夜》。但刘世浩从文本外部和文本内部将这一影响条分缕析出来。从文本外部来看,茅盾试图在《子夜》中从都市与乡村两个角度大规模表现中国革命整体发展过程的创作计划,与其“革命文学”论争的经历以及“左联”的潜在影响密切相关;从文本内部来看,茅盾对吴老太爷“维新党人”革命经历的简单勾勒绝非无意而为,吴老太爷的“革命”作为《子夜》革命叙事之“前世”,上可勾连晚清以来的革命历史,下可牵出1930年代革命之“今生”,这体现了小说独特的革命叙事逻辑。刘文对《子夜》开篇吴老太爷的情节阐释,令人耳目一新。

无论是刘文抑或杨文,似乎都昭示着茅盾研究的一条新路径,即将一种充分历史化的方法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由此对经典文本提供新的阐释的可能,这种研究或许才刚刚开始。

(责任编辑:晏洁)

收稿日期:2024-08-10

作者简介:李跃力(1978—),男,河南叶县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



爱情幻灭抑或革命幻灭

——茅盾《幻灭》中爱欲问题的文学思想史意义辨析

杨晓河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茅盾在《幻灭》中到底书写了什么爱情,这种爱情与革命有何关系?从爱欲思想的角度来思考,能够进一步厘清性和爱,进而发现小说的挚爱叙事尚未展开就走向了幻灭,它的欲爱叙事则暗示革命与爱欲并非矛盾而是共生关系。这符合马尔库塞提出的革命与爱欲交互促进的理论。从叙事安排来说,小说结尾革命活动并未停止,而爱欲活动均走向幻灭。《幻灭》体现出茅盾对大革命时期革命与爱欲关系的感悟,带入一个关键问题:挚爱和欲爱叙事共同走向的虚无与革命有何关系?

关键词:茅盾;《幻灭》;革命;爱欲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25)01-0027-08

《幻灭》是中国现代小说书写“革命+爱情”主题的先锋之作。学界对茅盾小说中的性爱描写已经有很多研究。例如,陆文采清晰地分析了茅盾在《蚀》等作品中性描写的艺术特色及其所受的中国古典情色文学的影响^[1]。徐仲佳对茅盾早期性爱思想进行系统分析,认为茅盾的性爱思想是灵肉一致,“带有明显的再造文明意识”,从而将性爱观与革命观在现代性改造这个命题上统一起来^[2]。吴承诚从爱情描写角度去对比茅盾和郁达夫的写作,从灵与肉的分歧与统一的辩证关系角度出发,剖析茅盾的性爱书写特质^[3]。其他从性爱角度研究茅盾的还有李继凯等学者。但是从爱欲思想史的角度,在进一步厘清性与爱、婚姻与爱情后,研究茅盾究竟书写了什么样的爱情,内在问题包括主人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爱情故事,这些爱情故事体现什么样的爱欲思想,又为何会走向幻灭;以及从距离当时革命环境已经有近百年历史距离的后革命角度,我们该如何看待爱情与革命;“幻灭”到底是指爱情幻灭还是革命幻灭?这些问题目前依然不清晰。回应这些问题,离不开对爱情叙事的文本细读。而对一个时代的革命叙事的理解,少不了与其他时代的革命故事进行对比。陈幼石在《茅盾〈蚀〉三部曲的历史分析》中则作了索隐式的独特的文本细读^[4],不过该文对《蚀》中爱情叙事的揣测性解读和茅盾先生的回忆录有所出入。陈幼石将小说中的爱情故事都看作是大革命政治故事的隐喻,等于将爱情也纳入革命进行研究,却对爱情叙事本身的意义探索不够,忽视了茅盾当时具有的爱欲激情与革命激情虽可对位,却不是同一的。这种对位不仅出现在茅盾思想中,后来也普遍显现于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革命作家作品中。虽然他们具体的爱欲思想和革命思想有个体性差异,但都存在极具时代特征的爱欲与革命的互动激情,以至于研究者容易将两者混同。本文试图把茅盾的爱欲思想放置到中国现代文学爱欲思想谱系中考察,限于篇幅,先就《幻灭》一文进行分析,适当扩及《蚀》及另外两部作品,力图展现小说爱情故事的爱欲思想内核和对其中爱情与革命的关系进行再思考,考察其在中国现代文学爱欲思想史中的意义。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爱欲思想研究”(SWU210922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19ZDA274)

收稿日期:2024-08-10

作者简介:杨晓河(1982—),男,重庆永川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西文学爱欲思想比较研究。

一、挚爱故事:尚未展开,已然幻灭

区分《幻灭》里的性(sex)与爱(love),爱情叙事分为挚爱(agape)叙事和欲爱(eros)叙事,“挚爱”指欲求和唯一爱情对象恋爱,而“欲爱”指欲求和不止一个爱欲对象恋爱。与鲁迅《伤逝》等所书写的“五四”时代的挚爱叙事不同,《蚀》三部曲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挚爱叙事,绝大部分革命青年一开始就选择和不止一个爱欲对象进行恋爱,并没有坚持爱且只爱一人的挚爱观念和行为。唯有《幻灭》中静女士的两段情感经历具有挚爱倾向。

第一个是静女士与抱素的情爱故事。伪装成革命青年的反革命暗探抱素,处心追求静女士,但静女士对其并无感觉,却因为抱素被慧女士抛弃而对抱素产生了一些关于爱的情绪,这种情绪让她接受将第一次与男性的亲密关系给了抱素。作者替静女士解释为“现在细想起来,不忍峻拒抱素的要求,固然也是原因之一,但一大半还是由于本能的驱使,和好奇心的催迫。因为自觉并非被动,这位骄傲的小姐虽然不愿人家知道此事,而主观上倒也心安理得。”^{[5]52}这段爱情刚准备开始,就因为静女士从抱素遗落的书里发现了他的暗探身份而突然中断,因而其发生和结束都突然而蹊跷,以至于论者往往忽视这段爱情叙事内在的完整性和爱欲思想内涵。例如钱杏邨等人批评过这样的结尾太过突兀,但他们忽略了其实这个故事有着隐秘而完整的前奏,比后来静女士与强连长的爱情故事写得细腻且丰满很多,可以说《幻灭》的第二节到第六节前段的叙事都在为这次爱情关系的发生做铺垫。这段相对漫长的叙事回答了一个对爱情而言最基本的问题:静女士为何会爱抱素?

觉察静女士和抱素这段爱情叙事的漫长前奏,需要区分性爱研究和爱情研究,倘若论者简单把二人发生性爱关系当作爱情叙事的开端,将会偏离矛盾重爱情而非性爱的基本宗旨。是否欲求发生性关系,选择哪种性别或者哪个类型的对象发生性关系,这是性爱关系最基础的问题。为何会爱上某个特定的人,而不是为何和某个对象发生性关系,这是爱情关系的基础问题。在这样的情感关系中,性是其中一个并不必须存在的环节,更不是一种必然结果。写过革命文学也反思过革命文学的昆德拉,这样去区分性爱行为与爱情行为:“爱情并不是通过做爱的欲望体现的,而是通过和她共眠的欲望体现出来的”^[6]。而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爱情是欲求仅和某个对象死死抱在一起,重返整全状态;绝不是为了欲求“共享性事的快乐”^[7]。在西方文学的爱情关系描述里,如果终其一生,始终欲求与某个特定的对象在一起,则是挚爱主题的叙事模式。反之,欲求不止和一个爱欲对象产生爱欲关系,便是欲爱主题模式。

要理解静女士为何会爱上抱素,可以从结尾开始回溯故事。结尾明确说了在情感上静女士愿意和抱素发生第一次关系的理由:她认定抱素是所有人中唯一理解她的。“她心的深处似乎有一个声音说道:‘走上前,对他说,你真是我的知心。’”^{[5]50}“静霍然立起,抓住了抱素的手,说:‘许多人中间,就只你知道我的心!’”^{[5]51}就在这次主动抓住抱素的手之后,她听任了抱素的所为。性爱可以与理解无关,但爱情需要理解和交流。往前回溯故事,矛盾为“理解”埋下的伏笔十分深远,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小说从静、慧二位女士以友情为起点的相互安慰的交流开始,实际上写了两人其实难以相互理解。那些不能理解对方真实想法前提下的劝诫加重了一种让人厌倦的存在困境。双方都在用一种大革命时代的共同话语去相互劝谕,却并未理解对方独特的个体忧郁。这体现出当时一个基本的交流困境:话语制造者要求个人去理解时代话语,却无视时代话语是否理解个人。第二,强调了静女士的个性与众不同。静女士的绝大多数同学都在直接参与各种革命活动,她却想静下心来读书。矛盾由此揭示出另一个交流困境:与众不同的个体因为其特殊,更容易区别于常人,本应获得更为准确的理解。但悖论恰在于,常人总是用公共的普通的话语去理解独特个体,所以特殊的人或事往往不容易被理解,甚至不被人试图理解。慧女士不算特殊,类似于《蚀》后两部中的章秋柳、孙舞阳等人物,但静女士与她们都不一样。例如在大革命的火热背景中,其他人都参与其中,或者在革命的前提下“恋爱”(基于性欲基础上的欲爱行为,慧女士、陶女士、孙舞阳、章秋柳都是这样的行为),而静女士却觉得“只有‘静心学习’一语,对于她还有些引诱力”^{[5]58}。慧女士并没有尝试去理解静女士内心的理想,而是首先就从现实主义角度对之提出反对:“你打算静心读书么?什么地方容许你去静心读书呢?你看看你的学校!你看看你的

同学!他们在这里不是读书,却是练习办事——练习奔走接洽,开会演说,提议决议罢了!”^{[5]8-9}慧女士未站在静女士的角度思考,因此,静女士对慧女士的话也“不以为然”。可以作为普遍悖论的是,慧女士认为知道对方的想法或目标(读书)就算是理解,然而“知道”(了解是什么)和“理解”(了解为什么)之间隔着遥远的距离。静女士非常清楚真正不能读书的原因不是因为时局,而是因为丧失了读书的心境——“读书何必一定上课呢!”^①第三,抱素对静女士不能算理解的“理解”也花了很多工夫。通过各种探询,抱素力图去理解静女士的想法,然后再投其所好。所以,抱素关于革命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浅薄发言虽然不能得到静女士认可,但对静女士忧郁的劝慰语却逐渐唤起她的好感——“她想起抱素规劝她的话来,觉得句句是知道她的心的,知道她的好处,她的缺点的,是体贴她爱惜她的”^{[5]45-46}。静女士自认为的这种“理解”和共鸣感是她对抱素产生爱的情感基础。只是所产生的爱的情感,却不是理解,而是怜悯,静女士怜悯抱素在爱慧女士过程中所受的伤。静女士认为“爱就是怜悯的转变”^{[5]49},而“她的‘怜悯哲学’已在抱素心里起了应和”^{[5]50},于是和抱素发生了亲密关系。简言之,茅盾此时通过静女士提出的爱的理由是:理解产生怜悯,而怜悯生发爱情。

理解《幻灭》里相对于全文已算漫长的关于“理解”的铺垫,可以明白静女士和抱素的爱情结尾恰好体现茅盾有意使用的“突转”手法。“突转”从叙事技法角度,有利于增强叙事的戏剧性,而从故事内在的思想脉络而言,茅盾一直都在暗示“人与人相互理解的难得”。因此,作者安排静女士无意看到抱素的信件就顺理成章。静女士发现抱素仅仅是“一个轻薄的女性猎逐者”^{[5]56}。她感到受伤不是因为婚姻理想受挫或者身体失去贞洁,而是因为“理解”原来是“误解”。抱素同时背叛了情感和革命,静女士离开他与性爱无关,而是和爱情的情感前提(理解)的消失有关。静女士的第一个爱情故事看似突兀,还与茅盾使用的对位法有关系。这个故事与第二个爱情故事形成了周密的对位。静女士的第二个爱情故事,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小说结尾),看似内容更丰富,实则篇幅更少。上文提及静女士的第一个爱的故事,衍生了一个她对爱的定义:“怜悯是最高贵的情感,而爱就是怜悯的转变”^{[5]49}。在第二段爱情故事结束时,她发现了自己错付了怜悯,但却未改变过自己的爱情定义。所以,在第二段爱情里,强连长发表了一番关于爱上战场的言辞后,她认定强连长是一个伤心人,从而产生了一种怜悯的忧伤。“她暗中忖量:这少年大概也是伤心人,对于一切都感不满,都觉得失望,而又不甘寂寞,所以到战场上要求强烈的刺激以自快罢。”^{[5]95}“因为想起他那样的人,却有如此悲痛的心理;他大概是一个过来的伤心人!”^{[5]96}这些怜悯构成了静女士对强连长动情的真正原因。不同的爱情故事情节因为相同的爱情理由构成巧妙的对位:第一个故事写静女士被追求,第二个故事写她主动追求别人;第一个故事重心在相爱前,第二个在相爱后;第一个故事写相爱前所追求的思想理解,第二个故事写相爱后所追求的身体上的相互愉悦。两个故事互文,体现出茅盾对爱情的思考全面而不突兀。

从爱情叙事来看,两段叙事最巧妙的对位是在结尾。通常情况下,爱情故事的悲剧结尾有两类:一类是爱情消失导致分手;一类是仍存爱意却被迫分开。茅盾在静女士的两段爱情故事里,通过这两种悲剧结尾制造了鲜明的对比。第一次无爱的分手虽然剧情突兀,但情感逻辑并不突兀。第二次相爱的分离剧情虽不突兀,情感逻辑却有些吊诡——明明强连长已经决定不去打仗了,静女士为何还督促他上战场?她原本打算让强连长用对女人的爱代替对战场的爱。慧女士曾经把静女士的心事这样说出来:“小妹妹,你和那军官可以成为一对情人;那时,他也毋须再到战场上听音乐,你也不用每日价悲天悯人地不高兴!”^{[5]96}如今静女士已经让强连长爱她胜过爱战场了,为何最后却主动放弃?小说写道:

静的温婉的女子的心,转又怜悯她的爱人了;她知道一个人牺牲了自己的主张是如何痛苦的——虽然是为所爱者牺牲。在先静以为强又要从军便是对于自己的恋爱已经冷却,所以痛苦之中又兼愤懑;现在她明白了强的心理,认定了强的坚固的爱情,她不但自慰,且又自傲了。她天性中的利他主义的精神又活动起来。

“惟力,你还是去罢。”……^{[5]108}

①静女士的观点可能是茅盾自话,区分于当时的普通革命青年。从史实看,茅盾为代表的五四一代学人作家始终坚持了学习和做学术,不仅是写小说。参见茅盾:《幻灭》,《茅盾全集》第1卷,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17页。

“怜悯”再次成为静女士的爱情思想的关键词,而怜悯的前提是她对强连长的自以为是的“理解”。至于强连长是否真愿意重新回到部队,对战场的喜欢又是否真如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来自一种未来主义的激情,会不会同抱素一样只是来自浪漫主义的虚饰?小说并没有直说,下文再将其放回革命叙事中去思考。但是静女士的爱情因为强连长的离开已然终止,作者暗示了静女士虽然说着山盟海誓的话语,其实并没期待强连长三个月后会回来再续爱情,这才是体现爱情幻灭的吊诡之处。文章结尾时静女士的原话是:“诗姊!我们分离后,我简直是做了一场大梦!一场太快乐的梦!现在梦醒,依然是你和我。”^{[5]110}也即是说,无论对象值得爱与否,静女士所代表的大革命时代青年的挚爱理想均已“幻灭”。

二、欲爱故事:革命爱情的“灵”与“肉”之辨

静女士的爱情故事在《蚀》三部曲里算是独特的,其独特处就在于她欲求和某个唯一的对象相爱,但这种欲求和《动摇》中方太太所欲求的传统的从一而终的情感不同。现代意义上的挚爱并不欲求永恒性,因为现代人已经不信仰永生,不再欲求“生生世世相爱、岁岁年年共度”,但至少欲求爱的对象在情感状态中的唯一性。因此,静女士才刨根究底地追问强连长与前女友的感情,也忍受不了抱素对爱情的背叛。相比静女士的爱情,其他人的爱情大都有着强烈的欲爱特征——他们欲求不止一个爱欲对象。例如慧女士曾经和不少人发生过露水情缘,王诗陶女士有过轰动全校的三角恋爱。这些翩着对象谈的恋爱,似乎就是以愉悦为目的——尤其是性爱的愉悦,但绝非简单地欲求性爱快乐。这种欲爱活动和“五四”早期的知识分子从旧士大夫那里继承而来的狎妓,以及“五四”新知识分子的自由恋爱均有明显的不同,是极具大革命时代特征的“恋爱”。这种非传统的爱欲行为,在茅盾看来与革命有关,但到底有何关联,茅盾并没有直接交代。他借静女士的思考描述了这些爱情:

一方面是紧张的革命空气,一方面却又有普遍的疲倦和烦恼。各方面的活动都是机械的,几乎使你疑惑是虚应故事,而声嘶力竭之态,又随在暴露,这不是疲倦么?“要恋爱”成了流行病,人们疯狂地寻觅肉的享乐,新奇的性欲的刺激;那晚王女士不是讲过的么?某处长某部长某厅长最近都有恋爱的喜剧。他们都是儿女成行,并且职务何等繁剧,尚复有此闲情逸趣,更无怪那班青年了。然而这就是烦闷的反映。在沉静的空气中,烦闷的反映是颓丧消极;在紧张的空气中,是追寻感官的刺激。所谓“恋爱”,遂成了神圣的解嘲。^{[5]80}

这段话一方面说明这种恋爱和挚爱无关,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恋爱与普遍的精神困境有关。纯粹书写肉欲属于爱欲书写中的色情主题,而《幻灭》的欲爱主题书写甚至还不算濒临色情。“要恋爱”点出大革命时期很多青年普遍性的精神困境。茅盾看到了性爱在此具有的精神性作用,却似乎并不认为性爱解放具有革命性的正当。但是,性爱和革命真的充满矛盾吗?当时的革命者自以为找到了新兴的革命和道德话语,从而从两方面挣脱了传统的爱情话语:一是在婚姻上挣脱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开始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对象;二是在身体上挣脱了贞洁观念的束缚,开始支配自己的身体,自愿地与中意的他者发生性关系。然而,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挣脱的还有第三点——挚爱的理想,即不再乞求终其一生和一个人在一起。他们愿意爱其所爱,如果发现目前的对象不再为自己所爱,马上转而去爱另一个人;或者从根本上认为没有一个人值得终身相爱,决不愿被任何一个爱欲对象束缚终身。因此,他们喜欢一个人,却绝不愿为之守贞。慧女士如此,孙舞阳和章秋柳尤其如此。孙舞阳对方罗兰有异于其他所有人的好感,但是拒绝因此放弃自己肉身与情感的自由。

慧女士等女性对自己身体情欲的承认和对自己身体自由的重视,显然与传统女性的不守贞节大异其趣。因为她们的爱欲思想特质不在于守身体的贞节,而在于精神上不再欲求从一而终的情感。如吴承诚发现:“茅盾笔下的那些‘强女人’们,在男性面前,缺乏东方女性的羞怯、矜持、谨慎……‘灵和肉’的冲突没有在她们精神世界里爆发而折磨她们。”^{[3]239}在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等女士的意识中,并没有所谓的灵与肉的冲突,这显然已经跳出了《沉沦》中(“五四”时代)那种灵与肉冲突的爱欲思想。但是,迄今还没有论者说清楚在爱情意义上,大革命时期青年放弃挚爱理想的缘由,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仅仅将之归结于对中国传统爱情模式的抛弃,也许未必。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并非禁欲主义,反而

对性爱颇有感悟。茅盾研究中国传统的性描写时总结说,中国古代性欲描写“不但在量的方面极多,即在质的方面,亦足推为各民族性欲文学的翘楚”^[8]。第二,中国古代对女性婚姻的束缚,并不能从生活的现实主义去论证爱情无用论,恰好相反,有太多的后花园私定终身的故事一直叙说着爱情对家庭和权力的反抗。第三,认为此处对挚爱的否定是来自对性爱自由的追求——即为了享受自己的性快感,慧女士等人就不能被爱情所束缚。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合理的,毋宁说是色情的。能不能享受性爱的快感,和能不能和一个人保持爱情关系,逻辑上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因为性爱的快感与对象的数量并无直接关系。恰好相反,认为性爱的快感来自于不止一个爱欲对象,与挚爱情感并不矛盾。这正好是中国古典爱欲思想的独特理论。不论《西厢记》里张生的“若共他多情的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他叠被铺床”^[9],还是《红楼梦》中贾宝玉与多个爱欲对象的性爱纠结,都说明了中国古代爱欲思想认为人欲求性爱自由和欲求挚爱情感并无冲突。

慧女士她们抛弃挚爱思想的原动力,如果不来自中国古典,那么则可能与“五四”时期引入的西方爱欲思想有关。西方文学传统的挚爱主题在文艺复兴以后,一分为二:其一是继续描写对唯一爱欲对象的热烈的爱,如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等作品;而另外一种类型是描写炽烈而不唯一的爱,其代表是拜伦的《唐璜》。拜伦等人意识到浪漫主义的爱欲重点不是欲求唯一,而是炽烈,呈现为一种强烈的征服欲。关键的思想事件是,浪漫主义文学虽然同时夹杂着挚爱和欲爱的主题,但是随着浪漫主义的激情回落,浪漫主义之后的现实主义作家再也不相信挚爱激情,所以欲爱成为一种主要的爱欲叙事。^[10]茅盾的这些欲爱书写,很可能与这个思想史事件有关:浪漫主义以后的西方经典文学家和思想家,大都已不相信传统的挚爱主题,放弃了一生只爱一人的挚爱叙事,转而探讨爱的本身可能有多炽烈而复杂,因此,西方浪漫主义之后的文学作品常有多角和自杀的恋爱。由于中国古典的挚爱主题并不鲜明,导致读者未能重视茅盾作品中这些多角和自杀的欲爱情节书写的现代思想史意义及其西方思想源头。读者重视茅盾笔下的大革命时期新女性能够独立地诉求性爱的快乐和自由选择性爱对象,却忽略了茅盾同时点明大革命时期新男性独立地欲求性爱的快乐和自由地选择性爱对象是来自同样的时代精神。这种自由选择性爱对象——试图不止和一个女性发生性爱关系——与古典的娶妻纳妾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与古代男性故意引诱女性发生性爱关系也有本质区别。简言之,他们绝不仅仅为了欲求性事的快乐,也不是为传宗接代。他们主张一夫一妻制,却又欲求和不止一个对象发生关系,不是因为他们反抗传统(传统允许不止一妻),而是因为他们接受西方欲爱话语的同时,接受了西方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对西方传统的挚爱主题的反叛。

从灵肉二分的角度去理解,茅盾书写的大革命时代欲爱思想重点显然是属“灵”的,但目前还没有论者注意到的是,慧女士的欲爱思想除了接受了对挚爱主题的否定,同时也接受了因为否定挚爱主题而陷入的爱欲思想的虚无。由此,欲爱故事非常清晰地走向幻灭。慧女士不止一次对静女士强调:“男子都是坏人!他们接近我们,都不是存了好心!用真心去对待男子,犹如把明珠丢在粪窖里。”^{[5]10}“我高兴的时候,就和他们鬼混一下;不高兴时,我简直不理。静妹,你以为我太放荡了么?我现在是一个冷心人,尽管他们如何热,总温暖不了我的心!”^{[5]83}论者容易忽略的是,茅盾指出失去挚爱理想后,爱欲思想走向虚无的不只体现在女人不再相信男人,还体现在男人们也不再相信女人。慧女士和男人们鬼混时假装的热情,与大学和革命机关里那些男人们翘着女孩恋爱的热情如出一辙。所以,《幻灭》中欲爱走向幻灭,和爱欲思想本身的发展谱系有关。从思想渊薮分析,大革命时代的这种爱欲现象是普遍的历史事实,和革命青年们心中由“五四”文学建立起来的以自由恋爱为基础的挚爱理想的坍塌有关,而不是因为茅盾革命理想的幻灭。

三、爱欲背后的革命叙事:爱欲的个体性与革命的时代性

从距离大革命时代近百年的历史角度和现代性的理论角度看《幻灭》的欲爱书写,关于“肉”的思想解放并不奇怪,这些爱欲活动与革命有密切关系也不奇怪。借西方爱欲理论来理解,其一,爱欲自由的正当性来自于启蒙主义对个体自由的重视,以及浪漫主义对主体性激情的重视。其二,弗洛伊德的爱

欲理论进一步解释了爱欲与革命的深层关系。弗洛伊德发现的性原欲说界定了性爱在生理上的正当,力比多不仅是性爱的原动力,也是搞艺术等所有创作活动的原动力。其三,马尔库塞等人相信革命者拥有比普通人更丰富的力比多,认为个体的革命激情和爱欲激情来自同样的原欲——力比多,所以他不认为性爱是纯肉体的而革命是纯精神的,也反对性爱是低级的动物性的,而革命就是高尚的这种推论。于是,他进一步论定,革命就是为了解放人的爱欲,解放后的爱欲才是人类理想性的幸福的爱欲。

从中国现代革命史背景来理解,《幻灭》爱情故事与宏大的革命背景紧密联系,爱情与革命精神事实处于特殊的历史共生。《幻灭》第一段静女士与抱素的爱情故事发生在“五卅运动”周年纪念日后不久,也就是1926年5月30日以后不久。“S大学的学生都参加‘五卅’周年纪念会去了”,“现在这‘五卅’纪念日,抱素和静女士又被发见在P电影院里。还有个青年女子——玩玩的秀眉,清澈的小眼睛,并且颊上有笑涡的,也在一起”。^{[5]21}他们看的电影是《罪与罚》。王诗陶同时爱着东方明和龙飞,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心理。主席建议应该给予其处分。组织通过民主表决方式直接处理王诗陶的三角恋爱事件,是极具当时组织特征的事件。静女士与抱素分手后躲进医院是在1926年7月,1926年8月叶挺的北伐军独立团打败吴佩孚主力。此后,静女士参加社工活动,持续半年多,然后遇到强连长。强惟力后来因为去南昌而与静女士分开,时间是1927年7月,故事结束。

基于大革命走向低潮后,茅盾本人的革命激情走向低落的史实。茅盾以为革命需要的先锋精神和爱欲活动导致的人的空虚和颓废是一重矛盾。他看到了矛盾双方奇怪地并存,却不说清楚两者为何可以并存。因此,茅盾并未清晰解释大革命时期的这些革命者究竟为何同时存在着革命的先锋性和爱欲的颓废感?但在后来的西方现代性理论看来,“先锋”和“颓废”本来就是同一现代性的不同的面孔而已^[11]。革命和爱欲在西方现代性理论看来,本来就不矛盾,而是紧密联系的共生关系。爱欲,从来不属于灵魂或者肉体,它从来就没有被分裂过。

茅盾的敏感性在于,他在1927年8月下旬到9月下旬写作《幻灭》时就直觉到革命与爱欲的共生关系。部分学者拘泥于茅盾本人的革命经历,将小说《幻灭》的主题理解为革命的幻灭,却忽视了《幻灭》中的革命叙事并未幻灭,而真正明确在思索革命受到重挫理由的是《动摇》。《幻灭》的革命故事梗概是一群在校学生纷纷走向了不同的革命岗位,干着不同的革命工作,其中一开始缺乏革命激情的主人公静女士随着社会的变化不断提升了革命意识,而且去武汉等地切实地参加了革命活动。结尾是她支持恋人强连长继续去参加革命战争,此时她的同学东方明、李克、慧女士、王女士等人仍在参加各种革命工作。茅盾自言准备写出“革命前夕的亢兴奋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12]203},并同时强调:“《幻灭》和《动摇》中间并没有我自己的思想,那是客观的描写”^{[12]205};“我只写一九二七年夏秋之交一般人对于革命的幻灭”……“这是幻灭,不是动摇!幻灭以后,也许消极,也许更积极……所以在《幻灭》中,我只写‘幻灭’;静女士在革命上也感得了一般人所感得的幻灭,不是动摇!”^{[12]207-208}茅盾这些写于1928年的创作说明和一年前写作的《幻灭》叙事结构并不完全吻合。这就提示我们需要细读茅盾潜藏的话语信息。其一,小说主人公静女士对革命感到了“幻灭”,其实也就是当时一般人所感到的对革命的幻灭。其二,“幻灭”是一个程度弱于“动摇”的词语,并非如今天还有强烈的绝望或彻底怀疑的意思,而是兴奋和满怀希望过后发现并不能得到想象的幸福,察觉“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12]207}的意思。也就是说,“幻灭”的本义不过是“幻想破灭”。但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叙说的幻灭程度,在《幻灭》中并未体现得那么严重。《幻灭》中,静女士幻想的两人相爱相伴的幸福破灭了,但对革命只是有些具体而微的行为等方面的不满,并没有《从牯岭到东京》里的“一切理想中的幸福都成了废票,而新的痛苦却一点一点加上来了”^{[12]207},更没有部分研究者根据茅盾未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和中间一长段时间退出党组织的史实来推测的茅盾对大革命期间整个革命斗争(尤其上层斗争)的幻灭。这也许能够提醒我们重视文学文本中保存下来的茅盾在南昌起义刚结束不久时关于革命的心理状态。其三,大革命时期革命者内部有不同的阵营。一方面,国共合作打败了吴佩孚等军阀,平定武汉,一帮革命青年纷纷到武汉等已经革命成功的地方去参加各种事务。这是《幻灭》中从1926年5月到1927年7月的革命故事的明面的背景。另一方面,国民党左派、右派、中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之间也是矛盾重重,这是茅盾部分地参与其中的隐秘的政治背景。茅盾当时也未必能梳理清楚,只是之前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发展态势突然转变,国

民党的“容共”变为“清共”，使得革命走向一个新的开端——到南昌去。这是现代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关系“幻灭”，《幻灭》是否如陈幼石说的充满革命阵营关系隐喻，还值得探讨，但静女士和强连长还在相爱着却分离，很难说可以比附当时国共关系的亲密与分离。其四，从茅盾晚年写的《回忆录》来看，他依然坚持《幻灭》写了静女士对革命和爱情的幻灭，增加了强连长也有一个对革命幻灭的军人肆意于性欲的原型故事。这些都在解释大革命爱欲的时代性^[13]。

但不论是1928年在东京的解释，还是1980年《回忆录》里对《幻灭》的解释，都与《幻灭》关于静女士的革命叙事有一定的不吻合。因为小说之为小说而不是历史，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优秀的小说必须借助小说人物的个体性去体验历史和述说历史，而不是以历史事件和历史大人物的行动以及历史规律与客观矛盾冲突来勾画历史发展的宏大画卷，所以历史书写追求历史史实的真实，而小说追求个体生活的真实。还原静女士的故事，她最初的选择是想读书、欲求个人的幸福安静的生活，但依然受到时代的革命气息的影响。她喜欢抱素的原因与抱素的红领巾和伪装出来的革命言行关系紧密，一旦发现他是背叛革命的暗探，立马对其失却好感。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她也受大革命的时代性的影响，泛起激情去做一些革命工作。从办公室人员到看护护士，静女士所做的事越来越实际具体，距离真正的革命活动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最后，静女士坚定地支持强连长重新投入战场，以放弃自我幸福的方式去支持革命活动，对于超脱于时代大众的静女士而言，已经是为革命作了非常大的牺牲。同时，静女士自己并未说从此就不参加任何革命活动，而是准备和王女士一起继续寻找参与革命工作的机会。小说的每个细节选择都和静女士独特的个体性勾连在一起。茅盾当时是共产党员，但静女士仅仅是非常普通的生活在革命时代的女青年。两者的个体性不该被混淆。

借助静女士的个体性，可以发现茅盾小说写作的高明之处，他充分利用了静女士的个体革命经历展示了爱欲的时代性。巧妙呈现出爱欲与革命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用爱欲故事将大革命时代普通革命青年的多元的生活状态真实地呈现出来，这将有效区别于对革命人物公式化、脸谱化的写作。《幻灭》正视了差异性的个体爱欲故事，提醒读者爱欲叙事受个体性的约束，同时也提醒时代性对爱欲行为的重大影响。为何在每一个革命时期，爱欲就会充分释放？爱欲的时代性显示出的恰好是爱欲的社会性。爱欲受社会影响，从来不只是自然属性，也不只是身体欲望。独具个性的静女士不仅参与革命活动，也在爱情选择中有意无意地受到革命话语的影响，这更证明大革命的时代性充分影响着爱欲的个体性，从形而上学层面说，也正是爱欲不具备永恒性的缘由之一。同时，欲爱主题和现代革命精神的契合，源于共同的现代性思想进程。不论从历史史实，还是现代性理论来看，革命不仅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现代性的。《幻灭》相比之前和之后的革命文学，其高明之处在于茅盾借助并未标明党派身份的一群革命青年尤其是没有党派的静女士，讨论了一种普遍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首先不在于建构什么，而在于“反抗”什么。对传统和过去的改变背后是推进现代化的基本诉求。齐格蒙特·鲍曼说现代性特质之一就是流变^[14]。没有永恒性的绝对之物，只有永恒的求变，这与欲爱精神是一致的。欲爱不追求永恒，相反，一直处于永恒的流变之中。体现在《幻灭》的故事里，“幻灭”实指了静女士对爱情的幻灭，而革命行为则一直在继续。从革命理论来看，具体的革命活动不等于革命本身，恰若美的事物不是美本身。按卡林内斯库的理论，先锋性本就蕴含革命性，流变的现代性背后有着永恒的革命性。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逻辑分析，北洋军阀会反对清朝帝制，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军会反对北洋军阀，而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者会反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组织。具体的革命活动有始有终，但是革命本身一经开启就一直涌动不止。用革命话语和革命思维去激进地做事，在《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里始终存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幻灭》中，茅盾写出了爱情的幻灭，却并没有写出对革命本身的幻灭，而爱欲的个体性，最终淹没于革命的时代性中。静女士的幻灭是“五四”挚爱理想与现代革命欲望的冲突写照，而不是通常以为的革命与爱欲的冲突。其后，左翼文学大肆盛行“革命+爱情”模式，从现代文学爱欲思想史

的承转角度去理解,并不突兀。但是,革命+爱情的叙事和“五四”的自由恋爱的挚爱叙事之间的承转,最初具有“五四”女学生学习情怀和挚爱情怀的静女士,转向为放弃爱情、支持男友到南昌去的革命形象,应该是具有文学史标识意义的形象。革命和爱情的矛盾性以这种方式呈现,构成静女士爱情的实质性幻灭。《幻灭》也因此是一个爱情让位于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性的故事,这也许是其在现代文学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标识意义。

参考文献:

- [1] 陆文采. 论茅盾创作中性描写特色及其性美学观[C]//茅盾研究:第7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177-190.
- [2] 徐仲佳. 性爱的现代性与文明的再造——茅盾早期性爱思想浅析[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06):122-128.
- [3] 吴承诚. 茅盾与郁达夫创作中爱情描写比较研究[C]//茅盾研究:第4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237-252.
- [4] 陈幼石. 茅盾《蚀》三部曲的历史分析[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74-114.
- [5] 茅盾. 幻灭[M]//茅盾全集:第1卷. 合肥:黄山书社,2012.
- [6] 米兰·昆德拉.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 许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2.
- [7] 柏拉图. 柏拉图的《会饮》[M]. 刘小枫,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2.
- [8] 茅盾. 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M]//茅盾全集:第19卷. 合肥:黄山书社,2014:128.
- [9] 王实甫. 西厢记[M]. 王季思,校注.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21.
- [10] 杨晓河. 西方文学挚爱主题的建构与流变——以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为中心的系谱学阐释[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4):149-151.
- [11] 马泰·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 顾爱彬,李瑞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61.
- [12] 茅盾. 从牯岭到东京[M]//茅盾全集:第19卷. 合肥:黄山书社,2014.
- [13] 茅盾. 回忆录[M]//茅盾全集:第35卷. 合肥:黄山书社,2014:429-431.
- [14] 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代性[M]. 欧阳景根,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5-35.

(责任编辑:晏洁)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iterary Thought History of Love Desires in Mao Dun's *Disillusionment*

YANG Xiao-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What is love like in Mao Dun's *Disillusionment*, and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kind of love and revolution? By further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 and lo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ve desires, the narrative of true love in the novel has, as can be found, become illusioned before its unfolding, while its narrative of desires suggests that revolution and desire are not contradictory but symbiotic, which is in agreement with Marcuse's theory of the interactive promotion of revolution and love desires. In terms of the narrative arrangement, the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did not stop at the end of the novel, while activities of love desires all went towards disillusionment. *Disillusionment* embodies Mao Dun's perce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volution and love desires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leading to a key issue, i.e.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ihilism shared by the narrative of true love and of love desires and revolution?

Key words: Mao Dun; *Disillusionment*; revolution; love desires



从“革命文学”论争看《子夜》中的革命叙事

——兼谈吴老太爷的“革命”

刘世浩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茅盾始作于1931年10月、完成于1932年12月的长篇小说《子夜》中的革命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1928年前后“革命文学”论争的影响。“革命文学”论争促使茅盾重新思考“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问题,调整小说创作方向,并有意识地从积极意义上表现社会革命。面对批评者们的质疑,茅盾从论争一开始就坚持以文学创作本身作为评价文艺运动成功与否的标准,不断摸索以“文学”的方式回应时代议题。简言之,《子夜》中的革命叙事实际上是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前后以及参加“左联”之后不断思考如何在小说创作中展现中国革命的结果。这种创作思路的调整一方面体现在茅盾对《子夜》叙事方式的重新编排,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文本内部的叙事张力。这种张力借助吴老太爷早年的“革命”经历,勾连起晚清时期与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历史,将《子夜》中革命叙事的“前世”与“今生”整合到一起。

关键词:茅盾;《子夜》;“革命文学”论争;革命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25)01-0035-08

“革命文学”论争对茅盾产生的影响历来是茅盾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但是,将“革命文学”论争与《子夜》中革命叙事之间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分析“革命文学”论争如何影响到了茅盾的文艺思想,进而促使茅盾对《子夜》的构思以及写作进行相应的调整,则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事实上,在“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茅盾面对来自创造社、太阳社成员攻击时的姿态颇为理性。他在经历了短期的苦恼之后,随即投入到创作之中,并坚持以实实在在的作品来回应批评者的质疑。正是这种理性的姿态,促使茅盾自觉探索如何通过小说的形式对中国革命进行正面描写。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如果说“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的“革命”更多指的是一种体现在文艺创作中的价值理念的话,那么《子夜》中的“革命”则有着明确的内涵。也就是说,“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所讨论的“革命”是“怎么写”的问题,此时讨论的重点集中在文艺表现现实的方式方法问题上;而《子夜》中的“革命”则具体到了“写什么”的层面,即以具体的文本实践,将作者对“革命”的理解具体化为对社会政治制度层面革命的表现。因此可以说,《子夜》中的革命叙事实际上将“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以实际的文学创作落实到了具体层面。这不仅体现出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所秉持的理性姿态,同时也为表现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文学经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子夜》中的革命叙事来源于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对文艺与中国革命之关系的深刻思考,并且更进一步地将这种思考落实到了具体的文学创作方面。

一、“革命文学”论争与茅盾文艺思想的转变

在“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当创造社与太阳社成员开始高举“革命文学”大旗并围攻鲁迅时,茅盾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21&ZD262)

收稿日期:2024-08-10

作者简介:刘世浩(1989—),男,河北邢台人,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

并没有参与到这场论战之中,“因为论战展开时我正埋头写《追求》,《追求》写完就真个到日本去了。直到我在日本写《从牯岭到东京》时,才间接地参加了这场论争”^{[1]440}。

不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茅盾参与“革命文学”论争要早于他写作《从牯岭到东京》的时间^①。只不过在此之前,茅盾是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参与其中,而非后来那样以文艺批评文章来表达他的观点。早在写作《追求》(1928年4月至6月)之前,茅盾创作了短篇小说《创造》(1928年2月)。茅盾自述:“我写《创造》是完全‘有意为之’。那时候,对于《幻灭》开始有评论了,大部分的评论是赞扬的,小部分是批判的,甚至很严厉。批判者认为整篇的调子太低沉了,一切都幻灭,似乎革命没有希望了。这个批评是中肯的。但这并非我的本意。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使我悲痛消沉,我的确不知道以后革命应该走怎样的路,但我并不认为中国革命到此就完了。”因此,“为了辩解,也为了表白我的这种信念,我写了《创造》”^{[1]437}。可以说,此时的茅盾依然按照自己原来的创作计划往前走,写作《创造》只不过是偶然为之,并非要标举某种主义。然而,等到“三部曲”都发表之后,批评的声音不仅来自敌对阵营,就连茅盾自己的朋友、同志也站出来批评他了,这让他颇为震惊。即便如此,茅盾依然选择以相对温和的方式表达他对“革命文学”的看法:“创造社、太阳社的朋友们在革命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有一些问题,我以为值得提出来讨论。因此,我写了《从牯岭到东京》。”^{[2]451}不料,结果却是“引来了太阳社和创造社的朋友们的围攻”^{[2]455}。

在批评者中,钱杏邨和傅克兴的言辞最为激烈^②。前文提到,不愿直接参与到论争中的茅盾曾以文学创作的方式间接回应文坛对他的批评,所以,当《从牯岭到东京》受到围攻时,茅盾并未立刻撰文反击,而是再次转向文学创作寻求帮助。尽管他在这一时期也曾在不同场合流露出内心的愤懑,如在写于1929年1月10日的散文《叩门》中,茅盾就曾暗示过当时内心的苦恼,他后来回忆道:“我对于当时围攻我的朋友仍怀不满。文末一句是:‘是你这工于吠声吠影的东西,丑人作怪似的惊醒了人,却只给人们一个空虚。’我以为我这个情绪是有普遍性的,然而用吠声吠影作象征,在当时是箭在弦上,事后深悔有伤厚道。”^{[2]461}秦德君晚年在回忆文章中也曾提及:“这一时期,茅盾的心情仍然有些郁闷。他想写一部新小说来扭转‘三部曲’在文坛上给自己造成的影响,只是苦于没有题材”,所以,当秦德君将好友胡兰畦的经历告诉茅盾之后,“茅盾大感兴趣,当即决定以胡兰畦为模特儿,写一部长篇”。^[3]于是,就有了《虹》的出现。《虹》无疑是茅盾小说创作发生转向的重要标志。茅盾自己也说:“《虹》在题材上,在思想上,都是‘三部曲’以后将转移到新方向的过渡;所谓新方向,便是那凝思甚久而终于不敢贸然下笔的《霞》。”在这里,“转移到新方向即指思想转变的过程”,在茅盾当时的创作构想中,“《霞》将是《虹》的姊妹篇。在《霞》中,梅女士还要经过各种考验”。^{[2]469-470}显然,经历来自创造社、太阳社成员的批判,并且被昔日的朋友、同志误解的茅盾,开始思考如何扭转文坛形成的对自己不利的局面。因此,在《虹》与《霞》的人物形象与情节设置方面,茅盾开始自觉向“革命”靠拢。

实际上,真正标志着茅盾文艺思想发生转变的,是写于1928年2月的短篇小说《创造》。关于这一点,茅盾本人曾在1980年出版的《茅盾短篇小说选·序》中明确指出:“《创造》是继《幻灭》、《动摇》、《追求》以后我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在题材和风格上既和《幻灭》等不同,也和我以后所写的短篇小说不同。至于思想上,已经不象《幻灭》等三篇那样消沉悲观了。……有些评论家认为《虹》表现了我的思想从消沉悲观转到积极乐观。我自己却以为《创造》才是我在写了《幻灭》等三篇以后第一次思想上的变化”^[4]。从这个角度来看,“革命文学”论争的确促使茅盾开始寻找一种全新的艺术表现方式,特别是在小说中表现革命内容。而此后《路》(1930年11月—1931年2月)、《三人行》(1931年6—11月),直至《子夜》(1931年10月—1932年12月)的出现表明,茅盾终于探索出了一条自救之路。

据茅盾回忆:“《路》的时代背景正是中国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而使革命

①《从牯岭到东京》写作于1928年7月16日,最初发表于1928年10月18日的《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参见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19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200页。

②参见孙中田、查国华:《茅盾研究资料》(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版,第10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29、747页。

经过短时间的低潮而声势又复大振的时期”；并且，“《路》全书写蒋政权下的大学教育的腐败，学生两次反抗，都被蒋政权用刺刀压迫下去。然而书中暗示学生经过失败，经验丰富了，新的反抗方法正在渐渐成熟”；此外，“我写《路》时，正值五烈士被害前后，就想通过作品，指示青年的出路。原来写的是中学生，瞿秋白看了原稿，认为应当写大学生，又谓书中有些恋爱描写是不必要的。我尊重他的意见，都照改了，成为现在形式的《路》”。^[5]如果说《虹》对革命的表现依然与主人公的情感经历纠缠不清的话，那么茅盾听取了瞿秋白的建议，在《路》中淡化了此类描写，而更加注重从正面描写革命斗争的残酷。这些细节充分表明，茅盾此时逐渐告别了创作《蚀》三部曲时的“消沉悲观”情绪，开始自觉探索在小说创作中对革命进行正面表现。尽管稍后的《三人行》在表现革命斗争方面没能超越《路》的成就，但是茅盾至少依旧沿着这条新探索出来的道路继续前行，而《子夜》的出现则表明前期的积累终于有了质的突破。

二、《子夜》的写作动机及其调整

在开明书店版《子夜》(1933年1月)的《后记》中，茅盾提到他最初的写作动机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6]，并未直接透露其描写中国革命的意图；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1939年6月)中，茅盾提到他试图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农民暴动”的写作动机^[7]；而在《再来补充几句》(1977年12月)中，茅盾“补充”道：“《子夜》原来的计画是打算通过农村(那里的革命力量正在蓬勃发展)与城市(那里敌人力量比较集中因而也是比较强大的)两者革命发展的对比，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体面貌，加强作品的革命乐观主义”^[8]。相比之前的论述，茅盾在这里第一次明确指出通过《子夜》表现中国革命的意图；到了《〈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1981年11月)中，茅盾更进一步地指出他在《子夜》中表现中国革命的创作意图：“翻开报纸，满版是经济不振、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罢工的消息。我又时常从朋友那里得知南方各省的苏维埃红色政权蓬勃发展，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多次的军事围剿，声威日增。尤其彭德怀部队红军的攻占长沙，极大地振奋了人心。这些消息虽只片段，但使我鼓舞。当时我就有积累这些材料，加以消化，写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农村的交响曲的小说的想法”^[9]。

茅盾之所以会在《子夜》创作过程中以及日后的相关表述中越来越强调其中的革命因素，显然与他此前和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之间围绕着“革命文学”展开的论争密不可分。茅盾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在1929年写《读〈倪焕之〉》的目的，原本是想对《蚀》三部曲以及《从牯岭到东京》引起的批评的“总答辩”。然而，《读〈倪焕之〉》的发表“又触怒了提倡普罗文学的朋友们”，自此以后，茅盾感叹：“因为动辄得咎，我只好写一点决不惹起风波的东西”。^[2]可以看出，来自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批评使茅盾开始有意收敛锋芒，主动避免和对手产生正面交锋。不过，此时的茅盾毕竟已经从事文艺活动十年之久^①，并且中间经历了1922年前后作为文学研究会代表与创造社之间的论争，因此，他不太可能在受到创造社、太阳社的并不严厉的批评之后就畏首畏尾^②。他此时对待批评者的态度与其说是畏惧，不如说是采取了更加柔和的迂回策略。这可以从他当年在《中学生》上发表《关于高尔基》的过程中窥见一二。

1929年底，避居日本的茅盾收到国内好友来信，请他为开明书店将要发行的专供青年阅读的月刊《中学生》写一篇文章。于是，茅盾写了《关于高尔基》，发表在《中学生》创刊号上。根据茅盾回忆：“我这篇文章是‘有意为之’的，因为创造社、太阳社的朋友们说我是提倡小资产阶级文学，我就偏来宣传无产阶级文学的创始者和代言人高尔基。”^[2]从茅盾的语气中可以看出，他在对待这件事的态度上颇有趣味，从中不难看出此前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与其说是让他变得谨言慎行，不如说是促使他换了一种方式与之周旋。当这种颇具策略意味的选择反映在创作方面时，就表现为茅盾主动探索如何在小说中融入更多的革命内涵，以此作为对先前批评者们的回应。《虹》与《子夜》都可以看作是这种创作意图的典型代表。

①茅盾第一篇文学评论文章《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发表于1919年《学生》第6卷第4-6号。

②据茅盾回忆，当时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他的批评并没有他们对鲁迅的攻击那么严重，“头上还保留一顶‘所谓革命的’帽子”。参见茅盾：《亡命生活》，《茅盾全集》第35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455页。

另外,考察《子夜》中的革命叙事,还应该注意茅盾在“左联”中的相关活动。在刚加入“左联”不久的茅盾眼中,与其说“左联”是个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个政党^{[10]491-492}。这让“自由”惯了的茅盾感到有些无所适从,他起初对待“左联”的种种社会活动也表现出“游离”的状态,但他毕竟是“左联”的一员,后来还担任过“行政书记”一职。因此,尽管他对“左联”的一些“纲领”并不赞同,但是对极左思潮耳濡目染还是让他“受害不浅”^{[10]494}。可茅盾亲身经历过“革命文学”论争,此前对“革命”与“文学”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也势必会继续影响他对二者关系的判断,这种思考便体现在《中国苏维埃革命与普罗文学之建设》(1931年11月15日)这篇文章中。文中,茅盾“针对当时普罗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弊病,提出了作家要深入生活,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挖掘真实的生动的题材的问题”。尽管茅盾事后回忆:“我这篇文章实在只是一份大声疾呼的宣言”,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篇文章与《子夜》的创作有一定的关系”;并且,“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就是我在构思《子夜》时反复想到的;而且,我也企图通过《子夜》的创作实践来检验我在文章中提出的‘理论’,即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10]524-525}由此可见,从“革命文学”论争到参加“左联”,再到《子夜》的构思与创作,实际上折射出了茅盾在《子夜》的革命叙事中所倾注的现实关怀以及精神诉求。

正因为茅盾是以作品本身的好与坏作为评判某种文艺思潮实际效果的标准,所以他才会在《从牯岭到东京》中指出“革命文艺”的“主张是无可非议的,但表现于作品上时,却亦不免未能适如所期许”,因为“‘新作品’终于自己暴露了不能摆脱‘标语口号文学’的拘囿”。^[11]故而,他才会对《倪焕之》的出现大加赞扬:“因为创造社、太阳社的朋友们自从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以来,并未能创作出一篇表现‘时代性’的作品来,相反,写出了这样的作品的,正好是他们斥之为‘厌世家’的叶圣陶”^{[12]475}。也正是因为茅盾一向坚持以实际创作来扭转文坛风气,他才在《读〈倪焕之〉》中再次强调作家在面对眼花缭乱的批评时,应当保持头脑冷静,不要盲目地跟着批评家打转,因为“当代的批评多半是盲目的,作家要有自信的精神,要毫不摇惑地冷静地埋着头干!”^[12]

从1928年在《创造》中开始有意识地转变自己的思想倾向,由对现实的消沉悲观转向积极乐观,到1930—1932年在写作《路》《子夜》的过程中对瞿秋白的意见的吸取,都表明茅盾已经走上了不同于《蚀》的创作道路,而促成这种转向的催化剂,无疑与“革命文学”论争的经历以及“左联”给他带来的潜在影响有着内在关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茅盾试图在《子夜》中大规模表现中国革命整体发展过程的创作计划,便是这种转向的深化。尽管《子夜》最终将大部分笔墨放在了都市部分,未能按照原定计划将“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农村”全盘托出,以至于研究者多从《子夜》的都市描写方面分析这部作品的文学意义与文学史意义,但是未能按照原定计划对中国革命开展过程进行整体性观照,并不代表作品本身不具有这方面的因素。实际上,正是由于茅盾最初构想这部作品时的宏大意图,才会在作品中留有这种构想的某些碎片。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第四章对双桥镇农民革命运动的描写、第九章对纪念“五卅”游行示威运动的描写、第十三至十六章对工人罢工运动的描写。从《子夜》的叙事肌理来看,这几部分与小说的主线——吴赵斗法——之间有着一定的疏离,然而,如果将这几部分内容所透露出的革命诉求放到更为长远的革命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的话,那么这种疏离并非影响了《子夜》叙事框架的完整性,而是将《子夜》纳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意义空间之中。在这个意义空间里,远有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近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大革命”、五卅运动等。有意思的是,吴老太爷这个三十年前的“维新党”在小说中的角色,恰好将上述一系列历史事件串联在了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更为深层的历史关联。

因此,只有当我们弄清楚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前后所持态度以及“左联”对他的潜在影响,才能更好地理解《子夜》中革命叙事产生于怎样的时代语境之下,也才能更好地理解茅盾为何在创作《子夜》的过程中如此重视瞿秋白的建议——他原本就是要在《子夜》中从城市和乡村两个角度反映中国革命的发展,所以当瞿秋白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之后,茅盾“都照改了”^{[9]557-558}。并且,茅盾最初写作《子夜》时用的笔名并非“茅盾”,而是“逃墨馆主”,意在“表示我是倾向于赤化的”,而《子夜》最初的题名为《夕阳》,取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来“比喻蒋政权当时虽然战胜了汪、冯、阎和桂、张,表面上是全盛时代,但实际上已在走下坡路,是‘近黄昏’了”,最终决定取名《子夜》,则是因为“《子夜》即半夜,既

已半夜,快天亮了;这是从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而言”。^{[9]561-562}这些细节表明,茅盾告别了《蚀》三部曲的时代,沿着在创作《子夜》过程中摸索出的全新道路出发了。这条新的创作道路不仅体现在外部形式技巧方面,还体现为《子夜》的革命叙事所具有的内部张力。

三、吴老太爷的“革命”及其文本意义

如果说从茅盾创作《子夜》时的历史语境着眼,梳理并考察其1928年前后与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围绕“革命文学”展开的论争,以及其参加“左联”后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如何影响到《子夜》中的革命叙事是从文本外部层面进行考察的话,那么对吴老太爷的“革命”经历及其与纪念“五卅”游行示威、工人罢工运动的内在逻辑关系分析,则是从文本内部层面入手,剖析小说在叙事层面所展现出的巨大张力。

有关《子夜》中吴老太爷这一人物形象的分析,研究者多从小说情节设置方面着眼,将其视为作者引出主要人物先后登场的“取巧”手法^①。这与作者自己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一文中的说法一致,即“第二章是热闹场面。借了吴老太爷的丧事,把《子夜》里面的重要人物都露了面。这时把好几个线索的头,同时提出然后来交错地发展下去……在结构技巧上要竭力避免平淡,但是太巧了也便显得不自然了”^{[7]679}。除此之外,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指出,吴老太爷这一人物形象在文本中的作用主要是展现了封建文化的必然衰落,此类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小说第一章末尾部分,范博文关于吴老太爷的那段分析^{[13]32}。还有研究者从病理学的角度解读吴老太爷的死,这种解读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有其合理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解读与作品本身关系不大^[14]。然而,鲜有研究者从革命叙事角度,对吴老太爷这一人物形象在小说中的特殊意义进行分析。事实上,吴老太爷年轻时也曾热心过“革命”,更是“维新党”的一员,其激进姿态可见一斑。从革命叙事角度分析,茅盾安排吴老太爷在小说开头部分死去,似有更为深刻的含义。自晚清时期开始,救亡图存存在知识界已成公论,辛亥之后,“革命”蔚然成风。然而,从维新变法到国民大革命,哪一次“革命”都没能彻底改变中国内忧外患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将吴老太爷的“革命”放到这样一个历史时段中进行考察,可以勾连起晚清时期与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历史,并从中窥探到茅盾在《子夜》的革命叙事层面对中国革命历史寄寓的深刻反思。

仔细阅读文本便会发现,吴老太爷的形象在小说的叙事层面充满张力。一方面,三十年前他是“顶括括的‘维新党’”,“满腔子的‘革命’思想”^{[13]10};另一方面,接二连三的打击不仅使他无暇顾及曾经为之热血沸腾的“革命”事业,而且“吴老太爷的英年浩气就好像是整个儿跌丢了”^{[13]10},以至于他和吴荪甫之间的“父子的冲突”更甚于他当年与父亲的冲突。文中指出,促使吴老太爷从“革命”走向“反动”的客观原因在于:“二十五年前习武骑马跌伤了腿,又不幸而渐渐成为半身不遂的毛病,更不幸而接着又赋悼亡”;主观原因在于:“二十五年来,他就不曾跨出他的书斋半步!二十五年来,除了《太上感应篇》,他就不曾看过任何书报!二十五年来,他不曾经验过书斋以外的人生!”^{[13]10}但是,如果仅仅从反封建的角度分析,认为吴老太爷这一形象在文本中的意义就像范博文所说的那样,象征着封建文化的“风化”,那么,这种分析方式并没有超出文本所框定的范畴,并且,此类研究早已成为常识。而当我们跳出文本的限定,对吴老太爷早年的“革命”进行考察时,便可以发现,作者在这一人物形象身上所寄寓的思想内涵,远远超出了反封建以及情节设置的范畴。

文本中故事发生的时间为“一九三〇年代”,而“三十年前”,吴老太爷是“顶括括的‘维新党’”,这显然提示我们将吴老太爷这一人物形象与历史上的“维新变法”(1898年6月11日—1898年9月21日)关联到一起。换句话说,作者通过描写吴老太爷这样一个曾经“革命”,但现在“反动”的人物形象,实际上暗含了他对“维新党人”那种“革命”行为的批判。“百日维新”之短促,充分暴露了晚清时期社会革命所面临的重重阻碍,有史为证,不必多言。然而,从文学创作层面来看,茅盾在《子夜》开篇部分对吴老太

^①这种观点最早见于朱自清1934年发表的《〈子夜〉》上,此后不断被其他研究者引用。参见朱佩弦:《子夜》,《文学季刊》1934年第1卷第2号,第405-408页;叶子铭:《谈〈子夜〉的结构艺术》,孙中田、查国华:《茅盾研究资料》(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版,第271页。

爷“革命”经历的介绍,实际上传达出了他试图将晚清社会革命与1930年代的社会革命勾连在一起的自觉尝试。因此,小说指出以吴老太爷为代表的“维新党”既不能彻底反抗“父”辈的压制,又不能不对“子”辈进行妥协,是别有深意的:只有冲破这种左右摇摆的处境,“革命”才能继续向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老太爷的死,也就代表了中国革命告别了一个旧的时代,迎来了新的阶段。

或许正是出于将吴老太爷曾经代表的“维新党人”的革命实践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学生的革命实践进行对比的目的,作者借二小姐芙芳之口道出了后者强大的发展势头:“罢工”“三弟公馆的围墙上,都写满了共产党的标语”“捉不完”“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许多不要性命的人”等,这些语句所透露出的信息表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再像“维新党人”那样软弱与无能。更重要的是:“共产党有枪呢!”^[13]¹²茅盾在这种描写的背后所寄寓的“民族—国家”想象显然使文本具有了更为丰富的解读空间。从这一点上来看,如果说茅盾创作《虹》的出发点是想尝试从大革命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并且回应文坛对其《蚀》的批评的话,那么他在《子夜》中对革命的描写显然深化了他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与表达,并在其中融入了他对社会现实的理性思考,从而与创作《蚀》三部曲时那种任情感肆意流淌的笔法有着云泥之别。

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一文的最后一段,有这样一个细节提示我们注意茅盾在吴老太爷这一人物形象身上所寄寓的丰富内涵:“吴老太爷好像是‘古老的僵尸’,一和太阳空气接触便风化了。这是一种双关的隐喻:诸位如果读过某一经济杰作的,便知道这是指什么”^[7]⁶⁷⁸⁻⁶⁷⁹。这里所说的“双关”,一方面自然是指吴老太爷象征着封建制度在现代文明面前的溃败,但是单从这句话来看,似乎并不能推导出其另一层含义。这显然表明,要考察茅盾在吴老太爷这一人物形象身上寄寓的丰富内涵,除了对茅盾围绕《子夜》所写的创作谈进行认真梳理之外,还应该注意茅盾与当时的时代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实际上,在茅盾写作《子夜》之前,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托派之间展开了较量^[15]。而茅盾写作《子夜》的目的就是想回答托派,中国的社会性质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7]⁶⁷⁶。在发表于1931年8月5日的《“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一文中,茅盾借检讨“五四”的机会,表达了他对“新文学”的不满。尽管他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明确提到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但是从他指出五四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以及强调无产阶级争取政权方面可以看出,此时的茅盾已经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革命以及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了^[16]。而在稍后的《“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1931年9月13日)中,茅盾更是以严厉的措辞揭露了“民族主义文艺”的法西斯本质。此外,茅盾自己也曾谈到他在193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靠拢:“说到我自己,在三十年代,不过是力争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总之,我不过是尽力而为……换言之,是以当时所达到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尽力去理解、分析所观察到的事物”^[17]。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发现,茅盾在创作《子夜》前后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他要通过《子夜》的创作来回答托派的写作目的,则进一步表明了他在《子夜》创作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运用。由此可以推断出茅盾在吴老太爷这一人物形象身上寄寓的“双关的隐喻”的另一面,当是指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形象化表达。因此,《子夜》开篇部分对吴老太爷的“革命”经历所进行的简要描写便不再仅仅是一种“取巧”的写作手法,而是茅盾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宏观展现的尝试。

可以说,无论茅盾是想通过《子夜》的创作来“回答托派”,还是试图从城市和农村两个方面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进行整体表现,以便回应“革命文学”论者对他的批判,都离不开他对当时社会发展方向的准确判断。这显然与茅盾在写作《子夜》的过程中对文艺的社会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分不开。在写于1932年4月的《我们所必须创造的文艺作品》中,茅盾指出,在当下的时代环境中,“艺术家的任务不仅在分析现实,描写现实,而尤重在于分析现实描写现实中指示了未来的途径”;另外,在这篇文章中茅盾还呼吁广大作家对当时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实际问题进行广泛、深刻的描写,以便“唤起民众间更深一层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18]紧接着,在写于同年12月的《我的回顾》中,茅盾再次强调,在帝

国主义加紧控制中国的时代环境中,“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19]。可见,此时的茅盾是自觉站在文艺与时代社会互动的价值立场之上着手进行文学创作的,尤其强调作家在创作时应当具有分析社会现实的冷静的头脑。正是这种理性分析的价值诉求,促使茅盾在《子夜》中对如何表现中国革命整体发展的过程进行了自觉的艺术探索。而在小说开篇部分对吴老太爷“革命”经历的介绍,无疑是内在于这种价值诉求之中的。此后,小说第四章对双桥镇农民暴动的勾勒,以及第九章和第十三至十六章对纪念“五卅”游行示威活动、工人罢工运动的描写,也可以看作是作者试图从相对宏观的层面表现中国革命发展过程的合理展开。无怪乎有的研究者认为《子夜》的创作特征是一种“逻辑理性建构”^[20]——它原本就是继《创造》《路》《三人行》与《虹》等小说之后,茅盾在创作中融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典范之作。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子夜》中吴老太爷这一人物形象所代表的“历史变迁”,认为茅盾在小说开头对吴老太爷“过去”的交代,“丰富了人物性格的历史内容,扩大了读者审美感知的信息量”。^[21]然而,这种“丰富”与“扩大”是在何种意义上的“丰富”与“扩大”,研究者并没有深究。从小说内部结构来看,这一情节设置可以引出主要人物形象陆续出场;而当我们跳出小说内部结构的分析,从小说所包含的思想意蕴角度来分析吴老太爷这一人物形象时,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茅盾对吴老太爷“革命”经历的简单交代,实际上表现出了从历史长时段中勾连中国革命的创作意图。

虽然吴老太爷青年时代也曾是“维新党”,但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尚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封建势力依旧强大,吴老太爷最终没能摆脱做封建大家庭“孝子贤孙”的命运。而当吴老太爷继续按照先前那一套思想观念来要求吴荪甫时,封建家长的权威突然失灵了。这一方面是因为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政权迅速土崩瓦解,各地军阀纷纷独立,革命力量迅速崛起,进而导致思想观念领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裂变;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入侵,夹带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给中国社会注入了一系列迥异于传统的文化元素与思想观念。自晚清以来,中国逐渐被纳入追逐“现代”的历史进程之中。自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便陆续开始寻求通往“现代”的“正途”。从晚清时期的“中体西用”到“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从学习西方的“器物”到“制度”,最终意识到要学习西方的“思想”。尽管辛亥革命以后成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形左实右”的政策根本无法完成民族革命的历史任务。事实上,国民政府的阶级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不可能坚决地抵抗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大革命”的失败便将其反动的一面显露无遗。茅盾曾怀着崇高的理想投身其中,并在政治部任职,但“大革命”的失败将他对于国民政府的幻想彻底击碎。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运动与工人罢工运动的蓬勃发展,显示出巨大的革命潜能,这使茅盾受到极大鼓舞。因而,茅盾在《子夜》中对中国革命的侧面描写,并将吴老太爷的“革命”作为小说革命叙事的历史背景,可以将小说中的农民暴动、工人罢工运动,以及纪念“五卅”游行示威运动这样一系列革命叙事纳入一个相对完整的叙事脉络当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作者试图在《子夜》中完整地表现中国革命发展过程的创作意图。从这个角度看,茅盾在《子夜》开篇部分对吴老太爷的“革命”经历进行简要描写,是从“革命”视角着眼,将吴老太爷的“革命”作为小说革命叙事之“前世”,以此勾连起自晚清以来的中国革命历史,并将其与当下的革命运动进行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对照,从而引出1930年代中国革命之“今生”。因此,小说对吴老太爷“革命”前后变化的描写,就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修辞上的讽刺,它实际上体现了小说的革命叙事逻辑。

参考文献:

- [1] 茅盾. 创作生涯的开始[M]//茅盾全集:第35卷. 合肥:黄山书社,2014.
- [2] 茅盾. 亡命生活[M]//茅盾全集:第35卷. 合肥:黄山书社,2014.
- [3] 秦德君,刘淮. 我与茅盾的一段情缘[J]. 百年潮,1997(04):59-64.
- [4] 茅盾. 茅盾短篇小说选: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2.
- [5] 茅盾. 《路》法文版序[M]//茅盾全集:第2卷. 合肥:黄山书社,2014:425-426.

- [6] 茅盾. 后记[M]//茅盾全集:第3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604.
- [7] 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M]//茅盾全集:第3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
- [8] 茅盾.再来补充几句[M]//茅盾全集:第3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613.
- [9] 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M]//茅盾全集:第35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
- [10] 茅盾.“左联”前期[M]//茅盾全集:第35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
- [11]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M]//茅盾全集:第19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212-213.
- [12] 茅盾.读《倪焕之》[M]//茅盾全集:第19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245.
- [13] 茅盾.子夜[M]//茅盾全集:第3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
- [14] 李城希.《子夜》中吴老太爷死亡原因分析[J].名作欣赏,2012(20):59-62.
- [15] 李新,彭明,孙思白,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99-105.
- [16] 茅盾.“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M]//茅盾全集:第19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281.
- [17] 苏珊娜·贝尔纳.走访茅盾[J].新文学史料,1979(03):191-197.
- [18] 茅盾.我们所必须创造的文艺作品[M]//茅盾全集:第19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358-359.
- [19] 茅盾.我的回顾[M]//茅盾全集:第19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460.
- [20] 周仁政.逻辑理性建构与茅盾《子夜》的革命叙事[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06):88-93.
- [21] 程致中.全景式史诗的基础工程——《子夜》开头三章的艺术评说[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01):24-30.

(责任编辑:晏洁)

On the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in *Midni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troversy over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Senior Mr. Wu's "Revolution"

LIU Shi-h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in Mao Dun's novel *Midnight*, which was first written in October 1931 and completed in December 1932, was largely influenced by the controversy over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round 1928, which prompted Mao Dun to reconsi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adjust the direction of his novel creation, and consciously express social revolution in a positive sense. Faced with the doubts of critics, Mao Dun has insisted on the literary creation itself as the standard for evaluating the succes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movements from the start of the controversy, and constantly explored ways to respond to the issues of the era in a "literary" manner. In short, the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in *Midnight* is actually Mao Dun's constant reflection on how to demonstrate the resul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his novel cre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controversy over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after his engagement in the "Left Alliance". The adjustment of this creative approach is reflected in Mao Dun's rearrangement of the narrative style of *Midnight* on the one hand, and in the narrative tension within the text on the other hand. This tension, with the help of senior Mr. Wu's early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connects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1930s, and thus integrates the "past life" and the "present life" of the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in *Midnight*.

Key words: Mao Dun; *Midnight*; the controversy over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从“怪诞”到“童趣”

——论丰子恺漫画对鲁迅小说的叙事改编

丰 杰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丰子恺绘画鲁迅小说作为“漫画初兴”的实绩,为连环图画进入文艺史提供了有力的辩护。从时空设置来看,丰子恺将故事定位在“清末”,又不同于“绍兴”一地,再加之“题画”“远近法”的使用,表现了鲁迅小说的深刻内涵与艺术张力。从形象来看,丰子恺运用黑白两色描绘天象、勾勒人物、表达模糊性与荒诞感,又通过两类笑容表现温情与讥讽,呈现出思乡与批判的双重内涵。从风格来看,变形手法的使用、回忆的实化处理、儿童与动植物的增绘等改编在忠于原作“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主旨之外,增加了故事的童趣,同时又与1930年代鲁迅的儿童教育观相契合。概言之,丰子恺绘画鲁迅小说是较早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儿童画本范例,为鲁迅作品走向大众,甚而文艺的大众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丰子恺;鲁迅;漫画;怪诞;童趣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25)01-0043-09

1930年代前期,文艺界曾有一场关于连环图画是否算艺术的论争。沈永琪提出:“我们的问题是‘连环图画故事,是否为大众所易了解的读物,连环图画故事这一旧形式,是不是最能普遍地传达新艺术的内容?’”^[1]作为“漫画初兴”^{[2]358}的实绩,丰子恺绘的九篇鲁迅小说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其中有反对的声音,如冯雪峰:“对于丰先生过去的作品,我不喜欢,以为它们没有带来社会的积极的意义”^[3];也有赞赏的声音,如朱自清:“他的画极家常,造境着笔都不求奇特古怪,却于平实中寓深永之致。他的画就像他的人”^[4]。如果说这场论争将包括漫画在内的连环图画引入了主流美术史视野,那么丰子恺绘制的漫画鲁迅小说则是从实践层面为连环图画能够成为雅俗共赏的美术佳作,提供了辩护与证明。

1950年代以来,丰子恺绘画鲁迅小说被不断翻印重版,先后出版了《绘画鲁迅小说全集》(万叶书店1950年版)、《丰子恺绘画鲁迅小说(两卷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丰子恺漫画小说选》(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丰子恺漫画鲁迅小说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丰子恺绘画鲁迅小说》(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丰子恺漫画鲁迅小说(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等十余种。这也客观说明了丰子恺绘画鲁迅小说不仅具有美术价值,在推广鲁迅小说方面也有积极意义。近几年来,学界对于丰子恺绘画鲁迅小说的研究也有重要进展,如杨剑龙的《论丰子恺的漫画〈阿Q正传〉》、张惠的《从“言说”到“图说”:丰子恺插图本〈孔乙己〉的语图关系研究》等论文。笔者无意从美术史的角度去评价丰子恺漫画的艺术成就之高低,而是想从丰子恺以绘画艺术对鲁迅小说进行翻译的角度,进一步考察其是否在精神上与鲁迅思想产生了共振?又在哪些方面对鲁迅小说进行了改编?这种翻译与改编的策略是什么?效果如何?对于文学史有什么样的意义?要回答这些问题,势必就要将九篇丰子恺绘画鲁迅小说统合起来,并将鲁迅的文学文本与丰子恺的漫画文本作对读比较。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优秀青年项目“当代儿童读物中的鲁迅形象研究”(23B0127)

收稿日期:2024-06-20

作者简介:丰杰(1986—),女,湖南长沙人,文学博士,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一、时空的“误读”与“正解”

丰子恺所选的九篇鲁迅小说分别为《孔乙己》《药》《明天》《风波》《故乡》《阿Q正传》《白光》《社戏》《祝福》，其中《孔乙己》《药》《白光》的故事时间是清末；《祝福》《风波》《故乡》的故事时间是民初；《阿Q正传》的故事时间是辛亥前后；《社戏》中处于民国时期的“我”回忆清末的童年故事；《明天》一篇没有确切的时间，大致为清末民初。如果将《社戏》算在“清末”一类的话，九篇中有四篇叙述的是清末的故事，不到半数。丰子恺在《〈绘画鲁迅小说〉序言》中说：“这些小说所描写的，大都是清末的社会状况。男人都拖着辫子，女人都裹小脚，而且服装也和现今大不相同。这种状况，我是亲眼见过的。”^{[5]511}“不到半数”与“大都”显然不是一回事。笔者认为，这既是丰子恺对鲁迅这九篇小说在时空定位上的“误读”，但也因为这种“误读”而展现出了鲁迅小说在思想上的深刻与艺术上的张力。

首先，鲁迅小说中的时间是一种多重叠滞的状态。谈及《阿Q正传》的成因时，鲁迅说：“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6]397}。所以，《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风波》诸篇即使写的是民初社会，却依然远滞后于世界发展的进程。1917年的七斤为了辫子而惶惶终日；狂人至迟到1918年还“赴某地候补”；阿Q在“革命”过后被胡乱充作劫匪遭枪毙……在鲁迅看来，社会上的新闻远比小说夸张，“假如有一个天才，真感着时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出记叙这样情景（按：指新闻内容）的小说来，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以为是说着包龙图爷爷时代的事，在西历十一世纪，和我们相差将有九百年”^{[6]400}。因此，丰子恺将漫画的故事时间设置为“清末”，比设置为“民初”更为恰当。有研究者认为，丰子恺绘《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王九妈等穿的是上袄下裙，衣服是宽袖、斜襟，头梳圆髻，脚穿尖口小布鞋——标准民国时期农村妇女的装扮”^[7]。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一方面，丰子恺本人曾说过，自己所绘的是清末的社会状况，妇人不是流行穿“尖口小布鞋”，而是都“裹小脚”^{[5]511}；另一方面，鲁迅小说所描写的社会情状也不是“标准民国时期”，而是“清末”这一旧时空的延续。

其次，在“背景空间是不是绍兴”这一问题上，丰子恺与鲁迅的创作思想也有类似之处。《阿Q正传》发表后，有不少人对号入座。鲁迅说：“‘巴人’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6]397}丰子恺曾说：“此画背景应是绍兴，离吾乡崇德二三百里。我只经行其地一二次，全未熟悉绍兴风物。……据友人说，鲁迅先生原文中所写，未必全是绍兴所有。”^[8]鲁迅小说中的空间与人物具有抽象性和类指性，如果取精细考据的自然主义画风，恐怕就与其精神南辕北辙了。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丰子恺的“不写实”是不是等同于“随意”？笔者认为，“背景之不写实”，并不仅仅因为画者“全未熟悉绍兴风物”，例如典型的两处加法。一是为咸亨酒店加上了“群贤毕至”四字（见图一）。咸亨酒店是鲁迅笔下鲁镇的标志性建筑。研究者多注意到鲁迅谈及的这句话：“劈头看见丰子恺的画——一个工人靠在柜头上喝酒，旁边也写着‘太白遗风’，莫非外省酒店多有这样的句子么？”^[9]但实际上，丰子恺加的是“群贤毕至”而非“太白遗风”。客观来说，“群贤毕至”比“太白遗风”更为应景，是对《孔乙己》中看客群体辛辣的嘲讽。随着景深的缩短，“群贤毕至”不断放大。其具体变化为“群贤毕至”——“贤毕至”——“贤（半字）毕至”。不断扩大的“贤”字与咸亨酒店里的看客形成了文字与形象、文明与丑陋、外表与内里的强烈对比。故而，尽管“群贤毕至”不是绍兴风物，也不一定是外省特色，但却极大增加了此场景的讽刺效果，透露出画者的幽默。二是在钱家照壁上加了“鸿禧”二字^{[10]215}（见图二）。照壁，古称“萧墙”。孔子曰：“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篇十六》）《阿Q正传》中，由于阿Q自“恋爱的悲剧”之后，“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这使其“肚子饿”，而“位置在王胡之下”的小D竟抢了他的饭碗^{[11]529}。未庄底层的秩序被打乱，这自然是“不均”且“不安”的事情。于是，阿Q和小D在“鸿禧”前打架。阿Q因“不均”“不安”而与小D打架，属于“祸起萧墙”。“鸿禧”意即“洪福”。阿Q、小D扭打形成的“虹形”映在“鸿禧”之下，于是上面乃“洪福齐天”的愿景，下面却是“祸起萧墙”的

现实。祸福相对,形成了强烈的反讽效果。这与咸亨酒店“群贤毕至”的图像修辞手法一致。在丰子恺看来,“画不及诗的自由。然而也何必严禁漫画的借用文字为画题呢?就当它是一种绘画与文学的综合艺术,亦无不可”^{[2]360}。“群贤毕至”“鸿禧”类似于“画题”,用以造成更大的艺术张力。正如马特·马尔帕斯所说:“为了解决严肃的问题,我们会使物体变得陌生并故意使用模糊性,从而产生悖论和矛盾,伴随着这种悖论和矛盾的产生,批判性设计必然会显出幽默感。”^[12]概言之,丰子恺添加“群贤毕至”“鸿禧”并非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而是出于对漫画体裁幽默笔法和鲁迅小说讽刺艺术的独到理解。



图一



图二

最后,鲁迅小说与丰子恺漫画都娴熟地使用了空间的远近法。连环图画的首尾两幅一般采用远景或中景,一方面交代故事发生的场景,另一方面更好将读者代入与代出。丰子恺曾说:“雪山兄善画,亲写一乌篷船相示,远近法颇正确。”^[13]前述提到咸亨酒店的“群贤毕至”时,丰子恺就运用了远近法。而更为明显的运用是漫画中首尾两幅对鲁镇空间与世态的展示。漫画《风波》开篇是“田园乐”的远景^{[14]86},最末一幅是风波过后七斤一家安然吃饭的中景,表现了张勋复辟对于乡镇的影响之微^{[14]101}。漫画《故乡》的首幅是“我”归乡所见的远景“故乡”^{[15]115},最末一幅是“我”幻想中离乡人们的大远景^{[15]133},表现了鲁迅小说“归来——离去”的情节模式。漫画《药》的最末一幅也是中景,增绘了除华大妈和夏瑜母亲之外的扫墓人,冲淡了故事的苦感。^{[16]48}笔者认为,丰子恺在首尾两幅图上的中远景构图,大致有两种效果。其一,景深的调深使得故事本身的人和事变得细微,故事带来的苦感与讽刺也都被一定程度的稀释。这自然是丰子恺漫画与鲁迅小说在风格上的区别。其二,漫画中首尾两幅图既宣告了单个故事的起与合,也提供了“周而复始”的寓意。在鲁迅小说中原本常常出现一种周而复始的闭环结构,如《阿Q正传》中“革命”之后与之前的未庄没有什么大异样,《风波》中张勋复辟之后与之前的鲁镇乡村一切都“仍旧”。丰子恺用图像叙事时采取的“远—近—远”的空间调度,正与鲁迅小说中的闭环结构相契合。

二、形象的“黑白”与“笑容”

在丰子恺看来,讽刺漫画的佳作“能短刀直入地揭破世间的大黑幕”^{[2]365}。赵延年认为:“漫画不一定讽刺,却不能没有幽默,即便是讽刺,也应以幽默出之。”^[17]可见,以幽默的形式表现讽刺的内容是鲁迅小说插画者的共识,而如何在静止的画面中塑造鲁迅小说中内蕴丰富的人物,以及如何通过形象来表达深层的讽刺意义,是插画者的一大挑战。

丰子恺漫画所用的工具是毛笔,因此,画中所有的形象都依靠黑白两色来呈现。在鲁迅小说中,黑白两色是出现频次最高且最为重要的颜色。崔云伟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黑白构成了鲁迅作品木刻感的生命和精华所在……黑色给人以‘罪恶、恐怖、邪恶、寂静、不祥’之感,白色则给人以‘洁白、神圣、快乐、光明、洁净’之感……他们并置在一起,必然会引起剧烈紧张之感。”^[18]典型如《狂人日记》中关于天象的描写,小说正文前两节开首即是:“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19]445};“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19]444}。“月光”是“觉醒”的暗示,“黑夜”则是“吃人”的前奏。黑、白两色具有极强的象征意味,是狂人内心活动的投影。丰子恺绘的《白光》积极回应了鲁迅对于黑、白二色的运用,但由于单幅图像在时

间流动性上的表现力弱于文学语言,难以将鲁迅小说中黑与白的动态与意味全部展示出来,如小说中陈士成挖宝一节对于天象的描写:

……最先就绝了人声,接着是陆续的熄了灯火,独有月亮,却缓缓的出现在寒夜的空中。

空中青碧到如一片海,略有些浮云,仿佛有谁将粉笔洗在笔洗里似的摇曳。月亮对着陈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来,当初也不过像是一面新磨的铁镜罢了,而这镜却诡秘的照透了陈士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出铁的月亮的影。^[20]

青碧色,即青绿色,用来形容天色、山色、烟色。丰子恺用留空来表现青碧色的天空,略去了摇曳的浮云。原小说中动态的如铁的月亮则以细线勾出一个小圆圈来表示。丰子恺也注意到了时间的流动性,所以在陈士成挖宝之后逃到院里的画中将天色绘成全黑,唯悬一颗星星。天色从全白到全黑表示陈士成挖宝的行为从傍晚持续到了深夜。黑色与白色的强烈对比又营造了阴森可怖的氛围,与小说的氛围近似。不难看出,毛笔漫画在表现昼夜天象时,时间运转较容易表现,但深层的象征内涵则难以呈现。

丰子恺以黑色塑造人物最为精当的是《阿Q正传》中的两处“黑影”形象。第一处是“有一只大乌篷船到了赵府的河埠头”^{[10]226}(见图三)。乌篷船因竹篾篷漆成黑色而得名,船身低矮。丰子恺将近处河上乌篷船的船体描绘成全黑,又用线条表现竹篾的质感,再绘两块白色布样或意为窗户。乌篷口是全黑的洞,而从这全黑里出来的两个撑船人也是全黑的人影。黑影各站一首一尾撑船,又分别留有一足与乌篷口的黑色融为一体。远处岸上的草木黑魇魇地连成一气。房屋的窗门亦是全黑。原小说中,“乌篷船到了河埠头”的“新闻”本就是“探头探脑的”带来的消息^{[11]537},因此并不确切。丰子恺运用大量的黑色,既交代了故事时间为深夜,也表现了该事件的模糊性与荒谬感,对鲁迅小说中的这一场景作了恰当的展示。



图三

另一处是“赵家被抢”(见图四),配文用的是“‘赵……赵家遭抢了!’小D气喘吁吁的说”^{[10]238}。图中近处两个“抢劫者”的形象全黑,使人辨不出是谁。更值得玩味的是,黑影形象中蕴含的诸多细节。他们用筷子将辫子盘在头上,低头躬背往前走,双手作拿东西之势,但手中空空,双脚与地上的浊影连成一气。这表明劫匪是革命的投机者,偷到什么也不分明。原小说中,阿Q看到“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宁氏床也抬出了,……抬得他自己有些不信他的眼睛了”^{[11]546},这一部分省略了。由于图像的故事时间往往只是一个截面,丰子恺选择表现抢劫之前或抢劫之后,也就回避了对“箱子、器具、宁氏床”等似真似幻的物品做实化的处理,与小说原文一样保留了足够的想象空间。虚化的表现手法也意在说明这一情节的不确定性。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紧接着的一幅图即是阿Q被捕的场景,将小说中阿Q咒骂劫匪的心理活动也省略了,很容易使读者得出阿Q是劫匪的推断。这也是丰子恺漫画与鲁迅小说在表意上的一个落差之处。



图四

杨剑龙认为:“由于丰子恺采用毛笔简笔画的方式,他并不注重对于人物脸部细节的勾画,甚至弱化人物脸部的表情,而更关注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动作,突出其描画人物的姿态和神韵。”^[21]笔者认同这一观点,并进一步认为,丰子恺所绘的人像精细与否和画中人物的大小数量有关。丰子恺笔下有名字的人物大都有较为明显生动的表情,如九斤老太皱眉、眯眼、昏沉沉,七斤老婆指手画脚、怒目而骂,七斤愁眉苦脸、抽烟杆,阿Q被叫“老Q”时昂首阔步、得意洋洋,陈士成落榜后低首落寞……底层的百姓在成为看客的宴席时,表情、动作、身形都写满了逼仄与凄惨。在九篇小说的漫画中,最为突出的人物表情则是“笑”。这既源于鲁迅原作中频繁出现的看客们的“讥笑”,也与漫画体裁以“笑”作为幽默的载体有关。漫画中人物的笑大致可分为两类,分别是善意的笑和嘲讽的笑。

在第一类“善意的笑”中,有长辈对孩童的笑,如华老栓、华大妈对华小栓的笑,《故乡》中母亲对

“我”的笑,还有孩童之间的笑,如少年“我”与少年闰土,《社戏》中孩童一起玩耍时的笑,以及村镇里一派祥和的笑,如豆腐西施杨二嫂与买豆腐的客人的笑,风波过去后七斤一家围坐而笑。如此等等,展现了人情温暖与农家之乐,但鲁迅小说则极少描写人物之间善意的笑。丰子恺的这一改编委婉地表现了1930年代文艺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思乡情绪。丰子恺认为:“农业社会的生活不可复现。然而大家背井离乡,拥挤到都会里去,又岂是合理的生活?”^[22]正如林岗所说:“鲁迅的《故乡》敲醒了千年的乡愁旧梦,而丰子恺的《故乡》预告了乡愁牧歌的无以为继。”^[23]鲁迅与丰子恺在“故乡”题材上的交集,除了创作同名文学作品《故乡》,还有丰子恺为鲁迅小说《故乡》《社戏》绘制的漫画。《社戏》一篇,丰子恺将原小说中前十段文字都舍去了,取了第十一段的第四句作为第一幅的文字素材:“那地方叫平桥村,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24]²⁸²。于是,小说原本的“社戏”主题转化为了完全的“故乡”主题,而丰子恺绘《风波》等篇中也常常能够感到“牧歌”与“讽喻”两种基调的对冲。

在第二类“嘲讽的笑”中,“笑”则与人物的位置关系一起,用以诠释鲁迅小说中“看与被看”的人物结构模式。主人公与群像之间的对峙关系也构成了丰子恺漫画与鲁迅小说之间的最大冲突。在鲁迅小说中,群像描写是较为模糊的,看客们往往混成一气,难以分辨具体的个人。丰子恺对这一模式的改编,主要体现为群像的具象化。在丰子恺选绘的九篇鲁迅小说中,涉及的群像有《孔乙己》《阿Q正传》中咸亨酒店里的酒客们、《药》中看革命党行刑的围观者和茶馆里的茶客们、《明天》里为宝儿治丧的“几堆人”,《风波》里开首的“农家乐”、《阿Q正传》里观看阿Q游行与行刑的看客们、《社戏》里看戏的观众们等。而根据“群”的大小数量不同,丰子恺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上百人的大群像是“弱化人物脸部表情”的。如看社戏的场景中,看戏的观众是背对着读者的,且人数极多而无法进行细微的表现。可贵的是,即使是小到芝麻大小的头,都有方向、角度、大小的区别,给读者以“人头攒动”的真实感^[24]²⁸⁹。一旦看客以正面出现,就有了性别、年龄、姿势、服装与表情的区别。如在阿Q游街的画中,看客虽都聚成一堆,但前排的看客有的戴着眼镜插手而看,有的昂首张口而笑,有的妇女静默而看,后排远处的看客则只露一个头顶。看客们虽都是笑,但个人都有了较为完整的形象。^[10]²⁴³

当看客群体是个位数时,人物的表情与形态则有更为丰富的呈现,如咸亨酒店里围绕着孔乙己的看客。他们或跷着二郎腿昂首而笑,或倚靠着柜台手指着孔乙己而笑,或将手伸在袖口里取着暖而笑。在孔乙己双腿已瘸、挂着蒲包而来时,他们低首或皱眉而笑,或舒眉而笑(见图五)。张惠认为:“鲁迅在《孔乙己》中那些深于思想批判的激愤之词,被丰子恺用现世的诗意遮蔽掉了。……图像铺陈了小说的情节,展示了众生相,却并没有刻意地突出孔乙己的悲惨,也没有丑化和批判周围的看客。”^[25]这种看法有待商榷。笔者认为,“诗意”与批判并不相悖。图像无法将讽刺性的内核直接表述出来,但可以通过人物的位置关系、表情对比等得到体现。如果仔细观察便可发现,当看客讥笑孔乙己时,孔乙己的视线看向画外,不与看客发生对视。但当孔乙己和“我”或孩童说话时,孔乙己是看向“我”或孩童的(见图六、图七)。也就是说,看客的目光令孔乙己感到如针芒刺背,遂抗拒与看客交流。因此,丰子恺画中的看客不是“高兴地询问”,而是“得意的打探”与“残忍的讥笑”。漫画《阿Q正传》中,当阿Q嘲笑小尼姑时,他的一只脚踏上了酒店的门槛(见图八)。这意味着在更弱势者面前,曾被讥笑的阿Q又自动融入了看客群体。这种紧张对峙的人物关系本身就透露出不平等,显示出画者的批判意识。

三、风格改译:从“grotesk”到童趣

李允经认为:“漫画是画苑中的‘刺儿梅’,通常是用简洁的笔触、夸张的手法来描绘生活中的痼疾和时弊,并以变形、比拟、象征等方法来达到尖锐讽刺的艺术效果。所以漫画又称讽刺画,漫画家又称讽刺艺术家。”^[26]有关真实与虚构的关系,乃是鲁迅小说与漫画艺术在创作观念上的重要契合处。在鲁迅看来:“‘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27]在谈及《阿Q正传》的成因时,鲁迅又提到了怪诞的风格:“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我常常假想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图五



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么写的?”

图六



“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

图七



“这断子绝孙的阿Q!”

图八

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6]398-399}。换言之,小说的思想内涵是现实主义的,但变形、夸张、对比等表现手法是“grotesk”,即怪诞的。

丰子恺绘鲁迅小说的漫画中常用“变形”手法来展现人物心理与情节走向,如漫画《药》中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的情节。暗夜中的老栓,身形比一扇门还要宽大,身高则比近处房屋还高过半头,手中提的灯笼也大过路旁的一只花狗(见图九)。老栓到轩亭口时,天色已明。“一个人还回头看他,样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16]31}华老栓一下子就缩小成正常比例,一改刚刚步步生风的样子,卑躬屈膝起来(见图十)。尔后,“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睛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16]33}。眉头紧锁的华老栓较黑衣人矮了半头(见图十一)。待到老栓抱着“药”包往回走时,“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16]34},他的形象又变大了,甚而高过远处的两层房屋(见图十二)。如此的比例变化还有《阿Q正传》中阿Q与王胡打架的情节。原小说如此描写:“从先前的阿Q看来,小D本来是不足齿数的,但他近来挨了饿,又瘦又乏已经不下于小D,所以便成了势均力敌的现象。”^{[11]530}丰子恺于是将阿Q画得高于小D一头,怒目而视、气势汹汹。但当两人交手之后,两人的大小就差不多了。在读者看来阿Q有瞬间缩小之感。^{[10]214-215}漫画《孔乙己》中,随着周围的人从看客们到“我”再到众小孩,孔乙己的身形从小到大,神情从困窘到稍微舒展,体态从局促到稍微自如,显现出孔乙己对看客和孩子在态度上的区别。^[28]

华老栓、阿Q、孔乙己等三个形象大小是人物自我感觉的投射,也是心理自画像的外化。叙事者以



老栓倒觉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

图九



一个还回头看他,样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

图十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

图十一



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身事外了。

图十二

浪漫主义的变形手法,将不可见的心理感觉化为可见的形态大小,如郑二利所说:“无论是图像还是语言,都曾被认为能用形象化的方式描述世界或表现意义”^[29]。实际上,丰子恺的确特别留意过鲁迅小说中的变形手法,并且运用到自己的散文创作中。他曾谈道:“鲁迅先生曾经看见一个黄包车夫的身体大起来。我现在也如此:忽然看见桌子角上这两只蚂蚁大起来,大起来,大得同山一样,终于充塞于天地之间,高不可仰了。同时又觉得我自己的身体小起来,小起来,终于小得同蚂蚁一样了。”^[30]“黄包车夫的身体大起来”指的应是《一件小事》中的一段:“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31]由此来看,形象的大小不仅是人物自身的感觉投射,也是叙事者或者作者对人物的情感色彩的彰显。

在忠于鲁迅小说“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32]的主旨之余,丰子恺还以浪漫主义的笔触增添画面的童趣。首先,他在画幅中增加儿童形象或以儿童为构图的中心。丰子恺在绘人物衣着时多运用纯黑、纯白、线条、方块补丁等色彩与图案元素。在九篇小说的漫画中,小孩的服装颜色却较为统一。一是纯白,如《孔乙己》里的“我”与《社戏》中的“我”穿的衣服。二是黑白条纹,如《药》里的华小栓、《明天》里的宝儿、《风波》里的六斤、《故乡》里的宏儿、《阿Q正传》里旁观阿Q挨打的小孩等,穿的均是黑白条纹的衣服。黑白线条从纯白到黑色的“渐进”意味着孩童本来如一张白纸,然而经过对成人的不断观摩与模仿,最终变为与成人一样。另外,华小栓、宝儿、六斤、阿毛的父母都是底层弱势群体,自己衣着朴素俭省,但孩子却衣衫完整、洁净,表现了父母对于孩子的珍爱,也投映着绘者对于孩子的珍爱。

其次,在处理虚实关系时,丰子恺将鲁迅小说中的想象、幻想、回忆用桃心、气泡等童真的方式呈现出来,既吸引了儿童读者,也冲淡了故事的绝望感。如漫画《明天》第十幅,单四嫂子幻想宝儿还活着的情节,丰子恺用两缕线条划分出一个回忆空间,里面是活蹦乱跳的宝儿;第十六幅,绘者再用极大的桃心形线条勾勒出回忆空间,里面是单四嫂子边纺纱边看着宝儿,宝儿也微笑地看着妈妈。这种灵动的区隔线既标明与现实空间的界限,也给读者一种温馨之感。又如漫画《故乡》的最末一幅。画中离乡的人走在蜿蜒的山路上,远处山麓有太阳升起。小说《故乡》的结尾是:“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33]丰子恺将小说结尾的夜景变成朝阳之景,让深蓝缥缈的海景转化为了深沉朴实的山景,增加了小说中希望的温度,较于鲁迅原作更为乐观。

最后,丰子恺给鲁镇的街头、墙头增加了猫犬、花草等动植物形象,平添了很多烂漫活泼的气息。众所周知,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狗、狼、海乙那等动物有强烈的象征性。狗是吃人者的帮凶,甚或吃人者的化身。而丰子恺漫画中的动物,其象征意义被削弱了。在丰子恺看来,“儿童大都是最富于同情的。且其同情不但及于人类,又自然地及于猫犬、花草、鸟蝶、鱼虫、玩具等一切事物,他们认真地对猫犬说话,认真地和花接吻,认真地和人像(doll)玩耍,其心比艺术家的心真切而自然得多!”^[34]⁵⁸³基于这样的想法,丰子恺绘《孔乙己》中,咸亨酒店外面添了两条吃食的狗,《风波》里的土场上蹲着一只闲暇的猫,《阿Q正传》里墙头上又骑着一只看热闹的猫。它们为鲁镇空间增加了生活的实感。

从主观方面来看,丰子恺对“童趣”风格的追求与他所持的艺术观有关。他认为:“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换言之,即人类本来是艺术的,本来是富于同情的。”^[34]⁵⁸³他也自觉美术应该取材于底层的儿童:“在这社会里,穷的大人固然苦,穷的小孩更苦!穷的大人苦了,自己能知道其苦,因而能设法免除其苦。穷的小孩苦了,自己还不知道,一味茫然地追求生的欢喜,这才是天下之至惨!”^[35]这种艺术观从丰子恺的选篇也能窥见一斑。除了《阿Q正传》外,其余八篇都涉及儿童,但《阿Q正传》在被“翻译”成漫画的过程中,丰子恺也为其添加了儿童形象。

从客观角度来看,丰子恺漫画对儿童形象和儿童读者的关注,反映了1930年代左翼倡导下文艺大众化运动对于艺术家创作的影响。“由于新文学的受众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革命文学的对象劳苦大众又大多不具备阅读的能力,因此革命作家便尝试将传播革命思想的载体转向了连环画、小调和花鼓戏等对阅读能力要求不高的媒介。”^[36]鲁迅参加了有关“大众化”的论争并助力于美术大众化的实践。他为

连环图画辩护：“我并不劝青年的艺术学徒蔑弃大幅的油画或水彩画，但是希望一样看重并且努力于连环图画和书报的插图；自然应该研究欧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像和画本，以及新的单张的花纸。这些研究和由此而来的创作，自然没有现在的所谓大作家的受着有些人们的照例的叹赏，然而我敢相信：对于这，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37]丰子恺绘画鲁迅小说，即是以连环图画绘现代内容的实绩，为儿童读者提供了新鲜的滋养。

四、结语

如果说在文学革命时期，鲁迅所关注的是“怎样做父亲”的问题，即“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38]，那么到了1930年代大众化运动时，鲁迅则转向关注文艺如何直接作用于儿童，即儿童教育问题。1933年，陈子展在《申报·自由谈》上先后发表《再谈孔乙己》和《孔乙己考》，其中说道：“此一描红语句诀，由来甚古，盖远在唐宋以前已有之欤？而孔乙己为不朽矣”^[39]。同年8月，鲁迅提及这篇文章时说：“看见了讲到‘孔乙己，就想起中国一向怎样教育儿童来’”^[40]。他深切地呼唤美术家为儿童而画：“现在总算中国也有印给儿童看的画本了，其中的主角自然是儿童，然而画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样的，过度的恶作剧的顽童，就是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这虽然是画家本领的欠缺，但也是取儿童为范本的，而从此又以作供给儿童效仿的范本。……观民风是不但可以由诗文，也可以由图画，而且可以由不为人们所重的儿童画的。”^[41]丰子恺没有将儿童绘成冥顽的“熊孩子”或驯服的“好孩子”，而是保留了儿童的天真烂漫。这所契合的恰是1930年代初鲁迅的儿童教育观。故而，从媒介传播的角度来看，丰子恺对鲁迅小说的改编，也与大众化运动中鲁迅的美术理论与实践相呼应。概言之，从文学史的意义来看，丰子恺绘鲁迅小说既为1930年代提供了现代意义上的儿童画本范例，也为鲁迅作品走向大众，甚而为文艺的大众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 [1] 沈永琪. 谈连环图画故事[J]. 读书生活, 1934(02):37-40.
- [2] 丰子恺. 漫画艺术的欣赏[M]//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三.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0.
- [3] 冯雪峰. “读漫画阿Q正传”更正[J]. 刀与笔, 1940(03):23.
- [4] 朱光潜. 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M]//丰子恺研究资料. 丰华瞻, 殷琦, 编.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116.
- [5] 丰子恺. 《绘画鲁迅小说》序言[M]//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三.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0.
- [6] 鲁迅. 《阿Q正传》的成因[M]//鲁迅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7] 黄雨芯. 论鲁迅小说《明天》的连环画改编——从丰子恺到华其敏[J]. 上海鲁迅研究, 2017(03):101-113.
- [8] 丰子恺. 《漫画阿Q正传》初版序言[M]//丰子恺文集:艺术卷四.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0:34-35.
- [9] 陈梦熊. 丰子恺与《漫画〈阿Q正传〉》[J]. 书窗, 1997(04):26-28.
- [10] 鲁迅, 著. 丰子恺, 绘. 阿Q正传[M]//丰子恺漫画鲁迅小说(全本).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 [11] 鲁迅. 阿Q正传[M]//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12] 马特·马尔帕斯. 批判性设计及其语境:历史、理论和实践[M]. 张黎, 译. 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9:81.
- [13] 丰子恺. 教师日记(1939-03-30)[M]//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三.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0:121.
- [14] 鲁迅, 著. 丰子恺, 绘. 风波[M]//丰子恺漫画鲁迅小说(全本).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 [15] 鲁迅, 著. 丰子恺, 绘. 故乡[M]//丰子恺漫画鲁迅小说(全本).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 [16] 鲁迅, 著. 丰子恺, 绘. 药[M]//丰子恺漫画鲁迅小说(全本).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48.
- [17] 赵延年. 关于漫画艺术[M]//赵延年年集.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18:112.
- [18] 崔云伟. 鲁迅与西方表现主义美术[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148-150.
- [19] 鲁迅. 狂人日记[M]//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20] 鲁迅. 白光[M]//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572.
- [21] 杨剑龙. 论丰子恺的《漫画〈阿Q正传〉》[J]. 江汉论坛, 2021(06):89-97.
- [22] 丰子恺. 故乡[M]//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一.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0:334.
- [23] 林岗. “故乡”的百年变迁——读鲁迅、丰子恺、薛忆尧同名作《故乡》[J]. 小说评论, 2021(04):171-176.

- [24] 鲁迅,著.丰子恺,绘.社戏[M]//丰子恺漫画鲁迅小说(全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
- [25] 张惠.从“言说”到“图说”:丰子恺插图本《孔乙己》的语图关系研究[J].中国文学研究,2023(02):144-152.
- [26] 李允经.鲁迅与中外美术[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22:101.
- [27] 鲁迅.什么是“讽刺”[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40.
- [28] 鲁迅,著.丰子恺,绘.孔乙己[M]//丰子恺漫画鲁迅小说(全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10-12.
- [29] 郑二利.20世纪图像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254.
- [30] 丰子恺.敬礼[M]//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504.
- [31] 鲁迅.一件小事[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82.
- [32]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6.
- [33] 鲁迅.故乡[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10.
- [34] 丰子恺.美与同情[M]//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 [35] 丰子恺.穷小孩的跷跷板[M]//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一.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350-351.
- [36] 沈明杰.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中连环画的讨论与表现[J].美术,2021(04):86-92.
- [37] 鲁迅.“连环图画”辩护[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60-461.
- [38]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34.
- [39] 陈子展.孔乙己考[N].申报·自由谈,1933-05-20(05).
- [40] 鲁迅.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M]//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71.
- [41] 鲁迅.上海的儿童[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80-581.

(责任编辑:晏洁 郑静波)

On the Narrative Adaptation of Lu Xun's Novels in Feng Zikai's Cartoons

FENG Ji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Feng Zikai's painting of Lu Xun's novels, as a practical achievement of the "initial rise of comics", provided a strong defense for the entry of the comic book into the literary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atio-temporal setting, Feng Zikai located the stor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ut not confined to "Shaoxing", and expressed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and artistic tension of Lu Xun's novels through the use of the "inscriptions on paintings" and the "distance method", et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ery, Feng Zikai employed black and white colors to depict celestial phenomena, sketch characters, express ambiguity and absurdity, as well as showcased warmth and sarcasm through two types of smiles, presenting a dual connotation of homesickness and criticism. In terms of the style, the use of transformation techniques, the materialization of memories, as well as the addition of illustrations of children, animals, and plants not only remain true to the original theme of "exposing the malady and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need for treatment", but also add a childlike charm to the story and meanwhile align with Lu Xun's view on children education in the 1930s. In short, Feng Zikai's painting of Lu Xun's novels is an early example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with modern significance, which has mad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Lu Xun's works and even the populariz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Key words: Feng Zikai; Lu Xun; cartoons; grotesque; childlike charm



《野草》与散文诗的文体边界问题

妥东

(江苏省作家协会 创作理论研究室,江苏 南京 210019)

摘要: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的出现确立了散文诗文体的合法性,扩充了散文诗文体的基本形式内涵。与此同时,散文诗颇为自由的文体形式也与鲁迅复杂精神状态之间有着较为独特的同构性,它使《野草》成为鲁迅生命观与文学观交织互动的审美形态的真实写照。鲁迅在生命“彷徨期”创作了一系列散文诗,且有意识地将其结集出版,既有彼时散文诗的理论争鸣作为铺垫,同时也关联着鲁迅在创作转型中自觉而清晰的艺术选择。更为重要的是,鲁迅的思想境界与精神气质使得散文诗的文体形式自身,在拓展表现空间的基础上突破了其在理论和创作层面的双重“边界”,继而为现代散文诗提炼出一种开放、包容的文体特质。

关键词:鲁迅;《野草》;散文诗;文体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25)01-0052-09

引言

新文学经由“西洋小说”启发、刺激,而形成“变革”之动力,并成功催生出散文诗这一文体形式^①,这种观点如今几乎已经成为学界共识。据考证,“最早使用‘散文诗’这个提法的是刘半农”^{[1]12}。“五四”之初,散文诗经由翻译进入中国本土,随即与中国文学的变革语境相结合,产生了中国的散文诗,并在此期间一度“形成了一股热潮”^②。然而,由于早期的理论探索对相关的理论概念认识不清、争鸣不充分,知识界关于散文诗的讨论一直以来显得比较“混乱”。这也使得散文诗的发展一直默然无声,并不惹人注意。1924年,鲁迅陆续创作出一系列极富个人精神特质的散文诗,后结集出版,定名为《野草》。作为散文诗的代表性作品,《野草》颇为开放的文体形式以及其非典型的文体特征,使得散文诗的文体问题重新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野草》的出现不仅使得散文诗具有了区别于散文与诗歌这两种文体的核心特质,同时也使得散文诗的文体形式具备了富于道德意蕴与历史内涵的新特质。更为重要的是,《野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新世纪散文理论与批评话语建构研究”(22DZJ05)

收稿日期:2024-07-25

作者简介:妥东(1992—),男,宁夏中卫人,文学博士,江苏省作家协会创作理论研究室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 ①关于散文诗的“缘起”问题,大部分论者认为散文诗是一种“舶来品”,但也有人认为,“散文诗”的出现既有“外部刺激”也有“内在传承”。持此意见的研究者,大多依循的是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散文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中论述新散文的发生时所申述的观点。综合来看,其分析虽不无道理,但也有将“散文诗”当作散文的类文体理解的意思。肖剑南的《论鲁迅〈野草〉文类的传统渊源》一文(《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便是这一观念下的“溯源”之作。就散文诗的概念来说,理论探讨中“西风压倒东风”的局面,自然已是无可置辩的事实,然而,关于散文诗有其内在的源流、“传统”等说法,其实也是学界一直以来理解散文诗创作,定义散文诗基本特质的重要一脉。
- ②许多新文学的开拓者在这一时期内,针对散文诗文体概念、内涵、合法性等问题,都或多或少参与过讨论和争鸣。学界对散文诗争议点,主要集中在散文诗文体的合法性层面。而散文诗的文体命名能否成立的关键,则又集中在对散文诗是否是“诗”的界定以及与之相对的新诗散文化讨论中。具体讨论的展开,则以上海的《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为中心阵地,论者包括徐玉诺、郑振铎、刘延陵、腾固、王任叔等。后期不断有创作者和研究者加入,使得彼时的散文诗讨论不断升温,反响也颇为热烈,甚至一度形成了规模不小的“散文诗运动”。关于散文诗运动以及关于散文诗的讨论的详情,参见孙玉石:《〈野草〉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232页;柯蓝:《中国散文诗创作概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秋吉收:《鲁迅与徐玉诺——围绕散文诗集〈野草〉》,《汉语言文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77-85页。

草》在诗学追求和思想深度上呈现出的突出特点,以及其在形式上不拘一格的“破体”实践,对于重新定义散文诗的文体内涵、廓清散文诗的文体边界而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基于此,如何理解《野草》的创作实践对于散文诗文体的贡献,如何理解散文诗的文体形式同鲁迅的艺术观念、生命经验之间的内在关联,如何理解散文诗的形式特征同鲁迅思想实践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如何在开放的文体观念中重新理解散文诗这一文体观念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考察《野草》与散文诗之间的复杂关联时需要厘清的问题。

一、散文诗与现代主体精神之提炼

贺麦晓在《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1911—1937)》一书中指出:“文体概念不仅仅是语言、形式和内容的聚合物,而且也是生活方式、组织方式(像在社团中)和发表方式(像在杂志中)的聚合物。”^[2]在早期,学界关于散文诗的文体特点的讨论,基本上局限于语言形式层面的分析。论争也基本上围绕散文诗“不韵则非诗”等方面的问题而展开^①。在《野草》出现之前,学界对于散文诗整体的艺术风貌和美学追求等问题,一直讳莫如深。散文诗始终无法廓清自身“边界”的基本事实,正由此形成。一方面,追问散文诗文体特点,不仅涉及对散文诗文体本身的界定(尤其是区分其与散文及诗歌之间的关系),也意味着要在本体论的层面上,确立其“合法性”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早期散文诗在创作上,缺乏成熟的作品,以至于关于散文诗的“文学形象”一直难以建立起来。从这两个层面来看,散文诗无法确证自身合法性的“困境”,也就不难理解了。

更何况,在整体的文学生态中,由边缘“位移”至中心的小说^[3],彼时作为强势的艺术形式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已经成为主流的文体形式。这种格局多少也造成了其他文体形式相对被压抑,以至于边缘化的状况。新文化运动明确的问题指向性,规定了新文学(主要是小说)所表现的内容必然要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中国的国耻、积弱和腐败,启发了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七年大部分严肃作品。”^[4]“中国作家热忱追求的是文学的社会效应,而不是小说创作的丰富性与多样性”^[5],这便使其在思想上很容易超越一般意义的个体存在,上升至一种现代的“国族想象”。李泽厚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概括中国走向现代的思想历程,也正是看到了现代知识者所共享的“民族/国族”情结。显然,文学内部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正源于某种现实的内在规定性。这实际上也注定了其他文体(包括新诗、散文诗、话剧等)在“五四”初期惨淡经营的基本格局。然而,“感时忧国”的精神追求虽然赋予了文学勇于担当的现实关怀,却也为文学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方面,塑造现代民族国家“理想形态”的任务,造成了文学“沉重的肉身”;另一方面,塑造个体心灵的内在丰盈,以及在无穷丰富的感性体验中寻求感性滋养的文学,成了少数人(如沈从文)所关注的事业^②。

“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后,之前凝聚一时的社会团体逐步走向分裂,曾经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启蒙者不得不回退到自己的内心,真诚地倾听自己的声音。鲁迅对此有深彻的体会。“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6],言表的正是此时的心境。诚如竹内好所言,综观落潮后的“五四”文坛,他们几乎成为了唯一的“现役的文学家”^[7]。文学自然也要回到“常态”,有了开辟个体心灵艺术空间的具体要求。张旭东将包括《野草》《朝花夕拾》《坟》在内的文学创作,称作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的“准备期”,正是看到了《野草》之于鲁迅的转型意义。对于鲁迅而言,一方面,是对不自觉地“听将令”的“第一次诞生”的超

①可以明确的是,许多新诗与散文诗的倡导者正是借助“新诗革命”(自由体新诗对格律观念的破除)的口号和旗帜,来确立散文诗的合法性地位的。同时,在提倡“新诗革命”的思潮中,早期理论界关于散文诗“不韵则非诗”的质疑,也随之消除。这反映出散文诗在确立其合法性地位时的策略性。然而,依靠“新诗革命”而伸张散文诗合法性的做法,也造成了散文诗长期与诗歌纠缠不清的基本格局。

②正如王德威指出的那样:“当多数写实作家视涕泪飘零、义愤愧怍的修辞为描写‘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唯一选择时,沈从文坚持以抒情叙事的形式达到更深的层次,其实有一刀双刃的批判性。无论我们初读的印象如何,沈的这种批判式的抒情叙事还是暴露了‘呐喊’、‘彷徨’式风格、主题的片面性和排他性;它也揭示出露骨的写实主义(hard-core realism)在执行其使命的同时,即已耗尽底牌。”参见王德威:《现实主义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232页。

越和完成,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自身文学个性的自我肯定与自我发扬”,鲁迅文学才获得了一种本体论意义的文体自觉。换言之,鲁迅文学正是在带有本体论意义的散文诗文体中真正地“成为自己”,“即在自身独特个性、独特声音和独特写作方法中成为自在而自为的历史风格,而无需服从或迁就任何既有的、外在的文学体制和审美标准”^[8]¹⁵⁸。此后,在这个自足的文学本体论空间内,他“纵身跳进了生活的潮流,跳进了‘变化’的核心,由此成为一个忠诚的发言者,一个文学家”^[9]。

《野草》是鲁迅内心流露出来的文字,其个人最复杂的情感都含括在这部《野草》里。章衣萍说:“鲁迅先生自己却明白地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他的《野草》里面。”^[10]然而,鲁迅之所以愿意表达自我,与其所选择的文体实际上也有密切的关系。散文诗独特的文体形式,某种意义上正契合着鲁迅的表达需要,也就是说,“只有在这种充满象征、隐喻的文体中,鲁迅才会放下面具,审视和挖掘自己的灵魂”^[11]。鲁迅对散文诗的看法有两个比较关键的信息值得注意。首先是一则关于《野草》的出版广告。《野草》最初在北新书局印行时,曾刊出过一则概括其“基本特点”的宣传广告。广告具体内容如下:

《野草》可以说是鲁迅的一部散文诗集,优美的文字写出深奥的哲理,在鲁迅的许多作品中,是一部风格最特异的作品。^①

据陈子善考证,这则印在《野草》初版本版权页之后的广告,作者可能正是鲁迅本人的手笔^[12]。抛开广告本身是否为鲁迅所作的问题不论,单就内容而言,至少包含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广告定义《野草》为散文诗集并得到鲁迅默许,至少说明他对《野草》本身的文体特色,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由此,《野草》作为散文诗的文体属性便很清晰。其二,用“优美的文字写出深奥的哲理”概括散文诗集《野草》的基本特点,实际上也透露出彼时的评论者,对散文诗这一文体的基本认知和期待。除此之外,还有常为研究者忽略的细节是,鲁迅关于《野草》创作的回顾。鲁迅在1932年12月14日所作的《〈自选集〉自序》中写道: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13]⁴⁶⁹

这段为鲁研界所广泛征引的文字在解释了《野草》创作起因的同时,其实也暗合着鲁迅对于散文诗文体问题的理解。对鲁迅而言,不同时期的创作背景、材料的性质以及“丰富”程度,以何种文体形式去表现显然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即便是在同一时期,由于“质料”“技术”“心境”有所不同,故其适宜的组织形式也会有所区别。譬如,“随便谈谈”就适于杂文的创作,而“得到了整齐的材料”之后,则应作“短篇小说”。顺此思路,“有了感触”而写就的“短文”,对应的则是散文诗这一文体。虽然鲁迅并未就同样以“杂感”写就的“杂文”与散文诗文体做进一步的区分,然而两相对比之后却不难发现,同样是因“感触”而作的《野草》,较之“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的杂文则多出了许多随意点染的超越之思。这种区别背后是鲁迅对散文诗的文体自觉。套用张旭东的话来解释鲁迅选择散文诗的过程,也是散文诗选择鲁迅的过程,这是一个痛苦挣扎的过程,但也是意识越来越明确地接受这种痛苦和挣扎的过程。正是透过这一系列的痛苦过程,鲁迅才真正与这个时代融在了一起^[14]¹⁴⁰。

张洁宇将散文诗集《野草》视为鲁迅的一组自画像^[15],某种意义上正是看到了《野草》诸篇中偶发的随感背后,有基于个人体验而构筑起的相对整齐的艺术思考这一事实。鲁迅的彷徨除了各种现实因素之外,也与其所遭遇的各种不同文化力量、语言以及思想的撕扯有关。事实上,《野草》内在的“思想—艺术”张力即源于此^②。这意味着,《野草》散文诗体的艺术选择很大程度上与鲁迅复杂的精神境界是互

①1927年7月北京北新书局初版《野草》书末广告页第3页。转引自陈子善:《〈野草〉出版广告小考》,《文艺争鸣》2018年第5期,第11-14页。

②鲁迅思想深处的张力或矛盾可以总结为个人主义与进化论之间的复杂矛盾,这种矛盾或张力在鲁迅的《野草》中得到了认真的清理。

为表里的。换言之,散文诗的文体形式,是“安置鲁迅真实幽深灵魂的最合适文体”,“恰好与鲁迅驳杂幽深的精神体验及不可方物的艺术创造力相得益彰”。^[16]

尽管邵元宝在《破〈野草〉之“特异”》一文中,特意提醒研究者勿将《野草》在修辞层面的特色夸大为“独异”,并奉劝研究者不要刻意超拔它的意义^[17]。相较于鲁迅在同一时期(甚至鲁迅全部)的创作而言,《野草》确有其独到之处,它既包含着鲁迅独特的艺术个性,也有所谓的“忧愤深广”的思想选择,更有同宇宙天地相契的世界观。首篇《秋夜》中,那“介于象征和拟人之间”^[18]的灯下“独语”,即让冰冷夜空下的枣树散发出托物言志的意味。枣树倔强、执拗、果敢地刺向天空,仿佛是战士立于旷野的狂怒。这种情感和意绪经由《雪》《死火》《腊叶》的层层点染而一步步升华。与此同时,不露声色的叙述者则“像象征诗人那样,想通过散文诗先把‘诗的高蹈感’的感觉解除武装,然后用最平易的日常语,慢慢地把读者引入一些‘言不尽意’的异常的、甚至是超现实的情境”^[19]。果然,在颇为写实的象征界里,那决不粘连的孤独的朔方的雪(《雪》)、烧完且冻灭的死火(《死火》)、斑驳的腊叶(《腊叶》)等,最终都化作“决心自食,欲知本味”^[20]的孤独“自白”。然而,“诗心”已去,“本味”又如何“可知”?这便是《野草》面对的深刻悖论,其与散文诗在散文与诗之间不断权衡,但却无法超脱两者而获得文体独立意义的悖论状态,具有潜在的同构性。

鲁迅的选择是诚实地提炼出关于生活的真实体验,并以“语言的强弱之差”所形成的顿挫感、节奏感——这种表达“在精神上是一种超常的速度”^[21]——而使其获得诗意的升华。在这个意义上,《野草》篇目中诸如“冻灭”“颓败线”“死火”“奔突”等语言表达,都可以视为鲁迅与其所遭遇的复杂现实相互搏斗后,生成的生命“体验”。在《一觉》中,叙述者的叙述视点虽然一开始便经由一种较为紧张的氛围而得以引入:“每听得机件搏击空气的声音”,便如同“宛然目睹了‘死’的来临”,但“我”却依然静心“在我的四方的小书斋”中工作着,只是“常觉到一丝轻微的紧张”。^[22]²²⁸由于“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而且“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因此,即便“社会是一片沙漠”,不断遭遇生死紧张时刻的“我”,依然可以在生命的意义上获取诚实的体验,就好像“野薊经了几乎致命的摧折,还要开出一朵小花”。^[22]²²⁹精神的诗意和宁静也足以令“我”沉浸在校编工作中,并在不期然的停歇中意识到:即便生命的“夕阳居然西下”,然而为生民立言、立命的灯火,依然会给“我”续着光。显然,在强大的主体精神的投射下,兵戈扰攘的残酷现实,以及与此相关的破败和悲凉,早已被推置到身外,转换而来的则是主体内在的精神超越。正如张旭东所言:

往往在深陷具体冲突对抗环境之中时,在短兵相接的近战乃至肉搏中,鲁迅的文字和文章每每能够突然从眼下的战斗脱离开来,进入到对个人生存的寂寞、痛苦、悲哀和虚无的存在体验和历史意识之中,从而将一个粗粝、堕落、空洞、黑暗的当下转化为一种“存在的诗”。^[23]²⁰⁶

《一觉》这个文本的魅力正在于此,它紧紧地抓住了这个震撼的瞬间,并通过“主体精神”强大的过滤能力将它抒情化、个人化了。这一个瞬间,由是变成了鲁迅特有的艺术感受力的外显,也成为散文诗提炼、发散创作主体内在精神的典型特征。因而也不难看到,这种“攻受转换”实际上正标志着鲁迅的文体学真理:“它是一种能够时刻把最不利于文学生存所需的内心状态(如‘闲适’‘静谧’等)的外部冲击与震惊,吸收、内化、升华为具有文学自律性的记录、叙述、想象和寓言式否定的写作方法和写作机制。这种外部的冲击和震惊越强烈、越具有摧毁性,这种潜意识的、本质上是诗的心理防卫机制就越执着地、绝望地、创造性地调动起作者存在与意识的一切资源和能量,构筑起一个本质上是诗的防线和攻防战略战术系统”^[23]²⁰⁷。

二、杂取旁出的“敞开”姿态

鲁迅对不同文体及其内涵的熟稔,有力地证明了散文诗在艺术上的独特性。鲁迅与散文诗的“相遇”虽然多少与现实遭际、个人苦闷相关,但《野草》内在的丰富性却也时刻提示我们留意散文诗体内在的诸多问题。鲁迅对艺术形式的要求向来不以“定为一尊”为目标,而是吸取多种艺术元素“杂取旁

出”,风格由是也变化不定(鲁迅小说“几乎一篇一个样”)。在散文诗创作上,鲁迅虽然不是一个“开天辟地”创始者角色,但他却是一个集大成者。在很大程度上,散文诗正有赖于鲁迅的创作推动,才形成了代表性的文本形象,其合法性才得以正名、光大。

关于散文诗的文体定位,鲁迅的态度自然也是“杂取旁出”。然而,许多评论者却就此将《野草》杂乱的风格,视为鲁迅文体概念“模糊”的证据。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恰恰忽略了最为关键的一点,那就是《野草》在文体上的杂乱,首先意味着《野草》文本的开放性。认识到这一点,就“无须担心因此会损害《野草》那子虚乌有的不可冒犯的完整性、同一性、纯粹性”,这是因为“不承认和不愿正视《野草》的‘杂乱’与多元,就很容易人为地制造出片面的《野草》形象”^[24]。换言之,《野草》开放性的文体特质背后,其实贯穿着鲁迅文学的整体精神,它正是一种关于文学的“政治”(即所谓不断创新、革命的需要),就此意义而言,“文学鲁迅”与“政治鲁迅”恰恰有其内在的统一性。

需要注意的是,鲁迅此时在创作上自然并不局限于《野草》(同时在进行的既有小说,也有杂文创作),然而《野草》的语义却最为丰富,其缘由或许在于散文诗这一文体自身有着与鲁迅内在精神相似的同构性。于鲁迅而言,散文诗诗意的提炼既要求生动情感的“叙写”,也要求一定的思想超越性。所以,典型的散文诗在鲁迅这里,首先是一种兼有诗的艺术想象力、散文的叙写力,以及多类型的文体表现力的、深刻浸染创作主体精神特点的现代文学抒情体裁。它既融合诗的表现力,也透着散文叙写的生动性特点;既是舒展创作者微妙情绪的载体,也是肯定艺术创造力的手段。它的合法性并不是建立在对散文和诗歌艺术空间的“挤占”上,而是更多源于对个体的生命意识、创造力的肯定和体认。与此同时,在细微的情感表达上,散文诗既需要“诗”的“细腻”表现力,也需要散文、小说、戏剧、杂文等多种适当的文学形式,为其谋篇布局提供某种策略性的支撑。总体来说,《野草》在创作倾向上的“敞开”或“非典型”的状态,正表明鲁迅对散文诗的核心意涵有着深刻的理解。

《过客》是《野草》中最为典型的话剧体散文诗,也是鲁迅两次仅有的戏剧创作文本之一。“《过客》借助‘走’这一戏剧行为不仅暴露出鲁迅当时严重的自我认同与价值信仰危机,更展现出作为生命个体的鲁迅全力自救的心路历程。”^[25]故事一开始,时空背景就被“虚置”。过客仿佛立于荒原,“时:或一日的黄昏。地:或一处”,周围却不见一人。“东,是几株杂树和瓦砾;西,是荒凉破败的丛葬;其间有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26]。视角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地形成了一种空间性的跳跃,这意味着《过客》(也包括其他文本)首先有“一个上下勾连、联系紧密的层次性结构”^[27]。这种结构层次的显示并非“不是从一个意境转换为另一个意境,而是从一个意境升华到另一个更高更深的境界。”^[28]在此背景下,老者和过客之间的对话便形成一种潜在的张力。一是,过客以现代性的目光^①支撑起人生行旅的全部意义,于过客而言,“前方”是提示他“存在”(即“走”)的意义范畴;二是,过客在不断前行的路途中不断遭遇老者、女孩的目光。过客被观看、被注视所造成的旅途中的犹疑与困惑不断消解、逼视其在行走前所“料定”的意义,继而使其对“走”这一行为的最终所指有所怀疑。《过客》通过一种情节剧的形式所构造的“问答”,与鲁迅彼时的心境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潜在投射。由此,“虚置”时空的意义也便有了最为直接的目的:抵抗虚无。如此一来,“过客”通过身体力行的“走”来实现对某种虚无性的“超克”,对鲁迅而言,实际乃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思想操练。《野草》在这个意义上,正成为鲁迅“活与行”的生命观的文学实践^[29]。

相较于《过客》这类带有明显象征隐喻性质的文本,《野草》中具有杂文风格或倾向的散文诗则明显地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整体来看,“讽刺”失恋诗(《我的失恋》)、抨击残暴军阀(《淡淡地血痕中》)、“憎恶”社会上的旁观者(《复仇》《复仇(其二)》),以及有感于文人学士的“帮闲”(《狗的驳诘》)的诸篇,都以其直击现实的批判性,而近于鲁迅的杂文风格。对鲁迅来说,“《野草》有‘杂文的自觉’,未尝不是文章学的一种考量”^[30],其核心虽透着批判色彩,然而偶发的“杂感”经过诗性的“沉潜”,并以散文诗的形式而得以赋形,其本质却依然是散文诗而并非杂文。在这里,所谓“杂文笔法”更多显示的其实

^①这种“现代性”目光具体表现为“过客”目的明确的人生信念。过客始终“料定”前方有路可走,有“迹”可寻,就其表现出的“目的性”和“方向性”而言,这本身便是一种超越“具体”实在而向往一种不可限定的未来的认知现代性。关于“认知现代性”的阐释,参见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绪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是一种批判性和指向性,它是一种带有目标和方向的价值(是非、道德)判断。同那种颇为温吞的文字相比,杂文的力度在于其专注“当下”“此刻”,而把那些虚伪的名目一一移开,而只流露一种“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31]。因此,它的背后关联的乃是鲁迅爱憎分明的个人立场,如《我的失恋》这首拟古的新打油诗,即有一种“迎实击虚”的特点,本质上与过客抵抗虚无的“行走”是相通的。

小说笔法的运用,在七篇以“我梦见”开始的“梦境”叙述中最为突出,而其中“在逻辑上是整个《野草》的高潮和转折”^[32],无疑是《颓败线的颤动》。鲁迅说:“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13]481}这与布斯《小说修辞学》中所论述的戏剧化的叙述者及其不可靠的讲述方式,近乎如出一辙。在这里,“戏剧化的叙述者”指的是叙述人“把自己作为‘我’来提及”^[32]所形成的戏剧化效果;不可靠的叙述方式则是指叙述者意欲背离“隐含作者”(作者创造的“第二自我”)的基本范式(norms),而制造出一种偏离式的反讽或戏剧化效果。在叙述过程中,(隐含)叙述者正是通过一种有“距离”的控制,使得“说梦”这一行为,成功地转化为对读者情绪、意识的调动与控制。与《过客》相仿,《颓败线的颤动》在开篇亦对时空背景进行了“虚置”式的布设。叙述者“我”虽然“自身不知所在”,然而“眼前却有一间在深夜中紧闭的小屋的内部”^{[34]209},里面是身形颓败的母亲和瘦小的女儿。于是便有一段关于“饥饿”的对话。在这一过程中,“我”悲悯在视野中挣扎的母女,然而在意识到行为“越界”之后便笔锋一转,“梦中梦”随即打破,“我呻吟着醒来”^{[34]210},回到一样悲凉的现实,“窗外满是如银的月色”^{[34]210}。然后又是一幕戏剧性的突转。这使得原本似乎已经中断了联系的“两幕”情节,经由梦境的打破而重新连接了起来。“我”意识到自己还“续着残梦”^{[34]210},然而却感到一种呼之欲出的分裂与“对立”。此时的情景恰如《狂人日记》中“文言小序”与“日记正文”之间的紧张分裂^[35]。《颓败线的颤动》亦由此引入一种深刻的反讽。

《野草》多样的旁通之法正是鲁迅对散文诗的独特贡献^①,它使散文诗虽然基于偶发性的“小感”(体制也相对短小),却因“沉潜”叙述者诗性的艺术思考而生出不拘的艺术形式。刻意强调文体间的差异性,反倒会有意无意削弱蕴藏于其中的“文学精神”。这种富足的文学精神同样使《野草》始终都处在鲁迅文学的“索引”位置。这既与散文诗的整体性特质有关,也与鲁迅个人的精神特质紧密相连。如果说在《祝福》中被寄予厚望的“我”作为启蒙者,面对底层劳动者祥林嫂而“无法疗救”其灵魂的情节,显示出的是“鲁迅对启蒙理性的设计被自己塑造的文学形象所颠覆”^[36]的挫败状态,那么意图寻找“自我”,继而进入暗夜语境中的《野草》,其记忆的“斑驳”之态则成为鲁迅意图走出“挫败”状态的起始与见证。

三、抵抗虚无的“排拒”形式

散文诗《野草》无疑构成了鲁迅生命体验与文学交织的另一种形式。竹内好称《野草》为“鲁迅文学的原型、索引、代表作,同时也是入门书”^[37],正是看到了这一层面的独特意义。钱理群将鲁迅《野草》逼视内心的艺术选择视为“独语”式的自我清理。他认为,鲁迅很可能在写作之初就已经预先设定某一个对象会倾听自己的“内心剖析”。然而,“自我清理”又为他所警惕,以至于不敢(或不肯)近距离注视这个孤独的自我,因此,叙述者实际上“自觉地将读者推到一定的距离之外,甚至以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紧张、排拒为前提”,其缘由即在于,“唯有排除了他人的干扰,才能径直逼视自己灵魂的最深处,捕捉自我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包括直觉)、情绪、心理、意识(包括潜意识)进行更高更深层次的哲理思考”^[38]。然而,鲁迅的风格却也有外向的一面,正如张旭东指出的那样:

……鲁迅文学风格就其“性格”而言,最终是“外向”的、热情的。任何积极寻求交流与共鸣、声气相通甚至“会心一笑”的言语行为,都必然反映出言说者的激情和能量;任何话语方式和话语系统中透露出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都“暴露”出作者对于他人的寻觅、向往甚至

^①这种“触类旁通”的方法,不光表现在散文诗对多种文体的吸收与化用,同时,通过对鲁迅小说与散文诗的“对读”,也可发现《野草》在互文性的层面上所蕴含的深刻意涵。参见黄子平:《真理、谎言与扯淡》,《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1期,第92-94页。

依赖。^{[8]191}

在这个意义上,因“独语”而形成的“排拒”效果,其实并不仅仅是一种筛选理想读者的写作策略。相反,真正为鲁迅所警惕的恰恰是脱离“他者”(一个理想的阅读者)的自省行为本身。一方面,脱离对象的自我反思往往会使自我反省更容易走向“唯我论”的境地;另一方面,如何同“理想之对象”形成“对话”关系,显然更为重要。联系到鲁迅将《我的失恋》这般“油滑”的小诗编进《野草》的做法,《野草》对于理想读者或曰“对话者”的期待可想而知^①。

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期待的“对话”显然也需要必要的基础和条件。《野草》在语言、文体等形式层面,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排拒”效果,由此便可以视为是这种“对话”的规则、形式的具体外化。孙郁认为,《野草》“通篇是自由的喷吐”“智慧的散发”,其所倡导的“情趣与境界”“深掩着个性的创造潜能”^[39],显然点破了《野草》之于读者的潜在要求。而这也意味着,靠近想象力与创造力均胜于常人的精神主体,确实有着不小的难度。然而,有难度并不意味着无法靠近,或者无法真正与鲁迅相遇。就鲁迅自己的创作设想而言,《野草》显然是一个关于“艺术与生命”之辩证的“示众”的例子。一方面,鲁迅在关于“自我”的形象建构中,虽有着相对复杂的策略性^②,但另一方面,《野草》的意义生成只有借助于文本外的“他者”(理想读者),才能产生循环并不断获得更新。从这个角度来看,《野草》固然是一次“避实击虚”的“回退”,它使鲁迅更多朝向了自己的生命世界,但这种“回退”却也关联着鲁迅生命哲学的艺术之思。正如《过客》中所说的那样,“料不定可能走完?……(沉思,忽而惊起,)那不行!我只得走”^{[40]196}。对人生、对艺术而言,“料定”也只能是前进的最初动力。至于“前方”究竟如何,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在质询“彷徨于无定”的过客,倒不如说它是在质询每一个历史的、现实的生命个体。

在《影的告别》中,鲁迅就将目光锁定在了一个一言不发的身体上。形与影的分离、告别,毋宁说是对身体与精神彼此分离的某种自指。形影分离,虽然使身体不断承受痛苦,但是这种决绝的姿态,却也申明了身体对傲居于其上的精神之立场的摒弃。鲁迅借此立住的,恰恰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具体形态。因为对鲁迅而言,唯有战士孤独地挺立,人才在黑暗的孤独中有所凭依,生命也才在真正意义上有所“附丽”。这背后关联的其实是鲁迅在《野草》中提出的“生死之辩”,即所谓“要么冻灭,要么烧完”^[41]的辩证。“非生即死”追求所谓速朽的文字立场,也是鲁迅后期创作转向杂文写作的内在逻辑。笔者认为,此处鲁迅所谓“非生即死”的极端形态,可能并非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一种指向“虚无”的决绝、一种所谓的语义学上的生死“混同”,或语词书写的再度“分离”。恰恰相反,它实质上正是关于“抵抗”或“超克”的哲学表达,“抵抗”或“超克”本身即强调的是“生与死”之间的共性特点。这是因为,对于每一个生命个体而言,生与死无论从何种层面来看,始终都处于生命历程中无从经验的两端,也就是说,生死在更多意义上只是终极的概念,人类本身无从经验这两个瞬间。对于每一个生命而言,生死也正由于其瞬时性与非经验性,其意义也才永远都在过程本身。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后期转向的“杂文”写作,正是对生命过程本身的确证和体认。本意在于超越“虚无”的生死概念,直抵生命“过程”(即行动)本身。“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42]这就是鲁迅建立在人格基础上的生命观与文学观(即张洁宇所谓“活”与“行”的生命理念)的生动实践。显然,透过将生命经验内化为具体的风格形式,《野草》已经成功将一个关于“怎样活”的问题,变成了“怎么写”的问题。这种潜移默化的转化,使我们又一次回到了那个关于《野草》的提问:即《野草》之于鲁迅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将这个问题稍加转换,其实可以发现,它实际上指向了另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写作之于个体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可以引出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对于鲁迅而言,选择散文诗这一文体形式以及创作《野草》的直接理由,本质上是“自我清理”的需求。唯其如此,鲁迅内心的苦闷和焦虑才得以进入具体的历史现场,成为反思生命历程的基本视角。在此过程中,鲁迅不仅在“自省”的意义上,完成了启蒙

①日本学者秋吉收认为,《野草》的定名其实更多与鲁迅回敬成仿吾的关于新诗的讨论有关。参见秋吉收、李慧:《成仿吾与鲁迅〈野草〉》,《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19-126+160页。在同时期的诸多论战中,鲁迅始终强调,理解文艺须具备一定的生命感悟力。他所排斥的,乃是对于艺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那一类人。至于秋吉收关于《野草》之“定名”的新说法,联想到鲁迅的许多杂文集的定名,如《三闲集》《二心集》等,均与鲁迅彼时的“论战”联系颇多,这种意见或可聊备一说。

②这突出地表现在《野草》的自我反省的“自我指向”,而这个层面不断拓展的思辨意义,实际上也造就了《野草》的哲学深度。

主体的自我“清理”,同时,在艺术理念与生命经验的交织互动中,鲁迅也完成了其在艺术创作上十分自然的“转向”。其二,于读者而言,《野草》内在呈现的鲁迅“文学观”与“生命观”的互动,既造就了鲁迅生命特殊时刻的意义格局,同时,也从“起源”意义上回应了散文诗的边界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野草》的文体形式同鲁迅精神结构之间的同构性,也为我们走近鲁迅、理解鲁迅,继而与鲁迅相遇,提供了复杂的精神“索引”。

结语

鲁迅在生命“彷徨期”创作的散文诗集《野草》为确立散文诗的文体合法性、扩充散文诗文体的基本形式等,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创作基础。由于散文诗颇为自由的文体形式与鲁迅复杂精神状态之间有着较为独特的同构性,因此,《野草》的创作实践也成为鲁迅生命观与文学观交织互动的审美形态的真实写照。由此生成的“诗学意义”与“道德意义”,正是鲁迅散文诗集《野草》最为突出的思想与艺术特点。《野草》所折射出的思想精神与艺术的双重内涵,也使得它本身变成了鲁迅思想与行动的连结点,借助这个连结点,我们才得以理解鲁迅特有的形象与姿态。与之相关,《野草》内部所闪现出的诗学与道德意义,也成为《野草》这一复杂文本所构筑的艺术世界的两个端点:“一是那种体验层面的抵御‘震惊’的消耗战和白刃战。一是一种‘诗史’意识,一种最高意义上的为时代‘立此存照’为生命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意识”^[14]¹⁴³。前者的代表性文本有《一觉》《淡淡的血痕中》《我的失恋》等等,后者则以《腊叶》《风筝》《墓碣文》等文本为典型。这种带有现实性与超越性的诗学内涵,很大程度上赋予了作为艺术形式的“文学”,以具体的、变动的、播散的品质与内涵。而为此刻、当下“立此存照”的“不饶恕”的道德意蕴,则又深刻联结着启蒙主体对于自我、生命价值的探索与追寻。在这个意义上,《野草》其实也具备了某种起点性的意义:即它始终是那个可以带领我们抵达“回心”意义上的“鲁迅”的经典文本;于“散文诗”文体的内涵和定位而言,《野草》的典型性与非典型性特征,更多为散文诗的文体内涵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形象支撑,它为散文诗的创作者和后继者们,提供的启示性意义在于:散文诗既要在形式上张扬丰沛的生命体验和生动情感,也要在历史文化的思想深度中张扬其无可替代的艺术创造力。

参考文献:

- [1] 陈子善.《野草》出版广告小考[J].文艺争鸣,2018(05):11-14.
- [2] 贺麦晓.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1911—1937)[M].陈太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4.
- [3]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29.
- [4]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夏济安,李欧梵,译.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459-477.
- [5] 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M].姜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200.
- [6] 鲁迅.题《彷徨》[M]//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6.
- [7]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李冬木,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84.
- [8] 张旭东.批评对象的重建——鲁迅文学风格的复杂性,统一性与历史性:上[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04):156-193.
- [9] 郜元宝.鲁迅六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84.
- [10] 章衣萍.古庙杂谈:五[M]//瑞峰.章衣萍作品选.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229-230.
- [11] 刘旭东.暗夜独行:今天如何读鲁迅[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89.
- [12] 陈子善.《野草》出版广告小考[J].文艺争鸣,2018(05):12-13.
- [13] 鲁迅.《自选集》自序[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14] 张旭东.批判的文学史:现代性与形式自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 [15] 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
- [16] 陈培浩.散文诗:一个当代性的提问——从中国散文诗的《野草》传统说起[J].文艺争鸣,2019(11):54.
- [17] 郜元宝.破《野草》之“特异”[J].鲁迅研究月刊,2019(04):4-17.
- [18] 孙郁,高远东,王凤,等.《野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以《独醒者与他的灯》为中心的研讨[J].当代文坛,2018(02):91-96.
- [19] 叶维廉.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论鲁迅兼谈《野草》的语言艺术鲁迅的选择[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6):1-9.

- [20] 鲁迅. 墓碣文[M]//鲁迅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07.
- [21] 孙郁.《野草》研究的经脉[J]. 鲁迅研究月刊,2013(07):36-39.
- [22] 鲁迅. 一觉[M]//鲁迅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3] 张旭东. 批评对象的重建——鲁迅文学风格的复杂性,统一性与历史性:下[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05):203-239.
- [24] 郜元宝. 鲁迅六讲:二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104-141.
- [25] 孙海军. 鲁迅话剧体散文诗《过客》主题新探[J]. 四川戏剧,2014(10):165-167.
- [26] 李玉明. 论《野草》的基本意识结构[J]. 东岳论丛,2012(02):24-31.
- [27] 鲁迅. 过客[M]//鲁迅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93.
- [28] 柯蓝. 中国散文诗创作概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51.
- [29] 张洁宇. “活”与“行”——鲁迅生命观与文学观的互动[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09):88-97.
- [30] 孙郁. 鲁迅的语词之“力”[J]. 读书,2015(03):137-143.
- [31] 鲁迅. 华盖集·题记[M]//鲁迅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
- [32] 汪卫东.《野草》的诗心[J]. 文学评论,2010(01):141-149.
- [33] 布斯. 小说修辞学[M]. 华明,胡晓芬,周宪,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142.
- [34] 鲁迅. 颓败线的颤动[M]//鲁迅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35] 薛毅,钱理群.《狂人日记》细读[J]. 鲁迅研究月刊,1994(11):13-21.
- [36] 陈舒劭. 启蒙: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公共构建[J]. 江淮论坛,2010(05):179-185.
- [37] 竹内好. 从“绝望”开始[M]. 靳丛林,编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31.
- [38] 钱理群,王得厚. 鲁迅散文全编前言[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27.
- [39] 孙郁. 在民国[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62.
- [40] 鲁迅. 过客[M]//鲁迅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96.
- [41] 鲁迅. 死火[M]//鲁迅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00-201.
- [42] 鲁迅. 故乡[M]//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10.

(责任编辑:晏洁 郑静波)

The Stylistic Boundary between *The Wild Grass* and Prose Poetry

TUO Dong

(Office of Literary Creation Theory Research, Jiangsu Writers' Association, Nanjing 210109, China)

Abstract: The appearance of Lu Xun's prose poetry collection *The Wild Grass* has establish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prose poetry genre and expanded its basic form and connot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lso a unique isomorphism between the free style of prose poetry and Lu Xun's complex mental state, which makes *The Wild Grass* become a true portrayal of the aesthetic form of Lu Xun's life and literary views interwoven and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The fact that Lu Xun wrote a series of prose poems during the "wandering period" of his life, and consciously published them in a collection not onl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theoretical debates of prose poetry at that time, but also related to his conscious and clear artistic choices in the transition of his creative work. More importantly, Lu Xun's ideological realm and spiritual temperament have enabled the literary form of prose poetry to break through its dual "boundaries" in theory and creation on the basis of expanding its expressive space, and thus refine an open and inclusive literary characteristic for modern prose poetry.

Key words: Lu Xun; *The Wild Grass*; prose poetry; style



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特征、 动因、挑战及优化策略

李宝贵^{a,b}, 韩金洋^a

(辽宁师范大学 a. 文学院 b. 国际教育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 中文纳入海外各国国民教育体系有助于扩大中文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柬埔寨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体现了柬埔寨对中文地位的认可与支持。目前,中文已纳入柬埔寨基础教育阶段中的中等教育阶段以及高等教育阶段。中国的推力作用与柬埔寨的拉力作用共同助推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发展进程。然而,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仍面临中文纳入布局需加强统筹规划、教学资源配置有待优化、华校在教育体系中的位置亟须提高、中文教学的实际效果尚需加强等诸多挑战。基于此,提出以下策略:调整中文教育布局;优化中文教学资源;改进华校办学模式;构建“中文+技能”教学模式;发挥孔子学院辅助作用,以推动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 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纳入特征;纳入动因;优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 H19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5310(2025)01 - 0061 - 12

引言

中文纳入海外各国国民教育体系是中文向世界各国成功传播的标志之一^[1]。目前,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学项目,85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海外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逾3000万^[2]。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中文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标志着国际中文教育正在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柬埔寨是东盟成员国,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自1958年中国与柬埔寨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中柬两国携手共进,谋求共赢,目前中柬两国已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积极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柬埔寨中文教育发展较早,距今已有100余年的历史。2022年11月,中柬双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柬埔寨教育、青年和体育部关于合作开展柬埔寨中学中文教育合作项目的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中文正式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3],这体现出柬埔寨对中文语言价值的认可,以及对促进中文教育普及化发展的支持。

学界关于柬埔寨中文教育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包括柬埔寨中文教育发展、各学段中文教育情况以及柬埔寨孔子学院建设等方面的研究。从中文教育发展情况来看,柬埔寨中文教育分为独立发展和中柬共建发展两个阶段^[4]。柬埔寨中文教育最早起源于华校,进行“半日制”的语言教学^[5]。2009年柬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配合支持更多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理论建构与实现路径研究”(22BYY154);辽宁省教育厅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人文社科类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与提升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LNYJG2022382);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项目“中文纳入海外国家国民教育体系质量评估研究”(23YH18C)

收稿日期: 2024-12-18

作者简介: 李宝贵(1963—),男,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中文教育、中文国际传播和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韩金洋(2000—),女,辽宁大连人,辽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埔寨第一所孔子学院成立,标志着柬埔寨中文教育正式进入中柬共建阶段^[4]。从柬埔寨中文教育的不同学段来看,在基础教育阶段,华校是柬埔寨开展中文教育的主要场所,但华校“半日制”办学模式已不符合学校教育模式的主流^[6],并且面临着未纳入柬埔寨教育体系的发展困境。而在高等教育阶段,高校中文教育教学中主要存在教材版本老旧、教师素质参差不齐、专门中文课程缺失等问题^[7]。此外,自2007年起,柬埔寨各地孔子学院/课堂相继建立,为柬埔寨源源不断地输送汉语高级人才^[8]。总体来说,柬埔寨中文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是高端中文人才的培养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中文师资培养机制及准入标准的建立,因此,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和体系化建设^[9]。

纵观现有相关研究,柬埔寨中文教育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中文教育的“三教”方面,尚未发现从纳入视角开展的相关研究。因此,本文基于柬埔寨中文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探析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特征与动因,并针对目前中文纳入存在的困境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以推动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高质量发展。

一、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特征

中文纳入所在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可以从纳入方式、纳入形式、纳入层级和纳入类型等方面进行归纳。在这些方面,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展现了其独特的发展特征。

(一)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方式

从时间维度看,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主要方式分为“先高后低”“先低后高”和“高低并进”三种。“先高后低”方式是指中文教育首先纳入对象国的高等教育,然后向基础教育和学前教育阶段辐射^[10]。2011年,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在大理大学的协同帮助下开办了柬埔寨高等教育阶段第一个中文专业。2022年,中柬两国以签署《谅解备忘录》形式标志着中文正式纳入柬埔寨基础教育阶段,因此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符合“先高后低”的特征,即中文首先进入柬埔寨高等教育体系后再向基础教育阶段辐射。

从空间维度看,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方式有两种,即“完全纳入”和“部分纳入”^[10]。“完全纳入”是指中文实现全面纳入对象国的各个学段,从小学到高中,乃至高等教育,均设有系统的中文课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文教学体系。这种纳入方式通常伴随着政府层面的强力推动、教育资源的充分配置以及社会文化的广泛认同。“部分纳入”是指中文进入对象国某一教育阶段的课程,但尚未形成完整的中文教学体系^[11]。目前,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处于“部分纳入”状态。具体而言,柬埔寨的中等教育阶段以及高等教育阶段已经明确将中文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学生可以在这些阶段选择学习中文作为外语课程。而初等教育阶段以及职业教育领域尚未将中文纳入其课程体系之中,这导致了中文教育在柬埔寨教育体系中的不连续性,也限制了中文教育在更广泛年龄层和社会领域中的普及与发展。

(二)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形式

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形式,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中文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它直接关联到中文教学的组织方式、教学资源的分配以及学生学习中文的动机和效果。在全球范围内,由于各国教育体制、文化传统、社会需求的不同,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进入课程体系和进入考试体系两大类^[11]。

柬埔寨的中文教育,目前正处于进入部分课程体系的状态。这意味着中文已经被正式列为某些学校或教育阶段的选修或必修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或未来职业规划选择学习中文。然而,与课程体系相比,中文尚未成为柬埔寨国家考试体系的一部分,如中考、高考等重要考试并未将中文作为考试科目,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文教育的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的完善。因此,柬埔寨中文教育的发展,还需要在课程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与考试体系的融合,以形成更加全面、系统的中文教育生态。

(三)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层次

外语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往往由其社会功能、国际影响力以及国家外交战略等多种因素决定。外语角色分为:外事外语、领域外语、泛领域外语、基础教育外语、重要外语以及重要语言六类^[12]。根据外语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角色分类,中文在柬埔寨属于基础教育外语,即作为培养学生基本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部分,而非特定领域或职业的专业语言。

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层次性特征进一步细化了对中文教育发展状况的理解^[13]。从层次性角度来看,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可以分为初、中、高三个层次。^[13]目前,中文已经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高等教育阶段以及中等教育阶段,这标志着中文教育在柬埔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由于尚未实现全学段纳入以及纳入考试体系,中文在柬埔寨的教育体系中仍处于初级层次。这意味着柬埔寨的中文教育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需要政府、学校和社会界的共同努力,以提升中文教育的地位和影响力。

(四)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类型

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发展类型,是根据各国中文教育实施的具体情况而归纳出的一种分类框架。这一框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文教育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路径和模式。根据中文纳入举措的实施情况,还可以将中文纳入的发展类型归纳为:潜在型、预备型、起步型、成长型、乏力型以及稳定型六种,其中起步型指的是中文纳入发展成效仍待检验,发展举措完备性不高,科目地位较低的一种类型^[14]。2022年11月,中柬两国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标志着中文正式以公立中学课程的形式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中柬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友好合作,也反映了柬埔寨政府对中文教育的重视和支持。随后,柬埔寨教育、青年与体育部决定在金边市以及西哈努克省的20所公立中学开设中文课程,并起草了《华文教育发展五年战略规划(2023—2028)》,同时完成了教师的选任和培训工作。这些举措表明,柬埔寨在推进中文教育方面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然而,由于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时间相对较短,课程开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实际效果尚需进一步检验。因此,从中文纳入的发展类型来看,柬埔寨属于纳入起步型国家。这意味着柬埔寨的中文教育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如师资力量的培养、教学资源的配置、学生兴趣的激发以及社会认可度的提升等。为了推动中文教育在柬埔寨的持续发展,需要中柬两国政府、学校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支持。

二、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动因分析

一种有效的汉语国际传播,需要考虑到对象国和接纳国双方面的条件和因素,即源自传播国的推力因素和对象国内部产生的拉力因素,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15]。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则从“推力”和“拉力”两个维度确立影响因素的分析主体,并从中外互动视角、供给侧与需求侧视角对中文纳入海外国家国民教育体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类^[16]。我国作为母语国的推动作用与柬埔寨的需求拉力作用,共同促进了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发展进程。

(一)中柬两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交流

中柬两国政治互信稳固、经贸合作持续、人文交流深化、教育互动紧密,是高度信任的好朋友,肝胆相照的好伙伴。正是在这种全方位的合作交流基础上,中文教育在柬埔寨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认可,为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 中柬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中外政治关系深刻影响中文纳入对象国国民教育体系^[11]。1958年7月,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访问柬埔寨,与诺罗敦·西哈努克签署《中柬建交公报》,标志着中柬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006年7月,中柬双方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联合公报》,建立中柬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10年,中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领

事条约》,以保护两国国家和两国国民的权利和利益,促进两国友好合作交流。2019年4月,中柬双方签署《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两国合作关系达到新高度。2023年,中柬两国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探索构建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的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体。在这一系列中柬两国合作文件的推动下,双方加强了教育领域的互动与交流。中柬两国高度的政治互信为柬埔寨中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策支持,也为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中文成为两国合作的重要桥梁。

2. 中柬经济合作不断深入

双边经贸合作为中文纳入对象国国民教育体系提供动力来源。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为中柬两国的贸易往来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持以及广泛的渠道保障。“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经济带发展而来,柬埔寨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国。2017年,中柬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柬埔寨王国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纲要》,标志着中方“一带一路”倡议与柬方“四角战略”的高度契合,进一步推动了中柬两国间经贸合作关系的深入发展。2020年中柬双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柬埔寨王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于2022年初正式生效,中方对柬方货物贸易零关税税目比例高达97.53%,柬方对中方90%税目零关税,均为双方所有自贸协定最高水平。近年来,中柬贸易合作稳定、持续深化,中柬双边贸易额不断攀升(见图1)。截至2022年底,中柬双边贸易额达160.2亿美元,同比增长17.5%。中国已经连续多年保持柬埔寨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17]。中柬经济合作的持续深化,为两国之间的文化与教育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经贸往来的日益频繁,中文作为两国交流的重要工具,已成为提升双方合作效率与质量的关键因素。中文不仅成为商贸领域的工作语言,也日益成为柬埔寨青少年学习的热门语言。中柬贸易的增长促进了柬方对复合型中文人才需求的上升,这为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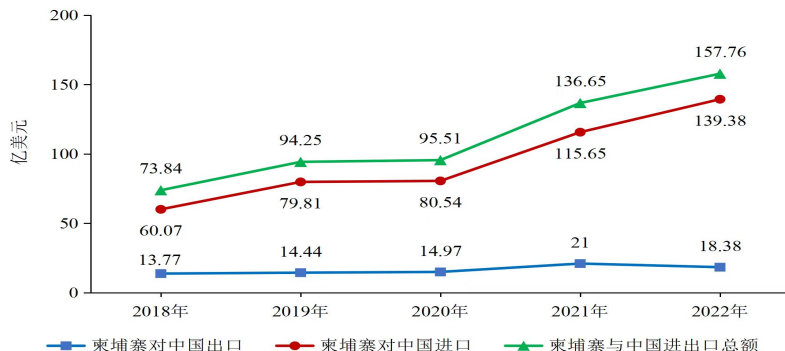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与柬埔寨进出口贸易额^[18]

3. 中柬人文交流不断巩固

文化因交流而丰富,文明因互鉴而精彩^[19]。近年来,中柬两国共同举办各类人文交流专题活动,例如旅游年、电影文化交流周、友好年以及中柬文化交流论坛(见表1),推动了两国人民对于彼此文化的深层次认知,也巩固了两国间长久以来的友好纽带。此外,中柬两国旅游领域的合作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阵地。据柬埔寨旅游部统计,在2019年,柬埔寨共接待中国游客236.2万人次,占比高达当年外来旅游游客的36%。2023年,柬埔寨政府启动“柬埔寨旅游年”活动,为吸引中国游客推出“中国准备”战略,在旅游服务领域推行中国标准迎接中国游客。中柬双方开展的多层次、多领域的文化交流活动,加强了双方人文交流合作,深化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情谊,为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提供了稳固的民意基础。

4. 中柬教育合作不断拓深

中柬两国一直在教育领域积极开展合作,促进了中柬两国人民对彼此语言的了解,为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持。一方面,中国长期对柬埔寨提供教育援助。中国除了对柬埔寨教

表1 中柬文化交流事件

时间	事件名称
2019年1月30日	中国-柬埔寨文化旅游年
2021年12月16日	首届中柬文化交流论坛
2023年8月30日	中柬建交65周年文艺晚会
2023年11月17日	中柬媒体高层论坛暨第三届中柬文化交流论坛
2024年1月21日	中柬文创文化展

育基础设施“短板问题”进行“硬件”援助,积极向柬埔寨派遣中文教师和志愿者进行“软件”帮扶,助力柬埔寨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中柬两国积极开展教育合作。在职业教育领域,中柬两国相关部门及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柬埔寨职业教育合作联盟”,共同助力两国职业教育发展。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国也面向柬埔寨招收政府奖学金留学生。据不完全统计,2023—2024学年度共有1 067名柬埔寨留学生在中国26个省市的100多所大学留学和生活^[20]。除此之外,中柬高校通过互设语言课程,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在语言教育领域的深入合作与交流,为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中柬两国供需视角下的协同配合

供需视角下的影响因素包括:语言资源、语言声望、语言服务、语言需求、语言态度、语言政策^[16]。从供需视角来看,中国的供给侧与柬埔寨的需求侧协同配合,共同助力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发展进程。

1. 中文供给影响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

作为中文的母语国,中国在中文教育资源和语言服务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为推动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持。

(1)中文对柬埔寨而言是有价值的语言资源

语言作为资源,因使用者社会经济资源的不同,而形成价值高低的评价结果^[21]。中文对柬埔寨而言是有价值的语言资源。首先,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文在柬埔寨的价值日益突出。作为中文的母语国,中国的国家地位和综合实力的增强,推动了中文价值的进一步凸显。现如今,中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22]。其次,掌握中文这门第二语言有利于柬埔寨民众的就业。例如在端华学校、启华学校、中山中学等华校均设有“夜校”,学生在这里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掌握中文语言技能,增强自身竞争力,以拓宽求职道路。最后,中国与柬埔寨的多领域合作拓展了中文在柬埔寨的使用范围。以援柬西港特区项目为例,中国在西港特区累计实现投资22.7亿美元,引入来自中国、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共180家,创造约3万个就业岗位^[23]。中文语言价值的提升促使柬埔寨民众选择学习中文,进而有力推动了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进程。

(2)中文的语言声望在柬埔寨稳步提升

中文语言声望伴随着中国语言经济价值的增长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中方教育机构对中文语言声望的提高也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24]。迄今为止,在柬埔寨共设立了三家孔子学院,分别为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孔子学院、国立马德望大学孔子学院以及柬华应用技术大学孔子学院,其中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孔子学院作为全球示范性孔院是在柬其他孔子学院的发展标杆。这三家孔子学院及其下设孔子课堂的建设与发展,对中文教育在柬埔寨的推广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孔子学院在柬开设中文语言课程,开办中国传统文化活动并承担HSK、HSKK以及YCT考试工作。这些举措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扩大了中文教育的影响力,有助于提升中文在柬埔寨的语言声望。

(3)优质的语言服务为中文在柬埔寨发展提供支撑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各类中文教学机构通过优质高效的语言服务助力中文教育在柬埔寨的持续发展与传播。一

方面,柬埔寨众多高校以学历以及非学历教育的形式开设中文课程。截至2021年,柬埔寨共有6所高校开展中文学历教学,12所高校开展中文非学历教学^[7]。培养高级中文人才可为柬埔寨当地中文服务提供稳固支撑。另一方面,中国对柬埔寨的外派援助中始终融入优质的语言服务。中柬两国是命运与共的好伙伴,中国已连续12年保持柬埔寨最大援助国地位。在疫情期间,中国累计向柬埔寨提供新冠疫苗1670万剂,占其接收疫苗总数的98%^[25]。在体育援助方面,中国政府援建了柬埔寨举办2023年东南亚运动会的体育场建设项目,并承担援柬体育技术援助项目。除此之外,中国政府也积极投身于柬埔寨文物保护工作,致力于两国文化的传承与交流。在每一次的外派援助中,中文语言服务都会根据实际情况结合自身优势,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高质量的中文服务,助力柬方在各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中文在柬埔寨的传播和普及。这些援助活动不仅提升了中文语言服务的实际价值,也为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民意环境,进一步深化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友好合作。

2. 中文需求决定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

对象国柬埔寨作为需求一侧,受到自身语言需求、语言态度以及语言政策的影响,主动拉动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

(1) 柬埔寨民众对中文学习具有现实需求

海外中文学习者因中文的价值产生中文的学习需求,继而做出语言选择^[26]。首先,柬埔寨说中文、用中文的人数不断增加。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统计,当前柬埔寨华人华侨数量约为110万,占柬埔寨总人口的6.8%,除此之外,柬埔寨在读的中文学习者也超过了10万人,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27]。其次,在柬华校的蓬勃发展侧面反映出柬埔寨民众对于中文学习的认同。目前,在柬华校共有57所,在读学生约为5万人,且越来越多的柬埔寨籍华裔学生选择在华校读书。最后,在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的框架下,中柬双方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多方合作不断巩固加深,中文在柬埔寨的实际使用需求不断增加,客观推动了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发展。

(2) 柬埔寨民众对中文学习持积极态度

柬埔寨的普通民众对于中文学习一直持有开放包容的态度。一方面,友好的学习态度离不开华人群体的努力^[28]。在柬华人群体数量庞大,且华人华侨对本民族的语言及文化认同感十分强烈,这不仅推动了中文在华人社区中的延续与传承,也增强了社会各界对中文教育的关注。柬埔寨本地华人群体对中文教育的需求,为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另一方面,柬埔寨各类学校积极开设中文课程。自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后,首批20所公立学校于2024年增设中文课程。除此之外,孔子课堂也深入柬埔寨中小学的课程之中。以暹粒省吴哥高中孔子课堂为例,自2012年成立以来,已有12年的办学历史,现已搭建完备的汉语学习、职业培训、HSK考试以及赴华留学申请的学习交流平台,深受学生的喜爱与好评。正是由于柬埔寨民众对中文学习的积极态度和强烈需求,中文教育得以在柬埔寨国内快速推广,并顺利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3) 柬埔寨政府的语言政策支持

柬埔寨政府对中文的语言政策直接影响了中文在柬的发展。1970年,柬埔寨内战爆发,政府下令禁止华人使用华语并停办全国所有华校。此政策的出台严重阻碍了中文在柬埔寨的发展。1990年8月3日,柬埔寨王国政府发布《第248号法令》,允许设立华校及恢复华人庙宇和华人传统的相关庆祝活动^[5]。此法令的颁布标志着柬埔寨政府对中文价值的认可,并承认了华校办学的合法地位,促进了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体系的进程。2022年11月,中柬两国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柬埔寨教育、青年和体育部关于合作开展柬埔寨中学中文教育合作项目的谅解备忘录》,标志着中文正式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3]。2023年12月,柬埔寨教育部起草了《华文教育发展五年战略规划(2023—2028)》,为柬埔寨的华校发展提供了方向性指导。柬埔寨政府的相关政策支持,为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长远发展提供稳定的助力。

三、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面临的挑战

随着中柬两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柬埔寨政府以及相关教育部门积极推进中文教育工作,在柬学习中文人数逐渐增加。然而,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仍存在中文纳入布局需加强统筹规划、中文教学资源尚待完善优化、华校在教育体系中地位较低、中文教育实际效用还需增强等突出问题。

(一)中文纳入布局需加强统筹规划

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的规划布局目前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中文纳入地区不均衡。目前柬埔寨高校的中文学历教育主要分布在金边市、西哈努克省以及班迭棉吉省等省份,而公立中学阶段的试点学校也将设于金边市以及西哈努克省两处。可见,大多数中文的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柬埔寨中西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而东部地区的中文教育则发展较为迟缓。其次是纳入学段不平衡。目前,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仍处于“部分纳入”,即只涵盖中等教育阶段以及高等教育阶段,而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内的学前教育阶段、基础教育阶段以及职业教育阶段并未涵盖在内,存在断层现象。最后是纳入相关政策不完善。自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至今,除两国共同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华文教育五年发展战略规划(2023-2028)》外,并无其他政策指导性文件下发。因此,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统筹规划仍需加强。

(二)教学资源配置有待优化

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内的中文教学资源问题主要表现在教师和教材方面。一方面,柬埔寨中文师资队伍存在中文教师现有数量不足以及援柬中文师资队伍不稳定的问题。据柬埔寨皇家科学院统计,2019—2020学年度,柬埔寨中文教育师生比例为1:50,而柬埔寨教育部规定的标准师生比例为1:25,因此柬埔寨中文教师仍存在1500人左右的缺口^[9]。此外,援柬教师师资队伍流动性较大,中方派遣教师多有1年至4年的任期限制,而流动性大则会影响到教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不利于打造高水平中文师资队伍。另一方面,柬埔寨中文教材的适配度不高。目前华校使用的教材为《华文》以及《柬埔寨华文教育初中华文实验教科书》,虽然是中柬双方合作编写,但内容仍存在本土化程度不高、课文内容陈旧、学生理解难度过大等问题。高水平中文师资的短缺和教学资源建设的不完善将会阻碍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进程。

(三)华校在教育体系中的位置亟须提高

华校是柬埔寨中文办学历史最悠久,办学模式最完善,覆盖面最广的中文教学单位,在柬埔寨中文教育的体系建设中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尽管柬埔寨政府承认华校办学的合法性,但华校在柬的定位仍然是“半日制”教学的语言培训学校,学生无法取得正规的学历证书。此外,华校的教学时长须与公立柬文学校的作息时间相协调,这一特性导致在面对升学选择时,部分学生倾向于选择能提供完整学历认证的公办柬文学校,从而造成了华校学生人数的流失问题。2002年,时任柬华理事总会会长杨启秋勋爵曾提出了华校转轨的教改方案,开设了柬文课程,将华校改革为柬埔寨政府承认的公立学校,学生可通过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升学统一考试,获得相应的毕业文凭^[29]。但华校的主流仍然是以中文为媒介而非柬文来进行教学。华校作为柬埔寨历史悠久且办学经验丰富的中文教学单位,对柬埔寨中文教育的整体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若华校未能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不仅可能导致大量潜在学习者的流失,削弱中文在柬社会的影响力,还将阻碍柬埔寨中文教育质量和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四)中文教学的实际效果也需加强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深化,中国对柬埔寨的投资步伐加快,众多中资企业纷纷落户柬埔寨,在建筑业、农业、制造业、电力行业及经济特区等多个关键领域内注入技术和人力资源。2023年,柬埔寨共批准了268个投资项目,总投资金额高达49.2亿美元,其中源自中国的投资占到了总投资额的66%,在推动了柬埔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柬埔寨就业岗位的增加^[30]。然而,随着中资企业的快速涌入,它们在当地的发展面临着诸如人才短缺的严峻挑战。依据《“一带一路”沿线中国民营企业现状研究报告》,中资企业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人才短缺,尤其是在招聘复合型中文人才方面

遇到瓶颈。这一现象反映出柬埔寨当前中文教育与市场需求之间的明显不匹配。中资企业对于具有中文能力的专业人才的强烈需求,进一步凸显了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性。若能通过教育体系内系统开展的中文教育培养更多具备中文能力的专业人才,将有助于满足当地企业的用人需求,并为中文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广阔的空间。

四、优化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策略

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整体趋势积极向好,但仍面临诸多问题,制约其深入发展。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可行策略:调整中文教育布局、优化教学资源、改进华校办学模式、构建“中文+技能”教学模式、发挥孔子学院的辅助作用。通过这些措施,全面推动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深入发展,培养更多优秀的中文人才,为中柬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作出贡献。

(一)调整中文教育布局,助力纳入均衡发展

优化中文教育布局是推动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走深走实的关键一步。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完善相关柬埔寨当地的中文教育相关政策,协调各地区中文教育资源的供给,填补基础教育各阶段的空白,弥补中文教学中的断层现象,从而促进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第一,应统筹规划柬埔寨各个地区的中文教学资源供给,优化中文教学资源配置。目前,柬埔寨中部以及西部中文教学资源较为充足,而东部略有欠缺,因此应汲取部分省份的中文办学经验,向中文欠发达的省份倾斜教学资源,提升柬埔寨教学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促进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内中文教育的均衡发展。

第二,应汲取已纳入学段的经验,积极推动中文向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全学段纳入。在基础教育阶段,公立学校只有初级中等教育阶段以及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进行了中文试点课程,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在高等教育阶段,目前的中文教育已形成较为完备的规模。因此应当充分借鉴和吸收目前中文在已纳入学段的成功实践经验,推动中文在柬埔寨的全学段纳入。同时,还须注重中文教育在柬埔寨各个学段之间的有效衔接,确保学习者中文学习的连贯性。

第三,应联动各方教育部门制定相应的中文教学大纲以及考试大纲,推进纳入的政策实施。目前,柬埔寨并无针对各学段而设立的教学大纲。因此,可以《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修订版)》为参考,结合柬埔寨各阶段中文教学自身特点进行修改编写。作为中文母语国,我国还应配合服务柬埔寨教育部门研制面向柬埔寨考试体系的中文考试大纲,以促进中文纳入柬埔寨考试体系的步伐。除此之外,应柬方要求,可设立柬埔寨常驻汉语教育官员,辅助柬埔寨中文教育工作^[31]。此举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中柬在中文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为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内的中文教育开展提供专业指导和支持。

(二)优化中文教学资源,提供纳入所需保障

优化中文教学资源是确保中文成功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保障。中文教育的质量和覆盖面直接依赖于高质量的教学资源,包括师资、教材、教学设施等。只有在这些资源得到充分保障和优化的基础上,才能确保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长远发展与可持续性。

一方面,要优化柬埔寨中文教师队伍。一要重视培养在柬本土中文教师。中柬双方教育部门可加强合作,参考《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结合柬埔寨中文教学特点制定相应的教师培养机制,积极拓展本土教师的成长体系,组织各级各类中文教师参与教学培训,建立起规范、完善、有层次的教师培养方案,助力本土教师成长道路发展。二要完善援柬教师培养模式。结合柬埔寨教育体系内各学段的中文教学实际,创新岗前培训、在职进修等多元培训方式,增强师资培养的实效性和针对性。除基本岗前培训内容外,增设离任与赴任教师进行工作对接环节。此外,可完善援柬教师任期机制,在尊重援柬教师本人意愿、派出单位同意以及相应考核合格的条件下,可延长教师留任时长,以稳定教师教学队伍。

另一方面,积极研发适配于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内教学开展的中文本土教材。首先,要加强中柬两方教育部门的通力合作。可选任中方语言部门、柬方孔子学院、高等院校中文系以及当地中文机构的资深中文教师代表建立教材编写研究组,共同合力编写柬埔寨本土教材。其次,要选取适合柬埔寨当地文化特点、符合柬埔寨学生交际需要以及吸引柬埔寨学习者兴趣的内容,还要考虑到柬埔寨当地的宗教背景、文化禁忌及语言习惯等方面。最后,教材的形式也应多元化。单一的纸质版教材现已不能满足中文汉语学习者的需要,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应逐步建立教材配套的音频朗读、动画演示以及视频介绍等内容,丰富教材的辅助学习板块。

(三)改进华校办学模式,拓宽中文纳入范围

目前柬埔寨华校仍游离于国民教育体系之外,这不仅阻碍华校发展的进程,也导致大量潜在中文学习人口的流失。因此华校应谋求改革,争取合适机会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之中。

一方面,实行中柬文双语教学是当前形势下柬埔寨华校的因应之举。在华校转轨的教改方案提出之后,已有部分华校为了留住学生,开始实行中柬文全日制双语教学模式,如金边的端华学校、广肇学校等已经转变为中柬文同步的双语学校,外省的一些学校如吴哥、比粒等地的学校也在进行类似的转型。柬埔寨华文学校一般隶属于当地的柬华理事会,目前,柬华理事总会在全国的下属华校约60所,在校学生5万余人^[30]。现在的柬埔寨华校已不单纯以华人掌握华语与中华文化为终极目标,而是更加重视受教育者的实际需要,有利于学生今后的升学和就业。因此,柬华理事总会应采取积极态度,争取获得柬埔寨政府的支持,推动华校从传统的单一华文教育向双语办学转变,把华校融入柬埔寨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在华校中办柬文的正规教育,让学生不必担心在华校学习的升学问题,以谋求华文教育的长期发展。

另一方面,华校应有效提升办学质量,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促进华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在完善课程设置方面,应精确定位华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地位,需重点强化华文及华文相关课程,明确教育目的与培养目标,并据此对课程体系进行合理设置,同时也要做好与柬文学校的课程对接。二是在师资队伍建设上,目前柬埔寨为提高本土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已经成立了柬华师资培训中心专门培养本土华文教师。今后需进一步发挥培训中心作用,进一步壮大华校的师资力量,为华校师资注入新的血液,实现师资队伍的自我造血、自我供血的良性循环。三是在华文教材研发方面,应组织本土华文教师与国内外汉语教学专家充分讨论,搜集一线师生意见,结合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实际需求与特点,对柬埔寨华文教材进行改编。在字词选择上,既要参照《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又要结合柬埔寨学生日常生活用语;在文化知识编排上,则需兼顾中柬两国文化,逐步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推动中柬文明交流互鉴。同时,应定期更新修订,确保内容与时俱进,满足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实际需求。

(四)深化“中文+技能”办学模式,促进应用中文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文使用的领域扩大,“职业汉语”教育成为国际中文教育的新趋势^[26]。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沿线重要支点国家,柬埔寨目前急需精通中文且具有较强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中文+职业教育”成为推动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实用性发展目标。

一方面,搭建“中文+职业教育”合作平台。目前,以“中文+职业教育”系列课程为特色的柬华应用科技大学首届本科新生人数达152名。安徽省教育厅也于2018年起承办“柬埔寨学生赴华留学项目”,截至2019年,安徽省各高职院校共接收129名柬埔寨留学生^[31]。可以汲取现有“中文+职业教育”平台的相关经验进行推广,在目前柬埔寨高等院校或孔子学院/课堂开设“中文+职业教育”相关课程,向柬埔寨民众积极宣传课程优势与潜在效应,提升“中文+职业教育”的课程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中文学习者。

另一方面,优化“中文+职业教育”办学模式。首先,要创新中文人才的培养模式。建立“4+0”“2+2”“3+1”等培养方案,探索“双学历”办学路径,以中文和职业教育为切入点,建立起“中文+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还要增加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为学生搭建良好的实习平台,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开发“订单式”培养路径,为柬埔寨需求市场提供兼具中文能力的高水平技能型人才。其次,要研发系列“中文+”教材。组建中柬双方专家团队,结合中柬两国特点,以就业为导向,编写本土化、实用化、科学化的“中文+职业教育”系列教材。最后,要优化教师队伍,与普通国际中文教师不同,“中文+职业教育”教师除了要具备过硬的中文教学技能外,还要有相关职业的知识储备,这就对教师有了更严格的专业要求。因此,应选拔兼具相关职业知识的中文教师,并定期参与中文与职业知识的相关培训,组建专业化的教师队伍。

(五)发挥孔子学院辅助作用,助力纳入平台建设

《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年)》指出,要促进孔子学院/课堂办学与所在国的国民教育体系相结合^[32]。目前,柬埔寨共有3所孔子学院,应发挥孔子学院/课堂的辅助作用,为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搭建优秀的传播平台。

首先,要积极拓展孔子学院/课堂的多层次办学模式。由三方合作办学模式向多元办学模式并行转型^[33]。一方面创新办学模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另一方面,应多措并举,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例如,柬华科技应用大学孔子学院,在孔子学院总部、柬华应用科技大学及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三方合作的基础上,还得到了柬华理事总会的积极参与,为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这种多方合作模式不仅推动了孔子学院的发展,也为中文教育融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进一步促进中文教育的普及与规范化。

其次,可开设孔子学院特色课程。应借鉴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孔子学院在陆军学院、吴哥免税店、首相府以及加华银行等地设立的多个汉语中心经验,根据不同学习需求提供针对性的中文应用课程。这不仅能够满足各类学习者的多元化需求,也有助于培养更多具备实际中文应用能力的人才,为中文教育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提供有力支撑。通过这种灵活多样的课程设置,可以增强中文教育的吸引力,进一步推动中文在柬埔寨教育体系中的广泛普及。

最后,可开创多元化的孔子课堂开展模式。后疫情时代,“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为孔子学院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这不仅能够扩大中文教育的覆盖面,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方便不同地区的学生参与学习,还能推动中文教育的数字化与智慧化转型,提升教学效果与学生的学习体验。在孔子课堂的实践基础上,这种多元化教育模式可以在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基础中文教育阶段进行推广,为中文顺利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提供创新动力,推动中文教育与现代教育体系的深度融合。

结语

新时代,随着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不断深化,柬埔寨中文教育发展前景向好。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不仅有助于中柬两国提升政治互信、加速经贸往来,更能促进文化交流,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中文教育的推广,为柬埔寨培养更多具备中文能力的优秀人才,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目前,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内的中文教育虽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应积极采取多方举措,如加强师资培训、优化教学资源、改进教学方法等,使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路径向更深层次迈进。同时,我们还需关注中文教育在柬埔寨的实际效果,确保其能够真正为柬埔寨的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作出贡献。

柬埔寨地处东南亚区域,目前已有8个东南亚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这一趋势表明,中文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我们应积极汲取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为中文纳入东南亚更多国家国民教育体系提供参考,进一步拓宽国际中文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展望未来,随着中柬两国关系的不断深化,中文教育在柬埔寨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凸显。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文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的进程将不断加快,为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搭建更加坚实的桥梁。

参考文献:

- [1] 陆俭明. 汉语国际传播方略之我见[J]. 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 2019(01):1-11.
- [2] 中文的世界性正在增强[EB/OL]. (2023-12-20)[2023-12-30].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1220/c1002-40142971.html>.
- [3] 中国与柬埔寨签署中文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中文正式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EB/OL]. (2022-11-10)[2023-12-20]. <http://www.chinese.cn/page/#/pcpage/article?id=1261&page=8>.
- [4] 赵雨, 吴应辉. 柬埔寨中文教育发展报告(2019)[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22(01):33-44.
- [5] 野泽知弘, 乔云. 柬埔寨的华人社会——华文教育的复兴与发展[J]. 南洋资料译丛, 2012(03):66-80.
- [6] 吉毅虹. 柬埔寨贡不省华文教育现状及启示[D].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 2017.
- [7] 高晗. 柬埔寨高校汉语教育教学发展研究[D]. 西安: 西安石油大学, 2021.
- [8] 温天凤.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孔子学院本部汉语课程调查研究[D]. 呼和浩特: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3.
- [9] 赵雨, 罗艳. 柬埔寨中文师资问题调查与研究(2020)[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2(05):156-159.
- [10] 李宝贵, 庄瑶瑶. 汉语纳入海外各国国民教育体系之方略探索[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01):84-88.
- [11] 刘家宁, 李宝贵. 中文纳入俄罗斯国民教育体系的现状、动因、挑战与对策[J]. 语言教育, 2022(01):106-120.
- [12] 李宇明, 唐培兰. 论汉语的外语角色[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0(05):17-30.
- [13] 李宝贵, 吴晓文. 中文纳入海外各国国民教育体系: 价值、演进与表征[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22(04):1-8.
- [14] 周德欢, 吴应辉. 非洲国家中文纳入国民基础教育体系发展研究[J]. 丝绸之路, 2023(04):124-139.
- [15] 卢德平. 汉语国际传播的推拉因素: 一个框架性思考[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01):55-61+2.
- [16] 李宝贵, 刘家宁. 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的论域类型与实践范式[J]. 语言文字应用, 2023(01):45-56.
- [17] 柬埔寨学者: 共建“一带一路”释放柬发展潜力[EB/OL]. (2023-08-17)[2023-12-30]. <https://www.yidaiyilu.gov.cn/p/02U17UIJ.html>.
- [18] 一带一路大数据汇总[EB/OL]. (2023-09-21)[2023-12-31]. <https://www.yidaiyilu.gov.cn/dataChart?to=AIR>.
- [19] 习近平.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19(06):7-9.
- [20] 架起中柬“一带一路”青年友谊之桥——访柬埔寨驻中国学生会[EB/OL]. (2023-10-23)[2024-01-30].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310/23/t20231023_38760495.shtml.
- [21] 梁昱, 卢德平. 语言传播推拉规律及国际中文教育政策原则[J].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2023(02):31-44.
- [22] 吴志成. 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光辉成就[N]. 光明日报, 2022-10-09(08).
- [23] 2023年中柬经贸合作成果丰硕, 亮点纷呈[EB/OL]. (2024-01-23)[2024-01-30].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wjg/zwxw/zwxwyz/202401/20240103468238.shtml>.
- [24] 李宝贵, 张琪. 中文纳入毛里求斯国民教育体系: 样态、动因、困境与纾解[J]. 中国语言战略, 2023(02):103-113.
- [25] 中柬“铁杆”友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EB/OL]. (2023-9-18)[2023-12-20]. http://www.china.com.cn/opinion/2023-09/18/content_116691728.html.
- [26] 李宝贵, 吴晓文. 中文纳入东南亚国家国民教育体系动因机制与推进策略[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1):130-139.
- [27] 苏碧娜: 柬埔寨为何把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EB/OL]. (2022-12-25)[2023-12-20]. <https://www.chinanews.com.cn/dxw/2022/12-25/9921154.shtml>.
- [28] 张琪. 中文纳入毛里求斯国民教育体系: 样态、动因、困境与纾解[J]. 中国语言战略, 2013(02):103-113.
- [29] 张悦. 柬埔寨华文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J]. 晋中学院学报, 2012(05):89-93.
- [30] 柬埔寨加大力度吸引外国投资[EB/OL]. (2024-03-18)[2024-03-19]. <http://m2.people.cn/news/toutiao.html?s=M18zXzI-wOTk2NTQ2XzIzXzE3MTA3MTE5OTc=>.
- [31] 孙怡.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发展十年回顾与实践研究——以“柬埔寨学生赴华留学项目”为例[J]. 当代职业教育, 2023(03):23-29.
- [32] 《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年)》[EB/OL]. (2013-2-18)[2023-12-20].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302/t20130228_148061.html.
- [33] 李宝贵. 新时代孔子学院转型发展路径探析[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5):27-35.

(责任编辑: 杨威 谢松波)

The Characteristics, Motivations, Challenge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Integrating Chinese Language into the Cambodian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LI Bao-gui^{a,b}, HAN Jin-yang^a

(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to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s of various countries overseas helps to expand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orldwide.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in the Cambodian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reflects Cambodia's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for the statu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present, Chinese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secondary and higher education stages of Cambodia's basic education system, as the combined push from China and the pull from Cambodia have jointly facilitated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Chinese into the Cambodian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However,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into the Cambodian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s still faced with many challenges, involving the need for a better overall planning in the Chinese education layout, the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urgent need to improve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schools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actual effect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view of this case,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adjust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layout; optimizing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resources; improving the operation mode of schools; building a "Chinese skills" teaching model;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supplementary rol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so as to promote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tegration into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of Cambodia.

Key words: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into the Cambodian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ion; motivations for integration; challenges fac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老挝万象中文教育的现状、特点与思考

杨绪明

(南宁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摘要:老挝中文教育当前有华校中小学华文教育、高等院校中文(汉语)专业教学和各类培训机构汉语培训3种类型。老挝华文教育有着声誉良好、体系完整、管理有效、华语环境浓郁、华—老双语并重等特点,呈现出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互促、传播主体和受众面广的局面。华校中小学华文教育凸显“双语双文”育人目标,高校中文(汉语)专业教学关注专业发展,各类培训机构侧重汉语技能提升和考证、升学目标。万象市中文教育是老挝的代表,已形成涵盖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及成人教育等较完整的教育体系,中文学习人数快速增长。但整体上仍存在教学管理不够科学;办学经费不足,现代化教学设备较少;合格教师相对不足,教学方法较单一;缺少统一教学大纲,教材配套性差且本土教材不多等问题。宜通过整合资源、加大本土中文师资培养力度、编写本土化教材、丰富教材种类、增设实践课程、改进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等措施提升其中文教育水平。

关键词:老挝;中文教育;师资;教材资源;教学设施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25)01-0073-12

一、引言

老挝也称寮国,是中南半岛上的一个内陆国家,人口2023年达到758万,其中华侨华人超30万人^[1],居民多信奉佛教。老挝学制分为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高校一般四年,现有老挝国立大学、占巴塞大学、苏发努冯大学,另有老挝苏州大学,直属卫生部的医学院、各类专业学院(154所,多是私立学院)等^[2]。随着中国经济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东盟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中文(汉语)已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效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汉语教学也日渐成为中国与东盟各国互通、互惠、互促的重要活动之一。近年来,汉语教学在老挝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中老铁路项目也极大地促进了中-老两国的合作与发展,老挝对中文人才的需求正快速上升。邓伟(2020)调查发现,目前老挝琅勃拉邦汉语学习者中,男性多于女性,学习人群朝低龄化趋势发展,2020年非华裔学生占比高达92.52%,中文教育的发展呈现国际化趋势^[3]。陆蕴联和陆慧玲(2021)探讨了老挝中文教学的最新情况,并指出老挝东北部、西部和西南部省份的中文教学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4]。李步军和潘玉华(2022)也对老挝中文教育面临的困境及其发展策略进行了相关探讨^[5]。总体来看,现有老挝中文教育研究尚不够全面,仍需进一步探究。

二、老挝的外语教育及其中文(汉语)传承

老挝境内语言分属老泰语族系、苗—瑶语族系、孟—高棉语族系、汉—藏语族系四个语系,官方语言老挝语与汉语同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泰老语支,为东南亚最具语言多样性国家之一。

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际中文教育创新项目“越南本土中文教师培训与资源开发”(21YH035CX1);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广西壮族学龄儿童多语习得状况调查及其家庭语言规划价值研究”(23FYY012)

收稿日期:2024-12-23

作者简介:杨绪明(1973—),男,河南信阳人,文学博士,南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中文教学、汉语词汇语法和语文教学研究。

(一)老挝语言政策及其外语教育

1975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为增强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急需去殖民化,制定独立自主的语言政策。同年12月2日,老挝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专门决议,将老龙族语言和改革后的老龙族文字确定为标准老挝语和官方语言^[1]。这是老挝第一次独立、正式地提出其语言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标准老挝语的普及。此后,老挝语就被正式确立为老挝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定教学媒介语。

老挝沧桑的历史及其所经历的复杂国际关系,使其在语言使用上尤其是外语使用呈现出复杂性^{[6][37]}。老挝的外语,除华文(汉语)外,泰语使用范围广、影响深;自1893年沦为法国殖民地起,法语曾一度深刻影响着老挝;1954—1975年美国取代法国侵入老挝事务,英语开始推广;老挝1975年建国后,俄语和越南语开始在很多学校教授,但20世纪80年代后,俄、越两种外语渐受冷落,不过受惯性影响,1994年英语、法语、俄语等仍是老挝国民课程选修外语之一。

(二)老挝的中文(汉语)传承历史

老挝与中国西南山水相连,两国有多个民族跨境而居,中老关系源远流长,一直和睦相处。在老挝反殖民统治和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斗争期间,中国从经济、技术和军事等多方面给予老挝人民大量的帮助。老挝的汉语和中华文化教育历史较长。

一百多年前,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移民已在老挝开办了私塾,教授中文。20世纪,老挝先后出现了百细市华侨公学(1929年)、沙湾拿吉省崇德学校(1931年)、万象市寮都公学(1937年)、甘蒙省他曲华侨学校(1939年)、琅勃拉邦新华学校(1943年)等有名的华文学校。法国殖民统治和战后美国“援助”期间,也都有大批中国人移居老挝^[7]。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移民又开始前往老挝经商定居,汉语和中国文化在老挝进一步传播。华人与当地各族人民友好相处,对促进老挝经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也有力地推动了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传播。

20世纪90年代起,老挝与中国的各种交流也日益频繁,中老两国情谊不断升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特别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老经贸合作和文化交往更加密切,老挝政府和民间也更加重视中文教育,目前中文教育已被纳入老挝国家教育体系,涵盖了幼儿园至高中各个阶段。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汉语在老挝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汉语教育机构也逐渐增多。由于华校培养的人才已经难以满足老挝与中国各个层面和领域交流合作的需求,老挝的高等教育应势应时而动,陆续开设汉语课程或设立了中文系,如老挝国立大学、苏发努冯大学、老挝苏州大学、国防学院、万象警察高等专科学校和巴巴萨职业技术学院等^[8]。

近年来,中老双方合作推进了一系列经济工程,如中老铁路、“老挝一号”卫星、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等项目^[9],既给老挝当地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发展机会,也扩大了对熟练掌握中老双语人才的需求,老挝的中文教育也越来越受老挝政府和人民的重视,2016年老挝国会批准将中文(汉语)教育纳入老挝国民教育体系^[1]。

目前,老挝的中文教育已有一定的基础,已经发展为拥有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等全学段教育体制。除早期建校的5所华校外,老挝全国先后出现了很多新的汉语教学单位,如老挝国立大学就于2003年成立了中文系,并开始招收五年制汉语专业本科生;寮都公学2005年10月开办了第一期零起点的成人汉语培训班;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在2010年正式建立并招生;老挝苏州大学2011年7月成立并招生;老挝苏发努冯大学孔子学院2018年建立并招生,面向老挝北部9省提供中文(汉语)教学服务。

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老挝华校已有10多所(见表1的10所及后文陈述)。

因受建校时间、管理模式、所在省份等因素影响,表1这10所华校各有不同。如寮东公学仅设置了幼儿园和小学;百细华侨公学、崇德学校、寮都公学和寮龚华文学校4校都设置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新华学校设置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进修班;寮北学校设置了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晚间中文培训班等;中老友谊学校设置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中文预科班;程自德华文学

表1 老挝华校情况统计表

序号	华校名称	建立年份	管理模式	所在省份	分布地区
1	百细华侨学校	1929	中华理事会、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责任制	占巴色省	南部
2	崇德学校	1931	同上	沙湾拿吉省	南端
3	寮都公学	1937	同上	万象市	中部
4	他曲寮东公学	1939	同上	甘蒙省	中部
5	新华学校	1943	同上	琅勃拉邦省	北部
6	寮北学校	2006	民营校长负责制	乌多姆赛省	北部
7	中老友谊学校	2006	同上	乌多姆赛省	北部
8	寮龚华文学校	2006	同上	琅南塔省	北部
9	程自德华文学校	2012	同上	波侨省	北部
10	中华学校	2016	同上	琅勃拉邦省	北部

注:表中数据截至2021年底,引自李步军,潘玉华2022^[5])

校设置了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初中;中华学校设置了托儿班、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部分总结自陆蕴联,陆慧玲2021^[4])。

(三)老挝的华文教育特征

1. 实行老挝语和汉语并重的双语教育

华校除教授华文外,还教授中小学的英语和数、理、化等科目,通常会直接使用中国版中小学教材。同时,华校也教授老挝教育部要求的中小学全部必修课程,因此华校学生一般要学习两套课程,学习任务相对较重。但他们多数人都能凭借母语优势,在学习中并不需要花费双倍的时间和精力。但因中国中小学课程要求一般会高于老挝当地水平,这与新加坡双语(多语)教育的实效相比,老挝华校真正意义上做到了“老语—汉语”双语并重。

2. 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华语教育

老挝华校多称“公学”或“学校”(一般包括小学和中学),是一校兼容“中文—老挝文”两套教学内容的教育体制,提供了从幼儿园、小学、初中直至高中的系统学校教育,这种兼顾老挝文的教育模式为学生的进一步深造奠定了基础,有效地避免了生源流失。相较而言,马来西亚虽然也具备了从幼儿园至高中的完整华文教育体系,但因华校各自都是相对独立的,多数未能获得政府的支持,加上不同的学习阶段在办学规模上有差异,以及各阶段能直接向上晋升空间的受限,致使马来西亚华校的生源流失相当严重。

3. 华校依托华人社团实现了有效管理

老挝华人社团作为出资方能够对华校进行有效管理,这充分保证了华校的办学质量。如华侨公学、崇德学校、寮都公学、他曲华侨学校、琅勃拉邦新华学校这5所老华校全部隶属于当地的中华理事会,理事会派专人负责华校工作,如筹集办学经费、争取地方当局对华校的支持,解决师资、教材、校舍等方面困难,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等,这些办学环节当地的华人社团都能全过程参与、全方位负责。中华理事会对华校的有效管理,使得老挝华校的教学质量也超过了当地一般的公办学校,如2003年万象市的中小学统考成绩排在第一、第二名的学生都是寮都公学的学生。得益于华校的良好声誉,目前老挝政府公务员、在老挝经商或工作的外国人,争相将子女送进华校就读。

4. 浓厚的华语环境,促进了华文教育

东南亚华人多来自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省区,因分属不同方言区,有不少人不会说普通话,非常不利于华文教育的发展,早期的老挝华人也不例外。但老挝的华人社会却能较早形成共识,积极营造通行华语(普通话)环境。如1939年,百细华侨学校和崇德学校合并为华侨公学时,当地华人社会就曾约定大家都要讲能在全中国通行的汉语(即后来的普通话),这一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目前,百细的华人几乎都会讲普通话,这也为当地华文教育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助力。

5. 华语声誉良好,非华裔子弟学习热度逐渐增长

在老挝,由于华校的高效管理,办学条件也较好,教学质量普遍较高,多已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学校。不仅深受华裔子弟的欢迎,也深受其他族群家长和学生的追捧。如2011年琅勃拉邦新华学校有学生672人,只有30多人是华裔子弟;万象的法国中学也开设汉语课程,学生主要是驻当地法国人及法国侨民子女,还有少量其他国籍学生^[10]。2020年7月,琅勃拉邦新华学校共有20个教学班、学生983人,华人子弟占6%;寮都公学共有63个班、在校生3002人,华裔学生约占20%,此外还有美国、泰国、柬埔寨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学生;崇德学校2019年华籍和华裔学生占比也只有42%(总结自陆蕴联,陆慧玲2021^[4])。

(四)老挝的中文(汉语)传播方式和传播群体

1. 老挝的中文(汉语)传播方式

从主体的角度看,传播主要有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两种类型。人际传播(Interspersal Communication)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也是由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新的信息传播系统。人际传播的形式可以是两个人面对面的直接传播,也可以是以媒体为中介的间接传播。面对面的直接传播主要以语言表达信息,或辅助以表情、姿势来强化、补充、修正语言的不足,它可以使传者与受者直接沟通,及时反馈信息,并共聚一堂,促膝交流,产生亲切感,从而增强传播的效果;以媒体为中介的间接传播使用的媒体主要有电话、交互电视、计算机网络、书信等,它可以使传者与受者克服空间上的距离限制,从而提高传播的效率。

组织传播(Organization Communication)是组织成员之间、组织内部机构之间、组织与更大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具体地说,组织传播是由各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结成的网络,为应付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是为了完成组织目标而创造和交流信息的过程。组织传播是组织所从事的信息活动,包括组织内部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部门与部门、组织与其成员的传播活动,以及组织与相关的外部环境之间的交流沟通活动。组织传播既是保障组织内部正常运行的信息纽带,也是组织作为一个整体与外部环境保持互动的信息桥梁。

中文(汉语)在老挝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华裔群体内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人际传播,二是老挝多个高校所开设的中文专业或汉语课程班、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等单位之间的组织传播等。华裔群体内的人际传播,凭借面对面的、有温度的直接传播方式,有着“文化同根、语言相通、习惯相近”的优势,既具有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价值,也可收到抱团取暖的功效,是中文(汉语)在老挝传播的主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方式;组织传播既具有传播目标明确、传播范围较广等特点,还有跨文化、跨种族、跨区域的特征,两种传播方式互促互补,都对中文(汉语)在老挝的传播有着极大的助推力。

2. 老挝的中文(汉语)传播人群

中文(汉语)在老挝的传承人群,包括受众和传播主体两类人群,传承主体主要有中文教师和中文使用者,传承受众主要为中文(汉语)学习者和中文爱好者。目前在老挝学习中文(汉语)的人群,除了华裔外,主要是那些想要获得在老挝的中资企业工作机会的人、计划到中国留学的人、对中华文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学、历史、文物、美食、影视剧等)感兴趣的人,或对中国自然景观感兴趣并想到中国旅游的人,也包括希望通过中文媒介与其他国家会中文的人员进行交流的人群,当然还有一部分关注和研究中国(现象、成就、历史和相关问题等)的老挝学者,等等。

(五)老挝的中文教师培养

老挝的教育政策同中国有很多相近之处,如有关“教师的标准”,《老挝教育法》第42条的规定是:具有学士学位证书或教师专业证书(第4款);认真刻苦学习,提高自己(第5款)等。中文教育依靠中文教师,但由于历史原因,目前老挝合格的本土中文教师还相当短缺。于是,2021年7月30日老挝教育部正式批准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独立开设中文师范本科专业,该专业学生全部由其独立自主招生、培养及教学管理。

2023年4月26日,在中国驻老挝大使姜再冬、老挝教育体育部部长普·西玛拉翁、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李清先的见证下,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马箭飞主任与广西民族大学谢尚果校长、老挝国立大学乌冬·鹏坎平校长共同签署“联合培养老挝本土中文师资项目协议”,同意该专业采取“2+2”的培养模式(目前第一批学生已于2023年9月到广西民族大学留学)。双方期望通过此协议不断加强老挝本土中文教师队伍建设,加强中老高等院校间合作交流,实现两国教育合作高要求、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促进中老两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为中老友谊培育更多的接班人,共同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与发展^[11]。

三、万象市中文(汉语)教学特点

卡拉敦(2014)曾用问卷调查等方式对万象市的汉语教学单位、教师和管理人员、教材使用等进行调查并提出了一些建议^[12]。经过10年发展,老挝万象市的中文教学才有了长足发展。

(一)万象市汉语教学(培训)机构

万象市目前已有10多所学校(培训机构)开设了汉语课程,表2是2014年的老挝万象市汉语教学机构情况。

表2 万象市的汉语教学机构情况

学校名称	开设中文班年份	备注
寮都公学	1937年	华校,开展华文教育
老挝国立大学中文系	2003年	建立中文系
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2010年	中国汉办协助成立
老挝国立大学附属中学	2012年	2012-2013学年第一学期,由孔子学院引入汉语课程
万象警察高等专科学校	2004年	2004年,开设汉语专业
巴巴萨职业技术学院—云南民族大学国际汉语教育中心	2008年	老挝境内第一个专业汉语培训中心,两年制中文专业
老挝国防学院	2009年	2009年8月,设立4年制汉语专业。“2+2”培养模式
老挝共青团中央汉语培训班	2003年	2003年开始,定期举办短期的汉语培训班
万象法国中学	2006年	9月,开始汉语作为该校第二外语选修课
万象市中学	2012年	11月,初一3个班(每班40人)开设汉语课程(孔院引入)
万象市国际学校(VIS)	2004年	中小学均开设中文选修课,2004年,开设高中中文选修课
老挝苏州大学	2012年	中国在境外独资创办的首家中文大学,2012年10月,开设2个中文专业

注:表引自卡拉敦2014^[12]

除上表外,目前万象市还有中老农冰村小学,2013年10月从三年级开始开设中文课,每班每周7节课;白云碧国际学校,已开办10多年,从幼儿园到初中,每个班级都开设有中文课(占学校总课时20%);还有万荣民族中学、占沙旺中学、鹏宏中学和盼曼中学4所政府公立学校,以及老挝国家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等在孔子学院帮助下也开设了中文选修课。目前还有如恒岳国际语言培训学校等不少私人机构,也开办了汉语培训班(或学校)。除了传统华校外,万象市现有中文(汉语)教学机构中,国立大学中文系汉语教学历史最长、办学层次最高;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学习中文的学生最多、影响最大。

(二)万象市各类学校汉语教材

1. 万象市当前通行汉语教材的版本

目前万象市高校主要汉语教材是杨寄洲主编的《汉语教程》系列(北语版);同时,康玉华、来思平编著的《会话汉语301句》(北语版)也有一定的使用量;吴中伟主编的《当代中文(老语版)》(华语教学出版社)在部分学校使用;李晓琪等主编的《快乐汉语(老语版)》(人民出版社)目前主要由寮都公学等华

校使用。此外,还有中-老两国教师合编的一些简易中老语对照内部教材,如《中国文化》《简明汉语语法》《旅游汉语》《商务汉语》等。目前,符合老挝各个层次汉语教学单位情况、适合当地各类班级汉语教学需求的汉语教材仍较少,适合老挝汉语学习者实际水平的新编教材更少。

2. 万象市汉语教材的来源及数量

万象市公立学校使用的汉语教材由老挝各学校自行采购或编写的教材占比较少,其主要来源于中国汉办、与老挝有合作关系的中方大学的捐赠。华校的中文教材,主要来源于校友和爱心企业捐赠,少部分为华校自行到中国境内采购,还有一部分学校使用复印教材。总体来看,万象市汉语教学机构所配备教材的种类和数量都较有限,课堂上实际使用的汉语教材数量一直存在不足,仍有一些教学单位尚不能做到每生一本(套)汉语教材,还有学校主要使用复印教材,远不能满足不同程度汉语学习者的基本需求。

(三)万象市中文师资情况

曾佩莹(2011)统计了万象市9所汉语教学点2011年的师生情况,分析了当时的中文教师现状:优势是汉语教师都有基本的汉语专业知识,且拥有年龄优势;但短板是师生比例失衡、教师学历参差不齐、教龄偏低、性别构成失衡、普通话测试通过率低,缺乏骨干教师,教学质量有待提高^[13]。另根据卡拉敦(2014)^[12]、张宁(2017)^[14]、李小贞(2022)^[15]、李步军,潘玉华(2022)^[5]等的调查,发现10多年来万象市中文师资情况并没有太大改观,不仅在中小学,就是在开设中文专业的几所大学,汉语教师的数量都存在很大缺口;在现有教师学历方面,本科学历的占比最多,硕士学历的占比较少,博士学历占比更少,尤其是经验丰富的高水平汉语教师更为紧缺。

下文以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和寮都公学为代表,介绍万象市中文教师情况。

1. 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教师现状

截至2023年12月,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全职教师有56人,没有兼职教师,其中中国教师39人(公派6名,志愿者33名),老方教师17人(其中老挝籍华裔教师6人,都是具有中国内地留学经历的全职授课教师,另外11人内包含院长、副院长及办公室工作人员)。一般情况下,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每年都会为该校分配公派教师3到6人(服务期为两年一周期),汉语教师志愿者30名左右(服务期为三年一周期)。现阶段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在校学生有2300余人,包括学历生和非学历生两类:非学历短期汉语培训学生有2000余人,在孔子学院上课;中文本科学历师范专业学生采用“2+2”模式(前两年在孔子学院学习,后两年在广西民族大学学习,合格毕业生可拿中、老两国双毕业文凭),大一和二的学生有200人左右在孔子学院上课,大三的50多人在广西民族大学上课^①。

从教师数量角度来看,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可分配授课教师(全职和兼职)不到60人,师生比约为1:38,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教师承担的课程都很满,授课较为辛苦,不得不采取大班制进行汉语教学,这样教师就不太可能再有时间对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可见,教师紧缺仍是制约老挝中文(汉语)教学的一个大问题。

2. 寮都公学汉语教师现状

得益于长久的办学历史和中国的长期支持,寮都公学2019-2020学年重新开始小学招生,每个年级(共5个年级)招收学生人数15人以上,2019年有老挝籍教师4人、中国籍教师8人,均为师范专业毕业。^[4]寮都公学现有专职汉语教师16名,均具有较高学历水平,他们对中国和老挝的历史、风俗和文化都有较好的掌握并认同,这16名教师的教学经验较为丰富,教龄均在5年以上。但由于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当地人或者是没有在中国内地交流学习经历的人,因而他们在汉语口语方面普遍较弱,同时该校的优质教师资源均被安排在中学阶段授课,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而言,存在优质教师分配不均的问题。

(四)万象市中文学校教学设施状况

老挝各个开设中文(汉语)课程的学校和机构在教学设备和校园环境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首都万

①以上数据由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飒飒老师于2024年2月24日提供,特致谢意!

象市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环境较为优越,这些学校(机构)的教学设备和校园环境一般来说更优一个等级,但也存在优质教学设备紧缺、学生不能真正凭借这些教学设备受益等问题。

在老挝,教育资源的分配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条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除万象市外的其他地区,中文学校的教学设备和校园环境普遍较为落后。与孔子学院及其帮扶学校相比,这些学校在硬件设施上存在明显差距。许多学校缺乏必要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如计算机教室、语言实验室、电视机和外放教学播放机等,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体验。此外,快速和便捷的网络接入环境在万象市以外的其他老挝地区也不太具备。这种资源不均衡的现象,不仅限制了学生的语言学习效果,也阻碍了中文教育的普及和推广。

虽然华校等一些中文学校没有获得老挝财政的专项资金支持,但是老挝的华人企业家数量较多,资金雄厚的华人多会对部分华校的教学设备进行更新和捐赠。但由于稀缺,一般情况下学生们并不一定能自由接触和使用这些教学设备,只有老师在课程中有安排并带了这些设备,学生才有机会接触和使用。

(五)万象市汉语教学方法状况

下面以“汉语教师课堂所使用的教学方法”和“学习者(学生)对教师教学方法的教学效果评价”的调查数据,来呈现万象市汉语教学方法的使用现状。

1. 教师汉语教学方法使用情况

通过问卷,10名教师各自列举了自己汉语教学中常用的教学方法及所对应课程(综合课、口语课、听力课、阅读课和翻译课等),具体数据如表3:

表3 汉语教学方法使用情况表

	综合课	口语课	听力课	阅读课	翻译课
翻译法	5	2			2
情景法		3	3	2	
搭配法	4			1	
联想法				2	1
教具展示法	1				
夸张发音法		2			
对比听讲法		1	5		
手势模拟法		1			1
归纳-演绎法	4				
其他教学方法					

注:表中数字表示相应课程所用教学方法的频次

由表3数据来看,针对不一样的汉语课程,教师的教学方法也不同,口语和听力这类互动性比较高的课程,教师更偏好使用情景教学法和对比听讲教学法;在综合课上,翻译法、搭配法和归纳—演绎法使用的次数会更多一些;口语课使用的教学方法种类最为多元,使用频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情景法、翻译法、夸张法、对比听讲法和手势模拟法。对比发现,汉语教师多会使用常规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实践,较少使用其他或新的教学方法。

2. 学生对教学方法的反馈情况

学生对教学方法的反馈也可以作为对该教学方法或上课方式有效性的检验方式,表4是所调查的50名学生较喜欢的汉语教学方式统计数据。

表4(下页)数据显示,大部分学生对情景演示、对话练习、游戏互动等更感兴趣,这些教学方式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教学轻松有趣、课堂互动较多,更容易引起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习主动性,但在相关知识的掌握度、学习时间和学习效果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不利影响。

表 4 学生喜爱的上课方式统计表

上课方式(方法)	被选次数
教师讲授为主	24
学生练习为主	25
轻松有趣、游戏互动较多	41
利用教具、动图	32
课堂讨论	28
对话练习、情景演示	42
汉语网络课	6
多媒体教学	12
其他	0

四、万象市中文教学发展困境与建议

国际中文教育要长足发展,必须建立在世界各国对中文(汉语)学习的真实需求基础之上,必须依托于中文的交际工具和人文沟通价值,遵循语言的传播规律,唯其如此,才能实现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有效沟通和良性互动。

(一)万象市中文教学发展困境

1. 华校办学经费来源不稳定,制约其可持续发展

据调查,老挝早期华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华侨的捐助,当前华校的经费来源更加多元,主要有学生的学费、世界各地校友的捐款、理事会和董事会在春节“拜神会”期间拜年所得的红包以及本地富人给华校的日常捐款等 4 种途径。世界各地校友的捐款常常是华校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所收学费只能维持学校各种开支的四分之一,“拜神会”所得的红包和富人的日常捐款也是华校运营的重要经费来源。但华校很少有政府资金支持,由于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各学校的经费经常捉襟见肘,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华校的发展。

2. 合格师资较为缺乏,教学水平参差不齐

由于历史原因,老挝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受此影响,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此外,老挝的教师队伍整体水平也较低。为了改变这一困境,2000 年亚洲开发银行在《老挝教育部门发展计划》提出,老挝教育要“加强和扩大教师在职培训、加大教师职前培训的适切性、增加受训教师的供应、培训小学教师执教复式班、降低教师职前培训费用”5 个优先发展领域^[16]。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老挝的师资情况虽已有所好转,但目前老挝合格的中小学教师仍相当缺乏,中文师资情况也如此。老挝教育部教师培训处的统计数据显示,不少小学的师生比为 1:40,合格师资缺口很大。老挝华校本土教师大多为华校的初高中毕业生留校或是从社会招聘而来,教学水平参差不齐。前文调查也显示,万象市各级汉语教师的数量都存在很大缺口,学历整体偏低,尤其是经验丰富的高水平汉语教师更是紧缺。

3. 适用的教材较少,影响中文教学质量

前文调查显示,老挝汉语教材目前不仅数量不足,且尚未能形成体系,整体上“缺乏科学性、实用性、针对性和趣味性,种类较少,有很大的改进空间”^[17]。翟云柯(2020)曾从语言要素、文化内容和教材容量三方面分析了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使用的汉语基础教材《体验汉语》的本土化特征,认为本土化教材应反映出学习者所在国家的情况,符合当地的社会文化特点和教育制度,考虑学习者的母语特

点^[18]。李双(2021)针对老挝有汉语家庭背景的华裔儿童这一对象,考察了6种老挝通用汉语教材的特色、优势及不足,提出老挝中文教材选编既要遵循科学性、针对性、实用性和趣味性等一般性原则,也要遵循特殊性原则^[19]。我们的考察结果是:目前适合老挝各类机构以及各类班级的汉语教材在种类和数量上都特别少,新编教材更少。

目前,老挝华校使用的教材一般都会跟中国内地中小学同步,多是从云南、广西等临近区域直接购买中小学各科原版教材。但因华校就读的学生一般要同时学习中—老语两套课程,致使华校就读学生的课业负担相对繁重。中国版各科教材,因编写对象是国内学生,对老挝中小學生来说,不论是基础知识还是文化内容都明显较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会感到比较困难。因此,为了降低难度,老挝华校多采取“降阶使用”的变通做法——高中阶段使用中国初中教材、初中阶段使用中国小学高年级教材。

此外,中国出版的不少汉语二语教材多是针对欧美学习者编写的,多以英文为媒介语进行注释,内容也多以欧美学生生活为背景,不少内容并不契合老挝的社会生活,其英文注解对老挝学生来说用处较小,甚至是额外负担。

4. 教学方法较陈旧,教学活动较单一

崔希亮(2010)指出教学法是汉语教学的捷径,是语言教学快捷有效的利器^[20]。教学法虽没有优劣之分,但面对不同的教学情况需要选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张宁(2016)指出万象中小学阶段的汉语教师在教学中主要使用情境法、背诵法和提问法,建议增加听说法、全身反应法和纠错法^[14]。前文通过对10名汉语教师课堂所使用教学方法(表3)和50名学习者对教师所用教学方法的教学效果评价(表4)两个维度的调查显示,汉语教师多使用常规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较少使用其他教学方法,师生之间交流不多、教学形式较单一、活动次数较少;只有少数学生能有机会参与像汉语角、象棋比赛、国画比赛等中文使用类相关活动。此外,接受调查的学习者大多数对中国文化没有更深的了解。

(二)万象市中文教学发展建议

根据上文对万象市中文教育发展困境的分析,老挝万象市中文教学宜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策略。

1. 加大教师接纳和培训力度,推进教师本土化建设

张旺熹(2011)指出汉语国际教育的关键问题是教师、教材、教法等“三教”问题,其中教师问题是“三教”问题的核心^[21]。近年来,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各省市侨务办公室每年都会选拔一批优秀的中小学各科教师外派到老挝支教,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与合作中心每年也都会选拔一批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或孔子学院志愿者教师分派给老挝,使馆每年也会推荐老挝本土中文教师利用假期到中国进修,并选派优秀的中国中小学教师和专家赴老挝培训其本土汉语教师。老挝侨社也会聘请部分中国教师补充到各个华校,这些举措都极大地提升了老挝华校的师资和教学水平。但若想从根本上解决汉语教师紧缺的问题,老挝应通过相应的政策,采取“外引—输血”和“内培—造血”相结合的策略,逐步减少对外援教师的依赖,建设一支高水平的老挝本土汉语教师队伍。

针对前文所述万象市教师流动性较大、优秀教师资源紧缺等问题,可采取“两步走”策略。第一步是加强本土教师培养,建立标准化的汉语教师培养和培训制度,提高中文教师门槛,强化专家型中文教师作用,加大对在职(含兼职)教师和本土汉语教师进行针对性的培训力度。受培教师只有经过考核通过后才可以去各类学校教汉语,同时这些培训体系培养的汉语教师到相应学校承担汉语教学任务后,还应有一年实践验证期,只有完成和通过转正考核后,才可以真正获得汉语教师证书。第二步是扩大汉语教师的吸纳范围,本土开设汉语课程的学校应与大学或孔子学院等权威的专业汉语培训机构一起建设“本土化中文教师基地”,联合培养和吸纳本土的“中国通”作为汉语教师,对那些符合汉语教师培养标准的人员就可以纳入汉语教师培训体系中,全面布局未来中文(汉语)教师供血体系。另外,相关学校也应逐步减少对汉语教师志愿者的依赖,多给本土中文(汉语)教师实践锻炼和提升成长机会。

2. 丰富现有教材种类,编写适合老挝学生的本土化教材

由于老挝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出版业发展也较为缓慢,这在客观上也是导致老挝汉语教材不能很好实现本土化的原因之一。老挝绝大部分中文教材都依赖从中国出版并运回,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以老挝学生学习生活和习惯为基础编制的中文教材,老挝全国也尚未对汉语教材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基本上都是各个学校自行采购汉语教材,因此要解决教材问题,可采取如下措施:

首先,鼓励当地学校扩大接收汉语教材捐赠的范围,最大可能地接收到更多的汉语教材和相关资料,以满足当前师生需求,为加速教材本地化奠定前期基础。

其次,老挝的汉语教学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吸引精通老挝和中国两国语言文化的人才,鼓励他们同中国专家和教师一起参与到老挝本地化汉语教材的编写工作中去。因为使用本地化汉语教材不仅可以更大程度利用当地条件,增强教材的针对性,还可以让学生学习起来更加轻松有趣,提高学习效率。

再次,尽快编写出更多符合老挝国情和学生不同水平的多种类、多层次汉语教材。既要编写综合型汉语教材,也要编写专门用途汉语教材以及各种汉语辅助教材。目前,这一做法已有了一些实绩,如已出版了中老对照本《当代中文》(华语教学出版社)、《老挝汉语教程》(厦门大学出版社)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挝汉语教材缺乏的问题^[10]。

3. 增设更多实践类课程,奖惩结合,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

调查发现,目前相当多的老挝学生在中文(汉语)学习动机方面存在较高的功利化倾向,致使他们在后期向更高水平汉语和更加全面的中国文化的学习道路上进展缓慢。因此,中文(汉语)学校应该适当增加“汉语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鉴赏”“汉语角”等互动性和文化传播性较高的品牌汉语活动,此外还需要将学生的课余时间利用起来,积极安排和组织汉语文化分享等互动活动,鼓励学生尽可能利用每个假期到当地的中资企业进行实习和实践,以激发他们学习和使用汉语的兴趣,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学习汉语的潜在价值,打心底里欣赏和喜欢中国的语言文化,而不是单纯地因为可以去中国赚钱或找到相关的高薪工作而选择学习汉语,这种功利化的学习动机不仅会诱发教师教学缺乏全局性和学科针对性、学生学习效果差等问题,还同孔子学院和汉语国际传播的初衷相悖。

因此,中文教师应坚持“教师的一切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生的发展”的服务初衷,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客观真实地去观察和了解学生的不同需求,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为他们提供更专业、更有效的汉语学习指导,以吸引和留住更多的汉语学学习者。

4. 改进教法和评价方式,发挥“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优势

针对调查发现的“教学方法不能得到学习者接受、脱离学生实际需要”等问题,中文教师宜在教学方式和方法上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原则,结合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方法,选择学生喜爱的中文(汉语)教学方式和方法,鼓励学生主动学习、提升学习的热情和创造性,最大程度上满足学生的汉语学习需求,实现因材施教目标。与此同时,教师还应尽力创设良好的课外学习环境,满足学生其他方面的合理学习诉求,比如可多设计一些学生感兴趣的中国文化相关话题和学习路径,引导学生自主地去了解和体验中华文化,以提升汉语学习实效。

针对“考试形式过于单一,不能很好地检验学生真实汉语水平”的问题,建议中文学校和培训机构真正做到以所考科目的课程要求和学生实际水平为检测和评价的出发点,采用更加多元的考核方式,做到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可在试卷书面考试方式外适当增加一些更能够体现学生真实汉语水平的测评形式,比如可以将一部分笔试内容放到口语考试等中去,或者增加课堂考评分数的比重、让学生在课堂上的对话等口语交流以及课外汉语实践课程考核成绩也占有一定的比例等。这样不仅能全面检验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还能对学生的真实汉语表达水平进行全方位的评测。

此外,中文(汉语)教学机构还应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尽可能地配备丰富和足够的多媒体教学资源库与教学设备,营造中文(汉语)学习环境,发挥“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优势,全面展示汉语和中

华优秀文化,激发学习兴趣,扩大汉语教学及中文的影响力。李宝贵(2024)指出:“加快中文国际传播步伐。一是争取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为中文国际传播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二是加大中文师资、教材及教学设施等资源的投入,提高国际中文教育的供给能力。”^[22]可见,政策支持,教材和教学设施投入,师资本土化,课程、教法和评价方式的优化等内外因素的联动是有效提升老挝中文教育水平的发展趋势。

五、结语

孙春兰副总理曾在国际中文教育大会上指出,中国愿广泛开展与各国政府、学校、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合作,以学习者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坚持质量为先,推广国际中文教育标准,因地制宜开发教学大纲、本土化教材教辅和教学工具,创新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打造更加开放包容、更加优质可及的国际中文教育新格局,更好地满足各国人民学习中文的需要^[23]。

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开发语言资源和其他文化资源,进而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老挝因其地理位置及与中国的密切联系,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重要协同国家之一。随着老挝境内汉语学习需求的不断增加,宜进一步扩大与老挝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合作,理顺与老挝高校、华校、私立学校及中文培训机构等多种教育机构间的关系,协助老挝华校完善汉语教学体系和课程设置,改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在帮助孔子学院和其他中文(汉语)教学机构开展中文教学的同时,培养更多的老挝本土汉语教师,推进汉语水平考试(HSK),进行更广泛的文化学术交流和语言教育研究,以促进老挝中文(汉语)教育的发展。如此,老挝中文教育必能夯实基础,满足不同行业对中文(汉语)的需求,发挥语言桥梁作用,更好地服务于中老两国的合作交流,实现共建双赢。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等.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老挝(2023年版)[R/OL]. (2023-05-16)[2024-07-23]. <https://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laowo>.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老挝国家概况[R/OL]. (2024-03-27)[2024-07-23].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644/1206x0_676646/.
- [3] 邓伟. 老挝琅勃拉邦省汉语教学情况调查研究[D]. 延吉:延边大学,2020:7.
- [4] 陆蕴联,陆慧玲. 老挝中文教学发展状况及未来需求研究[J]. 亚非研究,2021(01):136-159.
- [5] 李步军,潘玉华. 老挝中文教育现状、困境及发展策略[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2(03):54-62.
- [6] 王晋军. 中国和东盟国家外语政策对比研究[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37.
- [7] 方芸. 老挝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J]. 八桂侨刊,2018(02):58-65.
- [8] 张梦. 老挝的语言政策与语言现状研究[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14):37-40+49.
- [9] 陶家骏,林齐倩,张唐凌.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老挝“汉语热”研究[J]. 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2020(02):91-99+90.
- [10] 邓海霞. 老挝中小学汉语教学现状[C]//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通讯,2011(01):21-22.
- [11] 孙广勇. 中老签署联合培养老挝本土中文师资项目协议[EB/OL]. (2023-04-27)[2024-07-2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4333098494625993&wfr=spider&for=pc>.
- [12] 卡拉敦. 老挝万象汉语教学情况调查研究[D]. 南宁:广西大学,2014:2.
- [13] 曾佩莹. 老挝万象汉语教师现状调查分析[D]. 苏州:苏州大学,2011:6-11.
- [14] 张宁. 老挝万象市中小学汉语教学现状调查与分析[D]. 沈阳:辽宁大学,2017:28-30.
- [15] 李小贞(PHOMMALY ONANONG). 老挝万象汉语补习班教学现状研究[D]. 南宁:广西大学,2022:1.
- [16] Asian Development Bank. Lao: Education Sector Development Plan[M]. Manila: Published in the Philippines by ADB, 2000: 2.
- [17] 赵娟. 老挝华校汉语教材研究[D]. 昆明:云南大学,2017:12.
- [18] 翟云柯. 《体验汉语(老挝语版)》本土化特征分析[D]. 泉州:华侨大学,2020:18-20.
- [19] 李双. 针对老挝有汉语家庭背景的华裔儿童的华文教材选编研究[D]. 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21:13-15.
- [20] 崔希亮. 汉语国际教育“三教”问题的核心与基础[J]. 世界汉语教学,2010(01):73-81.

- [21] 张旺熹. 关于国际汉语师资培养的几点思考[M]//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理论研究.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1:6.
- [22] 李宝贵. 中文国际传播“十度”谈[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5):9-18.
- [23] 孙春兰强调:扎实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N]. 光明日报,2022-12-09(04).

(责任编辑:杨威 谢松波)

The Status Quo, Characteristics and Reflection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Vientiane, Laos

YANG Xu-m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t present three type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Laos: primary and secondary Chinese education in Chinese schools, professional Chinese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Chinese training in various training institutions. The Chinese education in Laos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good reputation, complete system, effective management, strong Chinese language environment, and emphasis on both Chinese and Lao, thus presenting a situation where inter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promote each other, and the communication subjects and audiences are extensive.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t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ages i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highlights the goal of "bilingual and bicultural" education, while the professional Chinese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cuses 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various training institutions emphasize the improve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skills, certification, and enrollment goal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Laos, Chinese education in Vientiane has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education system covering kindergartens, primary schools, secondary schools, universities and adult education, with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hinese learners. However, there are on the whole still such problems as a lack of scientific teaching management, insufficient school funding, limited modern teaching equipment, a relative shortage of qualified teachers, the simple and one-sided teaching methods, the lack of a unified teaching syllabus, as well as the poor compatibility of textbooks and few local textbook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Chinese education by integrating resources, 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local Chinese teachers, compiling local teaching materials, enriching the types of teaching materials, adding practical courses, and improv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etc.

Key words: Laos; Chinese education; teachers; teaching materials resources; teaching facilities



从流量到知识:泰国网红中文教师 教学研究

何洪霞^{1,2}, 廖媛¹, [泰]Karun Chutharat¹

(1. 重庆交通大学 汉语言文化系, 重庆 400075;
2. 教育部 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贝宁研究中心, 重庆 400075)

摘要:短视频平台的诞生和发展使线上中文教育迎来全新转变。文章以Facebook和TikTok平台的6位泰国网红中文教师为调查对象,选取30条教学视频形成小型案例库,分析泰国网红中文教师在视频呈现、视频内容、视频传播效果等方面的特征,比较两个平台高赞视频异同之处,进而提出优化短视频平台中文教学的建议和策略:一是解决跨语言学习障碍,利用双语字幕及拼音标注等手段构建学习情境;二是确保视频内容丰富多样,满足学习者需求;三是优化在线教学设计,融合多种教学法并强化互动;四是理解平台规则,制定差异化的发布与推广策略,积极回应学习者反馈,营造积极的学习氛围。

关键词:短视频;网红;中文教师;国际中文教育

中图分类号:H195;G4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25)01-0085-10

泰国中文教育历史悠久,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泰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中文教育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截至目前,泰国共有17所孔子学院和11个独立孔子课堂^[1]。在泰国学习中文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100万,约占东南亚地区在校学习中文人数的60%^[1]。泰国中文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在东南亚具有显著示范作用^[2],在全球中文教育领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引领性。

近年来,短视频平台的发展催生了大量网红。随着网红群体的多元化,其所在的领域及表现形式日益丰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些具有教学能力的中文教师上传课程,提供教学服务,并获得较高的曝光率和知名度,从而形成“网红中文教师”群体。一方面,他们利用短视频平台发布具有独特风格和轻松氛围的教学视频,获得了巨大的流量。另一方面,网红效应扩大了线上中文教学的影响力,吸引了更多潜在的中文学习者,为线上中文教育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目前学界已有研究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抖音/TikTok、YouTube等单个视频平台(马贺楠、夏军,2022^[3];陈慧、李政泽、傅晓明,2022^[4]),关于多个平台的对比研究较少;二是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欧美博主或中文母语教师(江傲霜,2022^[5];胡唯哲、吴桐,2022^[6];王多,2022^[7]),关于本土中文教师的研究较少;三是相关研究内容多集中于旅游观光、城市风貌、文化传播等(王若江,2021^[8];卢羨婷,2023^[9];敖永春、周晓萍、马鑫,

基金项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十四五”科研规划省部级重点项目(全球中文学习联盟专项)“服务全球中文学习平台的区域国别中文教育政策及市场开发策略研究”(ZDH145-42);重庆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一般项目“新时期东盟孔子学院高质量发展研究”(yyk23239);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创新项目“中越合作‘线上+线下’混合式实习实践探究”(21YH020CX3)

收稿日期:2024-12-15

作者简介:何洪霞(1984—),女,辽宁义县人,文学博士,重庆交通大学旅游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中文传播、华文教育研究;廖媛(1999—),女,四川威远人,重庆交通大学旅游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师教育研究;Karun Chutharat(2002—),女,泰国廊开府人,重庆交通大学汉语言文化系学生,主要从事泰国中文教育与传播研究。

2022^[10]),关于中文教育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拟采用个案研究法和内容分析法,分析对比Facebook和TikTok平台上泰国网红中文教师的高赞视频,从视频呈现特征、视频内容分析、视频传播效果三个维度探究泰国网红中文教师教学视频制作的优点与不足,以期为国际中文教育领域视频产出和优化提供有益建议。

一、研究对象

本文通过搜索关键词确定研究对象范围,并根据浏览量、点赞量和评论量等指标锁定网红教师及其所发布的高赞视频。最终研究对象确定步骤具体如下。

(一)被试选择

本研究以“Chinese”“mandarin”和“Chinese culture”“Chinese teaching/ learning”为搜索关键词,在Facebook和TikTok上搜索泰国网红中文教师,并筛选相关视频,选择标准具体如下:一是视频浏览量;二是视频点赞量。二者综合体现视频的受欢迎程度,即为“高赞指数”^[2]。根据高赞指数,本文选取Facebook排名前三的泰国网红中文教师Poppyang laoshi、Zhang laoshi、Bubugao school;以及TikTok排名前三的泰国网红中文教师Fei Feay、Kaikai xinxin、Jia Jiao,共计6位泰国网红中文教师作为本研究被试。

(二)视频取样

首先,依据视频浏览量和点赞量,将6名网红中文教师的视频(2017年—2024年)从高到低进行排列;其次,分别抽取每位网红教师的5条高赞视频;最后,将最终获取的30条视频建成小型数据库,并将其作为内容分析样本(详见下页表1)。

二、研究发现

泰国网红中文教师在社交平台所发布的教学视频在形式、语言和时长等方面均与一般的网络教学视频具有显著差异,其教学内容多元,教学方法灵活,进而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一)泰国网红中文教师视频呈现特征分析

1. 呈现形式

一般来说,视频形式主要分为直播视频和录制视频两种类型。整体来看,6位教师的教学视频均属于录制视频。也就是说,网红中文教师更多以录制视频的形式开展线上中文教学并进行推广获客。以往研究表明,由于直播的即时性和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水平高于录播,学生对同步直播的学习体验满意度要高于录播课^[11]。本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录播视频在形式上不具备先天优势,但短视频平台的中文教学与直播线上教学存在明显不同,精心设计的录播课程更容易获得受众欢迎。马莉萍、卜尚聪(2022年)也指出同步直播与异步录播在教学效果满意度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11]。此外,研究发现,一些录播课程设计了师生互动环节,诸如Zhang Laoshi与Kaikai xinxin通过真人实时问答或视频连线的方式,构建了生动有趣的互动场景。用户评论显示这样的互动方式可以使其更好地理解知识。由此可见,录播课程中的互动设计同样能够增加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弥补录播课程的先天不足,进而受到社交媒体用户的广泛欢迎。

2. 视频语言

媒介技术革新下,语言形态具有多样性。影像语言成为网络空间信息传播的新方式,增强了信息表现力和传播效果^[12]。本文在参考其他视频语言分类的基础上,考虑到教学视频的特殊性,将视频语言按照其功能分为标题语言、字幕语言和教学语言。其中,标题语言为视频标题所使用的文字;字幕语言包括传统视频字幕、教学PPT等;教学语言指教师用以向学生传递教学信息的符号系统^[13],主要指教师授课过程中所使用的口头语言。

从标题语言来看,30个教学视频中纯泰文标题有23个,占样本视频的76.67%;中泰双语标题有7个,所占比例为23.33%;没有视频采用纯中文标题。此外,研究发现,高赞指数排名前10的视频标题语

表1 泰国网红教师视频分析样本

Facebook 高赞视频					
频道名称	发布时间	视频时长	浏览量	点赞量	高赞指数
Poppy Yang	2019/7/8	9:17	422 154	14 000	218 077
	2021/12/12	10:14	406 465	7 500	206 983
	2017/5/13	16:35	356 182	2 800	179 491
	2017/2/5	9:45	342 156	1 500	171 828
	2017/6/13	36:02	302 295	3 200	152 748
Zhanglaoshi	2019/3/19	31:25	1 447 567	36 000	741 784
	2019/4/20	18:38	735 560	4 000	369 780
	2019/11/2	9:46	702 692	9 500	356 096
	2024/1/3	17:11	520 368	3 900	262 134
	2020/8/11	15:16	506 657	7 800	257 229
BUBUGAO SCHOOL	2019/4/15	12:48	754 562	3 773	379 168
	2019/6/20	16:01	650 551	2 954	326 753
	2023/8/23	06:34	633 931	2 690	318 311
	2019/7/5	13:58	621 118	1 047	311 083
	2019/8/16	10:45	583 225	2 960	293 093
TikTok 高赞视频					
频道名称	发布时间	视频时长	浏览量	点赞量	高赞指数
Fei Feay	2023/11/20	0:26	2 440 000	188 000	1 314 000
	2023/6/1	0:06	1 459 000	226 000	842 500
	2023/3/15	0:15	726 000	55 000	390 500
	2022/5/25	0:14	361 000	72 000	216 500
	2022/5/20	0:59	366 000	54 000	210 000
Kaikai xinxin	2023/10/21	0:17	956 000	44 000	500 000
	2024/2/21	1:29	137 000	14 000	75 500
	2024/1/4	3:29	91 000	6 338	48 669
	2023/12/6	15:00	83 000	8 107	45 553
	2024/3/19	1:52	83 000	8 107	45 553
Jia Jiao	2024/5/13	0:15	272 000	16 000	144 000
	2022/10/6	0:04	83 000	6 872	44 936
	2024/6/24	0:20	74 000	4 708	39 354
	2024/1/28	0:32	43 000	4 114	23 557
	2024/2/25	0:11	15 000	6 612	10 806

言均为纯泰文。由此可见,视频创作者更倾向于使用纯泰文标题。原因如下:虽然中泰双语标题更能兼顾中文学习者,明确指向教学目标,但可能忽视大量潜在的单语学习者;纯泰文标题有利于营造本土文化氛围,并能够利用清晰易懂的母语优势获得更多泰国人的关注。在能看懂纯泰文标题意义的情况下,潜在受众或许会受好奇心的驱使点击视频,而点击量的提升能够给此类视频更多展示机会。因此,纯泰文标题可有效扩大泰国中文教学视频的受众基础和群众人数。

从字幕语言来看,仅有1个视频(占总样本的3.33%)使用传统字幕^[3],而其余29个视频(占比96.67%)则采用“画中画”或PPT形式进行展示。从字幕语种来看,中泰双语字幕占据了主导地位,有29个视频(96.67%)采用了这一形式,仅Bubugao school频道的1个视频为纯泰语字幕。值得注意的是,超过八成的视频(86.67%)在字幕中加入了拼音标注。我们认为样本视频中的字幕大多采用中泰双语并辅以拼音标注有其客观原因。有研究指出信息的创造与传递是编码的过程,而信息的接收与理解则是解码的过程^[14]。视频的制作既要顾及视频制方“编码”,也要考虑视频接受方的“解码”。一方面,从

“编码”的角度考虑,视频制作者使用中文字幕以凸显教学目的;另一方面,从“解码”的角度考虑,视频制作方使用泰语字幕以降低目标语理解门槛。同时,汉语拼音的使用也能够有效链接表音语言与表意语言,激发其他中文学习者的兴趣,从而扩大目标受众,增强传播效果。总的来说,双语字幕及拼音的综合运用能够充分利用多种信息渠道,有效链接编码者与解码者,满足目标受众的广泛需求。

从教学语言来看,30个视频中,仅有1个视频采用纯泰语教学,中泰双语教学占比高达96.67%。教师在教学和互动中使用中文和泰语,一方面体现了教师的身份认同。泰国中文教师的双语者身份认同促使其在教学选择中使用两种语言,同时也为学生营造了一个更加丰富多元的学习环境。有研究表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定位自己以及如何行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身份认同^[15]。本研究显示,泰国网红中文教师在社交平台的中文教学同样具有这一特征。另一方面,兼顾中文与泰语,既可以充分增加目的语输入强度,又可以减轻受众的语言理解压力,缩短师生心理距离。据研究,双语教学环境在多个方面都有助于减少学习者的焦虑情绪,进而降低语言习得的先决条件^[16]。在中泰双语环境中,学生通常不会因为害怕犯错或担心语言障碍而感到焦虑。相反,他们可以更加自由地尝试使用第二语言进行交流,因为即便出现错误,也有另一种语言作为备用或辅助手段。这种环境鼓励学生更加积极地参与语言学习,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和学习动力。

3. 视频时长

视频长度要求因社交媒体平台而异,根据时长,可以将视频平台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抖音(TikTok为旗下平台)、微信视频号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另一种是以B站为代表的不限视频时长的平台^[17]。近年来,短视频时长具有变长的趋势,快手、抖音和微信视频号均上调了视频时长限制^[18]。2021年,TikTok已将视频时长限制从原先的15秒扩展至3分钟,以满足创作者日益增长的内容创作需求,尽管如此,仍有许多创作者呼吁平台进一步放宽时长限制。Facebook则根据不同的视频投放频道设定了多样化的时长规则:在普通帖子中,视频时长通常控制在1分钟以内;而在“故事”频道,视频则需限制在20秒以内;剧集、网络连续剧、开发故事及直播内容,则允许视频时长超过3分钟,甚至支持最长可达240分钟的视频上传^[4]。

由表2可知,泰国网红中文教师视频时长存在平台分化现象:(1)Facebook上的3位中文老师倾向于制作时长偏长的视频,其中时长在 $5 \leq t < 10 \text{min}$ 区间内的视频共有4个,占比26.67%;时长为 $10 \leq t < 20$ 分钟的视频共计9个,占比60%;20分钟及以上的视频有2个,占比13.33%。(2)TikTok平台的3位中文教师则倾向于制作时长较短的视频,其中时长控制在1分钟以内的视频共计11个,占比73.33%;时长在 $1 \leq t < 5 \text{min}$ 以内的视频有3个,占比20%;时长达到10分钟以上的视频有1个,占比6.67%,这体现了泰国网红中文教师对于不同平台规则的熟悉与适应。

表2 泰国网红中文教师不同平台视频时长分布(个)

平台	$0 \leq t < 1 \text{min}$	$1 \leq t < 5 \text{min}$	$5 \leq t < 10 \text{min}$	$10 \leq t < 20 \text{min}$	$t \geq 20$
Facebook	0	0	4	9	2
Tik Tok	11	3	0	1	0

注:t表示时长;min表示分钟

跨平台分析可以发现,共计18个视频在10分钟以内,占比达到60%;时长介于10~20分钟的视频共计10个,占比33.33%;仅有2个视频时长超过20分钟,占比为6.67%。有研究表明视频时长与传播效果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19],也有研究指出视频时长与传播效果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系^[20-21]。本研究结果表明,时长较短的视频更受欢迎,但高赞视频中也有接近四成为长视频($\geq 10 \text{min}$)。一方面,其原因可能在于受众对于短小精悍的视频具有较少的心理抵制;另一方面,则可能由于视频内容较之时长更具传播影响力。

(二)泰国网红中文教师视频内容分析

1. 教学主题

研究发现,6位网红中文教师的教学内容可具体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知识技能类,如语音、词汇、语

法、汉字、口语等^[5];二是中文考试辅导类,如HSK或YCT考试题型、考试内容和注意事项等;三是中文学习技巧类,如教授学习中文的建议、汉字正确发音、记忆词汇的方法、汉字书写技巧,以及中文教材和中文学习工具推荐等(详见表3)。

表3 泰国网红中文教师视频教学主题分析

教学主题	具体类型	平台	数量(个)	合计(个)
知识技能	语音	Facebook	1	3
		TikTok	2	
	词汇	Facebook	2	6
		TikTok	4	
	语法	Facebook	0	3
		TikTok	3	
口语	Facebook	7	13	
	TikTok	6		
应试辅导	考试题型和注意事项的讲解等	Facebook	3	3
		TikTok	0	
学习技巧	学习中文的建议及方法等	Facebook	2	2
		TikTok	0	

由表3可见,高赞视频中语言知识技能类视频最多,总数达到25个,占比高达83.33%。进一步细分,知识技能类视频又由语音、词汇、语法和口语4个子类别构成。其中,口语类视频位居首位,共计13个,其内容集中于句子结构教学和HSK口语考试(HSKK)讲练等方面;词汇类视频紧随其后,共有6个,其内容既包括日常词汇、数字讲解,也包括HSK、YCT等考试词汇;语音和语法类视频则各有3个,占比最少。应试辅导类的视频次之,共计3个,占比12%。此类视频均来自Facebook平台的BUBUGAO SCHOOL,主要讲解HSK和YCT的考试题型、考察内容、考试方法及注意事项等。学习技巧类视频最少,共计2个,占总视频量的6.67%,全部来自Facebook平台的Poppy Yang老师,内容包括“有效学习汉语的8个技巧”和“如何记住汉字”。

我们认为语言知识这类主题在视频数据库中占主导地位,主要源于中文教师对语言能力培养的重视及视频实用性的追求。口语类视频占比最高,体现了语言的工具性和交际性的特征,而词汇作为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具有基础性作用。选择上述二者作为视频主题,能够使学习者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运用,迅速获得学习成就。HSK和YCT考试类视频数量适中,是因为此类内容满足了部分学习者的特定考试需求。学习技巧并非中文学习的核心范畴,属于语言学习的附带内容,所以此类视频数量最少。总体来看,高赞视频主题的类型及数量分布反映了教学者、学习者在内容选择上的偏好与需求,是教师与学习者互动协商的体现。

2. 教学方法

为了达到教学目标,师生会依据教学原则利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互动,这些互动活动根据认知类学习结果的获取方式,可被分为讲授法、演示法、谈话法(问答法)、讨论法、练习法、实验法和实习作业法^[22]。经过分析,本文发现6位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法涉及讲授法、演示法、谈话法和练习法,且所有教学视频中均使用了至少2种教学方法(详见下页表4)。

由表4可知,高赞中文教学视频在教学方法的应用方面没有显著的平台差异。30个教学视频中,有25个视频均采用了讲授法与演示法相结合的方式教学,且上述2种教学方式在Facebook(12个视频)与TikTok(13个视频)的使用频率大致相当。此外,有3个视频融合了讲授法、演示法及练习法3种教学方法,这些视频均由Zhanglaoshi制作。他在视频中不仅进行知识点的讲解与演示,还引导学生跟读,并给出纠错或口头表扬的互动反馈。另外,还有2个视频则涵盖了讲授法、演示法、练习法及谈

表 4 泰国网红中文教师教学方法分析

高赞指数排名:TOP5(教学方法排名表)					
排名	频道名称	发布时间	视频时长	高赞指数	讲授法、演示法
1	Fei Feay	2023/11/20	00:26	2 628 000	讲授法、演示法
2	Fei Feay	2022/5/20	00:59	1 685 000	讲授法、演示法
3	Kaikai xinxin	2023/10/21	00:17	1 000 000	讲授法、演示法
4	Fei Feay	2023/3/15	00:15	781 000	讲授法、演示法
5	Zhanglaoshi	2019/3/19	31:25	741 784	讲授法、演示法、练习法
高赞指数排名:LAST5(教学方法排名表)					
1	Kaikai xinxin	2023/12/6	15:00	45 553.5	讲授法、演示法
2	Jia Jiao	2022/10/6	00:04	44 936	讲授法、演示法
3	Jia Jiao	2024/6/24	00:20	39 354	讲授法、演示法
4	Jia Jiao	2024/1/28	00:32	23 557	讲授法、演示法
5	Jia Jiao	2024/2/25	00:11	10 806	讲授法、演示法

话法 4 种教学方法,这些视频由 KaiKai xinxin 老师制作。相较其他老师来看,该老师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采用连线的方式来问答,在知识讲解和习题练习的板块,讲授法、演示法、练习法均有体现,而连线问答主要使用问答法实施。由此可见,在教学方法运用方面,更多的差异是来自教师个体。此外,多元教学方法的使用并没有显著提高视频受欢迎程度;高赞视频 TOP5 与 LAST5 在教学方法层面也没有明显区分。

(三)泰国网红中文教师视频传播效果研究

1. 评论数量

视频评论数量是衡量其受欢迎程度和观众参与度的重要标准。一般来说,由于评论较为耗时,因此观众参与评论的次数会显著低于视频观看次数和点赞数。本研究结果同样反映出该趋势。研究显示,评论数量与高赞指数具有明显正相关关系,高赞指数越高的视频,其评论量会相对较多,观众评论意愿更强(详见表 5)。

表 5 各教学主题视频评论量

教学主题平台	语音	词汇	语法	口语	应试辅导	学习技巧	合计
Facebook	1 117	874	—	231	106	464	2 792
TikTok	205	166	296	70	—	—	737
合计	1 322	1 040	296	301	106	464	3 529

(1)评论数量存在平台差异。统计显示,Facebook 平台视频的评论数量共计 2 792 条,TikTok 平台相关视频评论数量共计 737 条,前者的数量远多于后者。

(2)评论数量存在主题差异。跨平台统计数据显示,知识技能类评论数量最多,其中语音(1 312 条)和词汇类(1 040 条)教学视频的评论量显著多于语法类(296 条)和口语类(301 条);学习技巧类(464 条)教学视频的评论数量次之;应试辅导类(106 条)最少。

(3)评论数量与平台之间存在交互影响。一方面,两个平台的评论数据呈现共性特征。共有数据显示,二者语音类教学视频评论数量均处于高位,词汇类均处于中位,而口语类视频的评论量均处于低位。另一方面,两个平台的评论数据存在互补特征。Facebook 平台缺乏高赞语法类教学视频,因此评论数据缺失,而 TikTok 平台的语法教学类(296 条)视频评论数量最多;Facebook 平台的学习技巧类教学视频评论数量居中,而 TikTok 平台的网红中文教师的高赞视频中则缺乏此种类型,更无相关评论。

我们认为原因可能如下:一是自然时间累积导致评论数量存在差距。Facebook 上的 3 位网红教师自 2017 年起开始发布视频,其中 2017 年发布了 3 条(占比 20%),2019 年则最为活跃,发布了 8 条(占比 53.33%);而 TikTok 平台上的视频发布时间相对较晚,自 2022 年起,且近 3 年内逐年递增,2022 年发布 3 条(占比 20%),2023 年发布 5 条(占比 33.33%),至 2024 年已增至 7 条(46.67%)。因此,我们推测二者

评论数量的差异或许主要源于视频发布时间的不同。以往研究也表明,早期发布的评论往往更容易获得更多的互动和持续的关注。这种现象被称为“富者愈富”效应,即初始成功会带来更多成功^[23]。二是社交平台的中文教学起步较晚导致量质齐缺。目前 Facebook(747个)及 TikTok(386个)英文教学频道超过1 133个,其中泰国英文教师多达30个,排名第一的视频播放量高达340万次(TikTok)和74万次(Facebook),教学内容涉及语音、词汇、语法、听说读写译、雅思/托福应试技巧等诸多方面。反观中文教学,高赞视频甚至在语法、应试等方面还存在空白。据此,我们认为内容创作者应继续聚焦语言技能类视频,特别是在语法、词汇及听说读写译等方面加大创作力度,持续优化已有传播内容矩阵,实现内容产出的量质齐升。此外,对于发布在不同平台的内容,应注意轻重缓急,优先填补空白缺位,形成“制作-发布-传播-再制作”的正向传播循环,实现中文教学内容的均衡发展。

2. 词频分析

本研究随机抽取1 500条评论(50条×30个视频=1500),运用微词云^[6]开展文本分析(见表6)。

表6 词频分析TOP10

排名	关键词	词性	次数	条数	TF-IDF
1	学习	动词	95	66	0.006131
2	中文	名词	51	37	0.00454
3	老师	名词	48	39	0.004166
4	谢谢	动词	47	41	0.003981
5	中国	名词	44	35	0.004019
6	可以	连词	43	33	0.004034
7	好	形容词	37	30	0.003618
8	声音	名词	36	31	0.003471
9	非常	副词	33	31	0.003182
10	喜欢	动词	24	24	0.002569851

TF-IDF(TF-IDF(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是一种常用于信息检索和自然语言处理的加权技术。TF-IDF结合了词频和逆文档频率两个指标,用于衡量一个词在文档中的重要程度。其计算公式为:TF-IDF(t,d)=TF(t,d)×IDF(t),其中TF(t,d)表示词t在文档d中的词频,IDF(t)表示词t的逆文档频率。详见网址:https://blog.csdn.net/shizheng_Li/article/details/144772394^[1]

研究表明,前五高频关键词为“学习”“中文”“老师”“谢谢”“中国”。这不仅揭示了视频内容的核心,还反映出学习者的情感态度与互动模式。一方面,“学习”“中文”与“中国”这三个关键词,作为视频内容的直接反映,明确指向了视频的教学性质及学习者的学习焦点。另一方面,“谢谢”与“声音”这两个关键词,则更多地承载了学习者对教学者的情感及学习效果的反馈。如,有评论者指出“老师的声音真好听”“谢谢老师”等。

3. 情感分析

评论的高频词汇及具体的文本内容能够反映视频传播效果。本文通过微词云对评论文本进行情感分析,进而检验视频传播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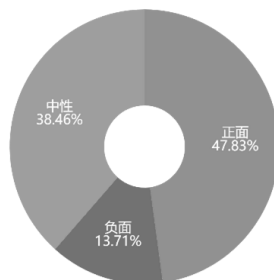


图1 评论情感分析饼图

从图 1 来看,正面评论高达 47.83%,这充分表明视频内容在受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中性评论 38.46%,表明有一部分受众对视频内容持中立态度;而负面评论则仅占 13.71%,表明抽样视频总体上受欢迎程度较高。总的来说,这些数据不仅从客观上为视频制作方提供了有力的反馈依据,还有助于其未来在内容创作与传播策略上的优化与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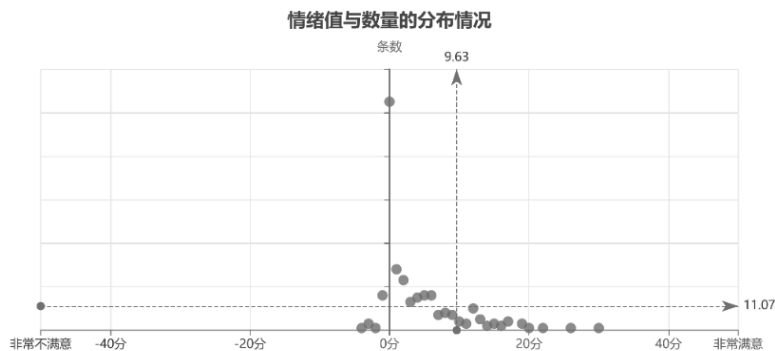


图 2 评论分析散点图

从图 2 的数据来看,图表的 X 轴代表了不同的情绪状态,从极端的“非常不满意”到积极的“非常高兴”,而 Y 轴则反映了每种情绪状态所对应的评论数量。在“非常不满意”这一情绪状态下,评论数量相对较少,这表明大部分评论者并未对视频内容产生强烈的负面反应;随着情绪状态向“不高兴”转变,评论数量有所增加,但仍然保持在较低水平,说明有少数评论者对视频内容持一定的保留意见;当情绪状态达到“一般”时,评论数量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这表明有一部分评论者对视频内容持中立态度,或者是态度倾向不明显;随着情绪状态的进一步提升,到了“有点高兴”这一区域,评论数量再次显著增加,且分布范围也更广,这反映了相当数量的评论者对视频内容持一定程度的正面评价;在“非常高兴”这一情绪状态下,评论数量达到了图中的峰值,这表明有很多评论者对视频内容非常满意,并表达了强烈的正面情绪。

质性分析发现,观众评论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对教师的感激之情,如“谢谢老师!”等;二是对教学成效的评价,如“老师教得很好!”等;三是对教学风格与教师魅力的直接赞扬,如“很喜欢老师!”“我爱老师!”等。另外,评论有大量非言语沟通的表情符号,如心形图案、大拇指点赞、鼓掌图标等。此类表达方式不仅强化了评论的情感色彩与信息传递效果,而且为我们深入理解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互动与社群文化提供了新视角。

三、结语

本文通过对泰国六位网红中文教师 30 个高赞教学视频的观察和分析,从视频呈现特征、视频内容分析、视频传播效果三个方面分析了高赞视频的表现特征,并比较了 Facebook 和 TikTok 平台高赞中文教学视频的共性与差异。研究发现:泰国网红中文教师偏好以录制视频的形式开展线上中文教学;高赞视频以 10 分钟以内居多;视频主题涉及知识技能、应试辅导和学习技巧,其中以知识技能类为主;用户评论积极正面居多,语音词汇类视频评论量最高,传播效果最好。平台比较发现,视频形式和教学方法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教学时长和教学主题方面,二者存在一些差异。Facebook 平台高赞视频以长视频为主,TikTok 平台则以短视频为主;Facebook 平台语法视频较为短缺,而 TikTok 平台则缺乏应试辅导和学习技巧类视频。

鉴于此,我们认为针对泰国中文教学的社交媒体内容创作可在以下方面加以考虑。首先,视频呈现需重视运用学习者母语、双语字幕、拼音标注等辅助工具,创设情境搭建“脚手架”(scaffolding),助力学习者跨越心理障碍,顺利进入中文学习“第一课”;其次,视频内容需兼具范围的广泛性与内容的丰富性,既要涵盖语音、词汇、语法等基础要素,也要融入考试辅导与学习技巧,以满足学习者的多元化需

求;再次,创新在线教学设计,巧妙融合讲授法、演示法、练习法、谈话法等多种教学手段,增加虚拟空间的互动性;第四,针对不同平台特性与用户群体,制定差异化的视频发布与推广策略,充分利用平台推广机制以拓宽视频受众基数。此外,视频发布者应积极回应学习者评论与反馈,及时解决学习疑问,营造积极向上的社区学习氛围。

社交媒体视频分享作为线上中文教学的新兴载体,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应用价值。未来的研究可考虑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数据分析,评估短视频在不同区域国别及文化背景下的应用效果,优化国际中文教育的媒体组合策略,构建立体多元的传播矩阵,从而促进国际中文教育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LI C, RAMAN A, JIN X. Systematic Review Of Chinese Language Motivation, Course Engagement And Chines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mong Students In Confucius Institute In Thailand[J/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2024(09):131-143.
- [2] 吴应辉,王睿昕. 东南亚高校中文及相关专业发展状况比较[J]. 华文教学与研究, 2021(02):52-60.
- [3] 马贺楠,夏军.“抖音”文化传播特点对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的启示[J]. 汉字文化, 2022(23):89-91.
- [4] 陈慧,李政泽,傅晓明. YouTube 中文学习资源大数据分析[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06):93-104.
- [5] 江傲霜. 美国新任中小学中文教师的六大教学挑战及应对策略[J]. 民族教育研究, 2022(03):161-168.
- [6] 胡唯哲,吴桐. 英国本土中文教师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22(06):69-79.
- [7] 王多.“互联网+”背景下国际中文教师线上教学能力的发展——评《多媒体和语料库驱动的汉语教学研究》[J]. 中国教育学刊, 2022(06):142.
- [8] 王若江. 基于区域发展特点的国际传播策略创新——以浙江的实践探索为例[J]. 传媒, 2021(16):81-83.
- [9] 卢美婷. 旅游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研究——以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为例[J]. 社会科学家, 2023(09):51-56.
- [10] 敖永春,周晓萍,马鑫. 基于TikTok平台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创新路径[J]. 传媒, 2022(22):72-75.
- [11] 马莉萍,卜尚聪. 同步直播与异步录播孰优孰劣——基于师生问卷调查与行政数据的实证研究[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22(03):2-24+187.
- [12] 马凛,连健伟. 中华和合文化短视频国际传播效果及优化策略——滇西小哥用户评论分析[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05):113-126.
- [13] 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183-184.
- [14] HALL S.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M]. Birmingham: Birmingham University, 1973:2-19.
- [15] 李孔珍,刘超洋. 新时代教育集团跨学校教师团队组织分析[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6):164-171.
- [16] al Saidi F A. On the Scope, Claims and Implications of Krashen's Theo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Social Science, 2024(01):2503-2507.
- [17] 魏畅. 公共图书馆B站号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上海图书馆”B站号为例[J].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2024(07):39-45.
- [18] 王鹤翔. 作为具身体验的短视频:本体内涵、时代征候与精神建构[J]. 理论月刊, 2024(02):154-160.
- [19] 李乾丙,王相飞,周榕.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效果提升的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基于YouTube热门视频的实证分析[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4(05):35-42.
- [20] 陈刚,刘灿威. 中华文化短视频国际传播效果的组态效应研究——基于YouTube平台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4(07):50-58.
- [21] 陈维超,周杨玲. 我国科普期刊抖音短视频传播效果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中国优秀科普期刊为例[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3(12):1616-1622.
- [22] 崔永华. 对外汉语教学设计导论[M].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8:120-121.
- [23] Kulchetscki, Luiza. “Performance distribution of TikTok contentpreneurs: A conceptual replication study”[D]. Skane County: Lund University, 2024:24.

(责任编辑:杨威 谢松波)

From Data Flow to Knowledge: On the Teaching of Influential Internet Chinese Teachers in Thailand

HE Hong-xia^{1,2}, LIAO Yuan¹, Chutharat Karun¹

(1.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5, China;

2. Benin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and Regional Research Center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400075, China)

Abstract: The advent and development of short video platforms has ushered in a new change in online Chinese education. Taking as its survey object six internet influential Chinese teachers on Facebook and TikTok in Thailand, this paper selects 30 teaching videos to form a case library, and analyzes the traits of internet influential Thai Chinese teachers in terms of the video presentation, video contents, and video communication effect. By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highly regarded videos on the two platforms, the paper proposes suggestions and strategies for optimizing Chinese teaching on short video platforms as follows: addressing cross-language learning barriers through the use of bilingual subtitles and pinyin annotations; ensuring the richness and diversity of the video content to meet learners' various needs; optimizing online teaching designs as well as integrating multiple teaching methods and enhancing interaction; understanding platform rules to develop differentiated release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as well as actively responding to learner feedback to foster a positive learning atmosphere.

Key words: short videos; influencers;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广东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区域比较视角

李迎旭

(韩山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摘要: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发展是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通过构建城市产业-人口-空间发展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函数,分析2002—2021年广东各区域综合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序特征和空间特征。从时序上看,广东产业、人口和空间三大系统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波动中上升态势;从空间上看,呈现出以珠三角为核心,沿“一带一区”延伸的非均衡发展格局,且存在人口与空间耦合协调度相对滞后的特征。因此需要从产业引领、人口支撑、空间承载的系统化思维出发,进一步推进广东三大系统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广东省;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25)01-0095-10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较大程度地影响了广东省全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广东一直努力推动珠三角地区产业向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有序转移和延伸,以推进全省产业布局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2018年,广东提出以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为重点、全面实施以功能区为引领的区域发展新战略,形成由珠三角核心区、沿海经济带、北部生态发展区构成的新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然而资源浪费^[1]、人地矛盾^[2]、环境污染^[3]、城乡二元结构^[4]等问题,较大程度地影响了广东区域的整体协调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效率、人口资源和城市空间资源利用效率的不同,会导致区域之间、区域内城市之间产业、人口和空间发展出现失衡,成为阻碍资源配置效率提升^[5]、区域协调发展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市域经济发展差异要求必须走统筹全局协调发展之路^[6]。在“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差异化功能定位背景下,深入分析广东各城市在产业-人口-空间要素协调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设计和优化区域产业空间布局,提升城市群发展的整体协调性,寻求经济新增长点 and 激发新动力,这对引领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产业、人口、空间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除单一要素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之外,部分学者还针对人口、产业、空间乃至生态环境等的耦合协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展开研究。区域产业布局不合理、人口资源与产业发展不匹配,以及空间系统发展不均衡,将导致城市发展效率低下。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教育供给与人口生育良性互动机制研究”(21YJC840017);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共建项目“广东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研究”(GD23XYJ60);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共建项目“基于机器学习的粤东西北碳排放影响因素与情景预测研究”(GD23XGL091)

收稿日期:2024-03-31

作者简介:李迎旭(1982—),女,黑龙江伊春人,经济学博士,韩山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研究。

如京津冀城市群人口与空间的耦合协调度仍然较低,成为制约城市群耦合协调发展的禁锢^[7]。赵川(2019年)研究发现,由于成渝地区产业结构转型过慢,导致大部分城市表现出产业与空间协调度滞后的特征^[8]。产业、人口、空间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任一系统的滞后都会导致系统失衡,并最终影响区域经济发展^[9]。总体上,已有文献多以单个城市或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三个系统对城市经济或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有许多学者运用了熵权法^[10]、空间自相关^[11]等方法,探究了区域经济发展中土地、资源、环境和生态等相关因素的耦合协调关系。也有涉及广东产业结构^[12]、区域科技创新^[13]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研究,但鲜有从区域比较视角针对广东省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发展进行研究。因此,当前广东省产业、人口、空间系统间协调程度的测度、桎梏广东区域协调发展因素的探索以及有效解决发展失衡的办法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鉴于此,本文将广东省划分为珠三角、粤东、粤西和粤北四个区域^①,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广东四个区域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发展基本特征和时空差异展开研究,探讨其差异原因,为促进广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二、研究方法数据来源

文章参考陈刚、刘景林等建立的产业-人口-空间的指标体系,利用2003—2022年《广东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对城市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建构耦合协调度模型,用以分析广东省产业-人口-空间的协调水平。

(一)指标体系

本文参考陈刚、刘景林等学者建立的产业、人口和空间的指标体系^[14],选择地区生产总值、工业企业总产值、第二、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和对外贸易依存度作为衡量产业系统的指标,将常住人口数量、人口密度、非农人口比重、人口城镇化率和失业率作为衡量人口系统的指标,将建成区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道路面积和污水处理率作为衡量空间系统的发展指标。除失业率为负向指标外,其余指标均为正向指标(见表1)。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003—2022年的《广东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通过各市统计年鉴进行填补。

(三)数据处理

1. 初始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系统初始矩阵为 $X = [x_{ij}]_{mn}$, $i=1, 2, \dots, n; j=1, 2, \dots, m$, 其中 m 表示指标个数, n 为样本城市数量, x_{ij} 为第 i 个城市的第 j 个指标值。为消除指标体系中各单位、量纲、属性等方面的差异,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处理。

正向指标无量纲处理公式为: $y_{ij} = \frac{x_{ij} - x_{j\min}}{x_{j\max} - x_{j\min}}$ 。

负向指标无量纲处理公式为: $y_{ij} = \frac{x_{i\max} - x_{ij}}{x_{j\max} - x_{j\min}}$ 。

计算权重时为满足对数取值要求,对指标进行平移处理,即: $z_{ij} = y_{ij} + 0.5$, 得到标准化矩阵 $Z = [z_{ij}]_{mn}$ 。

2.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采用熵值法来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根据该方法,每个系统第 j 个指标对应的熵值为 e_j : $e_j =$

①珠三角城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惠州、中山、肇庆、江门;粤东城市包括汕头、揭阳、潮州、汕尾;粤西城市包括湛江、茂名、阳江;粤北城市包括梅州、韶关、河源、清远、云浮。

$$-k \sum_{i=1}^n (p_{ij} \times \ln p_{ij})。$$

其中, $k = \frac{1}{\ln m}$, $i=1, 2, \dots, n; j=1, 2, \dots, m, P_{ij} = \frac{Z_{ij}}{\sum_{i=1}^n Z_{ij}}$ 。指标 j 的权重 W_j 为: $W_j = \frac{1 - e_j}{\sum_{j=1}^m e_j}$ 。各指标权重

测算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城市产业—人口—空间的指标体系

系统	指标(单位)	性质	权重
产业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	0.296
	工业企业总产值(亿元)	+	0.205
	二产占GDP比重(%)	+	0.127
	三产占GDP比重(%)	+	0.167
	对外贸易依存度(%)	+	0.206
人口	常住人口(万人)	+	0.246
	非农人口比重(%)	+	0.118
	人口城镇化率(%)	+	0.236
	人口密度(人/km ²)	+	0.253
	城镇登记失业率(%)	-	0.147
空间	建成区面积(km ²)	+	0.323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127
	人均道路铺装面积(m ²)	+	0.247
	污水处理率(%)	+	0.303

(四)城市发展水平的测算

根据各指标的标准化值和权重,计城市 i 在 t 时期的发展水平为 U_{it} , 表达式为: $U_{it} = \sum_{j=1}^m W_j Z_{ijt}$ 。其中, m 表示产业、人口或空间系统中包含评价指标的数量,根据指标所属系统,可分别计算出城市产业发展水平、人口发展水平和空间发展水平。全省综合发展水平等于各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算术平均值。

(五)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利用耦合度函数计算耦合度,可分析广东产业、人口、空间系统间的协同作用程度,耦合度函数为:

$$c_t = \left[\frac{f(U_{1t}) \times f(U_{2t}) \times f(U_{3t})}{\prod (f(U_{it}) + f(U_{jt}))} \right]^{\frac{1}{3}}$$

其中 $i=1, 2, 3; j=1, 2, 3; i \neq j$ 。 C_t 表示耦合度,取值在 0-1 之间,值越接近 1,耦合作用越紧密,说明产业、人口和空间系统相互影响程度越高;反之越低。

令 T_t 为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公式为: $T_t = \alpha f(U_{1t}) \times \beta f(U_{2t}) \times \gamma f(U_{3t})$ 。

令 $\alpha=\beta=\gamma=1/3$,表示产业、人口、空间系统发展对城市综合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则耦合协调度模型为: $R_t = (C_t \times T_t)^{\frac{1}{3}}$ 。

其中 R_t 表示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体现了系统发展协调水平的高低,值越大则系统耦合协调度越强;反之亦然。根据耦合协调度大小将广东发展阶段的判断标准定义为:当 $R_t \in [0.6, 0.7)$ 时,为初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当 $R_t \in [0.7, 0.8)$ 时,为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当 $R_t \in [0.8, 0.9)$ 时,为良好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当 $R_t \in [0.9, 1]$ 时,为优质耦合协调发展阶段。

三、实证分析

本文将从广东省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的时序特征和广东省区域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

的空间差异两个维度对 2002 年至 2021 年广东省各区域的综合发展水平和协调水平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准确而详细地进一步分析出广东省各区域的耦合协调度。

(一)广东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的时序特征分析

1. 广东综合发展水平时序特征

2002 年到 2021 年的二十年间,广东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波动中上升态势,在 0.664—0.820 的范围内上下浮动(见图 1)。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03—2008 年,总体表现为综合发展水平小幅波动中上升状态,仅 2005 年出现微弱下降;第二阶段是 2009—2018 年,综合发展水平短暂下降后稳步上升;第三阶段是 2019—2021 年,综合发展水平下降后又迅速回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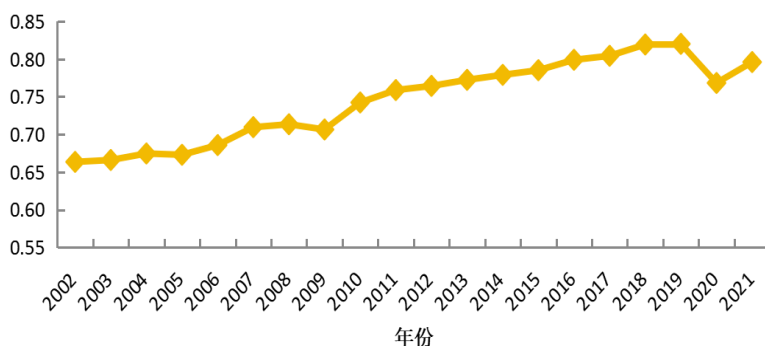


图 1 广东省城市综合发展水平

2001 年我国加入 WTO,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最早、经济外向度最高的省份,在入世后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业、人口和城市空间建设均取得明显成效。2009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市场周期性波动引发广东产业转型发展,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双转移”战略的实施,使得部分企业从珠三角向外省和粤东、粤西、粤北转移,最终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科学化,并带动了人口和空间发展。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广东经济尤其因外部环境和国外市场需求羸弱而受到冲击,企业经营遭遇困境,就业和人口流入受到影响,发展动力弱化。2021 年至今,广东积极落实国家政策,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产业和各城市建设持续恢复发展,综合发展水平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反弹上升。

2. 广东三大系统发展水平时序特征

广东三大系统发展水平在三个不同阶段显示出互动发展的特征(见图 2)。首先,2002—2010 年间,空间发展为主要拉动力,产业发展迅速上升,人口发展稳定上升;产业发展水平低于空间发展水平,高于人口发展水平。2008 年金融危机前,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城市群以发展“三来一补”出口加工经济为主,制造业取得巨大发展,是我国出口经济形成的主要贡献区域。在此期间,在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推动下,珠三角中心城市聚集资源的能力加强。广州依托省会城市的行政优势、深圳依托特区城市的政策优势大幅提升各自的城市地位,逐步成为区域内的两个强核心,空间水平高位发展,拉动全省城市空间水平稳步提升。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投资刺激地方经济增长,使空间系统进一步发展;产业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出现三个战略性转变:从出口导向到重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从低端加工业到高新技术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从繁荣珠三角经济到发展全广东经济,导致产业在 2011 年超越空间发展水平,并带动人口发展水平的提升。2011—2019 年,产业发展跃升为主要拉动力,超越空间和人口发展水平,持续稳步提高。2020—2021 年间,产业、空间和人口发展水平均出现下降后上升的情况,空间发展再次超越产业发展水平。新冠疫情暴发后,广东充分发挥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在公共卫生设施、老旧小区改造、物资储备、环保设施、农业农村等领域积极开展城市空间建设。产业受到短期冲击导致失业率提升,人口发展水平也受到影响。2021 年至今,广东 20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增加值占 GDP 比重发展至四成,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为广东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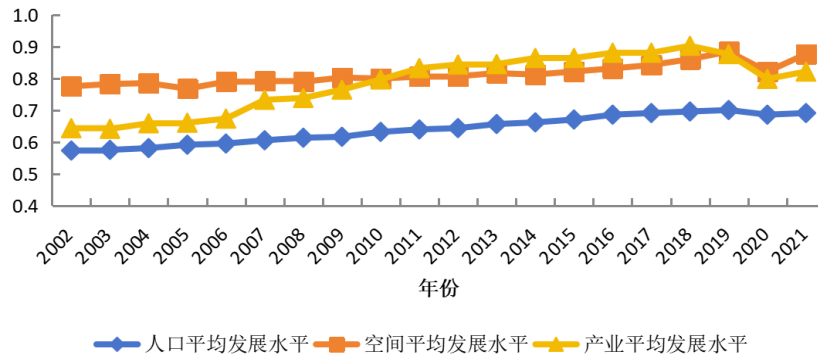


图2 广东产业、人口、空间发展水平

3. 广东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度时序特征分析

2002-2021年广东整体产业、人口与空间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基本实现了由初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向良好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转变,但仍未达到优质耦合协调发展阶段。2020年该指标出现了振荡,并在2021年再度提高,但仍未达到2019年水平(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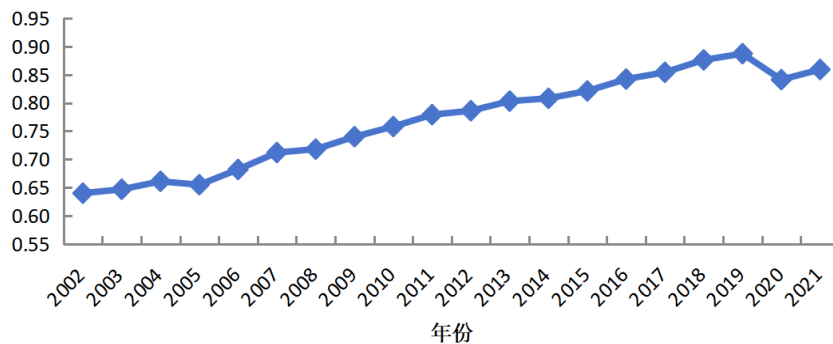


图3 广东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度

从两两耦合协调度来看,第一阶段2002-2007年数据显示,珠三角三大系统的两两耦合协调度几乎是同步波动中增长(见图4)。我国入世后,广东通过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多层次、宽领域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产业发展与对外经贸发展呈现出速度质量同步提升的效应,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空间和人口的协调性稳定性不断增强。

第二阶段2008—2019年数据显示,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度最低,产业空间耦合协调度次之,人口产业耦合协调度最高,人口与空间发展不协调是限制该阶段三大系统耦合协调程度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广东克服金融危机冲击,大力支持企业开辟新兴市场,推进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提升招商引资质量和水平,并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以产业发展为动力,继续发挥人口红利优势,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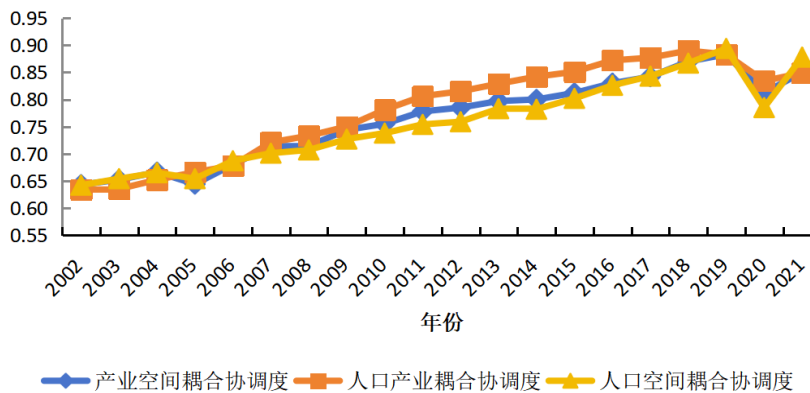


图4 广东产业-人口-空间系统耦合协调度

2020—2021 年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均出现波动,其中人口与空间降幅最大,产业与空间次之,人口与产业最小。人口与产业的耦合协调是稳定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素,人口与空间、产业与空间发展不协调是制约三系统整体耦合协调度提高的主要原因。2020 年疫情导致制造业外需订单减少,人员流动受阻,复工推迟,订单交付延误和供应链部分“断链”。在此背景下,政府资金投入积极展开城市建设,但空间与产业、人口与空间耦合协调度仍出现降低。疫情导致了用工中断和劳动力回流,疫情调控措施优化以后,广东企业积极变革生产方式,主动利用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速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机器替代劳动力的脚步,以降低人工成本并减少对人工的依赖,缓解了人口与空间、人口与产业的不协调程度,三个系统指标反弹上升。

(二)广东区域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发展的空间差异分析

1. 广东各区域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分析

经过 20 年发展,广东各区域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提升,2021 年水平均明显高于 2002 年(见图 5)。从区域空间看,呈现出以珠三角为中心的空间特征,珠三角综合发展水平明显高于粤东、粤西和粤北三个区域,粤东相对粤西和粤北略高。从发展速度看,珠三角综合发展水平提升速度最快,粤北次之,粤东和粤西发展较缓。可见,广东城市群在产业、人口、空间协调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失衡性,主要是珠三角和粤东、粤西、粤北区域综合发展水平差异化的扩大(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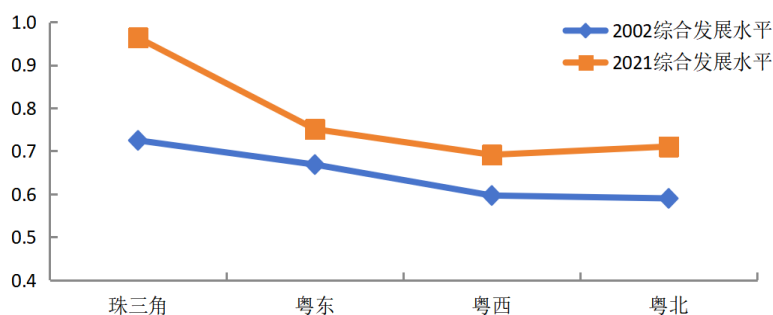


图 5 广东区域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

2. 广东各区域三大系统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分析

从广东各区域的产业、人口、空间三大系统来观察其空间特征。广东是全中国发展最不平衡的省份之一,且区域失衡情况长期存在。产业方面,在经济总量、工业企业总产值、二三产业占比和外贸依存度等方面,珠三角发展水平和速度都远高于粤东、粤西和粤北。2021 年珠三角产业发展水平高达 0.982,而其他三个区域均不超过 0.850(见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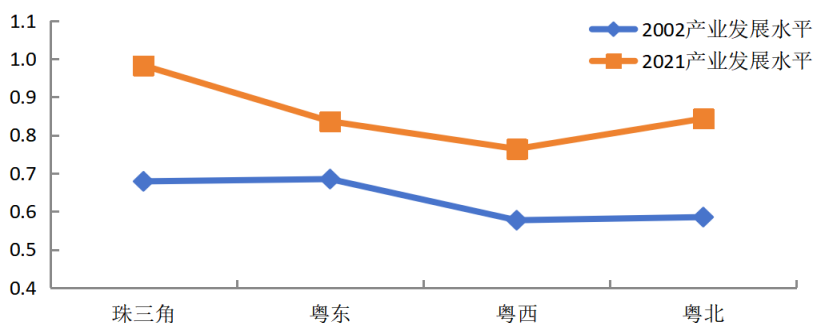


图 6 广东各区域产业发展水平

近年来,珠三角着力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同时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产业升级支撑能力。特别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不断强化广州和深圳的“双核联动”,深化珠三角城市战略合作,推进产业、科技、金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一体化发展,珠三角核心区优势进一步增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也成为

广东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让粤东、粤西和粤北城市在机制创新、项目落地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获得发展机遇,资源集聚带动了发展,形成一定的比较优势,助力广东整体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

人口方面,数据显示,20年间广东各区域人口发展水平整体提升(见图7)。经济发展导致人口大量流入,在2021年约8万人流入珠三角城市,人口发展水平从2022年的0.614提高到0.886。由于广东以民营经济、出口制造业为主,2022年因疫情防控影响大幅受挫,导致外省务工人员回粤受阻,随着疫情防控全面放开和经济回升,人口流出现象大幅扭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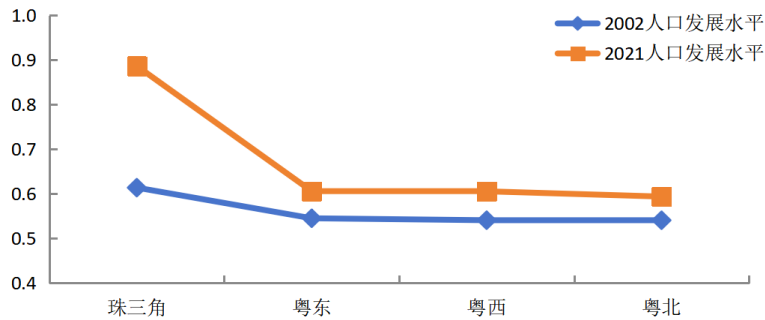


图7 广东各区域人口发展水平

产业和人口发展导致人们对城市建设、房地产产生较大需求,各区域空间发展水平均得到提升。其中,珠三角提升幅度最大,粤北次之,粤东最小(见图8)。数据显示,珠三角城市建成区面积、人均道路铺装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等指标均远高于其他区域。粤北近年来加速城市建设和改善城市功能,加强城市计划和土地利用治理,重点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交通、水电、通信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同时加强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城市空间建设较快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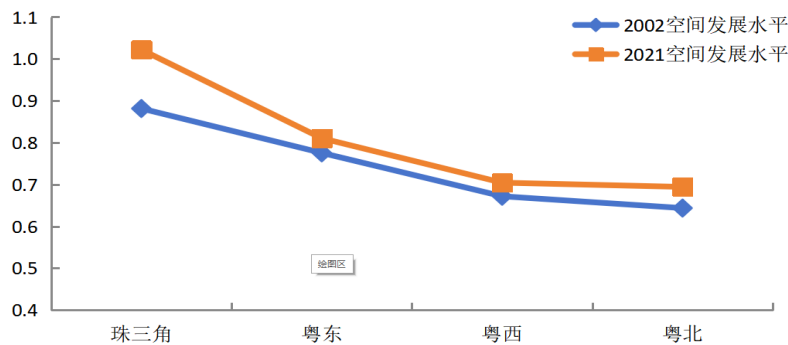


图8 广东各区域空间发展水平

3. 广东各区域产业-人口-空间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分析

通过对比2002年和2021年广东各城市产业-人口-空间的耦合协调度,可发现粤东、粤西和粤北各城市处于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阶段,珠三角大部分城市处于良好协调阶段(见表2)。2002年,广州、深圳、东莞、中山、佛山、珠海、汕头的耦合协调度最高,为良好水平;茂名、清远、云浮、韶关处于初级协调水平;其余城市则处于中级协调水平。其中,清远、云浮、韶关从2002年的初级协调水平发展至2021年的中级协调水平;惠州从中级协调水平向良好协调水平发展;汕头则从良好协调水平降至中级协调水平。总体上看,广东三系统耦合协调度良性发展,珠三角大城市仍然是城市群的核心,并且逐渐形成粤东、粤西和粤北努力追赶发展的格局。

表3进一步显示了2002年以来广东各城市三大系统两两间耦合协调度发展情况。广东各区域城市协调发展模式变化呈现以下变化:从产业与人口系统看,总体上由初级耦合向中级、良好耦合协调发展。2002年,尚有汕尾、阳江、茂名、湛江、云浮、清远、韶关、河源8个城市处于初级耦合阶段,至2021年全部发展为中级耦合阶段。广州、深圳、东莞、中山、佛山、惠州六个珠三角城市始终处于良好协调阶段,汕头则从良好耦合协调变为中级耦合协调。从产业与空间系统看,2002年,粤东、粤西和粤北城市

表 2 广东城市耦合协调度分布

耦合协调度	2002	2021
初级协调 $R < 0.7$	茂名、清远、云浮、韶关	茂名
中级协调 $0.7 \leq R < 0.8$	惠州、江门、肇庆、阳江、湛江、揭阳、汕尾、潮州、河源、梅州	江门、肇庆、阳江、湛江、粤东四市、粤北五市
良好协调 $0.8 \leq R < 0.9$	广州、深圳、东莞、中山、佛山、珠海、汕头	广州、深圳、东莞、中山、佛山、珠海、惠州

全部处于初级和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除惠州和江门处于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以外,其余珠三角城市均处于良好耦合发展阶段。到 2021 年,尽管茂名、云浮、清远、韶关四市从初级向中级耦合协调发展,但以珠三角高水平耦合、其余区域城市低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的失衡性仍明显存在。从人口与空间系统看,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稳步提升。2002 年,珠三角人口与空间在初级、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城市数量为 12 个,良好 9 个,整体看处于中级偏下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到 2021 年,茂名、云浮、清远全部从初级向中级耦合协调发展,惠州从中级向良好耦合协调发展,汕头、揭阳和汕尾则从良好降为中级,呈现其他区域级耦合协调度向好发展,而粤东耦合协调度下降的空间特征。

总体上,2002 年以来广东产业与空间、人口与空间系统耦合协调度时序上在提高,但低于人口与产业耦合协调度,且三者之间动态协同关系仍需加强。各系统发展的区域非均衡性明显,需要在各区域促进三大系统协调度供给匹配,加强全省产业结构的区域协调,以保障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表 3 广东城市协调发展模式

耦合度	年份	产业与人口协调度	产业与空间协调度	人口与空间协调度
初级协调 $R < 0.7$	2002	汕尾、阳江、茂名、湛江、云浮、清远、韶关、河源	茂名、云浮、清远、韶关	茂名、云浮、清远
	2021	-	-	-
中级协调 $0.7 \leq R < 0.8$	2002	肇庆、江门、揭阳、潮州、梅州	惠州、江门、汕头、揭阳、汕尾、潮州、阳江、湛江、河源、梅州	惠州、江门、肇庆、潮州、阳江、湛江、河源、梅州、韶关
	2021	江门、肇庆、粤东四市、粤西三市、粤北五市	江门、肇庆、粤东四市、粤西三市、粤北五市	江门、肇庆、粤东四市、粤西三市、粤北五市
良好协调 $0.8 \leq R < 0.9$	2002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惠州、汕头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肇庆	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东莞、中山、揭阳、汕尾
	2021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惠州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惠州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惠州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构建城市产业-人口-空间发展的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函数,实证分析广东省 2002 年至 2021 年各区域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发展特征,得出广东省的综合发展水平总体上波动上升、广东省耦合协调度发展处于良好以下等级的结论,并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一) 结论

从时序上看,广东综合发展水平总体上波动上升,呈现良性向好发展趋势。全省耦合协调发展各年度的等级主要集中在良好协调以下,尚未达到优质协调。人口与空间系统耦合协调度仍然较低,成为制约区域耦合协调发展的限制因素。从空间上看,至 2021 年良好耦合协调城市均为珠三角城市,粤东、粤西和粤北城市群处于中级耦合协调以下。从三大系统间耦合状态上看,呈现珠三角高于粤东、粤西和粤北的状态,这主要由于粤东、粤西和粤北各系统间相互作用同频共振度不够,因此形成了以珠三角为核心,沿“一带一区”三向延伸发展的格局。同时,近年人口与空间发展的不协调和不同步也限制了广东经济整体发展与协调。

(二)建议

根据广东产业、人口和空间的耦合协调度区域不均衡问题,可以对不同区域采取针对性的发展政策。首先,加强产业与人口耦合协调发展。珠三角城市群可发挥其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交通和经济优势,通过产业转移、对口扶持等方式,辐射带动粤东、粤西和粤北城市发展。粤东、粤西和粤北城市可以通过优化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硬件条件,同时配套营商环境优化等软环境建设,提升产业总体发展水平。同时,粤东、粤西和粤北城市还需要开展人才培养、人才储备、智力储备和知识储备,以支持当地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产业与人口的进一步协调。其次,加强人口与空间耦合协调。珠三角继续发挥先进制造业、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优势,发展高素质就业人口和人力资源。同时,在积极开展空间建设的同时,重视人口生育率下降、老年社会造成劳动力供应总量下降的情况,重视高房价、高物价导致的产业工人“回流”中西部地区现象,促进人口与空间耦合协调度的提升。粤东、粤西和粤北城市可加快提升城镇化水平和人口经济聚集度,优化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城市承载能力,提高品质空间环境,促进产业升级、就业增长和科技创新水平提升。最后,加强产业与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珠三角城市建设过程中需避免造成绿地建设面积减少等问题,应进一步提升数字产业、绿色产业的发展水平,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促进各类创新要素的加速集聚,构建全产业链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的高端制造体系。粤东、粤西和粤北城市应积极和深度利用《关于推动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若干措施》建立的“1+N”产业转移政策体系,积极推动产业转移承接,优化“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提升全省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水平和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能力,实现全域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柯小玲, 闵园园, 郭海湘, 等.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生态环境的时空耦合分析: 以湖北省为例[J].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21(10): 213-222.
- [2] 周棱楠, 潘安, 罗芳, 等. 川东北地区“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耦合协调性研究[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01): 79-86.
- [3] 田俊峰, 王彬燕, 王士君. 东北三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及耦合协调关系研究[J]. 地理科学, 2019(02): 305-315.
- [4] 纪志佳, 张军, 汪健平, 等. 乡村人口-土地-产业-财力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格局与机制研究——以重庆三峡库区典型县域为例[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3(40): 1-11.
- [5] 陆远权, 张源. 汉江生态经济带交通状况-区域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2(11): 2404-2415.
- [6] 宋国崇. 市域经济发展差异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分析——以安徽为例[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4): 102-108.
- [7] 刘洁, 姜丰, 粟志慧. 京津冀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1(S1): 171-178.
- [8] 赵川. 城市群的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成渝城市群为例[J]. 经济体制改革, 2019(05): 51-59.
- [9] 朱江丽, 李子联. 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 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2015(02): 75-82.
- [10] 宫一路, 李雪铭, 刘贺, 等. 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耦合协调关系研究[J]. 生态经济, 2022(01): 193-201.
- [11] 张晨, 曾坚, 王倩雯.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空气环境耦合协调的定量测度与空间特征[J]. 现代城研究, 2022(03): 64-71.
- [12] 陈秀枝. 耦合协调视角下广东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研究[J]. 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2023(02): 98-104.
- [13] 肖田, 野罗, 广宁, 等. 区域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以广东为例[J]. 科技管理研究, 2017(15): 21-28.
- [14] 陈刚, 刘景林, 尹涛. 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J]. 西北人口, 2020(02): 114-126.

(责任编辑:袁宇)

A Study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Population-Space in Guangdong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omparison

LI Ying-xu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zhou 521041, China*)

Abstract: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population-space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By constructing the index system of urban industry-population-space development and using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fun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as well a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features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from 2002 to 2021. From a temporal perspectiv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Guangdong's three major systems of industry, population, and space generally shows an upward trend amid fluctu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there is an unbalanced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the Pearl River Delta as the core and extending along the "One Belt, one region", with a relatively lagging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nd spa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ree major systems and regional economy in Guangdong from an industry-led, population-supported, and space-born systematic thinking perspective.

Key words: Guangdong Province; industry; population; spac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gional economy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技术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高楷博¹, 田中景²

(1. 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2.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经济学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要:人口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要素。近年来,我国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老龄化速度逐渐加快。在很长一段时间,依赖低成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制造业实现了飞速发展。如今,人口结构的改变意味着以往依靠低劳动力成本模式发展制造业的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针对这一现象,文章基于2004-2019年省级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制造业技术复杂度指标用以衡量制造业技术转型,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转型的影响及具体影响机制。笔者研究发现:从全国范围来看,人口老龄化促进了制造业技术转型;在机制检验中,老龄化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倒逼”制造业技术转型,通过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有利于制造业技术转型,通过降低社会人力资本积累存量阻碍制造业技术转型。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制造业技术转型;技术复杂度;面板数据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25)01-0105-08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和经济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极为关注的全球性的问题。人口老龄化表现为老年人口占据总人口比例的大幅度上升。过去40年来,受独生子女政策以及人均寿命不断延长的影响,中国的人口结构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老龄化。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1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4.2%,是世界平均水平(6.3%)的两倍多。在1982—2021年间,我国老年抚养比(即65岁以上占15—64岁人口的比例)从8.0%上升到20.8%。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转变。

制造业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至关重要^[1]。制造业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并且能够增强区域经济的抗风险能力^[2]。为了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德国推出了“工业4.0”,希望能够在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中取得创新的主导地位。美国相继开始了再工业化战略。中国并不例外,中国政府也推行了《中国制造2025》以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经济实现飞速发展。自2010年以来,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已经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从2012年到2022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从20.9万亿元增长到31.4万亿元,占全球比重从22.5%增长到30%(国家统计局)。在很长一段时间,依赖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中国制造业实现了飞速发展^[3]。然而,老龄人口规模的增加和占比的扩大让这一发展模式不可持续^[4]。中国制造业企业必须在迁移到低劳动力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粮食生产气候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强化策略研究”(24YJC790048)

收稿日期:2024-03-31

作者简介:高楷博(1997—),男,湖北黄冈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劳动经济研究;田中景(1968—),男,内蒙古赤峰人,经济学博士,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经济、区域经济研究。

成本地区和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做出选择。因此,为了保持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和顺利完成转型升级的目标,深入研究老龄化与制造业之间的联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老龄化和制造业技术转型纳入研究,论证了老龄化对制造业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尝试回答以下问题:近年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结构以及制造业发展现状如何?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技术转型是否有影响?老龄化影响制造业的机制是什么?

二、相关文献综述

(一)制造业技术转型的测度方法

制造业转型作为产业转型的一部分,也存在较多研究。在较多的研究中,制造业技术转型也被定义为制造业升级。现有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界定。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分析,制造业技术转型意味着制造业由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转移。从要素密集度角度分析,制造业技术转型意味着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不断转变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据制造业总增加值的比例不断下降。导致要素密集度转移主要源于制造业转移和制造业内部规模扩张导致的结构转型^[5-6]。

阳立高将制造业划分为低、中和高端技术产业三大类,然后通过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两项指标分别用于衡量制造业技术转型^[7]。赵昕东将低、中和高端技术产业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以此构建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指标^[8]。张桂文将制造业升级分解成三个方面,即集约化、合理化、高级化,在计算出这三个方面的指数后,选用客观权重赋值法来构建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指数^[9]。也有一些研究在制造业划分的基础上,利用高端技术制造业与中端或者低端技术制造业的比值来衡量制造业的发展程度^[10]。

(二)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转型的影响

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了劳动供给不断增加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前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导致的。工业化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前处于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大量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大量劳动者涌入市场,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形成了“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有效地推动了工业化^[11]。除此之外,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以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获得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进而实现了制造业规模的快速扩张^[12]。然而,老龄人口占比上涨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让这一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赵昕东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人口老龄化影响制造业技术转型的渠道。^[8]研究发现,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倒逼制造业技术转型。楚永生将制造业分为要素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该研究还发现,我国的老龄化伴随着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升,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推动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因素^[13]。一些学者则从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考虑老龄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已使低端制造业失去了传统比较优势,但却为中高端制造业的较快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6]。马红梅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制造业发展质量,发现老龄化提高了制造业的发展质量^[14],生产性服务业水平的提高可以加快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提升^[15]。李光明从空间的角度考虑老龄化对制造业的影响,研究发现,老龄化、科技创新、制造业升级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与此同时,老龄化可以促进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有利于制造业升级^[16]。田中景围绕人口负债与日本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衰退的关系展开了分析,认为扭转人口负债局面是促使日本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回升的关键因素^[17]。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较为深入地研究了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并且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不过,现有文献对于老龄化与制造业结构的讨论仍存在一些不足,具体情况如下:(1)老龄化对制造业影响的机制较为复杂,现有的研究在机制检验方面尚不完善。已有一些研究基于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和消费需求的渠道分析老龄化影响制造业技术转型的机制,但是较少对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均人力资本水平进行区分。(2)一些相关研究对制造业技术转型的度量存在主观性估计、分类粗糙等不足。鉴于

此,本文基于2004—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老龄化对制造业结构的影响。在机制检验中,本文基于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本和边际消费倾向三方面开展机制分析,并区分了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

三、人口老龄化影响中国制造业技术转型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鉴于不同省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并且制造业发展具有随时间变化的特征,本研究采用双项固定效应模型,将省份和年份作为固定因素。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来实证检验老龄化对我国制造业技术转型的影响,设定如下的回归方程:

$$\ln INS_{it} = \alpha_0 + \alpha_1 OLD_{it} + \delta X_{it} + \varepsilon_i + \omega_t + \mu_{it} \quad (1)$$

其中, i 用于省份, t 用于表示时间。 INS_{it} 用于表示制造业技术转型的指标, $\ln INS_{it}$ 为制造业技术转型指标取对数的值, OLD_{it} 表示 i 地区 t 年的老年抚养比, X_{it} 表示控制变量。 μ_{it} 用于表示误差项。在公式(1)中, ε_i 用于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ω_t 用于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本文用老年抚养比,即65岁以上人口占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地区的老龄化程度。少儿或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越高,则说明该国家的老龄化程度越低;反之,老年抚养比越高,则说明该区域的老龄化程度越严重。

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城镇化率(用 $URBAN_{it}$ 表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对数形式(用 $\ln FDI_{it}$ 表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用 INF_{it} 表示)、研发投入(用 $RESEARCH_{it}$ 表示)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用 $CAPITAL_{it}$ 表示)。城镇化率($URBAN_{it}$),采用城镇化率的指标来衡量。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ln FDI_{it}$),采用各省市每年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对数来衡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INF_{it}),用地区每平方公里的公路里程与区域面积之比表示。研发投入($RESEARCH_{it}$),用专利授权数的对数形式表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CAPITAL_{it}$),用制造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百分比衡量。控制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

为了识别研究机制,本文借鉴了Baron和Kenny的中介检验方法^[18],构建如下方程:

$$\ln INS_{it} = \alpha_0 + \alpha_1 OLD_{it} + \delta X_{it} + \varepsilon_i + \omega_t + \mu_{it} \quad (2)$$

$$M_{it} = \beta_0 + \beta_1 OLD_{it} + \delta X_{it} + \varepsilon_i + \omega_t + \mu_{it} \quad (3)$$

$$\ln INS_{it} = \gamma_0 + \gamma_1 OLD_{it} + \gamma_2 M_{it} + \delta X_{it} + \varepsilon_i + \omega_t + \mu_{it} \quad (4)$$

在上式中, M_{it} 为机制变量,其他变量与前文的定义保持一致。在本文中,机制变量包括劳动力成本($Labor_cost_{it}$)、人力资本存量($Human_capital_res_{it}$)、人力资本水平($Human_capital_edu_{it}$)。

当老龄化不断加剧时,劳动力变得稀缺,企业雇佣劳动力的价格就会越来越昂贵,导致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而工资是劳动力成本较为重要的指标。因此,劳动力成本用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工资收入来衡量。

人力资本水平包括两方面,一部分是人力资本存量,另一部分为人均资本水平。人力资本存量是指区域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总和。人力资本总量越多,对区域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作用越大。在制造业技术转型的过程中,研发部门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十分重要。因此,本文用科研人员数量的增长率来衡量人力资本存量。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反映了区域内劳动力整体的受教育程度,人均人力资本水平通过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UN-Comtrade数据库、世界银行开放数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2004年至2019年的基础数据。本文还参考了各省的统计年鉴。由于西藏、海南和甘肃的数据严重缺乏,这些省份(自治区)被暂时排除在本研究之外。最后,本文以28个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本文选取2004—2019年中国28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西藏自治区、海南省和甘肃省)的省级层面数据进行分析。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lnINS</i>	442	9.560	0.100	9.210	9.790
<i>OLD</i>	448	13.460	3.040	7.400	23.800
<i>URBAN</i>	448	0.540	0.140	0.260	0.900
<i>lnFDI</i>	443	3.440	1.590	-3.110	5.880
<i>INF</i>	448	0.760	0.490	0.030	2.120
<i>RESEARCH</i>	448	9.420	1.630	4.250	13.440
<i>CAPITAL</i>	448	0.196	0.106	0.006	0.571
<i>Planning_policy</i>	448	3.117	0.813	1.000	4.000
<i>Labor_cost</i>	448	4.600	2.560	1.170	16.680
<i>Human_capital_res</i>	448	0.012	0.008	0.001	0.061
<i>Human_capital_edu</i>	448	8.800	1.030	6.380	12.780

(二) 因变量指标的测算

如何有效地度量区域制造业技术转型是一个难点。区域制造业技术转型意味着区域的制造业产业由低利润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转型到高利润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或劳动密集型产业。传统的度量方法将制造业平均地分类成三种类型,即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然后,根据三类制造业类型的产值占区域制造业总产值的比例来衡量区域制造业的技术转型。但是,该种分析方法存在对制造业的分类较为主观而导致估计偏误的问题。

基于产品异质性, Hausmann 引入了技术复杂度的概念来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转型^[19]。这种方法重视技术,认为技术是产业转型的主要驱动力。这种方法通过全球的贸易数据和国家发展水平的数据来衡量每一个制造业细分产业的技术复杂度。然而,这种方法使用的是出口总量数据,能够较好地体现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但是较难衡量一国内部区域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

本文借鉴周茂的方法^[20],对 Hausmann 的方法进行改进,将出口总量数据更换为地区的产值数据,分两步构建了各省的制造业技术复杂度来衡量制造业转型。

第一步是搜集各国各类产品的出口数据,并且将海关编码六位数产品分类^①的子类别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匹配。借由各个产品的出口数据,可以计算出不同国家各个行业的出口数据。然后计算出每个行业代码的种的技术复杂度($Prody_c$)。其公式如下:

$$Prody_c = \sum_m \frac{(Export_{mc}/Export_m) \times Y_m}{\sum_i (Export_{mc}/Export_m)} \quad (5)$$

在等式(5)中, $Export_{mc}/Export_m$ 表示 m 国行业 c 的出口值与其总出口值的比值, Y_m 表示 m 国任一个年份的人均 GDP。其中, $Export_{mc}$ 的数据来自 UN-Comtrade 数据库, Y_m 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开放数据。由于每个国家每年的人均 GDP 和出口值均会发生变化,因此,行业的技术复杂度也会变化。为方便计算,本文需要选取某个年份的行业复杂度作为基期进行计算。由于本文研究的时间段为 2004 年至 2019 年,本文将 2003 年的各行业的复杂度作为基准,以免干扰产业结构的变化。 $Prody_{c,2003}$ 表示 2003 年行业 c 的技术复杂度。

然后,本文利用制造业细分行业的技术复杂度数据($Prody_{c,2003}$),计算了各省制造业技术复杂度,以此来衡量制造业转型,公式如下:

$$INS_{it} = \frac{\sum_i Output_{i,c,t} \times Prody_{c,2003}}{\sum_i Output_{i,c,t}} \quad (6)$$

①也称为 HS 编码,是《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简称。该编码把全部国际贸易商品分为 22 类,98 章。章以下再分为目和子目。该编码对各种不同产品出入境应征/应退关税税率进行量化管理的制度。各国海关、商品出入境管理机构确认商品类别、进行商品分类管理、审核关税标准、检验商品品质指标的基本要素就是进出口商品通用的身份证明——HS 编码。

INS_{it} 表示 t 年 i 省制造业的技术复杂度, $Output_{i,c,t}$ 表示 t 年 i 省份 c 行业的总产值, 行业按种类进行分类。制造业产值的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最后, 本文选用制造业技术复杂度的对数来衡量因变量。

(三) 实证结果分析

表 2 报告了人口老龄化影响制造业技术转型的基准回归结果。模型的(1)列使用最小二乘法(OLS)方法进行估计, 并没有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在模型(1)列的基础上, 模型的(2)列考虑了控制变量, 仍然使用 OLS 进行估计。

然而, 制造业发展状况可能会受到时间的发展、地区差异的影响。最小二乘法无法考虑这些截面差异导致的估计误差。此时使用固定效应或者随机效应模型是有必要的。因此, 模型的(3)列使用双向固定效应进行估计, 在省份和时间层面上进行控制。模型的(3)列得到的系数为 0.10, 说明现阶段老龄化对制造业技术转型有正向影响。由模型(1)-(3)得到的回归结果可知, 在现阶段, 老龄化促进了制造业技术转型。除此之外, 控制变量的符号基本符合预期, 城镇化率的提升、外商对该省份直接投资金额的增加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均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技术转型。

表 2 人口老龄化影响制造业技术转型的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变量	(1)	(2)	(3)
	$\ln INS$	$\ln INS$	$\ln INS$
<i>OLD</i>	0.014*** (10.63)	0.006*** (4.91)	0.010** (2.21)
<i>URBAN</i>		0.244*** (7.81)	0.356*** (3.39)
$\ln FDI$		0.010*** (2.82)	-0.014* (-1.84)
<i>INF</i>		0.058*** (5.21)	0.046* (1.74)
<i>RESEARCH</i>		-0.009** (-2.38)	0.018* (1.95)
<i>CAPITAL</i>		-0.092*** (-2.87)	0.075* (0.65)
<i>Constant</i>	9.373*** (507.86)	9.368*** (329.45)	9.140*** (239.00)
省份和年份控制	否	否	是
Hasuman test		P=0.011	
观测数	442	437	437
R ²	0.204	0.534	0.628

注: 括号内为 t 值。***, **和*分别表示 1%, 5% 和 10% 水平上显著。

(四) 实证机制检验

本文的机制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第(1)列为基准回归结果, 第(2)-(3)列报告了劳动力成本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说明, 老龄化会提升劳动力成本, 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倒逼”制造业技术转型。第(4)-(7)列报告了人力资本水平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显示: 老龄化减缓了科研人员占比的增速, 而科研人员占比的提升有利于制造业技术转型; 老龄化有利于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升, 人均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技术转型的影响并不显著。不过, 利用 Baron 和 Kenny 得到的结果不显著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中介效应, 可能的原因还来源于自变量与机制变量高度共线性、内生性带来的估计误差等^[21]。本文采用 Preacher 和 Hayes 的 Bootstrap 法进一步探究人力资本的影响机制^[22]。Bootstrap 结果的置信区间并没有包括 0, 证明了人力资本的影响机制存在, 即老龄化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进而不利于实现制造业技术转型。结合表 3 第(4)-(7)的回归结果可知, 老龄化不利于总体人力资本的积累, 但是有利于

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而人力资本是制造业技术转型的重要动力。

表 3 人口老龄化影响制造业技术转型的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i>lnINS</i>	<i>Labor_</i> <i>cost</i>	<i>lnINS</i>	<i>Human_</i> <i>capital_</i> <i>res</i>	<i>lnINS</i>	<i>Human_capi-</i> <i>tal_edu</i>	<i>lnINS</i>
<i>OLD</i>	0.010** (2.21)	0.116** (2.71)	0.008* (2.04)	-0.054* (-1.82)	0.118** (2.94)	0.076** (2.12)	0.011*** (2.84)
<i>Labor_cost</i>			0.013* (1.74)				
<i>Human_capital_res</i>					0.068** (2.34)		
<i>Human_capital_edu</i>							0.026 (1.57)
<i>Consume</i>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Bootstrap Test						[-0.00223, -0.00059]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437	443	437	443	437	443	437
R ²	0.628	0.693	0.782	0.549	0.764	0.783	0.573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上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出发,从理论层面分析了老龄化对制造业技术转型的影响机制,同时通过构建技术复杂度的指标,利用我国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研究得到了以下基本结论:从全国范围来看,老龄化促进了我国制造业技术转型。在机制检验方面,本文从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水平两个方面检验了老龄化影响制造业技术转型的机制。研究发现,老龄化会通过增加劳动力成本“倒逼”制造业技术转型,通过降低人力资本总量阻碍制造业技术转型,通过提高人均受教育程度促进制造业技术转型。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就现阶段来看,老龄化有助于制造业技术转型。但是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愈发严峻且处于不可逆转的趋势。对照其他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国家,例如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等,老龄化对政府和社会创新能力都造成了负面影响。面对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有必要顺应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制定有针对性的人口和产业发展政策,降低老龄化的负面影响,适应老龄化给制造业发展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根据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顺应人口发展趋势,构建低龄老年人友好的工作环境。积极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充分发挥老年人口的技能优势和经验优势,为低龄老年人口再就业提供选择的机会,鼓励老年人口实现弹性就业。对于低龄老年人来说,他们刚刚从工作岗位退休,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熟练的工作技能,应当给予他们退休后再就业的选择空间。因此,可以建立老年人力资源再就业的咨询机构,引导老年人参与社会建设和发展,树立“老有所为”的正确观念,开发低龄老年人口的资源优势。实现低龄老年人口的再就业,有助于增加这部分群体的收入水平,进而能够提高消费需求,最终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首先,要围绕老年人口的人群特点,针对性地开展职业培训,引导老年人掌握具有可适应性和可操作性的职业技能来提高工作能力。其次,要拓宽老年人力资源的就业渠道,鼓励企业对老年人口的招聘,鼓励

地方政府搭建有利于老龄人口再就业的平台,研究并出台针对老龄人口再就业的相关鼓励和扶持政策。最后,对于一些行业可以实行弹性退休制度。我国现行的退休制度主要是根据劳动者的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进行划分,然而在一些特殊行业,退休年龄前后的差别相差并不大。一些老龄人口在退休后仍然有意愿工作。因此,可以适当地实行弹性退休制度,以满足一些老龄人口继续工作的需求。

第二,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实现人口优势向人才资源优势的转型。年长人口的体力水平、接受新知识的能力相比于年轻人都较低。因此,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进而影响整体劳动生产率,并对制造业的技术转型产生负面冲击。在技术进步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制造业必将对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力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是抵消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劳动生产率降低的关键举措。为此,应该加大对教育和科研的财政投入,同时积极提高全社会对人力资本的投入。

第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水平。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人们提高消费预期的基础。随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社会消费需求会逐渐缩小,进而导致工业品需求的减少,最终影响制造业技术转型。因此,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水平就成为扩大消费需求、促进制造业技术转型的重要途径。而要提高消费水平,就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城镇化的长期推进和过去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量流动人口无法在常住城市获得相应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时间较短,使得现有的社保征费体系跟不上现实情况的转变。因此,我国应该对现有社会保障体系制度进行完善,加强对流动人口和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减少留守儿童、农民工等重要群体的生活负担,进而提高消费水平。

参考文献:

- [1] Marconi N, Reis C F D, De Araújo E C. Manufactur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ctuality of Kaldor's first and second laws [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16(37):75-89.
- [2] 苏任刚,赵湘莲. 制造业发展、创业活力与城市经济韧性[J]. *财经科学*, 2020(09):79-92.
- [3] Autor D H, Dorn D, Hanson G H.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06):2121-2168.
- [4] 袁辰,张晓嘉,姜丙利,等.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贸易增加值的视角[J]. *上海经济研究*, 2021(11):59-68.
- [5] Wang F, Xia J J, Xu J J. To upgrade or to relocate? Explaining heterogeneous responses of Chinese light manufacturing firms to rising labor costs[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60):101-333.
- [6] 阳立高,龚世豪,韩峰. 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和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的实证[J]. *中国软科学*, 2015(11):136-144.
- [7] 阳立高,龚世豪,韩峰. 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J]. *财经研究*, 2017(02):122-134.
- [8] 赵昕东,刘成坤. 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J]. *中国软科学*, 2019(03):153-163.
- [9] 张桂文,邓晶晶,张帆.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 2021(04):33-44+126-127.
- [10] 傅元海,叶祥松,王展祥. 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基于动态面板的经验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09):78-90.
- [11] 董香书,肖翔. 人口红利演变如何影响中国工业化[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09):20-27.
- [12] 张杰,何晔. 人口老龄化削弱了中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吗? [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4(03):24-36+157.
- [13] 楚永生,于贞,王云云. 人口老龄化“倒逼”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效应——基于中国30个省级制造业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J]. *产经评论*, 2017(06):22-33.
- [14] 马红梅,杨月.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效应[J]. *宏观质量研究*, 2021(06):44-58.
- [15] 周懿,邓峰,卓乘风. 人口红利消退阻碍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了吗? [J]. *经济问题探索*, 2020(04):13-26.
- [16] 李光明,刘丹玉. 人口老龄化、科技创新与制造业升级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J]. *工业技术经济*, 2018(10):120-128.
- [17] 田中景,高鹤,谷口洋志. 人口负债与日本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衰退的关系研究[J]. *现代日本经济*, 2019(04):45-55.

- [18] 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06): 1173–1182.
- [19] Hausmann R, Hwang J, Rodrik D. What you export matter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7(01): 1–25.
- [20] 周茂, 陆毅, 杜艳, 等. 开发区设立与地区制造业升级[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03): 62–79.
- [21]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05): 100–120.
- [22] Preacher K J, Hayes A F. SPSS and SAS procedures for estimating indirect effects in simple mediation models[J].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Instruments & Computers*, 2004(04): 717–731.

(责任编辑:袁宇)

On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Population Aging on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GAO Kai-bo¹, TIAN Zhong-jing²

(1. *College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at Qinhuangdao,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Abstract: Population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element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witnessed a gradual deepening of aging degree and a gradual accelerated aging rate. For a long time,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has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by relying on the advantage of low-cost labor. Nowadays, the change in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mplies that the traditional growth model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based on low labor costs is unsustainable. In view of this phenomen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index for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measur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4 to 2019,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impact mechanism. As found in the study of the paper author, from a national perspective, population aging has promoted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mechanism test, aging population "drive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by increasing labor costs, benefit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by increasing per capita education years, as well as hinder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by reducing the accumulation of social human capital.

Key words: population aging;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the panel data model



东北地区人口流失对经济的影响 及对策研究

牟晓伟^{1,2}, 范子怡¹, 全鑫¹

(1. 长春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32;

2. 长春人文学院 商学院, 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 长期以来,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生产基地,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然而, 近年来, 东北地区人口流失问题严重, 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东北地区的人口出现了大量的净流出, 这一现象已经持续了多年。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就业机会有限等经济社会因素是导致东北地区人口流失的根本原因。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以缓解东北地区人口流失的状况, 但是仍然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未来, 政府和社会应该加强对东北地区人口流失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以促进东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东北地区; 人口流失;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310(2025)01-0113-08

引言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及战略性意义。当前, 我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高质量发展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东北老工业基地拥有广阔的平原和完善的工业体系, 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生产基地, 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关乎国家发展大局^[1]。然而, 近年来, 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却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为了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 需要抓住机遇, 创新发展模式, 释放发展潜能, 构建新的发展动力。

2023年9月7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再次强调: “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的部署,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牢牢把握东北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中的重要使命,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任务, 统筹发展和安全。”^[2]东北地区造成人口流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例如产业结构、政策环境、劳动力薪酬、人力资本以及“人情”社会文化^[3]。陆丰刚研究发现, 经济发展程度和地区产业结构特征是影响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 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资源型城市普遍呈现人口净流出状态, 因此东北地区人口流失问题已形成惯性趋势, 黑龙江省人口流失问题最为严重^[4]。目前大部分文献认为人口流失主要会造成GDP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社会保障压力过大三个方面的影响。王浩认为东北地区人口流失会降低其制造业生产效率从而进一步影响东北地区经济发展^[5]。韩欣铭从人口流失的变动角度分析了流失人口的特征以及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外流的问

基金项目: 吉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课题“吉林省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关系及协同路径研究”(2024ZCZ030)

收稿日期: 2024-03-31

作者简介: 牟晓伟(1976—), 女, 吉林辽源人, 经济学博士, 长春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区域经济、数字经济研究; 范子怡(2000—), 女, 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长春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职业教育(财经商贸方向)研究; 全鑫(1998—), 女, 山东菏泽人, 长春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职业教育(财经商贸方向)研究。

题导致东北三省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给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进一步抑制了东北三省经济的发展动力,成为东三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6]。

然而,如何有效地改变这一现状,寻求新的发展动力,从而推动东三省经济走上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已成为当务之急。张楠提出振兴东北经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就业机会、加快推进公共财政均等化等对策以此缓解人口流失的问题^[7]。龚征旗提出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吸引人才,需要完善东北地区社会保障政策,与发达省市建立合资办厂,引导资本进入东北等相应政策^[8]。因此,政府应加大力度,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人口外流,进一步激发东北经济发展的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东北地区人口流失与经济发展现状

(一)人口流失现状

1.人口流出的规模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三省共计流出了821万人。其中,辽宁省流出187万人、吉林省流出241万人、黑龙江省流出393万人,主要流向目的地是山东、北京、河北、天津、广东。根据表1可知东北三省2022-2023年末常住人口的同比变化情况,东北地区人口合计9620.41万人,比上年减少49.28万人。受自然地理环境、人口生育水平、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育理念等因素的影响,从2017年至2023年(表2),东北地区人口减少,人口出现持续下降趋势。

表1 东北三省常住人口2022-2023年变动情况

单位:万人

地区	2023年	2022年	同比变化
辽宁省	4 182.00	4 197.00	-15.00
吉林省	2 339.41	2 347.69	-8.28
黑龙江省	3 099.00	3 125.00	-26.00
合计	9 620.41	9 669.69	-49.28
全国	140 967.00	141 175.00	-208.00

注:黑龙江省2023年末未披露数据,采用2021-2022年数据;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东三省统计公报、东三省政府官网。

表2 东北三省2017-2023年常住人口数量

单位:万人

地区	2023年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辽宁	4 182.00	4 197.00	4 229.40	4 255.00	4 277.00	4 291.00	4 312.00
吉林	2 339.41	2 347.69	2 357.37	2 399.44	2 447.52	2 484.35	2 526.09
黑龙江	(未披露)	3 099.00	3 125.00	3 171.00	3 255.00	3 327.00	3 399.00
合计		9 643.69	9 729.77	9 825.44	9 979.52	10 102.30	10 237.00

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东三省统计公报、东三省政府官网。

2.人口流出的结构

东北地区的高学历人才和技能型人才流失情况特别严重,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东北三省新生代高学历人口流出数量占人口流出总量的18.63%;据东北高校《2019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例,2019届毕业生中有近90%在非东北地区就业。东北三省常住人口按年龄分组,因2023年详细数据未披露完全,故采用2022年对比2021年数据(见表3),0-15岁和16-59岁人口明显呈下降趋势,说明东北地区的流出人口主要以青壮年为主,儿童跟随父母转移流动;60周岁以上人口增加,所占比重平均为25.35%,远高于全国19.8%的水平,老龄化程度严重。由此可见。东北三省的人口流出具有一定的特点,即普遍年龄更小、受教育程度更高。

(二)经济发展现状

1.GDP现状

东北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全国较低水平。2023年,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的人均国内生

表3 2021-2022年东北三省常住人口年龄构成占比 (单位:%)

地区	2022年			2021年		
	0-15岁	16-59岁	60岁以上	0-15岁	16-59岁	60岁以上
辽宁省	11.25	61.16	27.59	11.12	63.16	25.72
吉林省	11.76	62.99	25.25	12.13	64.05	23.83
黑龙江省	9.30	72.90	17.80	9.80	73.40	16.80

注:辽宁省2021年采用第七次人口普查(2021.05)数据;黑龙江省年龄分组为0-14岁、15-64岁、65岁以上。数据来源:东三省统计公报、东三省政府官网。

产总值分别为7.2万元、5.8万元、5.1万元,其中,黑龙江和吉林位于全国倒数第2位和第6位,东北地区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同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2013至2023年的10年时间内,辽宁省GDP由27077.7亿元增长至30209.4亿元,10年间名义增速为11.57%,而辽宁省在全国省市区中的排名下滑了10名。吉林省的GDP从12981.5亿元增加到13531.19亿元,10年间GDP仅增加了549.7亿元,名义增速仅有4.23%,增速在东北地区排名第三。在产业方面,吉林的工业和旅游业不如辽宁,农业不如黑龙江,因此经济总量一直低于辽宁和黑龙江两省。黑龙江的GDP从14382.9亿元增加到15883.9亿元,10年名义增速为10.44%,全国排名下滑严重(见表4)。

表4 东北三省2013-2023年GDP变化

地区	2013年GDP(亿元)	全国排名	2023年GDP(亿元)	全国排名	10年名义增速
辽宁省	27077.7	7	30209.4	17	11.57%
吉林省	12981.5	21	13531.19	26	4.23%
黑龙江省	14382.9	17	15883.9	25	10.44%

注:数据来源:东三省统计公报、东三省政府官网。

2. 产业结构现状

东北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土壤肥沃,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基地。1958年东北三省总经济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15%,2022年东北地区三省的地区生产总值为59624亿元,仅占全国生产总值的4.73%,经济发展日渐疲态化。

1978年东北地区第一产业占比20%,第二产业占比为64%超过一半,第三产业占比16%,表现为较明显的“三一二”模式。2022年东北地区第一产业占比14.85%,第二产业占比下降为35.06%,第三产业占比为50%。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逐渐下降,第三产业占比增加并与第二产业差距逐渐拉大,当前表现为较为明显的“三二一”产业结构模式。

2023年辽宁省第一产业增加值为2561.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8%;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1734.5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8.8%;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5823.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2.4%。2023年吉林省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644.75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2.2%;第二产业增加值4585.03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3.9%;第三产业增加值7301.4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4%。各产业比重表明,第三产业已成为吉林省经济的支柱产业。2023年黑龙江省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3518.3亿元,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4291.3亿元,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8074.3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占比22.2%,第二产业占比27%,第三产业占比50.8%,这一占比结构显示出黑龙江省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高。

3. 财政收支现状

东北三省财政形势分化,吉林、黑龙江财政高度依赖中央补助,由于刚性支出较多,2023年辽宁省

表5 2023年东三省第一、二、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地区	第一产业占比/%	第二产业占比/%	第三产业占比/%
辽宁省	8.80	38.80	52.40
吉林省	12.20	33.90	54.00
黑龙江省	22.20	27.00	50.80

注:数据来源:东三省统计公报、东三省政府官网。

的财政自给率低于50%,吉林省、黑龙江省的财政自给率均低于30%。2023年辽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754.0亿元,比上年增长9.1%。其中,各项税收1870.6亿元,增长12.4%。全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567.3亿元,比上年增长4.9%。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72.2亿元,增长8.7%。2023年吉林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74.84亿元,比上年增长26.3%,其中,税收收入699.57亿元,增长22.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406.85亿元,增长9.0%。2023年黑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396亿元,增长8.2%;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5776.7亿元,增长6%。

二、东北地区人口流失带来的影响

东北地区人口流失给东北地区带来巨大的影响,人口衰减对东北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作用,并且形成恶性循环。经研究发现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年轻人口减少,劳动力短缺

随着东北地区的人口流失日益严重,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年轻人口的减少,这导致了劳动力的不足。尤其是在农业生产领域,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愈发突出。现代农业生产对于年轻有活力的劳动力投入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东北地区的农村却深受劳动力不足的困扰。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效益,也对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造成了限制,因为这些行业无法获得足够熟练的工人来满足其发展需求。此外,年轻劳动力短缺还直接影响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竞争力。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人力成为决定性的生产要素之一。然而,东北地区由于人口流失导致的劳动力不足将严重制约其产业发展。这无疑会给东北地区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

(二)社会总需求受抑制,GDP增速放缓

人口流失给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困扰,随着人口外流的不断加剧,社会总需求受到严重抑制,进而导致了经济增速的放缓。首先,人口流失对社会总需求造成了直接冲击。由于大量的人口外出,直接导致劳动力总量减少,出现劳动力不足的情况,这使得企业在招聘和维持运营方面遇到困难,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同时,22到44岁的人口是经济主力人口,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减少直接影响消费。消费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需求受抑制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其次,人口流失也对经济增速造成直接影响,人口流失导致劳动力的减少,对于生产力的提升产生了严重影响。东北地区人口流失越严重,就越阻碍经济的发展,就业机会越少,进而再度致使经济发展缓慢,造成恶性循环,不仅影响了生产力的提升,还影响经济发展速度。

(三)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

东北地区的老年人口系数比较高,根据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截至2021年末,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的老年人口比例分别为30.2%、28.1%和31.6%,总的老年人口比例为30.0%,较全国平均水平略高。人口流失无疑是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的重要原因,在人口流动中,青壮年占据了绝大多数,尤其是在一些偏远乡镇,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农村人口外流,而留下的都是老年人,这就导致了当地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必然导致老龄化加剧,人口红利效应减弱。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及民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将面临养老和医疗服务供应不足的问题,这将给东北地区的社会养老体系带来巨大压力。一方面,社会养老金的支出将大幅增加,这将严重挤压地区财政预算;另一方面,医疗和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也将进一步凸显。

(四)税收环境恶化,社保压力增大

社会保障系统通常是通过税收来支持的,而税收是由工作人口缴纳的。由于人口减少,税收负担加重,政府面临更大的压力,无法满足社会的各项基本需求。东北地区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众多,因此东北地区的大部分人都靠养老保险生活,退休后依靠政府的福利。然而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导致东北地区的退休职工人数占工作人口数量的比重逐渐变大,使退休人数和工作人数的比例逐渐失衡。东北地区税收减少,社会保障制度也受到严重影响,政府必须投入更多资源来支持社会保障制

度,以确保其正常运行,满足公众的各项需求。此外,老年人口的比例增加也将导致养老保险、医疗、福利等社会保障系统的压力加大,同时由于税收和社会福利减少,对政府的经济压力也会增大,这可能会进一步降低社会发展的效率。

(五)教育资源不足,高素质人才流失

首先,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高素质人才是一个地区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他们具备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能够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然而东北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尤其是高质量的教育资源。这导致了有能力的年轻人选择离开东北,前往其他地区寻求更好的教育和职业发展机会,进一步加剧了东北地区的人才流失,使得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其次,高素质人才的流失也会对科技创新造成不利影响。高素质人才往往是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各个领域的研究和实践经验,对科技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当这些高素质人才选择离开东北地区时,就意味着科技创新能力的减弱和可能的技术壁垒。最后,高素质人才的流失还会对东北地区的人才培养体系带来挑战。人才的培养需要长期投入和持续的努力,而高素质人才的离开,企业或者政府又要重新投入资金和时间去培养新的人才。

三、东北地区人口流失的原因

2021年2月18日,国家卫健委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839号《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的答复引起社会关注。国家卫健委作出回应称,东北地区人口长期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东北地区人口流失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民营经济不发达

民营经济兴,经济才能兴。东北地区的创新能力比较落后,特别是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民营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平台,没有民营企业,经济就没有活力。东北地区民营经济不发达是造成人口流失的最主要原因。东北地区民营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实力薄弱,与发达省份相比差距较大^[9]。202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浙江省有107家,江苏省有92家,广东省有51家,山东省有50家,这些地区经济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同时也是我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而东北地区上榜的民营企业总数量(辽宁省3家、吉林省3家、黑龙江省1家)不到浙江省的十五分之一,东北地区民营企业发展任重而道远。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

东北地区的经济主要以重工业、工矿业和农业为主,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传统产业逐渐萎缩,新型产业缺乏支撑。东北地区的经济结构相对单一,人才供给与当地产业需求不匹配,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主的东北很难满足多样化的劳动力需求,缺乏多元化的产业和高端技术产业。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重工业、工业产品比重过高,这是造成老工业基地经济后劲不足、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东北地区支柱产业中,重工业行业占据主导地位,包括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除汽车之外缺少大规模消费品生产行业^[10]。东北地区的工业经济越来越差,这不仅体现在国有企业的困难上,也体现在东北地区制造业薄弱、民营经济不发达,这是大量高素质人才离开当地到京津唐和南方发达地区寻找机会的主要原因。2022年东北地区GDP占全国比例为5%,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为5.02%,说明东北地区整体的第三产业发展不够。

(三)政策制度不完善

据人才流失的推拉模型可知,人才流失的原因可以归纳为推力和拉力的相互作用,东北地区人才政策制度的“推力”是人才外流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多南方地区为吸引人才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例如浙江省今年关于人才引进出台了《关于高质量推进新时代人才强市建设的意见》《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等相关政策文件,广东省自2018年起出台了《广东省人才优粤卡实施办法》并且积极实行,为吸引海内外高端人才、稳定本土紧缺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东北地区的人才引进相关

政策并不完善,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东北地区在吸引人才方面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缺少吸引人才的机制,包括引才方式、人才培养等;二是没有完善的引才政策,包括对引进人才的奖励、住房补贴等;三是缺少吸引人才的平台和载体。东北地区的政策制度不完善,已经影响了人才的发展,加剧了人才的流失。政策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人才更难得到公平对待,更难施展出自己的能力,更难获得良好的发展机会,因此,许多有潜力的人才纷纷流失,让东北地区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和挑战。此外,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慢,缺乏有竞争力的发展平台,使得人才在东北地区缺乏发展机会,人才流失更加迅速。因此,东北区政府应该加强对政策制度的完善,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保护和支持人才的发展,阻止人才流失。

(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由于经济欠发达,政府资金不足,社会福利体系发展不完善,东北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存在落后现象,大量的社会资源被浪费。东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设施老化;二是资金投入不足;三是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四是管理体制存在缺陷。东北地区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低,与其他地区相比,东北地区的发展滞后,使得当地人口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较低,年轻人在选择生活地点时,会考虑到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导致很多人口没有办法在当地安家落户,只能选择离开,流向其他更发达的地区。

四、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通过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一)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就业岗位

东北地区要加快产业结构优化步伐,实施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改造、实体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提升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力,有效增加就业岗位。要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把国家粮食基地建设与现代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引导企业用好国家政策增加创新投入,加快转型升级,形成大中小企业相互配套、融通发展的产业格局。同时,东北地区要着力促进就业,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稳岗支持,拓展就业空间,积极发展灵活就业,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权益。还要加大对就业市场的监管力度,实行更严格的就业管理和政策,拓宽就业渠道,支持社会劳动者自主就业,为此,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全面深化改革,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吸引更多人才。同时,东北地区要摆脱对既有经济发展模式的依赖,依靠政府和企业寻找新的增长和发展动力,以推动东北地区的经济向前发展^[11]。

(二)加大对教育领域的投资

首先,政府应提高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重,确保教育投入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同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其次,加强教育资源的统筹规划和布局调整,确保城乡、区域之间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教育的支持力度,缩小教育差距。再次,教师是教育的灵魂,应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教。加强教师培训和教育,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最后,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东北地区加强对教育的投资是提升地区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增加投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教师待遇以及深化教育改革等措施,可以推动东北地区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为地区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实施合理的人才战略

首先,东北地区应落实创新举措,加快培养紧缺人才,优化人才培养体系。政府应根据实际需要,给予高校、企业鼓励性的政策,加快培养专业人才,留住紧缺人才。其次,应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鼓励大学生本地就业,在市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安排不低于 10% 的岗位专项,用于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包括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农村特岗教师等项目。最后,政

府出台奖励、福利政策,利用政策导向引进人才,吸引人才回流,给予不同层次或学科的人才以不同程度的福利待遇,吸引高校毕业生及教师到此地生活工作。例如,提供人才补贴费、安家费、购房补贴,以及当地政府可以与高校签订就业协议,对教师给予生活补贴,解决好教师群体的后顾之忧。加大对创业支持力度,鼓励青年创业,为他们提供贷款、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对人才提供政策性的支持,为其创造更多的机会。

(四)提高工资待遇,缩小东北与其他地区工资差距

据调查,东北地区城镇私营单位和非私营单位,工资水平普遍低于东部地区,且劳动力的素质与薪酬水平也不匹配。为了缓解东北人口流失的问题,政府、企业要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提高各行业的工资水平,也应该考虑到其他地区的情况,不能“一刀切”地提高工资待遇,还要兼顾社会公平。政府、企业还可以建立多元化的薪酬分配机制,为员工创造有价值的薪酬福利体验,提高或改善就业人员的用工待遇,最大限度地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可以通过鼓励年轻人创业,增加更多的工作岗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进一步缩小东北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工资差距,减少人口外流。

(五)完善基础设施与社会保障制度

要加大东北地区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力度,支持城市地区轨道交通、网络宽带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农村地区生产性基础设施、生活性基础设施和服务性基础设施的建设^[12],找到改善人民生活与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把改善民生作为重要的增长点、动力源,使基础设施建设既利百姓,又利国家;既利当下,又利长远。医疗卫生事业是社会发展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生工程的重要内容,能够有效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和质量,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东北地区要加大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通过增加财政拨款、拓宽筹资渠道等方式,提高医疗卫生事业资金的利用效率。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东北地区的经济活力,使当地的经济更加发达,吸引人们留在家乡,改善当地的生活质量。还要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提高居民在优质教育方面的可获得性,最大化满足人们的生存发展需要。

东北地区要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全面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有针对性地强化养老保障与适老化服务支撑体系建设;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的覆盖面,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确保按时完成脱贫任务;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保障好城乡生活困难人员的基本生活。

结论

2023年,在东北振兴战略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振兴座谈会上指出,“努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13]。东北地区资源条件较好,产业基础比较雄厚,区位优势独特,发展潜力巨大,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14]。

本文研究了东北地区人口流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近年来,东北地区常住人口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比例尤为突出。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低迷,东北三省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排名逐步下降。东北地区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同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经济发展的迟缓给财政收入带来巨大压力,东北三省的财政自给率均低于50%,较多依赖转移支付来维持财政开支。持续的人口流失抑制了区域的社会总需求,降低了GDP增速,增加了政府面临的税收压力。这些负面影响加大了劳动年龄人口外流的趋势,形成经济增速放缓、人才流失、财政压力增加的恶性循环。

因此,解决东北地区人口流失的问题是振兴东北经济的关键。解决该问题,首先要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就业岗位。除此之外,还要实施人才引进政策,提高薪资待遇并且完善基础设施与社会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 段炼.学习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东北振兴重要论述增强主动性[J].辽宁经济,2022(05):9-15.

- [2] 习近平.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J]. 中国老区建设, 2023(10):4-5.
- [3] 郭子宸. 人才流失对东北地区经济影响分析及对策[J]. 时代经贸, 2021(01):82-85.
- [4] 陆丰刚. 人口流失影响了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东北地区户籍人口流失测算数据[J]. 人口与发展, 2021(05):98-110+120.
- [5] 王浩. 城市人口迁移对制造业生产效率影响研究——基于东北地区人口数据的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3(02):197-201.
- [6] 韩欣铭, 张永生, 詹雪莹, 等. 东北地区人口流失及优化路径的探析[J]. 现代商业, 2021(30):83-85.
- [7] 张楠. 东北地区人口流失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分析[J]. 经济研究导刊, 2016(17):63-64.
- [8] 龚征旗, 张丹盈. 东北三省人口流失现状与对策研究[J]. 商业经济, 2020(09):10-11+79.
- [9] 张秀娥, 滕欣宇, 李帅. 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困境及解决对策[J]. 经济视角, 2021(04):91-98.
- [10] 原松华. 振兴东北需要新动能[J]. 中国发展观察, 2016(23):46-49.
- [11] 魏洪英. 东北地区人口流出特征及其对经济的影响[J]. 社会科学家, 2021(02):83-90.
- [12] 林木西, 丁柯文, 王璐. 东北全面振兴的新质生产力实践研究[J]. 求是学刊, 2024(05):69-78+6.
- [13] 聂鑫.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重要论述的方法论探析[J]. 党政干部学刊, 2024(03):74-80.
- [14] 三十载栉风沐雨助发展白山黑水奏响“春”之华章[N]. 金融时报, 2023-11-13(02).

(责任编辑:袁宇)

On the Impac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opulation Loss on Economy in Northeast China

MU Xiao-wei^{1,2}, FAN Zi-yi¹, TONG Xin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32,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 Changchun 130117, China)

Abstract: Northeast China has long been an important base of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our country, enjoying a very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population loss in Northeast China has become serious, thus attracting much governmental and societal attention. Northeast China has seen a large population net loss, which has persisted for many years; while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un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unreasonabl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limite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re the root causes of population loss in Northeast China. In spite of a series of measures implemented by the government to alleviate the population loss in Northeast China, there are still many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shoul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and resolution of population loss in Northeast China so as to promote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Northeast China; population loss; economic growth



文明以止,天人相酬

——兼说紫贝古邑与新传

周泉根

(海南师范大学 国学所,海南 海口 571127)

摘要:从东坡海岛精神书写和一部古邑新传出发,对相关史地音韵、文化名相做一番知识考古,兼以揭明“天人相感”必“往来相酬”之文明寄意。百越女性纺织文化闻名中古史,尤其是海南侗台语族,成了反哺内地诸族的技术标兵。文昌土著以善织贝见载于史,彰显吉贝乃是文籍荒陋的先宋海南地理上最耀眼的人文。吉贝之为物,其音天下大同,南岛语、南亚语、侗台语等主要系属语种中皆与棉布音义同源,尤其在海南岛语言考古的所有层级都同时与棉花和布同源,且以特别的方式参与了历史的构建。进一步从语言发生学和接触语言学角度分析综合,我们认为,文昌故地物产吉贝、民擅织贝,故名吉贝,载记“紫贝”,乃土音汉写之误,与“珠崖”“交趾”等汉译南国地名一样,折射出中原对南国倚海族群的想象。隋唐更名“武德”“文昌”,亦皆土音汉写而赋以新义,其中“文”“武”皆聚落之意、昌则指山林,后者更是临语族群的专属词。而一旦汉义的“文明昌盛”取代临语的“山林之村”,从此也必将形成充满汉语意蕴的人文传统。“文”是堪配“道”的第一等概念,是天人之间相互成就的纽带和结果。古都邑既以文为名,必以文自命、以昌自期。

关键词:吉贝;侗台语;纺织文化;文;海南史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25)01-0121-09

一、引言

东坡谪儋三载,海外吟咏不惟气格超迈,识断亦精彩独到,往往能在闲笔之中书写揭明海南之历史人物、风土物候和文化精神。此中意味发明,不少仍待我辈发微显幽。如《和陶拟古》,东坡既在黎汉一家的和平主义基调上感叹“黎山有幽子”“遗我吉贝布”,又从人道主义角度在大历史视野中欣慰地发现“稍喜海南州,自古无战场”。诗中吉贝这个意象隐约成了关联人文治平的象征物。而细细寻味,吉贝织布其实深藏着海南古代文化昌明中关键而夺目的一题,海岛最早县邑之一“紫贝”更与千丝万缕的“吉贝”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吉贝、纺织、文昌、文明这些关键词之间的幽微关联和宏大影响,前人鲜有留意。

秦皇振长策御宇内,开三郡于岭南,海岛只是象郡之外徼^①。徼者,绕也,遐方外围,未预九州之内,但已然进入开启历史新阶段的窗口期。一百年后,汉武开疆,首置珠崖、儋耳二郡于岛,十六县之一的紫贝属珠崖郡,事在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1]。紫贝,本即大海之南的一种水产,以之名邑,似乎合情合理,但作为初郡属县之名,最初却更可能与南国女性文化、纺织文明的核心要素“吉贝”有关。吉

基金项目: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海南汉黎交往交融历史中的女性主体性研究”[HNSK(ZC)22-184]

收稿日期:2024-05-01

作者简介:周泉根(1977—),男,江西南丰人,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南师范大学国学所所长、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主任,主要从事经学文献和海南文史研究。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清雍正《广东通志》卷5《沿革志·琼州府》:“琼州府,唐虞为南交,三代为扬越之南裔,秦为象郡之外徼。”又据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2《沿革表》载,明王佐《琼台外纪》又以为“南海郡外境”。汉初一度虚授于长沙王吴芮,但实际上同时代的南越王也未有控驭的实力。

贝,在海南岛语言考古的所有层级都同时与棉花和布同源,汉语中的贝与壳、贝与布、织与绩,以及织贝与紫贝等等,在音或义层面都与吉贝存在发生学或接触语言学的关系。文昌土著东猫人在历史上也正是以纺织吉贝布闻名。其能见载于中古史,本身即彰显吉贝乃是文籍荒陋的先宋海南地理上最耀眼的人文。又且文昌至少从唐末以来就有“紫贝山”的记载,既然是山,又不临海,那当然是陆生草木之属,或如潮州之吉贝埔,原本乃“吉贝山”。进一步推测,吉贝蕃茂,百姓赖以为生,故以之名山,亦以名邑,汉语文献记作“紫贝”,当是土音汉写之误,与本无关脚趾交错的“交趾”、本无关猿狲的“东猫”等汉译南国地名一样,都是中原之于南方临海风物想象的美丽误会。

就邑名而论,从紫贝到文昌,其间的因果也与吉贝有关。武皇开郡不到三十年,元帝即从贾捐之之议捐珠崖而弃之,原因之一是官员无度地征调诸如吉贝所织的广幅布这类特产。此类征调引发了百姓的强烈反抗,以致中原王朝长达五六百年只能在名义上遥领其地,直到隋唐才实质性地重开郡县,其中故邑紫贝新曰“武德”,再改“平昌”,贞观元年,三定而为“文昌”,此后一千五百年再未更易。临高语中,“文”指“聚落”“村子”,“昌”是“山林”之意。唐太宗偃武修文,改“平”为“文”,不论是否顺便取用化裁了当时地名之土音,新名“文昌”借汉语新写以赋新义之用心,却是显而易见的。而一旦落墨合成“文昌”,汉义的“文明昌盛”必然取代临语的“山林之村”,从此也必将形成充满汉语意蕴的人文传统。在中国文化范畴体系中,文昌,乃文明勋绩、盛德大业,文而能昌,知周万物而道济天下,范围天地而曲成万物。南国这个以“文昌”为名的都邑注定要经历不凡的身世。这里的山水城池、村落民人,历经千百年积淀发扬,因而有了属于自身的传统、自我的气质,也自然要以文自命、以文自鸣。近来,何杰华先生尚此作传,副题曰“邑以文名”,意在认定“文”这一汉化地名之于古邑更造的提领意义。^①正值寻绎东坡书写海南精神意蕴的我,读罢古邑新传,忍不住对紫贝、吉贝、织贝、文、文明、文化、文昌,以及纺织文化等史地音韵、文化名相别做一番知识考古。

二、紫贝与吉贝:从海洋想象到纺织文化

文昌,东临浩瀚,紫贝,又确属珠崖的一种珍稀海洋物产。《汉书·南粤传》即载有赵佗献汉庭“紫贝五百”之事。三国《南州异物志》还描述了北部湾一带紫贝的形质:“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贝,质白而文紫,天姿自然,不假雕琢磨莹而光色焕灿。”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中)进一步指认是海南岛上土著所采:“紫贝,即研螺也。儋、振夷黎,海畔采以为货。”故此,都邑“紫贝”之名实,千百年来,无人疑之。但有理由表明,作为县名之“紫贝”最初却可能是土音“吉贝”之汉写,或有意改写,或自然误读。就像“珠崖”汉写出于海岸出产珍珠的附会^②,邑名之“紫贝”也是中原对南海族群的想象。1984年海南乐东县志仲镇潭培村出土汉代官方银印,铭曰“朱庐执封”,这显然与珍珠涯岸了无关系。所以说,“水含珠则川

^①即《邑以文名:文昌传》(海南出版社,2024年),是海南师范大学国学所暨省典籍基地规划的“泛北部湾古州城系列研究”之“文昌史研究”的结项成果。

^②珠崖,读如 du ngai,声纽分别是舌尖中音和舌根擦音。珠或作朱,“都”当其土音异写;崖,或作涯、厓、垠等,哀牢之“哀”诶人之“诶”当其音译别作。朱崖,常泛指整个海南岛,不止于南渡江下游流域:作为驿站,珠崖驿在临高;作为水名,多(朱)银(垠)水出三亚;作为郡治,珠崖军在崖州。du音齐头的南方古地名,其义既是一方之水土、一族之聚落,又可以是管领一方之境主。汉袁康《越绝书》(卷八):“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隋书·地理志》:“(俚人)有(铜)鼓者号为‘都老’。”朱余之朱、都老之都,皆摄事之主也。朱卢即都路,意即骆越所居。按王力古音系统,朱,赤(ta'da)也,炎(dan)上之火色,音近义通,同声互训,都在端母。海南多、都、大、三、东等齐头地名多与朱(du)赤(ta'da)同源。三与东,前人多未留意。岛南的三亚(dan ngai)与珠崖军、多银水相呼应,亦当珠崖之又一别写,海口的三亚坡亦即珠崖坡,而苗呼黎为嘟唉亦珠崖另一民族语。惟德挑赴琼郡饷东坡的三山之水,东坡赐名惠通,而其村今日东山,汉写之异。陈秀云跟我证实,三(琼音da)作村名多读dan(琼语东),此亦与笔者一向主张东猫或即珠崖相印证。侗台语族、甚至祖出闽浙沿海的南岛语族等曾经的生活带,皆有音du齐头的地名,如壮族都峽、侗族都匀、五岭之都庞、汉九真郡都庞县(今越南境内)、彝地朱提(tu shi)、钱塘朱余朱储。犹如“亳”移动不居,“京”须冠名才成立一样,珠崖亦移动而不主一地,且不限于海岛,如商周时有朱方及其属地丹徒、当涂,又如宁波鄞县秦汉时故名赤董,或皆曾经的朱崖朱垠。班固《东都赋》“北动幽崖,南赳朱垠”,朱垠界址何处,尚可议也。琼州海峡南北古代地理称谓还有如朱元、珠官等。朱元,古音近乎“东莞”今读,今闽语元依然读如管。汉交趾属县朱鸢之鸢,从弋,《汉书》译亚历山大(Alexandria)为“乌弋山离”,“弋”对应的是“xan”,音[gzæn],与朱元之元、珠官之官,皆同音,系易代异地之别写。此题展开还牵涉崖台僚赛徕卢黎黎佬佬等音义源流辨析,容某另著文。总之,珠崖与南方诸多古代史语地理相关,唯独与汉语之珍珠、海崖无涉。

媚”,“大文贝天姿灿烂”,美则美矣,但皆想象加修辞后的土音汉写,一如“引言”所及之汉译之郡名“交趾”。

紫贝或为吉贝汉写之讹,绝非刻意立异、随兴附会。除了符合语言学音变规律外,紫贝之为吉贝之土音汉写还可与其族群工艺、史地名物、政史演进相融通。试论之。

首先,吉贝,语系中举凡印欧、南亚、汉藏或南岛,几乎古今通音。唐代慧琳记载了“劫波育”“劫贝”“迦波罗”三种对应“吉贝”的汉写。(《一切经音义》卷一)先唐史书多写作“古贝”,如三国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南北朝的《宋书·呵罗单国传》,以及《南史·林邑国传》《南齐书·扶南传》《梁书·中天竺传》《旧唐书·林邑传》等。宋人以为“吉”之讹,如李石(《续博物志》卷八),甚至妄生分别,以为是两物,如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或如彭乘知呼古为吉(《续墨客挥犀》),等等,殊不知非在雅俗而在古今。吉、古,还有壳,古音同在见部,只是汉字记音耳,非误亦无别。今天文昌人把“鸡”读作“鸽”,亦即此类语言现象。

南亚次大陆上,吉贝拟音,梵文念 kapassi,印地语念 kapas,孟加拉语念 kapase。众多南岛语系的语种不外 Kibe(如台湾鲁凯语、印尼语、马来语)、kihei(如夏威夷语)、kive(如台湾卑南语),与之对应的“棉”则明显同源,皆作 kapas。棉与吉贝同源,藏缅语亦然,藏语两者的读音分别是 gyüdpä、pala,缅甸语分别是 kyeebae、katpa。壮侗语中,不仅岭南诸语种中“棉”已成汉语“绵”的借词,东南亚的泰语和海南岛的黎语这两种语言中棉花也都与吉贝同源。刘剑三教授曾诲我曰:“海南闽语吉贝作吉贝绵。吉贝,海南闽语叫 kabua,又叫 kabuimj,是一个合璧词,后面的 mj 是汉语棉的海南闽语音读。”归纳起来,剥离汉语的接触影响,在南岛语底层诸语种、藏缅侗台诸语种中,吉贝与棉同源,甚至完全同音。

其次,海南岛上的侗台语族不仅没有缺席早期岭南的纺织文化,而且是中古江南纺织业产业升级的技术输出地。与今名“文昌”和故名“紫贝”相关的名物,世传文献中只有“床栅山”和“紫贝岭”,而文昌先宋历史上,仅见的事件却是东獠族擅长织贝。假设几者之间存在牵连,不能说虚妄。其理如下。

宋初《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九):“床栅山、紫贝山元属紫贝县。”《正德琼台志》(卷二七《古迹·文昌》)载:“紫贝县,在县境紫贝山下。”既然是山岭,又不临海,那当然是陆生草木之属,紫贝岭为吉贝岭才更合理。吉贝蕃茂,故谓吉贝岭,如潮州之有吉贝埔。又如“引言”所及,文昌土著东獠人正是以纺织吉贝布闻名于史:“獠人居文昌东獠山,旧说其人形如猿獠。地多田少,种薯芋给食。纺绩吉贝,细密莹白。”(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三)就今天的传世文献看,其中“旧说”至少可追溯至宋代王象之编的《舆地纪胜》(卷一二四)。清代绩溪人程秉钊在《琼州杂事诗》中载录有一首混搭了汉、临、黎、东獠四个族群的诗:“东獠妇人嫗女工,纺车轧轧山花红。古逻答博往前县,寻个官娘卖布笼。”程氏解说道,少数民族中,古逻即小帽,答博为系腰之物,前县即县前,汉人称上户之男曰官、女曰娘,又详细注释:“东獠山,在定安城东一百里,其乡之民,如猿獠然。獠妇纺绩吉贝布缕,细密莹白,谓之布笼。”虽然事相名物混搭,却也自然天成、和谐相安,而透漏出的个中消息即如“引言”所预说:纺织吉贝乃是文籍荒陋的先宋海南史上最耀眼的人文。

不只东獠族,侗台语族善织吉贝布更是普遍而久远。汉至唐,侗台语族群带以卓越的纺织吉贝布技术显耀史籍。《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了汉代永昌郡哀牢夷织广幅布的事:“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哀牢夷族属虽有争议,但永昌的哀牢夷属于壮泰语族则无异议。至三国时期,岭南百越民族纺绩吉贝布已是品类繁多、色彩纷呈,如万震《南州异物志》载:“五色斑布,似丝布,古贝木所作。此木熟时,状如鹅毳,中有核如珠珣,细过丝绵。人将用之,则治出其核,但纺抽相牵引,无有断绝。欲为斑布,则染之五色,织以为布,弱软厚致,上毳毛。外徼人以斑布文最烦縵,多巧者名曰城城。其次小粗者名曰文褥。又次粗者名曰乌驩。”壮泰族,乃岭南百越之主体族群之一,当然预乎“南州”之中。其水平至南北朝更达空前的高度,刘宋武帝时,“广州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制岭南禁作此布”(《南史》卷一《宋武帝纪》)。唐宋当然愈加繁縵,刘恂《岭表录异》佚文载:“古贝木,其花成对,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与苧无异,(曰吉贝,俗呼古为吉也),多紫白二种,亦有诸色相间者,蛮女喜织之,文最繁縵。”(雍正《广西通志》卷九二引)宋庞元英:

“闽岭以南多木棉,土人竞植之,采其花为布,号吉贝。……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文昌杂录》)

同时期的海南岛,其主体族群不论黎临,皆侗台支裔,虽文献极少,但纺织记录,竟能大体呼应岛外记录,如《汉书·地理志下》载:“……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纡麻,女子桑蚕织绩。”李勃认为这里的民男民女,主要是临高族^[1]。鉴真第五次东渡流落海南,于玄宗天宝九年(750年)抵达崖州(其时文昌系属之),亲见当地百姓“十月作田,正月收粟;养蚕八度,收稻再度。男着木笠,女着布絮。人皆雕蹄凿齿,绣面鼻饮”。^[2]所谓“女子桑蚕”“养蚕八度”未必如实地闻,或是根据所见之织绩布絮传闻或推想,姑且不论。但据同时期史料,取吉贝织布,当是闻见实录。文宗太和或开成年间(826—840年)崖州刺史、崖州招讨使韦公干,贪墨蓄奴,其中纺织是奴隶重要事务。据《投荒杂录》,其时海岛纺织花样繁复、技术高超:“执业者太半,有织花缣文纱者。”(《太平广记》卷二六九引)又据《新唐书·地理志》,唐代振州进贡的重点之一也是“斑布”。又据《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琼州、土产”记载有“苏木、蜜蜡、吉贝布”;“风俗”部分记载夷黎“绩木皮为衣,以木棉为毯”;“万州、风俗”记载,“女人以五色布为帽,以斑布为裙,似袋也,号曰‘都笼’;以斑布为衫,方五尺,当中心开孔,但容头入,名之曰‘思缠’”。《太平寰宇记》的主编乐史为五代宋初人,所载当是先宋海岛风情。唐以后记录“妇媪以织贝为业”之类的史料不胜枚举。而问题在于,虽然岭南海南百姓皆擅长织贝,但宋元以后反哺江南的却不是地缘相接、交流频繁的两粤,衣披天下的黄道婆所学技艺反倒是来自隔海岛民。这说明海南地界的族群是壮泰语族纺织技术发展的最后引领者。

第三,汉语中织贝与紫贝在音或义层面,多重接触、反复黏连,彼此存在发生学或接触语言学的关系。古汉语中“壳”“贝”两字,音连绵而义互文,贝是壳的象形,最早也未必是水族甲壳类,他如贝叶、贝裘,海贝只是其外延之一。汉语视域中,“贝”与“布”音义尤其紧密相关。吉贝绵正是取自吉贝之壳中絮^①。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载:“鬲宾以南,大者成树;以北形小,状如土葵。有壳,剖以出华如柳絮,可纫以为布也。”鉴真在海南岛所见吉贝絮所制衣,记曰“布絮”,布絮、贝絮,布与贝,几乎可视作假借,粤语“贝”至今仍读作bui,且由来极古。《尚书·禹贡》载:“岛夷卉服,厥篚织贝。”《诗·巷伯》云:“萋兮斐兮,成是贝锦。”《诗》《书》中的织贝、贝锦,皆布之一种。

所谓“织贝”,织是文彩交织,贝是布匹锦缎。前文所及之广幅布就是吉贝所织。近代以来有学者如邵望平、顾颉刚、夏鼐、林惠祥、凌纯声等,依据民族学田野调查所见^{[3]637-639},认为《禹贡》所载织贝乃贝壳串缀。这种说法其实早已有之,伪孔安国传就以为水产,但孔颖达注意到郑玄的说法与之不同,而是认为是织品,并引用郑注《诗·巷伯》时所说:“贝,锦名。《诗》云:‘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凡为织者先染其丝,乃织之则文成矣。《礼记》曰:‘土不衣织。’”郑玄引证《礼记》出《玉藻》片:“土不衣织,无君者不貳采。”实际上作纺织品解是无疑的。《禹贡》一篇尚有“织皮”“织文”成词。顾颉刚的弟子刘起釭也认为当作织品解,且举文中内证:“《禹贡》兖、青、荆、豫诸州‘厥篚’例之,人篚者皆丝织物。则释贝锦较合,言其物由染丝织成,意谓丝织品上仿织贝的花纹,称为‘织贝’。像后世织的美丽的锦缎一样。”^{[3]637}总之,“织贝”之“贝”非海贝,“织贝”不是贝壳串缀,当解作贝布,为织品,东坡、蔡沈也皆无异议,且援《诗》《书》互证^②。

因传播的步调路径各异,上古音、中古音在南方总是纠缠重叠,织、紫、绩、吉、古,从舌尖到舌根往复移动,以至于彼此孳乳相混,亦属语言之自然。织贝之织,古音在章部,与紫贝之精部,两声纽只有舌尖前和舌尖中之微异,而在南方早已浑融,以粤语广府片为例,紫和织,声部都作z[ts]。上古音照二归精,紫在精部,吉在见部。但南边方言吉多在舌面,与今普通话一样,只是调值为入声。“纺织”一词,古文献也常常写作“纺绩”,织绩之间,正是舌面舌尖之之别。故紫与吉,在某些传播时空,区别只在尖团。精母见母之间在一种语言内部并不容易通转,但两种语言、多样方言、动态空间和数代接触,期间重译

①“贝”与“布”,代表织品同时,又同为通货——钱币的专有名词。

②蔡沈《尚书集传》:“织贝,锦名,织为贝文,《诗》曰‘贝锦’是也。”然略为遗憾的是东坡后面虽引了“成是贝锦”,却依然认为是以海贝为喻:“南海岛夷,绩草木为服,如今吉贝、木绵之类。其纹斓斑如贝,故曰织贝。”(《东坡书传》卷五)东坡既已揆测到卉服有如吉贝,却仍以海贝之斑斓以解织贝之贝,可谓未达一间。

转写,精照尖团完全具备通转的条件,并不违背汉语音变规律。

第四,吉贝,一种自然之物,却能作为这片地理上最显耀的人文,参与到紫贝县之后的历史构建之中。如“引言”所提领的观点,从紫贝到文昌,其间的因果也正与吉贝有关。元帝罢弃珠崖后,虽有屡有征抚,但都不得其地,紫贝县以及整个海岛,长期重新处于原始自治状态,只在名义上被遥领于合浦徐闻等,直到隋唐才重开郡县,先曰“武德”,后改“平昌”,最后在贞观元年定为“文昌”。此前五六百年之所以不得其地,与治理者贪暴有关。《后汉书·南蛮列传》载:“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这里的广幅布,就是吉贝所织。赵汝适《诸蕃志》(卷下):“吉贝……南人取其茸絮……不烦缉绩,以之为布……或染以杂色,异纹炳然,幅有阔至五、六尺者。”还具体指出此物乃海南岛上的女工纺织:“得中土绮彩,拆取色丝,加木棉挑织为单幕;又纯织木棉吉贝为布。”再次纳入中原王统时,甲方再度用上了武德、平昌这种内藏商金杀伐之气的邑名。但幸好随着唐太宗偃武修文,很快就更“平”为“文”了。

总结起来,吉贝之为物,其音天下大同,且在南岛语族和东南亚、海南岛的侗台语种中又与绵布音义同源;汉语中贝是壳的象形,早期未必水族贝类之专名,而贝和布,紫贝、织贝和吉贝,彼此存在多重接触、反复黏连的接触语言学关系。所谓紫贝,实非紫贝,音记紫贝耳,当为吉贝土音之汉写之误。先宋海南文籍荒陋,文昌土著却能以擅长纺绩吉贝而见载史志,故不惟紫贝岭为吉贝岭,紫贝县邑也因物产吉贝、民擅织贝而本名吉贝。所谓紫贝,实非紫贝,音记紫贝耳,当为吉贝土音之汉写之误。不仅讹误符合汉语音变规律,移接也折射出中原王朝对南国倚海民族风土人情的一贯想象。且吉贝既是历史的本身,又参与了历史的构建,对于诸如吉贝布等特产过度征调诛求,是珠崖郡县化历程迟滞五六百年的主要原因之一。“民善织贝”这一现象,大大溢出文昌一邑,也远非东甯妇女一家之长,不仅出现在海岛临高语族带,还可见整个汉唐壮泰语族密集的百越地区。这种溢出现象,既互证了这一时期文献视域中的文昌及海岛其他族群主体皆属于侗台语壮泰语支,他们以擅长织贝而名闻中原,又显示出文昌地界上族群间相互学习增益、海南侗台语族群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终成为反哺内地诸族的技术标兵。

三、文昌与人文:从山村林郭到文明昌盛

史地名相之音义传递,免不了几番双关、反复孳乳,然本身并无关是非对错,甚至载记变迁中,历史似乎自有追求“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陆机《文赋》)的演进冲劲,如原本史志作迈蓝(又或梅蓝、美南)的美兰(海口机场所在镇),史志原作买榔的美榔(澄迈双塔所在村),皆可见书写者赋予其韵致之用心。具体到文昌,最早由吉贝而紫贝,情有可原的误写后面,也包涵了不失美丽的绎读。而“文昌”易“紫贝”,也有音义天作偶合之处。紫贝本就叫“文贝”,“紫贝”一词最早见于《楚辞》《史记》,“文贝”则出现在更早的《尚书》《山海经》等文献。也难怪东坡传解《禹贡》时会误把“织贝”解作“织如文贝”。文贝、紫贝、文昌,虽别有演变之机缘因果,却也得天然形似之巧合。而平昌、文昌之“昌”则最初肯定有意因土语之便,取临音就汉义。试论之。

上文已提及的《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记录了紫贝故县有“床栅山”,编者乐史是五代后唐时生人,所录传记资料当源自唐。“床栅”,中古音都是舌面前音,近似 siang sa,就是今天的“昌洒”。显耀于近现代的宋氏家族,其先人于两宋之际卜居于此。昌洒有“三十六昌七十二宝”之说。^①按察图志,文昌

①七十二宝,指有极多含宝、抱、保等音的地名。一般以为,以 bou 或 bau 齐头的地名是黎族中哈族的遗存。据刘剑三统计,以 bou 或 bau 齐头的村名,在今天汉族地区文昌琼海有近 80 个(琼海 12、文昌 67),而汉族县市除了临高 37 个外,其他只有个位数。(据刘氏稿本《临高语族群的迁徙、分布变迁及其历史地位》)这个倾向属于侗台语族黎语支的名物,即使在今天黎族聚集区最多出现的乐东也只有 51 个,大幅低于文昌一带,与南宋之前就有“文昌无黎”说非常不协调。司徒尚纪统计数据略有出入,但文昌数据异常突出这一点是一致的。(司徒尚纪《广东地名的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 第 1 期,第 21-55 页)结合专属临高族“昌”地名,可以得出一个较清晰的文化族群历史变迁图:哈黎最早从文昌登陆并长期定居,留下了“七十二宝”之地名;之后临高族后来居上,譬如积薪,又留下了“三十六昌”临语地名;而至晚到南宋,汉语闽南方言语族接踵而至,以致临高人渐次退至南渡江之西,文昌话终成汉方言海南话之正音,而临语到明代已然只能叫西江黎语,今天更是进一步就地望而收缩曰临高语,琼澄一带的翁贝语反而成了临语在临高区域之外的遗响。此别是一题,亦容另辟专题论述。

及周边,带“昌”或“苍”的地名,举目皆是。以韩槐准、岑家梧开启的海南现代考古的起点“昌洒”为中心,星罗棋布着诸如昌浩、昌律、昌茂、昌武、昌润、昌爱、昌贤、昌述、昌图、昌元、昌吉、昌阳、昌闹、昌烈、昌桐、昌田之类的地名,文昌其他地方另有如昌会、昌汉、昌文、昌福、谭昌、塔昌等等,不胜枚举。文昌之外,岛上其他带“昌”音的地名也遍见临语族地区,可以肯定,皆是临语汉写。昌,临高语是山或山林的意思^[4]。刘剑三教授曾跟笔者介绍,临高县波莲镇的“昌乐村”意为深山村,新盈的“昌合”意为被围合的山林。床栅,意即名叫栅的山,史志所加之山,是汉写增累所致,并改临高语齐头为汉语齐尾。

更关键的是,“昌”音临高语指“山”,不见于其他壮泰语,黎语“山”也与“昌”无关。这可证,在侗台诸多语种中,这个音义仅出现在临高语。海南大量以昌命名之地也只分布在临高语族群带。中国境内还在使用的侗台语中,也只有临高语念 saŋ,且只有澄迈和琼山的临语作如是音,连岛上西部儋州境内临高人聚集的原和庆区都大异其趣,后者山读如 dia,乃借自海南闽语。内地有且只有广东吉兆话作 tsaŋ,而吉兆恰是公认的大陆仅存与临语高度一致的语言孤岛。隋唐以“平昌”“文昌”为县邑命名,可见紫贝故地已为临高语族奄有。至少在南宋王象之编《舆地纪胜》之前,文昌境内已基本无黎了。《舆地纪胜》(卷一二四)“广南西路·文昌县下”：“贞观元年更名文昌,《琼管志》云：‘诸邑皆邻黎洞,独文昌无之,民稍淳朴。’”是为“文昌无黎”说。而曾分布在铜鼓岭为中心大片土地上语言独立的獠人,在明代方志中也成了旧居之主：“东獠山,在县东一百里水北都,山下旧居獠人如猿。”(《正德琼台志》卷五)正如何以端先生感慨东部铜鼓岭为主峰的滨海丘陵区仅遗留獠人的传说了。(《黎峒志》稿本)总之,从吉兆语可知:与粤地临高母族分离前,临高族就以昌为山;而文昌之昌,在临高语,至隋唐是山而非昌;在汉语,至宋元,已是昌而非山了。

至于“文”,本意村落、聚落,乃是临高语中族群特色词之一。临高人自称村人或讲村话的人时,“村”的发音就是 vo。这个音在唇齿之间移动,或是唇齿音作“武”“扶”“文”、或是重唇音作“贝”。^①抚与武,临高语地名屡见。紫贝故地,隋置县曰“武德”,其时其间还有地曰“扶山”。故武德之名也当是土音汉写。唐武德五年县名“武德”改“平昌”,一则避当朝年号,二则有意置显耀武德之“平”于土音“昌”之前。至于作“山”解的“昌”,是扶山还是抱虎山,抑或东獠山、铜鼓岭,则不得而知。五年后的贞观元年再改“平”为“文”,遂有了千年不变的新名“文昌”,其土音本意只是“山林之聚落”。澄迈县桥头镇,是临高语的核心地带,今天也还有叫“文昌”的村。这可作“文昌”乃临高语记音之一小旁证。元代至顺前,文昌的县治一直在今址偏北约三十公里的东路镇潭豹(布)村,位置刚好在抱虎山与铜鼓岭西向夹角处。然不论土音何意,由紫贝(吉贝)而文昌,如“引言”所提领,一旦书作“文昌”,汉义的“文明昌盛”必然取代临语的“山林之村”,从此也必将形成充满汉语意蕴的人文传统。文昌者,昌茂文德也,主词在文,昌是愿望。文与昌合成的词甚至荣为天上星座之名,神格化曰文昌星君,主文运功名。文运功名,在读书士子,止于一人之运遇成就,而在邦国天下,文运乃是文明之道,功名系乎治平之德。这也是为什么政典常称尚书省为文昌天府的原因所在^②。总之,紫贝新名“文昌”,乃是借汉语音译以赋人文之新义。

“文之为德也大矣!”(《文心雕龙·原道篇》)“文”这个事体,本相、德性太浩大了,内涵、外延太弘深了。有多浩大弘深呢?刘勰说:“与天地并生。”(《文心雕龙·原道篇》)“文心”之“文”本指文章之文,属于人文之文,之所以堪与天地并生,是因为在古代东方先贤看来,人之文源于天之文,文心文德与天地造化同质共生,故能肆于外而弘于中,如地之广又齐天之大大。《文心雕龙》的这句开篇语可当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东方精神的命题之一。从刘勰这里溯源衍流,可发现,中国文化的名物体系中,“文”是一个可

①这是一个关乎侗台语族研究全局的问题,目前研究成果众多,意见分歧也严重,可参看:王文敏《临高语“村”的地理语言学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唐有伯、郭安胤:《古越文化与粤琼地名演变关系例考——兼论海南临高和广东吴川的关系》,《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宋长栋《试从地名探讨海南岛“临高人”的源流》,《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宋长栋《岭南地名中的若干文化内涵》,《肇庆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62-66页,等等。我认为,黎语美孚黎之“孚”、黎语润方言区之“芳”、黎语加茂方言区之“芬”、昌化江哥隆人之“芳”,甚至广东西江流域众多称“云某”的地名中的“云”,壮侗语族中众多“布某”之“布”,乃至各种包括南亚次大陆的各种物、抱、班、番、美,都有必要在这个理路下整体审视。

②上文所引北宋《文昌杂录》之“文昌”即取义于此,杂录撰者庞元英在尚书省四年之闻见。

与“道”并列的第一等概念,外延更是博及自然社会的方方面面,二分之则为天文、人文。天文即自然,人文即社会,天地人文,遍赅古往今来、宇宙上下的一切。

寥寥四画的“文”,为何有如此博厚深广的统摄力呢?训诂考源,《说文解字》(卷九)给出的定义直观朴素:“错画也。”就是笔画交错的象形。“乾道至简、坤道至易”,正是这朴素简易的“交错变化”,成了中国古典文明中对事物最穷尽、最极致的概括。古人认为,差异、变化是世界万物相互独立、名相彼此确认的根本。《国语·郑语》所谓“物一无文”,文一亦无物,又曰“同则不继”,意即同则无新生。事物之所以持存,正在于彼此文理不一、形色各异,即《系辞》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交错变化”则“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总之,文即变化,文理相变,便有了纷繁世界。群经之首的《易》就是推衍事物发展变易规律的。《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完整的意思是《易》以道阴阳之变化。先贤据此推演吉凶祸福,推演的符号叫“爻”。爻和文,都是“交”的象形,亦皆交错变化之意。故《周易·系辞下》曰:“道有变动,故曰爻。”又说:“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等者,类也,有等,即成类,成类,即成性成物。于是,万物交杂,总谓之文。概括起来就是,爻、文、物,三位一体,爻是物的变化,文是变化的物。

《易》有一卦,上山下火,曰贲。贲之本义是纹饰、装点,升华成卦,旨在以“山下有火”之象昭示“文明初度”之义。贲卦之彖辞将文理交错成象成物成性的这种古典东方掌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进一步萃取凝练成世界观、文明观,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刚柔交错,即阴阳变化。文明以止,则用了复杂的修辞。贲卦上“艮山”下“离火”,成“山下有火”之象,彖传的作者在这里将“艮山”之象的“限止”之德发挥出人的“行止”之义。止,本即脚趾的象形,是趾的本字,“行止”“活动”确属“止”的根本义。文明以止,即以人的智慧、行动让自然之文得以发而明之、运而用之,^①从而创成文化、天下文明。换句话说,就是通过认识自然之文,利用自然规律,创造光明,照亮天下,从而告别蒙昧、永辞长夜。有趣的是,这与英文Enlighten(启蒙)把光照进去的取义立象完全一致。孔颖达疏解“文明以止”作“裁止于人”,倒也妙合现代哲学的思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人类活动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正在于合规律、有目的^[5]。合规律,就是要求符合自然之道,即合乎天文;有目的,是说最终裁止于人,即成就人愿。总之,文明以止,人猿揖别,山下有火,文明初度:文之在天,日月普照、草木喷华,自然之道也;演进于人,改换天地、焕发文章,造作之功也。贲卦这句卦辞将天文、人文、文化、文明等这几个涵摄自然社会总体的概念全部囊括其中,而核心词就是一个“文”字。

“文”之形至简至易,“文”之义浩大弘深,如上文所说乃可博及自然社会的方方面面。日月叠璧曰天文,山川焕绮曰地文,记录语音的符号谓之文,著诸书帛的文章亦谓之文。《礼记·乐记》:“声成文,谓之音。”可见,音乐在文。《论语·宪问》:“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雍也》篇又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见,礼乐在文、君子在文。《国语·周语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可见,人内在的优美品质,无外“文”之表达。《逸周书·谥法》:“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可见,人外在的卓越事功,亦皆“文”之践履。而内外修治至内圣外王之境界者,在帝尧称“文祖”,在周庙称“文王”,孔子更以“斯文”自任,而后人亦美其名曰“文成”。

古典中国的天人观,有天人相分(如荀子)、天人相胜(如韩愈)、天人相补(如《列子》)、天人相副(如董仲舒)、天人相感(如《书·洪范》)诸说,影响最大的是天人合一说。天人能合一,基于天人同源同构之假设,即天人一体观。虽曰本就合一、应该合一,但能否合一,还得看天人相感与否。相感才是判定易道吉凶、人事悔吝的关键,其精义见于《易》下经之首的咸卦。山泽壅塞,则曰损,阴阳离绝、无家无国;

^①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上》),前人多不得其解,甚至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之代表。其实,备者,用也,繁体作備,是人资鉴万物、尊重天理的意思。下接“反身而诚,乐莫大焉”,隐微有《大学》“八目”之“正诚格致”之旨,即格物致知以至于诚,乃《易传》“来物”、《礼记》“格物”之孟軻氏表述。可与《礼记》中《礼器》篇“大备盛德”、《祭义》篇“博施备物”对勘。

泽山通气,是曰咸,能感而有感,万物化生、天下和平。然天人合一,侧重以人合天。其实古人还有一层更富人情的主张,即天人相酬。天人一旦相感,必往来相酬,“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占断或亨或吉,天地因人而着色,人文因天地而化成。天人之际,相辅相成,事象既如云从龙、似风从虎,占断得无亨通大吉、文明昌盛!这正是前文已阐发的山下有火、天下文明的贲卦之精蕴:天文刚柔交错,自然示现,以文启人,人反过来文明以止,发明天道幽微,再运而用之、通而行之,于是人文创生、化成天下。不循天行之常,人必不能胜天,而江山如有待,亦必人来开新天。河图洛书的传说正是出于天酬人的观念,而敷土平治天下的禹迹故事则是人酬天的表现。

总之,汉写而别生新意的邑名,在淮南、江南、岭南等故楚故越之地随处可见。以前学者词语名物考古,往往只溯源民族本音本义,而未及汉语新写赋义这一层,甚至用前者来否定后者。临高有文昌村(属临城镇),文昌有临高村(属昌洒镇),临高、文昌不妨碍移译接受成汉义,但究其本源皆临高语地名。“文昌”之临音本义之山村到汉语的文化昌明,甚至天上星官,从新写赋义的视角看,新旧相须相续,两说并行不悖。而文之时义大矣!以之名邑,尽得汉语文化之精髓,这个名字也果然给这片州城山水民人带来不凡的人文身世。

四、余说

天人相酬之间,文之为德、文之时义,何杰华曾以“天以文示人,人以文承天”一言以尽之。他精妙的总结正是基于对这个叫文昌的古邑的深度走读。其为此邑所作传的副题曰“邑以文名”,也正是指出“文”才是此邑之要领肯綮。他曾以设问的形式来描述其人文蔚起的盛况:

她立于古之南荒,却名唤“文昌”。单是明清两代,这座在当时人口总数不足3万的小城,却有文武举人137名,进士16人,“一里三进士”“七里八举人”“四代三举人”“师生同榜双进士”……至近现代,则名人迭出……这座至今总人口数仅60万的小城,是如何做到的?……她勇敢向深海更深处迈进,小心地记录遇到过的各个岛屿、沙洲、暗礁,“一不小心”便为我国南海的主权确立留下了铁证;作为华侨之乡,……至今仍仅60万人口的文昌,却有120万的侨胞。她的勇敢从何而来?真的只是被生活所迫的不得已的逃亡?^[6]

书作之眼、话题之主,当然是“文”,而通览何杰华的《邑以文名:文昌传》,这个“文”乃是毫无杂质的纯粹的人文,从章题如“希贤希圣,溪北书香”“舟行南洋,老宅守望”“九天揽月,旌旗猎猎”等即可知,他是在写海岛的正音、琼侨的乡愁、游客的远方和飞天的梦想。但人文之外,还有天文,传记的遗憾是点墨不及文昌风物形胜,往圆满了要求,在土,这是半壁,在玉,就只是玦了,望他日后能补作下篇,补上七洲洋、木兰头、清澜港、八门湾、铜鼓岭、珠溪河等一众山海记忆,补上龙眼荔枝、花梨紫檀、石林椰林、紫贝吉贝等此间物华天宝,以及台风过境时天兵天将八百里分麾下炙的浩荡。

文质彬彬的中华文苑,只有“传”这种文体,完整地通行于经、子、史、集四部。最早传只是经之附庸,如《诗》有鲁齐韩毛四家之传。两汉时《论语》《孟子》这类诸子书因为旨在阐释经的精神,所以被引述称作《传》。太史公首创“列传体”后,由“经”“子”辗转而来的传体,反而成了史部的正宗文体。正经正史通行既久,传体名实再度旁逸斜出,一旦不囿于纪人,便藉志物以讽人,如韩愈《毛颖传》。如此,传之体又从儒林、诸子、史部三迁而入文苑,成为寓言、志林等不拘抒情说理的集部文体。何杰华近作《邑以文名:文昌传》,就是这么一部集史志、列传、游记等文体要素,又沾满自媒体时代气息的传体文学作品。而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理路一样,传记多半也是在表达传主和传者共同的心相。此作既是我们文学史研究者观察新时代传体文学的样本,也是何氏个人文学趣味、文化精神的写照。有考据习气的我,一则忍不住对紫贝、文昌做一番我的学养基础上的知识考古;二则不嫌堆垛,从经学史、道学史角度为“文”做一次传注,亦以开掘何作之文化内蕴,尤其“天人相感”必“往来相酬”的文明寄意。

有意思的是,贞观以降,黎情虽从未完全绥宁,但较之海北动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兵祸,海南确也算差强人意了。本文导入时引用东坡和陶诗“黎山有幽子……遗我吉贝布”,又曰“稍喜海南州,自古

无战场”,正可视为文治优于武功之结果,而恰好从紫贝到文昌,吉贝正是文武纠缠中始终在场的事物。

参考文献:

- [1] 李勃. 汉代海南岛民户初论[J]. 新东方, 2015(01):25-29.
- [2] 真人元开. 唐大和上东征传[M]. 汪向荣,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79:69.
- [3] 顾颉刚,刘起釪. 尚书校释译论:第2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 [4] 刘剑三. 海南地名及其变迁研究[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31.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
- [6] 何杰华. 邑以文名:文昌传[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24:《序》1-2.

(责任编辑:李莉)

On The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A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the Name Changes of the Ancient County of Zibei and Its New Biography

ZHOU Quan-gen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2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writing of the Dongpo spirit on Hainan island and a new biography of an ancient county, conducts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its relevant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phonetic, and cultural names, while also revealing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mutual interac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and "reciprocal exchanges". The Baiyue women were renowned for their textile technology in medieval history, especially the Dong Tai dialect group in Hainan, which has become a technical model for feeding back other ethnic groups in the mainl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Wenchang are recorded in history for their skill in weaving shellfish, which shows that Jibei is the most brilliant human and geographical aspect in the pre-Song Hainan. Jibei is an object, and its pronunciation is universal, for among the main languages such as Austronesian, South Asian, and Dong Tai, it shares the same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as cotton and cloth, especially at all levels of linguistic archaeology in Hainan Island, where it shares the same origin as cotton and cloth, and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in a special way. As shown in the further analysis and synthe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genesis and contact linguistics, the ancient land of Wenchang was, as is believed, known as Jibei due to its natural resources and skilled weaving of shells by local people, hence the name Jibei, which is recorded as "Zibei". This is a mistake in the Chinese pronunciation of local names, similar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southern place names such as "Zhuya" and "Jiaozhi", which reflects the imagination of the Central Plains as to southern coastal ethnic groups.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Zibei County was renamed "Wude" and "Wenchang", both of which were of local dialect pronunciation but written in Chinese with a new meaning, for "Wen" and "Wu" both meant settlements, while "Chang" referred to mountains and forests, which were exclusive words for the Linyu ethnic group. And once the Chinese meaning of "prosperity of civilization" replaces the Linyu's "village of mountains and forests", it would inevitably form a humanistic tradition full of Chinese connotations. "Wen"(Culture) is a first-class concept that can be matched with "Dao", and it is the link and result of mutual achievement between heaven and man. Since the ancient capital is named for its culture, it must be dedicated to culture and expect to flourish.

Key words: Zibei; the Dong Tai dialect; textile culture; Wen(culture); a history of Hainan



海南中元赈济运行机制与地方社会互动

——以海口白马梁公信仰为例

李双¹, 褚春霖²

(1.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民族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2. 中共平凉市委党校 行政学院, 甘肃 平凉 744000)

摘要:“中元赈济”是琼北民间举办的中元节中针对鳏、寡、孤、独、残疾者的一种社会救济活动,融合了赈济文化与中元节习俗,凸显了海南传统节日具有社会公益性的特征。文章以海口市有较大影响力的白马梁公庙为例,通过释读碑文和田野调查,探讨海南中元赈济的由来、运行机制及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关系。“中元赈济”是中元节俗在海南本土演化的结果,与海南的民间信仰文化和社会公益事业紧密相连,具有显著的地方性和互动性特征;“中元赈济”的出现,使人们对中元节的关注逐渐从传统的祭祀转向了社会救助和慈善活动。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下,挖掘传统节日和民俗文化的积极因素,既激发了传统节日民俗文化的活力,又促进了乡村文化振兴。

关键词:中元节;中元赈济;地方社会;海南;白马梁公

中图分类号:K89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25)01-0130-11

中元节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节日,也称盂兰盆节、七月半、鬼节等。同清明一般,都是祭祀鬼魂的节日。有所不同的是,清明主祀祖先,中元除祭祀祖先外,还需给无人奉祀的孤魂野鬼施济。这样一个古老而神秘的节日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太史文在《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一书中讲述了唐代鬼节的主要活动及其意义,分析了“目连”的形象及中元节俗在中国的传播与扩散^[1]。高洪兴^[2]、吕鹏志^[3-4]、许春清^[5]、陈雄^[6]等诸多学者就中元节的起源、流变、发展等问题,从不同视域开展了论述。另外,地域性的中元节俗研究也是学界较为关注的,王琛发教授以海口府城的中元节俗为例,考述了海口府城中元节的发展与演变^[7],高泽强教授从海南中元节的来历、民族融合的节日、忌讳、特色等方面探讨了海南中元节文化^[8]。从中可以看出,对中元节赈济习俗的由来和演变历程还未被挖掘,故本文试对海口中元节俗中的赈济文化进行梳理和解析。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元赈济”是琼北民间举办的中元节时针对鳏、寡、孤、独、残疾者的一种社会救济活动,融合了赈济文化与中元节习俗,凸显了海南传统节日具有社会公益性的特征。但在整个琼北民间信仰文化中,“中元赈济”仪式的举办次数并不多,白马梁公境域上最近的一次举办距今已有二十多年,除村民们对当时举办“中元赈济”的情形记忆犹新外,白马梁公庙的碑廊中留存有(清)乾隆年间的两块碑刻,其上专门记载了“中元赈济”的相关事宜。2021—2023年,笔者曾先后四次前往海口市永兴镇对白马梁公“四坊十六村”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调查,并对“中元赈济”仪式进行了专题田野调查。由此知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海南‘村人’的村落民族志研究”(19ADD02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专项项目“海南民间遗存珍稀族谱与海上丝绸之路人口迁移路线研究”(23VJXG021)

收稿日期:2024-04-12

作者简介:李双(1988—),男,湖北随州人,法学博士,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民族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岭南民族历史文化研究;褚春霖(1997—),男,藏族,甘肃临潭人,中共平凉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教师,主要从事海南历史文化研究。

“中元赈济”只有在庙宇重修或境域内发生重大变故的情况下才会举办,巨额的经费需求使得境域内的民众无有余力承担。非常幸运的是,当笔者第三次进入田野调查时,意外得知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儒扬村和遵谭镇卜创村即将举办“中元赈济”,因而有机会亲身经历该仪式的举行。对比两村“中元赈济”,除举办仪式的境域地点和持续时间有所差异外,运行机制并无二致。带着龙泉、遵谭两镇“中元赈济”的调研材料,笔者又回到白马梁公境域,经过多次采访考证发现,“四坊十六村”举办“中元赈济”也是同样的情形。基于上述思路,本文探讨两个问题:一是海南中元赈济的由来和运行机制,及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二是如何发挥乡村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

二、以救济为名:中元赈济的由来

道教的观点中,农历七月十五是“三元”之一,即中元。史书记载,元魏以前并无“三元”的提法,“但有三官之称,而尚未谓之三元。其以正月、七月、十月之望为三元日,则自元魏始”^[9]。佛教以“目连”为其母求得解脱的故事出发,冠以七月十五盂兰盆会的称谓。现如今在海南民间,中元节和盂兰盆节的提法是并存的。谈及中元节,人们很自然的外加一句:“也叫盂兰盆节”。出现这样的情状并非民间大众对节俗起源的混同,而是千百年来王朝对佛、道两家各有倚重的偏颇,加之佛、道两家各自世俗化进程的差异所导致。

(一)中元·赈鬼

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着中元节祭祖、布施的习俗。民间至今流传着“七月半、神鬼乱”的说法。当天晚上,家家户户不光要为祖先烧香点烛、烧冥币、摆供果,也要在村边路口为路过的孤魂野鬼们制备一份,以此来求得平安。人们相信自家的先祖是最亲近的,自己是先祖血脉的延续,即便先祖去世也会保佑自己。但对于其他流窜的孤魂野鬼,人们更多的则是畏惧。在这种趋吉避凶的心理作用下,布施一份香烛纸火便显得无足轻重了,当然这只是大众社会心理解读的其中一种。在儒家学说的影响下,博爱、厚生、仁爱等道德思想深刻地塑造了海南乡土社会的主体社会观。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琼州府琼山县(今海口市永兴镇)的乡野先贤们体证善恶、感悟生死,构想到一些人“生无告、死无归”的凄惨境地,不免有些悲怜。故而邀集众人捐资积息,在雷虎岭白马梁公庙为无祀之魂济度衣食,并勒《南溟宝筏》碑以记,碑文如示:

自古有穷人而后有穷魂,但人之穷也,人恒得而见之,亦恒得而济之;若魂之穷不可见,不可见而魂于是终穷。然则谓魂犹食人食、衣人衣乎?魂不食,曷为有荐食之文?魂不衣,又曷为有设衾之典?独彼穷魂者,方其生固赫然人也。一旦填沟壑,委川原,极之战阵,死伤囹圄幽系及自创自缢,毒虫吞噬之。万有不济,其生无告,其死无归,遂令百年后风流云散,鹤唳猿啼。曾不得人间丝粟,人孰无情,谁能遣此。或曰其情则可悲矣,而气与我不相通,分与我不相属,奈何?夫古人尝有过荒郊而弗号溟漠而荐之者,情之所触,曾何隔于分与气哉?爰各捐资积息,以为济度衣食之费,不疏不数,每岁一举。敢云作主,聊表寸心。定其期则中元也,定其地则虎岭梁公庙也。乌乎,始是岁壬午,始会首王启盛,邀集合缘捐资。^①

赈济鬼魂本是中元节的主要内容,但从明正德年间到清道光年间的地方志中有关中元节的记载中并未看到中元赈济的信息。《正德琼台志》记载:“七月乞巧,用彩色纸糊作冠履衣裙,剪制金银纸为首饰带锭之类,备牲醴祀祖先。毕,焚之日烧冥衣。富室斋醮,焚纸衣以赈孤魂,谓之施設。十五日,村落庙堂作盂兰会荐亡。”^[10]在海南中元节的赈济孤魂和庙堂作斋是分离开来的,且赈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绝少有出现集资赈济的记载。《乾隆琼州府志》记载:“七月乞巧,用彩色纸糊制冠履衣裙,剪金银纸备牲醴祀祖先,谓之烧冥衣。富室斋醮焚纸衣以赈孤魂。十五日,城落寺庙作盂兰会。”^[11]《道光琼州府志》记载:“七月七日,乞巧。自初一日起,用彩色纸制冠履衣裙,剪金银纸为楮帛,备牲醴祀祖先,谓之烧冥

^①碑刻:《南溟宝筏》。乾隆二十七年。2022年1月20日笔者于海口市永兴镇建中村委会白马梁公庙所抄。

衣。十五日,城乡寺庙皆作盂兰会,富室斋醮焚楮衣,以赈孤魂。”^[12]

从中可以看出,乾隆、道光的方志中,均未提及有众人集资赈济的情形。加之上述碑文中记载:“始是岁壬午”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也就是说,类似雷虎岭梁公庙的这种赈济方式,在当时应属首创。这种对既定节俗习惯的改变,本身就是社会群体文化发展的具体体现和外表征征,也是地方民间信仰建构历程的局部缩影。这种借助既有的节俗习惯和特定的场域联系,将不同的群体联结成一个整体,能够建构起一个拥有文化认同感和地域归属感的村落共同体。一般而言,这种借助假想的“超自然力”凝结的群体,在特定的事项上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向心力,继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的日常生活。

赈济的地点选在白马梁公庙,首先得益于白马梁公在区域内特殊的历史地位,雷虎岭周边“四坊十六村”^①的村民将视其为“公祖”,以神明的形象存在于区域社会的集体记忆当中,成为这一区域集体凝聚力产生的媒介,而区域内的一切社会活动则紧密地围绕着白马梁公开展。中元赈济终归是诸多个体行为的凝结,唯有借助集体认同的文化符号才能更好地统一个体意见。其次,传说中白马梁公名为梁腾,琼州雷虎岭下潭榄(缆)村人,20岁中武解元,北宋淳化四年(公元993年)王小波起义,梁腾应诏平乱,被封“辕门守将”,后返琼奔丧,服丧期间因“神迹”而死,当地村民为其造坟立碑。其死后乡人多有祭拜,久之则有显灵。很明显白马梁公并非先天神祇,他的建构经历了人-鬼-神三个阶段,这也符合了人们济鬼的心理需求。再次,“公祖”的形象是以区域内保护者的身份而存在,保佑境内子孙不受孤魂野鬼侵扰是为职责所在。最后,白马梁公庙是雷虎岭“四坊十六村”共同的庙宇,本就是区域范围内的社会文化中心,中元赈济作为一种集体活动理应在此举行。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先贤们再次谈及赈济孤魂,据雷虎岭《早逢其雨》碑刻记载:

太平无事,相与盱衡今古。道生民之利病,通万物之欣戚。谈及死无所归者,不觉伤心嗟嗟。贵贱贤否、正极夭寿之不一,其遭亿万斯年,长此寂寂荒丘蔓草之下。托飞鸣而如诉,冒风雨以无聊。情形若绘,难以赅然,不得不思为之所。或曰:“立庙可?”余曰:“吾尊也乎哉,而庙也?”或曰:“岁祭可?”余曰:“吾亲也乎哉,而祭也?”侧闻浮屠之说,三元君皆掌人世生死罪福之籍,而中元则赦罪官也。凡幽魂之沉滞者,遇期列荐,举得上升。呜呼!其信然也,亦何吝而不为?^②

如上所述,这次讨论的重点较之上次有了很大的不同。起初,先贤们心怀恻隐,决议集资于中元之日赈济孤魂,为之济度衣食。历经四年沉淀,单纯的布施已然无法表达众人的悲怜之心,有人便提议为之建庙,考虑到建庙需有主祀,而无祀孤魂众多,随即作罢。庙虽未建,然就这一提议而言,已然透露了许多信息。以常理推之,要想建成庙宇,无论规格大小、集资人数多少,所需花费必然会高出许多,但当时却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加之众人否决建庙的原因是无法确定主祀,足以证明,当时的人们是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

恰巧在此年正月(1766年),高宗皇帝诏曰:“自本年始,普免各省漕粮一次”。^[13]如此大规模的普免全国钱粮,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毋庸置疑,如若经济发展滞后,物质财富匮乏,是不可能发生这种全国性普免钱粮的。另,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王朝统一台湾后,海南在军事上防范、抑制台湾的作用不再凸显,又于次年(1684年)解除海禁,此时清王朝的海疆政策也逐步成型,海洋贸易得以发展。据《乾隆琼山县志》记载,截至乾隆十二年(1747年),仅琼山一县,规模较大、未被废除的墟市便有36处^[14]。加之地处南溟,远离京都,不管是军事亦或政治均无法对王朝构成威胁。因而,朝廷对海南的政策略有宽松,如此种种,极大地促进了海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说四年前(1762年)决议集资赈济孤魂,议定在中元节是众人公议的决定;与之相比,四年后再次将时间定在中元节,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找到了“侧闻浮屠之说,三元君皆掌人世生死罪福之籍,而中元则赦罪官也。凡幽魂之沉滞者,

①注:最初决定为梁公立庙塑像的乡老会由十六个村子组成,分为四坊,如今已有三个村庄自然消亡,剩余十三个村庄依旧分为四坊,共祀梁公。

②碑刻:《早逢其雨》。乾隆三十一年。2022年1月20日笔者于海口市永兴镇建中村委会白马梁公庙所抄。

遇期列荐,举得上升”的“理论依据”。其实从众人认可这句听闻“浮屠”所说的道教理论可以看出,民间对于佛、道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晰,亦或是归因于儒、释、道三教合一在海南民间的具体表征,料想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二)中元·济人

宋元以后,三教合一已成定式,至明,三者之间的关系已然有了质的变化。随着佛、道两家在教理上进一步依附于儒家伦理以及世俗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在民间表现出亦儒、亦道、亦佛的杂糅情状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早逢其雨》碑的后半段还记载了:

是以集缘乙百九十八人,捐金分掌,按本出息,以为赈济之资。而或犹有疑焉,谓天下不乏疲癯残疾之人,其待于施济者无限,独孤魂云乎哉? 讵知此良缘者,不过少伸戚戚难已之怀焉尔! 若夫推焉而溥,俾生而乏养者有以给其养,死而无葬者代为收之葬,非有厚力不能,是所望乎继起者。兹勒之于石。^①

乡野先贤们在商讨赈济孤魂的同时,联想到天下诸多疲癯残疾之人有待施济,奈何力不从心未能将之付诸实践,只能寄希望于后来者。值得一提的是,当地所流传的白马梁公传说中提到:“七月十五日前夕,附近鳏寡孤独及残疾之人集结庙前吃斋膜拜,一连七天七夜,其活动称神庙中元节。”^[15]附近村落的老人也证实道,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传统,不只是请老年人、残疾人吃饭,额外还会给予一些钱粮,这种致力于“老有所养”的实践至今仍有传承。可以肯定的是,当地这种社会群体自发的赈济思想的萌生是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由赈济孤魂到赈济老弱的过渡究竟起于何时,掣肘于史料有限尚无从考究,或可从官方赈济的记载中窥测一二。

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考证,“《月令》:‘仲春振乏绝’。《左传》文公十六年:‘振廩同食’。这里的振就是赈的意思,可见赈济的思想已经发生很早。”^[16]但《正德琼台志》所见官办的救济机构——养济院^{[10]302-304},并未出现在琼山县所设公署之列,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本《琼山县志》也未曾提及,直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本的《琼州府志》中,才略微提及琼山县“养济院”所处位置。至乾隆朝,这一情形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乾隆琼州府志》和《乾隆琼山县志》中详细记录了养济院、普济堂的位置、规制及资产来源等状况,记载如下:

养济院 在城东关内。

普济堂 在五里亭,旧有药王殿。乾隆三十六年,奉行查建普济、育婴二堂,巡道王锦、知府孙琦、知县李玉树捐俸建复堂三进,房四十间,又劝令绅士行商捐银七千两有奇,置田亩收租外,余生息以为堂内支销,巡道德成、知府萧应植、署知县阎睿蒲竣其事,有碑记……一用银四百二十两,置澄迈县土名干班等处田六十四亩三分。印契存县交代。^{[11]203-204}

育婴堂 在北城外天宁寺傍。康熙四十四年,知县王黄建。

养济院 在城东关内。原额孤贫四十五名口,原额银八十七两八钱八分,每名合支银一两九钱五分二厘八毫。^{[14]56-57}

然至道光年间,琼山县普济堂所有银钱田粮已然出现“不敷支給”的状况,还不时有官员移挪动用。诚然,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发展,清王朝已然达到了鼎盛状态,国力足以支撑乾隆皇帝在惠及民生问题上作出更进一步的发展,但同样也离不开乾隆皇帝自身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其在位期间,曾多次下诏,要求各地留心关照鳏寡孤独残疾之人,并实时调整改进相关规定。对民间自发组建的救济事业,也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支持。琼山县先贤们萌发赈济鳏寡孤独残疾者这一理念的时间是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左右,此时距离雍正帝继位尚有三十年之久,期间完全有可能将之付诸实践。王卫平在其论著中也提到:“纵观有清一代,乾隆时期的鳏寡孤独救助政策实施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成为政府社会保障的鼎盛阶段。”^[17]借此,我们可以作出初步的假设,即海口永兴地区,中元节俗由赈鬼到人鬼并举的转变大致发生在乾隆中后期。

①碑刻:《早逢其雨》。乾隆三十一年。2022年1月20日笔者于海口市永兴镇建中村委会白马梁公庙所抄。

上文提到,琼州府琼山县的乡野先贤们,将中元施孤的传统扩大,固定在雷虎岭白马梁公庙这一特定地点,又集众捐资,用以赈济孤魂野鬼。这种将节俗习惯由家庭到群体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地方凝聚力的生成。随后,由赈济孤魂野鬼到施济鳏寡孤独残疾者的理念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地方慈善事业的发展,赋予了中元节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关怀贫困群体的现实观照,淡化了将中元节等同于封建迷信的固有认知。

三、村庄政治:海口中元赈济组织权力运作

中元赈济所描述的是向孤魂野鬼布施、向鳏寡孤独残疾者施济的行为,是中元节俗外化于形的一种展现。归根结底是社会个体行为的累积和叠加,整个赈济活动的举行,从始至终需要不同的个体去负责完成相应的任务,如何统筹规划、分配任务便显得尤为重要。明清及其前,国家权力的正式设置止于县一级,在乡和村则实行地方性自治。^[18]宗族、乡绅作为村落社会的掌权者,处在乡村权力结构的第一梯队,无论大小事务都会参与其中,类似中元赈济这种活动的组织、发起,对主导者在村落社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唯有宗族、乡绅具备或符合这样的条件。

(一)争先恐后的“权钱交易”

从中元节赈济鳏寡孤独残疾者这一理念的提出、践行,至今已有 250 多年,历经两个多世纪的发展,最初管理机构的组织架构和具体的运作模式已然无法彻底复原,唯有解读碑刻信息,并联系现今中元赈济的组织架构尝试进行解读。海口市永兴镇雷虎村委会儒本村所留乾隆三十年(1765 年)“中元募化赈济”的碑刻中对此略有记载(见表 1)。

表 1 乾隆三十年“中元赈济”捐款名单(节选)

中元募化赈济名单																
身份	都会	副会	劝首	劝首	劝首	劝首	劝首	庠生	庠生	庠生	庠生	庠生	约正	监生	榜生	
姓名	吴启贤	徐文荣	王佐	王仁聪	钟文典	李如桂	黄延□	吴伯兴	王仁仁	王□	王之蕃	王国琮	吴明鼎	吴明德	黄应章	王名位
金额	一十六两	三两	二两	二两	二两	二两	二两	一两	一两	一两	一两	一两	一两	三两	四两	四两

注:(表格信息:作者根据碑刻《寒谷回春》^①整理)

名单所列:“都会”,“都”作名词时有“头目”“首领”的意思,作形容词时有“大”的意思,这里可以理解为中元赈济斋会的头目或首领,碑刻中显示:“所有借约交以都会收执。”^①同时在捐款名单中“都会”捐银最多,据此推断“都会”类似于“会首”,属于一种地方性的称谓。但明清之际,雷虎岭附近又被称为“雷虎都”“雷虎图”,这里应是“都图里甲”体系中的“都”“图”,刘志伟教授指出:“都”是里甲编排和乡村地域单位的连接点,既具有确定的地域范围,又成为户籍管理的编排依据。^[19]由此,“都会”可以理解为“一都”的管理者。“都会”出现在中元赈济的募捐名单上极有可能是双重身份的重叠,即此人既是“都图里甲”体系中“都”的管理者,又是中元赈济斋会的“会首”,碑刻中用“都会”取代“会首”显然是一种身份的认同。“劝首”又称“头首”“表首”,即负责统筹本坊民众的人,一般由家境殷实之人担任,也有坊内民众公举选出,亦或是通过“卜筮”的方式选出。“庠生”“监生”“榜生”即所谓身负功名之人。而“约正”,也是地方基层组织的头目,据《广东通志》记载:“凡州县城内及各大乡村,各立讲约之所,设约正一人,于举贡生员内拣选老成有学行者为之。”^[20]在这里极有可能是类似于“庠生”“监生”等身份的一种象征,在负责中元赈济具体的管理事项中:“一议都副劝首人每年按二名掌理修斋,二名掌银出入,二名同斋,递年轮流,上交下接,周而复始。”^①身负功名的士人和“约正”均未负责中元赈济的具体事宜。

雷虎岭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南溟宝筏》碑中同样记载:

会首王启盛,邀集合缘捐资,共得本钱五十千,□簿掌数,每值中元修斋赈济。抽利存本,不得侵蚀。一议各劝首人每人每年□二名,□担斋事二名,伺候道场二名,掌□出入其簿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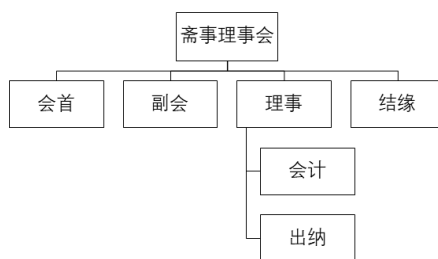
^①碑刻:《寒谷回春》. 乾隆三十年. 2022 年 1 月 20 日笔者于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雷虎村委会儒本村所抄。

务择□□之人□。□□□清出,上交下接毋致差错。^①

可见当时中元赈济的管理是由“劝首”负责,另有专人主管斋事、伺候道场和掌管账目等,且上述岗位的管理人员需每年轮换一次。现今具体的管理模式虽已发生变化,但维持中元赈济的组织架构,也仅仅是在适应国家、社会的基础上进行了略微的调整。采访得知,中元赈济的举办已然不似当初,不再是“年年七月,永以为则”,只有流年不顺或发生重大变故情况下才会举办,当然在一种例外的情形下会连续举办三年,即新修、重建庙宇,至于为何演变至此的问题留待后文讨论。

如今,在白马梁公境域内举办中元赈济,前期需由“管委会”牵头发起,经由梁公同意后,成立专门的“斋事理事会”,后续募捐和活动的正式举办等都由“斋事理事会”统筹负责,刚成立的斋事理事会所有成员均为“理事”。当然,前期消息的散播,宣传工作还是管委会负责操持。等所有愿意“进斋”人员报名结束,便又开始“卜选”头尾,即“会首”“结缘”。“斋事理事会”的管理、后勤人员也会在此过程中逐渐确定,“中元赈济”仪式中的组织架构也相应得以明确(见图1)。

其中“会首”“结缘”人选的确定是通过竞标得来,所有报名“进斋”的人都有资格进行争夺,而“会首”的争夺最为激烈,最终的“交易额”一般会在三四十万,“结缘”竞标的“交易金额”相较于“会首”略低一筹,一般由竞标价款排名第二的人担任,其余副会、会计、出纳则由众人推举产生。也即整个“斋事理事会”的组织架构是由“会首”“副会”“结缘”“会计”“出纳”和若干“理事”构成。



“理事”由若干人构成且人数不定

图1 斋事理事会组织架构

缘何有人愿意斥巨资竞标“会首”“结缘”?当地人将其视为一种行善积德的信仰。究其原因,单从成为“会首”后要负责中元赈济一切事宜的角度而言,存在一定的“权力”因素,但绝少有人是因为贪图主管斋会的权力而去竞标。与其说“权力”不如理解为一种虔诚的祈祷,一种朴素的善恶观。人们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相信“人在做天在看”,那些愿意斥巨资争夺“会首”,甚至所有愿意“进斋”、乐捐的人,无外乎是给自己的捐款找一个有神灵、鬼魂等超自然存在的见证,求一个有舍有得,相比于人为操纵的组织,他们更愿意相信鬼神的见证。

此外,道士主持中元赈济时所作“祝文”,也称之为“发书”,“祝文”中需注明“会首”“结缘”及其他“进斋”人员的姓名,“会首”为头,“结缘”为尾,有头有尾取圆满之意,结合“祝文”中的诸如:

皇天开赦,宥往者乐,而存者安。景泰时和歌盛世,上帝播洪恩,阴亦舒而阳亦畅,风调雨顺乐昇平,财源广进至比美,陶朱之家生齿月,繁踰匹文王之室,五福骈臻,寿比彭祖之龄,三星永照,福似崇石之辈,六畜兴旺,譬如蒙尤之区,五谷丰登,宛若鄱洞之域,家家玉燕投情,户户熊入梦,生生世世,骨泽长流,辈辈恩光普耀。^②

这些对美好生活的夙愿和祈求,由道士向诸天万界祷告。在人们的认知里,祝文中明确指出的“会首”“结缘”或能比之他人得到神灵更多的赐福。

(二)如履薄冰的“政治联盟”

期待超自然存在的真实作为或不作为,是民间信仰存在的主要申诉立场。在中元节这天,人们对“公祖”是一种作为的期待,对孤魂野鬼则是不作为的期待。在“境主”信仰体系中,以集体最熟悉的神明作为群体性认同的文化符号^[21],借助拟制的血缘关系,赋予神明“公祖”的形象,在群体的认可下使得地缘关系更加紧密。但这种看似紧密的关系是显现在对外的交往之中,对内不见得能够长期地维持。尤其是在中元赈济这样的节俗活动中,参与筹备的都是各家各姓、各坊各村的话事人,期间稍有嫌隙就能使得整个仪式联盟分崩离析。道光十年(1830年),海口市长德村委会大效村就曾有中元赈济仪

^①碑刻:《南溟宝筏》. 乾隆二十七年. 2022年1月20日笔者于海口市永兴镇建中村委会白马梁公庙所抄。

^②中元赈济祝文(节选),材料由王·真道士提供。

式联盟崩坏,据碑刻记载:

我大效村数姓联居,合祀境主灵山,历有年岁矣。向前孟兰大斋,与邻村共结一醮,乃人多而心难一,于科仪办理诸大端,难免龃龉,去秋遂有分建之举。又以村小人稀,按名而求,费用维艰,爰各捐资买田以收租税,庶后日逢其斋期,可充支费,而无掣肘之虞。但村中族姓不同,意见各异。前用私钱而皆惮于出头,后用众钱而或争为举首。且有另附斋场,欲于蓄积中分取名下。又有负欠钱数,借其贫穷际以落姓名,高功书表在村内,而思抑勒;人缘执事用众钱,而想覬觐。种种弊端不可枚举,一经忤逆,便有离心,既或离心,终于罢会,殊负举事者之初意矣。^{[22]158}

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类似于中元赈济这种集体活动,创设之初和后续募捐所得的钱款大多会用来置买田地等固定资产,以资产租入来维持正常的运转,如:“从前一逢孟兰胜会,人少力薄,凡科仪支费殊属甚艰,于是甲申年秋,爰集众等,共乐捐资,以免顾虑踌躇。越乙酉年春,尽交捐资以置产业,不日而成,堪称美举。”^{[22]274}这就意味着经费管理人将是一个人人羡慕的差事,何况还有能够操持一切的“会首”之职。在乡土社会的运行机制下,能够在公共事务中担任领导角色,对个人和整个家族而言都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出人头地的成就感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因此,公共事务中的权力争夺,极有可能变成家族与家族、村落与村落之间的角逐。而在世代定居的村落里,任何微小的矛盾、冲突都有可能成为既往纠纷爆发的导火索。外加对有限生存资源的争夺,但凡涉及自我利益的问题都会寸步不让地去争取。反映到个体身上,在利己思想的支配下,从公共事务中谋取私利便会成为一种常态,由此产生分歧、矛盾便会加速联盟的破裂,甚至是不止一次的破裂。据海口市西秀镇长德村委会富屋村保留的道光二十年(1840年)《孟兰会记碑》碑刻显示:

乃人缘不一,而心术难齐,自道光己丑年间,大效已分一首。越戊秋,后博、崇南二村,又取名下之钱,各回分立。惟我富屋、博崇、玳美遐海滨各诸村人念夫境神之正直,思其后事之举行,爰竭同心,捐资买田,收租掌置。^{[22]166}

“后博、崇南二村”于道光戊戌年即道光十八年(1838年)退出联盟各自分立,距离大效村分立尚且不足十年,富屋等村再次置办起中元赈济已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年左右的时间原本统一的仪式联盟两度破裂。事实上这其中也隐含着乡土社会权力更替的周期。假设,大效村分立前活跃在乡村政治舞台的是一群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联系古代早婚早育的情况,十年的光景足够他们的后辈崭露头角,新生代逐渐开始掌权,也就意味着旧的格局和秩序面临被打破的风险。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可能存在的假设,碑刻记载的信息所能反馈出来的,导致联盟破裂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人心不齐和争权夺利,这种一概而论的解释显然不足以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因为联盟的破裂仍在继续,直至最后彻底瓦解,富屋村所存光绪十二年(1886年)富屋天尾孟兰碑碑刻记载:

睹兹断碣残碑,依依如昨也。顾人以远近而思虑难齐,事因向背而今昔屡变。前所分名各立者,无庸论矣。乃顷者乙亥年,博崇北两村复蹈故辙,岂复有厚意耶?递至乙酉岁,众虑前业之渐稀,因思创捐以补阙,而美遐村又复有异意焉。^{[22]277}

可见即便当时人们对联盟破裂心生惋惜,却也无计可施。比之雷虎岭的白马梁公庙,大效村的村庙更具“多神共祀”的特点,庙中所供神像多达十余位,素有“满堂官将”之称,这也就意味着个体之间在信仰对象的选择上会出现一定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就会形成不同的信仰群体,而不同群体间由于各种利益的纠葛又很容易产生矛盾,同时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到仪式联盟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上。雷虎岭白马梁公庙虽然也有“多神共祀”的现象,但“梁公”和“梁姑”两位神祇是以亲兄妹的关系形象印刻在集体记忆中,神祇之间浓厚的血缘关系淡化了人们心中对于两位神祇主次地位的区分,不论个体做何选择,始终与“梁公”紧密相连,更何况“梁姑”的存在并未影响到“梁公”的主祀地位,这或许是雷虎岭“四坊十六村”的信仰联盟能够传承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四坊十六村”的村民当然也发生一些矛盾冲突,但也仅限于某一年由哪个

村子负责迎接白马梁公和年会活动、由哪个村子主办的问题,并未发生严重到影响整个联盟存亡的冲突。当然,这也得益于白马梁公管委会的及时介入,几经商讨,最终决定以“琰卜”的方式解决上述矛盾。在所有与信仰相关的事务中,但凡出现人为无法解决的问题,便会以借助“琰卜”,并将白马梁公的旨意寓意其中,如此便又能统一众人的意见,而这也构建起了海南乡野间最传统的规则与秩序。

四、秩序构建:中元赈济仪式展演与地方社会互动

上文提到,原先是一年举办一次中元赈济,每年中元节前夕,一众“劝首”根据当年资金多少,商议斋事的规模大小。如今要想举办中元赈济,仅仅是商议举办与否的问题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中元赈济的举办难度急剧增大。此外,原先的中元赈济不只是祭拜鬼神、施济贫弱,还包括了“死葬”的内容。据碑刻记载:“凡有归故无依、未有棺版者,劝首人酌议收此利银,买棺墓之。”^①生养死葬都囊括进了中元赈济的范畴之内,这种游离在国家救济体系之外的赈济方式应属于中元节俗积极性的延伸。

(一)周期变化与具象的表达

从前“年年七月,永以为则”的中元赈济,现如今只有在流年不利或发生重大变故、大众呼声极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举办,此外就是重修、新建庙宇后会连续举办三年。一方面是因为缺少稳定的经济收入,中元赈济创设之初,是置办了专门用来维持开销的田产。如碑刻记载:“众等持□买到土名官地地乙丘,种子二斗,载米七合正。每年□□□二千四出税,□为中元施孤之费。”^②联系当时的社会环境,米面粮油的需求应是最为紧要,依靠当时田产的收益和往年的积累是可以满足这一需求的。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原本可以自行置办的事物大量地商品化、市场化,种植农作物的收益也日渐萎缩,迫使依靠土地维系发展的赈济活动不得不作出适应性的改变。另一方面,创设之初赈济鳏寡孤独残疾者,为其提供餐食,解决温饱即可。但现在的赈济,除了提供餐食,还需发放“施阳款”即现金和物品,2020年海口市龙泉镇登云坊所办中元赈济就曾发放人民币160元,外加大米两袋、油一瓶。这里的大米和油虽说是以物资的形态发放,但终归不是以田产收益来支付的。粗略统计,除布置“道场”的场地不用出钱租借,其余所有的中元赈济周边,均需花费大量的资金。外加今时今日的海南固定的“庙产”并不多见,即便有也未必能产生经济收益,而专门用来举办中元赈济的资产更是无从谈起。现今的中元赈济,没有常设的组织机构,也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更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仅靠募捐能够有所传承已属不易。

至于重修、新建庙宇之后为何能够连续举办三年,事实上庙宇重修、新建所需要的周期只会更长,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有可能,能够与中元赈济联系在一起,也是得益于中元节这天“地官赦罪”的说法。在人们的认知中,重修、新建庙宇固然是为了信仰的神祇更加灵验,但也深知如此举动会破坏原先的秩序或状态,即阴阳失衡。为避免因破坏平衡而遭遇不幸,庙宇建成后祭祀神灵、施济孤魂野鬼便成了必要的补救措施。至于救济弱势群体,一方面是行善积德、对善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将信仰具象化的一种手段。事实上民间所有的信仰活动都有其具象化的表现方式,祭拜时燃烧香烛产生的缕缕青烟,放鞭炮时的声响,烧冥币所产生的光亮、烟雾、灰烬等等,似乎真的能沟通神鬼,人们的感官也能够很明显地感知到。唯独给孤魂野鬼施济的钱财去向何处无从感知,故而把对鬼神的施济,以人的方式嫁接给鳏寡孤独残疾者,一方面能为人们所感知,另一方面人们相信如此善举能够积累功德。借此人们也愿意相信赈济是能够落到实处,也能惠及自身。

(二)权力让渡与仪式展演

整个中元赈济虽说由“会首”统筹负责,但也仅限于负责筹备和善后工作。前期的募捐、筹备工作完成后,最重要的是确定做斋的道士,这里的道士泛指中元赈济请到的所有道士,一旦人选固定,“会首”的领导职能就会逐渐被所请道士群体中“受箓”道士取代,“会首”需根据道士的要求合理地安排一应事

①碑刻:《寒谷回春》。乾隆三十年。2022年1月20日笔者于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雷虎村委会儒本村所抄。

②碑刻:《早逢其雨》。乾隆三十一年。2022年1月20日笔者于海口市永兴镇建中村委会白马梁公庙所抄。

宜。这种权力的过渡,在仪式进行的过程中是最明显的,仪式当天,所有“进斋”的人员都归道士管理,烧香、鸣炮、跪拜、叩头等诸多事项都要严格按照道士的指引进行,仪式结束后权力又会自然地回归到“会首”这边,期间没有固定的流程,也没有明显的交接形式,“会首”会自觉、主动地移交权力。发生这种权力的让渡是仪式本身专业性的要求,也是道士这一职业特殊性和专业性的体现。对道士而言,能够被聘请是对其职业能力的一种认可和肯定,同时也是对道士本身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水平的考验。

中元赈济的诸多仪式都是在固定的场地进行,即所谓的道场。道场的规模大小与“进斋”人数是成正比的,人数越多规模越大。道场的陈设、布置上也与其他斋会不同,中元赈济道场的门口会放置纸扎的郁垒、神荼两位门神,道场内会根据方位设置纸扎的“天庭”和“地府”。虽然不同村落举办中元赈济时,道场内的具体陈列各有差异,但却有一些共同点:最上方一定会供着三清神像以及玉皇和十殿阎罗等诸神的神像或神位。另外,中元赈济每天所举行的科目也有所不同,以 2022 年海口市龙泉镇登云坊举办的中元赈济为例,每天的科目安排有:

接师、安师、启师、扬幡品、关奏品、开光符吏品、开光诸神品、开辟品、建坛品、建天地品、建外神品、各建品、各安品、启师品、净坛朝品、谢师品……第九天:扬幡品、启师品、沉溺朝、谢师品、启师品、十王朝品、谢师品、破池狱品、过十殿品、过三桥品、望乡台哭孤魂品。扬幡品、渡黄河品、炼度品、供王赈济品、启师品、庆祝中元朝品、谢师品。扬幡品、启师品、散坛朝品、谢师品、关灯品、送灯品、奉醮品、施孤品。斋醮告竣,功德无量。^①

这里的每一品都代表了一个主题的科仪,每一品在内容上有所区别,但程序大体上是一致的,基本都是按照道士的节奏有序地推进。

科仪圆满结束后,便开始施济人间的鳏寡孤独残疾者。中元节的赈济款项,其发放标准依据募集资金的多少而灵活调整,资金充裕时,赈济物资自然更为丰富多样。在选择救济对象时,“斋事理事会”会借助政府出具的相关证明,如残疾证、五保户证明等,这是整个赈济活动中对政府力量直接且有效的运用。在“施阳款”发放期间,凡是持有政府证明的人,均可在赈济现场领取物资。此外,未参与“进斋”的信众亦会慷慨解囊,以个人名义向道场内的鳏寡孤独残疾者布施。这样一来,所有参与“进斋”的个体便形成了一个临时的集体——斋事理事会,绝大多数的赈济活动由理事会负责协调,而祭祀鬼神、施济孤魂野鬼的具体事宜则通过道士完成。与此同时,所有“进斋”的个体会以个人名义祭拜鬼神,至于未“进斋”的人们,也会各自祭拜鬼神,并以个人名义进行赈济。而作为被赈济对象的鳏寡孤独残疾者们,同样会在仪式开始或结束时祭拜神鬼,只在赈济活动进行时是以“受众”角色存在,具体的结构关系如图 2 所示。

乡土社会的互助关系正是借助神和鬼这一特殊的媒介得以发展,个体在敬畏心理的驱使下自觉或自由地组成一个群体,再以群体的力量去完成每个个体的心愿。这种自发组成的社会群体在作用于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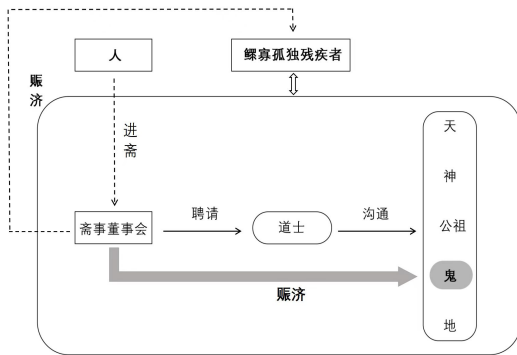


图 2 “中元赈济”仪式结构关系图

①2022年海南省海口市龙泉镇十字路登云坊中元赈济十三日斋节日录。

下社会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未来的社会发展。每一个独立的个体联结在一起,又以群体的力量辐射着周边的每一个个体。不管是对神灵的崇拜、对鬼魂的畏惧,还是对鳏寡孤独残疾者的关怀,都是以一种集体记忆传承和发展,这既是“善”的发扬,也是对范围内社会观念的塑造。事实上不管是祭祀神灵、赈济孤魂野鬼,还是布施弱势群体,所展现的都是一种持善心、行善事、正善念的“中元精神”,所隐含的是乡土社会个体、群体和权威的互动过程。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下,挖掘传统节日和民俗文化的积极因素,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是学界和社会较为关注的重大命题。中元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在海南经历了本土的演变,同当地民间信仰文化和社会公益事业紧密相连,具有地方性和互动性特征。

五、结语

需要强调的是,“中元赈济”在海南民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据笔者近三年来的调研发现,该仪式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从现实角度看,其开放、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海口市龙桥镇儒扬村和遵谭镇卜创村举办“中元赈济”仪式所筹善款来自各个乡镇、市县,即便对这两境域并不熟知也未曾信仰此间神祇,但只要听闻举办“中元赈济”,人们都愿意慷慨解囊,既为“施阴”也为“布阳”的信仰理念深入人心。其二,仪式所能惠及的以残疾人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同样来自四面八方。正是这种“强”对“弱”无条件的帮扶,促使中元节迸发出新的生命力。这种源于民间的赈济手段甚至也可成为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补充,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关怀和帮助,在助推慈善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和谐乡村、和谐社会的建设。

总而言之,中元赈济是中元节俗在海南本土演化的结果,与海南的民间信仰文化紧密相连。其演化过程经历了祭祖——赈鬼——济人三个阶段,以中元节为基础,将敬天法祖、亲情孝道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促使中元节俗从主祀鬼神的信仰形态转变为赈济贫苦的现实关照;也使中元节本就具备的家庭伦理观念和对善的追求更加突显,在助推慈善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和谐乡村、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国的传统节俗本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对中华民族伦理道德、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塑造作用。“中元赈济”的出现使得人们对中元节的关注逐渐从传统的祭祀转向了社会救助和慈善活动,这种转变使得中元节不仅仅是一个弘扬祭祀传统的节日,更成为一个弘扬慈善、救济精神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中元节的信仰观念逐渐被社会救助、互助理念所取代,使得节日的内涵和意义得到了新的延伸和丰富。通过赈济仪式,人们在传承传统的同时,也积极回应社会的需求,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 太史文. 幽灵的节日 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M]. 侯旭东,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 [2] 高洪兴. 中国鬼节与阴阳五行:从清明节和中元节说起[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132-140.
- [3] 吕鹏志. 中国中古时代的佛道混合仪式——道教中元节起源新探[J]. 世界宗教研究,2020(02):101-108.
- [4] 吕鹏志. 灵宝三元斋和道教中元节——《太上洞玄灵宝三元品戒经》考论[J]. 文史,2013(01):151-174.
- [5] 许春清,张咏涛. 中国传统鬼节及其法文化意蕴[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4):40-47.
- [6] 陈雄,陈成国. 从孟秋时祭、中元节、盂兰盆节看儒释道三教交流[J]. 中华文化论坛,2019(02):112-119.
- [7] 王琛发. 朝野互动:海口府城中元节俗历史以来的面貌演变[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4):60-75.
- [8] 高泽强. 海南中元节文化初探,来自公众号“南宗宗坛”[EB/OL]. (2023-07-23)[2023-09-22]. <https://mp.weixin.qq.com/s/Jkh4UsJErXRbfCpgTnmGaQ>.
- [9] 赵翼. 陔余丛考·卷三十五[M]/杨荫深. 神仙鬼怪.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9.
- [10] 唐胄. 正德琼台志[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144.
- [11] 萧应植修. 乾隆琼州府志·卷二[M]. 陈景坝,纂.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78.
- [12] 明谊. 道光琼州府志[M]. 张岳崧,纂.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101.
- [13] 张家林. 二十五史精编 清史稿[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81.

- [14] 杨宗秉纂修. 乾隆琼山县志[M]. 王秀臣, 点校.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6: 101.
- [15] 梁统兴. 琼台胜迹记: 琼山卷[M].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0: 35.
- [16] 邓云特. 中国救荒史[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20: 166.
- [17] 王卫平, 葛琦. 清朝乾隆时期救助鳏寡孤独的理念与措施[J]. 江海学刊, 2015(05): 157-162.
- [18] 肖唐鏢. 从正式治理者到非正式治理者——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变迁[J]. 东岳论丛, 2008(05): 118-124.
- [19] 刘志伟.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 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41.
- [20] 郝玉麟. 广东通志·卷八[M]//顺德县志 清咸丰 民国合订本. 顺德市地方志办公室, 点校.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3: 179.
- [21] 王琛发, 宋丹. 本境的存在: 海口府城公期信俗考察[J]. 艺术与民俗, 2021(01): 78-86.
- [22] 周文彰, 周伟民. 海南碑碣匾铭额图志: 秀英卷[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16: 158.

(责任编辑: 李莉)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Hainan Zhongyuan Relief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Local Society

——A Case Study of the Belief of Divine General Liang Teng in Haikou

LI Shuang¹, CHU Chun-lin²

(1. College of Nationalities,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0, China;

2. Party School of Pinglia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Pingliang 744000, China)

Abstract: "Zhongyuan Relief", a social relief activity for widows, orphans, the lonely and the disabled in the Zhongyuan Festival held by the folk in northern Hainan, integrates the relief culture and the customs of the Zhongyuan Festival and highligh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welfare in Hainan's traditional festivals. Taking the influential Temple for divine general Liang Teng (Bai Ma Liang Gong Temple) in Haikou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rigin,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interaction with local society of Zhongyuan relief in Hainan Province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scription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Zhongyuan Relief" is the result of the evolution of Zhongyuan Festival Festival customs in Hainan, which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folk belief culture and social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s in Hainan, with significant local and interactive characteristics, for with the appearance of "Zhongyuan Relief", people's attention to Zhongyuan Festival Festival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raditional sacrifice to social assistance and charity activities.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 exploration of the positive factors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and folk culture not only stimulates the vitality of traditional festival folk culture, but also promotes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Key words: Zhongyuan Festival; Zhongyuan relief; local society; Hainan; divine general Liang Teng(Bai Ma Liang Gong)